

# 目 录

- 口没遮拦的人 ..... 王丽亚 译 郭建中 校 [ 1 ]
- 今天过得怎么样 ..... 郭建中 译 [ 72 ]
- 泽特兰：人格见证 ..... 郭少波 译 [189]
- 银 碟 ..... 聂振雄 译 [210]
- 堂表亲戚们 ..... 石雅芳 译 [246]

# 译 序

把这个带点学究气的题目跟索尔·贝娄联系起来，这并非异想天开。不过，我在这里并不想以烦琐的学理分析来烦难读者，尽管 20 世纪的在世作家中，我们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位，他对当代人类思想的关注程度，他本人思想的深刻性及其所达到的高度，堪与贝娄相提并论。

当被问及“我们如何判断世界”时，通常的回答是：我们拥有一套评价事物的标准和尺度。然而，当进一步追问，这套标准和尺度从何而来？再进一步，从根本上说，你如何证明该标准与尺度的合理性？这种时候，我们通常不是瞠目以对，就是以“从来如此”“习惯使然”等等加以搪塞。

瞠目以对，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如此繁忙之中，以至早已忘掉了反思的必要性；以“从来如此”、“习惯使然”等等为由逃避进一步追问，是因为所谓的“传统”或“文化”常常构成我们非反思的生活的屏障。可是，索尔·贝娄却不然。他让他笔下的人物在存在问题的追问下无处逃遁。

索尔·贝娄所处理的题材，基本上是欧洲（特别是东欧）犹太人在美国的归化。十分明显地，这里会出现两个问题。其一，一种古老的文化（犹太文化）如何现代化？其二，一个外国移民

如何美国化？时间与空间的这种本质性交错所导致的眩晕，令索尔·贝娄的世界精彩纷呈，它们所达到的巨大的包容性和综合性往往使人眼花缭乱。

可以想像的两种基本答案是：诉诸未来的进步话语和诉诸物质主义的现实话语。前者要求牺牲掉大部分的怀乡症（这种怀乡症情绪在《泽特兰：人格见证》这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短篇中得到了诗一般的再现）；后者则以抹杀灵魂作为代价。这些问题通常以索尔·贝娄的如下方式典型地加以表现：

成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抽象目标。你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里，你得到了最合情合理的建议，你接受了它，找到了目标。而在新的概念之下，你又迷失了。他们要求你断然放弃个人的判断力。……一旦接受了新的概念，你就再也无须担心是非善恶了。不用顾虑善恶的借口是你已经在教育上倾注了心血。你在有限的科目上努力用功，掌握了它，你便永远清醒了。你会说：“负罪感必须消亡。人类有权享受没有罪感的快乐。”上了这宝贵的一课，你现在就能接受女儿混乱的性生活了，而这在过去会使你休克。（《堂表亲戚们》）

我认为我们已经来到了索尔·贝娄全部作品的入口处。为了使自己适应“新概念”，人们拼命“教育”自己，教育自己的结果是，当他们面对恶俗的现实时，就能以“现代性”为借口，使自己的心理保持平衡。在古老的传统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问题上如此，在外来人如何归化于本土的问题上，亦复如是。贝娄笔下的人物说：

菲力普为了实现完全美国化，投身到了特蕾西的怀中。为了这一（早已过时的）殊荣，他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也许他一直怀疑是否真有灵魂这种东西存在。他之所以讨厌我，就是因为我不断地对他暗示，灵魂是存在的。（《口没遮拦的人》）

怀疑乃至拒绝灵魂的存在，就是为了适应那个日益物质化的、粗俗的、凯列班式的美国！

世界的美国化进程无疑也是近代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整个人类的非神圣化的进程。因此，索尔·贝娄所处理的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个案性或地方性的意义，成为本世纪人类思想的一般焦点。海德格尔（作为 20 世纪少有的原创性思想家，曾经反复出现在索尔·贝娄笔下）就曾经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技术的时代”，并把它跟“美国方式”联系起来，虽说“美国方式”本身也是欧洲的产物，即欧洲形而上学思维的产物。这种思维将人确立为与世界面对的“主体”，而世界则成为与人面对的“图像”。于是，作为可计算的对象，世界的物质性便被视为惟一的实在性，工具理性因而主宰一切，事功则一跃而为真理的同义语。只有从这样的高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世界的非神圣化、技术化和美国化其实是同一回事；也只有从这样的起点出发，我们对索尔·贝娄的理解才不至流于肤浅。

索尔·贝娄的主人公陷于生活的支离破碎之中。世界在崩溃。原有的秩序已不复存在，只有碎片纷纷下落，贝娄的主人公们总想紧紧抓住什么。可那是什么呢？他们笨拙地跌进一个个泥坑，不是由情感的、财产的和生活的问题所引发的、人为设计的陷阱，就是由律师、警察、法庭所组成的无法逃避的法网。他们的厄运多半咎由自取，这正如他们的笨拙也完全要怪他们自己。用

社会学的术语来讲，他们是一些没有很好地“社会化”的人，即固执地守住某个自我，拒绝与社会认同。“口没遮拦的人”肖穆特的自供状，其实是一份人格成长和自我发现的出色的说明书和回忆录，在其中，小人物的愤懑和压抑升华为“口没遮拦”的妙语格言。正是这种小人物式的幽默使他吃足了苦头，因为这个社会纵然会对大人物的失语和口误报以热烈的掌声，却对小人物的幽默毫不动情！与此同理，“众堂表亲”眼里的艾扎，也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怪物”。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跟“怪物”是一对同义语。可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啊！“知识分子”等同于“怪物”的命运当然不止在美国中下层文化中存在，那里的玩世现实主义被当作唯一的社会现实和真理，那里的精神和价值这类词就会跟恶俗的气味联系在一起（诸如“臭老九”、“酸溜溜”等等）。

然而，把索尔·贝娄描述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和救世者，并不总是公正的。在著名的短篇《银碟》中，那位年届六十，游历过世上种种有趣的地方，观看过最下流的脱衣舞表演的叙述人，在埋葬了他的老父亲以后的一个星期里，陷入了某种跟《伊凡·伊里奇之死》和《乞力马扎罗的雪》十分相似的情境之中。当暮色四合、钟声响起的时候，这个老人回忆起父亲和自己的一生。人们常说，棺盖论定，然而我们发现这位老人无法对他父亲作出定论，诚然，父亲那玩世不恭的一生不能说没有缺憾，但跟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即叙述人的父亲和妹妹们）相比，父亲的生活要丰富多彩得多，而后者，执著于天国之乐的信者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却从来没有真正生活过！因此把索尔·贝娄理解为理想主义者，必定跟把他想像为玩世主义者一样，两者距离真正的索尔·贝娄都十分遥远。

与贝娄笔下的大多数主人公相仿佛，我们情愿把贝娄本人看做一位濒于绝望，但终于没有丧失希望的“期待者”，一位坚信

价值王国的存在，聆听着“内心声音”的人，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虽然也不免有几分“怪异”。贝娄相信价值王国的存在，是因为，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法判断现实王国，这正如如果没有另一维度的支点和坐标，我们就无法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我认为，以下这段话是真正能够代表贝娄本人心迹的肺腑之言，借着维克托，这位被誉为当代“思想大师”的老人之口，索尔·贝娄表达了他对世界（包括现实世界和价值王国）的根本看法：

艺术应该像你呼吸的空气和你喝的水一样，成为生活所必需，像营养和真理一样必需。维克托了解问题的实质，要是你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告诉你，没有艺术，我们就无法判断生活，也就根本无法区别和整理一切事物。（《今天过得怎么样》）

沈语冰

1998年元月于杭州

# 口没遮拦的人

亲爱的罗斯小姐：我几乎想用“亲爱的孩子”来称呼你，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三十五年前对你开的那次玩笑，使我们互相都可把对方当做孩子来对待。多年来，我常常回忆起我对你开的那个恶劣的玩笑，使你深受伤害；我自己也一直为此深感不安。但是，直到最近，我才真正意识到，我对你开的玩笑实在太缺德、太恶劣、太下流、太伤人、太无情、太缺乏教养了。你永远也无法忘记这次玩笑。我对你造成了一辈子的伤害。大家都认为我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这就更加重了我的罪孽，因为我对你的侮辱，完全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点头之交而已，互相根本不了解。今天，有人谴责我对你太残酷了；当然，此人对我本来就没有好感，他显然是故意要对我进行报复。然而，即使如此，自从读了他对我的指控后，我还是大为震惊。他的信寄到时，我身体正好很不好。像许多老年人一样，我不得不吞服各种各样的药片。因高血压和心脏毛病，我得吃英德拉尔和奎尼丁。由于各种心理原因，我一直性情忧郁，而此时此刻，已失去自我防御<sup>①</sup>的能力。

---

① 自我防御：精神分析学派用语，指用无意识的防御机制保卫自我。

我要告诉你，几个月来，我一直在拜访一个老妇人，她读斯维登堡<sup>①</sup>和其他神秘作家的作品。知道了这一点，你也许能更清楚我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她对我说（对一个六十多岁的人来说，不可能不相信这种话）人有来世。等着瞧吧，在来世，你会感受今生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我们将遭受给别人造成的一切痛苦，因为，在来世，一切经历都会颠倒过来。我们将进入今世我们熟悉的人的灵魂，他们也会进入我们的灵魂，并从内心感受和评判我们自己。这位加拿大老妇人的话不太可能是真的。但我必须把这件事告诉你。尽管我本意并未想伤害你，但伤害照样是十分严重的。

我不会把这一切都告诉罗斯小姐的，我将改写一下，只对她说一些可以对她说的话。

……现在我活着，还有可能做些弥补……

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可能你只记得我就是伤害你的人。那时候，我高个子，黑皮肤，留着一撮不太浓的小胡子；我的长相很突出，有点儿驼背，有点儿滑稽相。如果你能记起当年的肖穆特，你现在应该来看看他。西班牙名画家戈雅<sup>②</sup>给自己的一幅蚀刻画取名为《老年人的不幸》，画中的一个老人哆哆嗦嗦地从马桶上站起来，裤子掉到了脚踝处。正如哈姆雷特恶毒地对波洛尼厄斯<sup>③</sup>所说的，“他们的两腿是摇摇摆摆的。”这当然是挖苦老年人的话。除了上述毛病外，牙齿也不好，牙根断裂，牙周炎需服

---

① 斯维登堡（1688~1772）：瑞典科学家和神学家，从研究自然科学转向神学。其通灵幻象和对《圣经》的神秘解释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基础。著有《天国的奥秘》、《耶路撒冷》。

②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作品讽刺封建社会的腐败，控诉侵略者的凶残，对欧洲19世纪绘画很有影响。作品有钢版组画《狂想曲》、版画《战争的灾难》等。

③ 波洛尼厄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饶舌、自负的老奸臣。

抗生素，而抗生素又引起腹泻；腹泻又引起痔疮——已有核桃那么大了。手上还患有关节炎。这儿，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冬天又阴沉，又潮湿。我是在这儿避难的，现在我将被引渡。一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右手的中指有点不对头。关节僵硬，并弯曲起来，看上去像只蜗牛——又增加了一种新的病痛。这真可谓是罪有应得！而引渡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我已收到了传票。

这样，来世我至少减少了一样痛苦。

我这么唠唠叨叨，听起来似乎三十五年后，我在抱怨我自己的厄运。但你很快就会明白，事实并非如此。

我是通过里比耶大学的达索萨才找到你的。那是四十年代后期，我们都是同事。她仍住在那儿，在马萨诸塞州；十九世纪的许多古老的建筑还耸立在那儿。我的事在报上登出来之后，她给我写了封信——这件事既愚蠢，又令人难堪！当然，她是一个善良聪明的女人，像你一样——我可以这么说吗？一直是单身。我给她去了回信表示感谢，并问她有关你的情况。她回信告诉我，你已是一位退休的图书馆管理员了，现住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妒忌退休的人——当然，那时我也有可能退休。可现在对我来说，退休是不可能了。我兄弟死时，债台高筑；他的债依法转嫁到我的头上。我不想详细告诉你这件事；有关此事，报上尽是歪曲的报导。我只想告诉你，我兄弟罪大恶极，我自己又愚不可及，或者也可以说是心怀叵测，结果，把我彻底毁了。我想对你说这一点就足够了。听了律师不当的建议，我逃到加拿大来避难。因为我试图逃避，法院将会对我作出严厉的惩罚。也许，我不会坐牢，但我必须工作到死——见他妈的鬼——工作到死！就像一匹马拖着重负一直拉到指定的山顶。我父亲喜欢这么一个寓言：一匹老马被赶车人狠命鞭打。一位过路人

对赶车人说：“马驮的货够重了，山又陡，再怎么打这匹老马也没用，你为什么还要打它呢？”“是它自己要做马。”赶车人说。

我一生的毛病就是喜欢这种犹太式的幽默。这对你来说也许是很不习惯的，倒不仅是因为你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这是达索萨说的），还因为你是个（计算机时代以前的）图书馆管理员，完全是属于另一类人——是一种安静的人，整天与杜威十进分类法打交道。也许，你不喜欢过修女或牧羊女的生活，尽管“图书馆管理员”这个词曾一度比做修女或牧羊女。把你隔在现代“活动”的外面，你也许心怀不满——那种色情的、吸毒成瘾的、猥亵粗俗的现代生活。也许，你根本不喜欢把那些无视法律的色情书或充满邪恶的书借进借出（请相信我，罗斯小姐，这些书大部分都是捏造的）。我想，请容许我这么说，你是一个老派的人，不会因能过一种有益于社会的生活而心怀不满。要是你不是老派的人，我对你的伤害也就不会那么严重了。现代女性没有一个会对这种愚蠢的俏皮话痛苦一辈子的。她会说，“走开，别来烦我！”

是谁谴责我伤害了你呢？埃迪·瓦利施。就是他！他对我说的。他现在是密苏里州高等学校人文学科调查处的主要规划人。做这种工作，他棒极了，简直是个天才。然而，尽管他现在住在密苏里州，脑子里却似乎只有过去的马萨诸塞州。他无法忘记我做的坏事。我做坏事时他在场（不管是否真的在场），他是这样写的：“我必须提醒你，你是怎样伤害卡拉·罗斯的。只有你才会那样做！她想对你说一些好话，你不仅不领情，还当面使她难堪。我恰好知道，你伤害了她一辈子。”（你看，美国英语被用来折磨人了：“只有你才会那样做。”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不是个好人，肖穆特。”）你的心真的受了伤害了吗，罗斯小姐？瓦利施怎么“恰好知道呢”？是你告诉他的吗？或者，像我猜想的那样，这只不过是流言蜚语而已？我不知道你是否真的还记得这

件事。如果你不记得了，那真是幸运了。我不想把不愉快的回忆强加给你。但是，如果我真的无情地丑化了你，那有没有办法忘掉呢？

让我们再到里比耶大学去一次吧。那时，瓦利施和我是好朋友。我俩都是年轻的讲师，他教文学，我教轶事艺术——我的专业是音乐史。我这么说，好像你对我一无所知似的；我写的关于佩戈莱西<sup>①</sup>的书，每个图书馆里都有。你不可能没看到过或没借出过这本书。此外，我还在公共电视上主持音乐理论节目，颇受观众欢迎。

我们回到四十年代去吧。劳动节<sup>②</sup>后就开学了。在里比耶大学是我第一次获得的教职。开学后的七八个星期后，我还沉浸在兴奋之中。让我先描述一下新英格兰优美的环境吧。我是芝加哥人，在布卢明顿大学获得学位的。那时，我刚从那儿来到新英格兰。我从未看到过桦树、路边的蕨类植物、茂密的松树林和白色的教堂小尖顶。在这样的环境中，我只能感到自己和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当人家叫我“肖穆特博士”时，我真想高声大笑。在这儿，我犹如乡村草坪上的一只骆驼，自己也感到荒唐可笑。我是个高个子，上身短，下身长，自己也感到自己的形象有点不合时宜，滑稽可笑。我对里比耶大学的一切也还不太了解。这所大学不能说是真正的新英格兰大学。这是一所纽约纨绔子弟的大学，他们害怕进好大学，怕无法适应。

那时，埃迪·瓦利施和我正一起走过学校的图书馆。秋日暖洋洋的，而周围的树林又送来阵阵凉意，使人感到十分惬意。这

---

① 佩戈莱西（1710～1736）：意大利作曲家，代表作为《女佣作主妇》；还有宗教音乐《圣母哀悼》和《F调弥撒曲》等。

② 劳动节：美国、加拿大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就是我当时所处的环境。图书馆是一座希腊式的复古建筑，阳台上充满了柔和的阳光——阳台的柱子上长着地衣，地上布满苔藓，阳光透过树叶，呈现一片明亮的绿色。此景此情，令我心情荡漾，近乎狂热，或有点儿飘飘然了。当时，我和瓦利施的关系很单纯：我俩相处得挺愉快，两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没有一丝一毫的阴影。我热切地向他学习，因为从未见过一个如此进步的大学，从未在东部生活过，也从未接触过东部社会——关于这一切，我来之前已听说了不少。东部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上面分配我做一个女学生的导师，可这女孩子竟然要求换个导师，理由是我没有经过心理分析，根本无法与她沟通交流。当天上午，我们委员会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讨论历史课是否应是主修艺术的学生必修课。绘画教授托尼·莱姆尼策说：“让年轻人读读国王和王后的轶事有什么坏处呢？”来自布鲁克林<sup>①</sup>的托尼，从家里出走，到马戏团里当了个场地工，后来成了个画海报的艺术家，最终成了抽象派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别可怜托尼，”瓦利施对我说，“他娶了个百万富婆。她给他造了个画室，简直可以配得上给米开朗基罗<sup>②</sup>造的画室。他不好意思在这样的画室里做画，只是在里面吹口哨。他在一只鸟笼里雕了两个木球。”瓦利施自己是个早期的嬉皮士，哈佛出身；开始他还怀疑我对东部生活的无知是假装出来的。瓦利施身材矮小，又是个瘸子。他看着我——仰起头看着我——他目光锐利，嘴角边流露出一股不信任的神情。我，一个芝加哥人，在印地安那的布卢明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难道会这么落后吗？可我为人和善好相处。后来，他告诉我（这可算是个秘密吗？）他是马萨诸塞州格洛斯特市人，而不

---

① 布鲁克林：美国纽约市行政区名。

② 米开朗基罗（1475~1736）：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

是地地道道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第二代的美国人，原是个退休的海军机械军士长，没受过教育。他给他儿子写过这样一封信：“你可怜的母亲——医生说，她子宫里长了个肿瘤，一定得开刀。她去动手术时，我真希望你和你的妹妹能在我身边。”

在我们学校里有两个瘸子，他们的名字也很相似。另一个是埃迪蒙·韦尔奇。他是治安法官，走路要用拐杖。而我们的埃迪，患有脊柱弯曲的毛病，但他不愿用拐杖，更不喜欢穿后跟垫高的鞋子。矫形外科医生警告他说，他的脊柱会像一堆多米诺骨牌一样倒塌下来。自由自在，到处跷来跷去，这是他的风度。他走过来时，你不可能不注意到他，这是无法回避的。对此，我对他深表钦佩。

那天，罗斯小姐，你刚从图书馆出来，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双臂交叉，把头斜靠在一根希腊柱子上。瓦利施头发留得浓浓的，这样使他看上去显得高一些。头上当然无法再戴帽子。我那天则戴了顶棒球帽。这时，罗斯小姐，你笑着对我说，“喔，肖穆特博士，你戴了这顶帽子，看上去像个考古学家。”我却随口应道：“而你却像我刚挖出来的老古董。”

真是糟糕透顶！

我们两个人——埃迪和我——继续匆匆向前走去。埃迪的嘴巴都歪了，极力加快步子向前走。当我们走出你那神圣的视线时，我看到埃迪张嘴冲我笑着，他仰起脸看着我，脸部表情充满热情和欢愉，又掺杂着些许钦佩和指责。他目睹了非同寻常的一幕。这一幕是什么？是玩笑？是神经有毛病？抑或是邪恶？当时无人知晓。但埃迪显然很高兴。他当时就把罪过推得一干二净。他就是那样的人。喜欢俏皮话，出了问题又马上溜之大吉！他喜

欢扮演马克斯兄弟<sup>①</sup>那种角色，或者说话时带上 S. J. 佩雷尔曼<sup>②</sup>式的转折。至于我自己，却完全冷静了下来。我往往是这样的，在说过俏皮话之后，就会变得十分冷静。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我自己也大为震惊。也许，从医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歇斯底里的症状。以前，我一直认为自己完全正常。但后来——这还是很久以前了——我自己也感觉到，有时候，我笑起来近乎歇斯底里，连自己也能听得出笑声中那种不正常的音调。瓦利施很清楚，我有时会歇斯底里的发作。当他感觉到我快要发作时，就给我火上加油。当他被逗乐了就会笑得像潘·萨蹄尔<sup>③</sup>，并对我说：“你真是个狗杂种，肖穆特！你刺人刺到心了！”你看，他十分小心，从不让自己成为“从犯”。

我的玩笑根本谈不上聪明，那简直是邪恶！我没有任何借口可找，当然更不是什么“灵感”。灵感怎么会让我说出这么愚蠢的话？这种话简直是愚蠢透顶，邪恶之极！瓦利施一直对我说：“不管你自己怎么看，你是个超现实主义。”他的解释是，我是一个移民，通过自己艰苦的努力，使自己跻身于中产阶级这一阶层。但我内心想报复，因为我的身心受到了伤害，我不得不做人虚伪；为了适应环境，受人尊敬，我不得不扭曲自己的本性。这是为了在社会上向上爬而不得不作出的努力。这种分析非常聪明，非常复杂；那时候，在格林尼治村<sup>④</sup>，这种分析是十分典型的。瓦利施已养成了这种习惯。他上个月给我的信中，充满了这

---

① 马克斯兄弟：美国杂耍、电影喜剧演员家族，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组成喜剧团，主要成员有五人，曾分别主演过电影《动物饼干》、《歌剧院之夜》、《大商店》等。

② 佩雷尔曼（1904～1979）：美国幽默家、剧作家。1931 年后常给《纽约人》杂志撰稿。

③ 潘·萨蹄尔：希腊神话中半人半山羊的神。

④ 格林尼治村：纽约市哈曼顿区的一部分，是作家、艺术家等聚居的地区。

类真知灼见。人们很少会放弃在他们“风华正茂”的年代所积累起来的智力资本。埃迪已经六十多岁了，可骨子里还是个居住在格林尼治村的年轻人，并且主要还是与年轻人交往。我承认自己老了。

手指有关节炎毛病，写字可不容易。我的律师是我妻子的小弟弟；我妻子去年过世了。我听从了他的劝告，来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sup>①</sup>。这可真要了我的命！他说是日本的暖流使这里隆冬季节也鲜花盛开，且空气纯净。不错，窗外报春花 在雪地里盛开，可我的手指头都歪曲了起来。如果情况没有好转的话，恐怕我不得不打针了。不管怎么说，我生了火，坐在摇椅里，集中精力给你写信。因为我在考虑这些事情时，我不想有辱你的身份。如果我相信瓦利施的话，那么，你从那天起，一直在发抖，就像中产阶级家庭祭坛上的圣火，因受了不应有的耻辱而闪烁不定。你是被侮辱被损害的人。

就我本身而言，我必须承认，我为人处世很难做得高雅得体。这倒不是我生性粗鲁，而是因为我的地位往往使自己有一种紧张感。有一度，我自以为在社会上无法再立足了，直到后来，我也像其他人一样学会了虚伪，我得做出特别的努力，使自己变得能体谅人，尊敬人，使自己变得文明起来。当然，在这中间，我往往做过了头。教养好的人做一次就够了，而我却会做两次。但这种自我修养在我身上往往不能维持很久。我修养好了，不久又完全忘了——在盛怒的火焰中我会把自己的修养烧得一干二净。

我一定得告诉你，瓦利施给我写信，使我不得不得来回忆往事。他问：为什么别人谈话中在搜肠刮肚寻找适当的字句时，我要抢在前面把别人的话说完，以炫耀自己的才学？瓦利施断言，我这样做是卖弄学问，想摆脱自己低微的出身，讨好上流社会，

① 不列颠哥伦比亚：加拿大省名。

使自己成为 T. S. 艾略特梦中的基督教社会所能接受的那种犹太人（不仅仅能勉强接受而已）。瓦利施把我描写成被社会遗弃的人，但又拼命往上爬，试图寻找庇护，就像有人追求拯救一样。而对此作出的反应是，埃迪说，我有一种逆反的心理不时地会发作，还会伤害人，且十分厉害。瓦利施这些话都没错，但那时，我们应算是好朋友，可他却没说。他把这些话都放在肚子里。在里比耶大学，我俩相处得很好。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朋友。然而，最终他要做我致命的敌人。在他装做是我宝贵的亲密朋友时，他一直把我孤立起来，然后，就致我于死命。我在音乐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也许使他受不了啦。

埃迪把我对你说的话对自己的妻子说了，他妻子又告诉了所有的人。当然，这就在校园中传开了。大家哈哈大笑，而我却闷闷不乐。我自谴自责：你肤色花白，手臂很细，在你的皮肤中，吸收进了阳台上那些苔藓和地衣的颜色。图书馆沉重的大门开着，里面亮着台灯柔和的绿色的光线，还有那些闪闪发光的大桌子和成堆成堆的书，一直高高地堆到走廊上。这些书，有些是高雅的；有些包含着有用的知识，但大部分只能充塞人们的头脑。我结识的那位老妇人——一位斯维登堡神学和教义的信徒说，天使是不读书的。他们为什么要读书呢？我也很难想像，图书馆管理员会读很多书。他们的书太多了；大部分书对他们来说是个负担。堆满书的书架散发出一种诱人的气息，令人感到安慰，但也会使人堕落，因为那些书里也充塞着有害的、有毒的气息，会致人死命。人会在图书馆里失去生命。这一点，我们应警告世人！当时，你，这座神殿的女祭司，走出来看看天空。和你在一起的还有吕贝克先生。他是你的头儿，一位温文尔雅的难民。他老是在他那老态龙钟的狗身上绊脚，然后就向那畜牲道歉，“喔，对不起！”（他说起话来，发出的啾啾声特别响）。

关于罗斯小姐：罗斯小姐从来都不漂亮，甚至连法国人所说的 *une belle laide*，即“丑美”也谈不上。所谓“丑美”，是指女人床上功夫特别好，以至她的丑陋反而增添了她的性感。“丑美”，真是地地道道的法国思想！一个丑美的女人，一定得是一架性欲特别强烈的机器。但罗斯小姐缺乏这种魅力。罗斯的肉体，毫无性感可言。五十年以前，罗斯小姐也许还有一种莉迪亚·平卡姆菜地的绿色。然而，即使她有着绿色的皮肤，也还有男人会爱她——爱她胆怯的温柔，爱她有勇气称赞我的帽子。三十五年前，我会说一些恭维话，打发这尴尬的场面。我会说：“只要想一下，罗斯小姐，考古学家挖出了多少美妙绝伦的艺术品啊！麦洛的维纳斯，亚述人的长翅膀的公牛，还长着各个伟大国王的脸庞。米开朗基罗甚至还把自己的一尊雕像埋到土里，以使自己的作品带点古董的味道，然后再从土里挖掘出来。”但这些对女人献殷勤的谦恭礼貌的言词已经太晚了。我感到羞愧。一个既不漂亮又未出嫁的女人！在那小小的校园里，那些下流的家伙因我的俏皮话而嘲笑你。可怜的罗斯小姐一定绝望了。

我对你说过，埃迪·瓦利施尽管脊柱歪曲，可不想给人他是瘸子的印象。他走起路来低头垂肩，左脚朝外歪，但还是风度翩翩。他穿着上等的英国花呢裤子和劳埃德—海格名牌粗革高帮劳动鞋。他自己还常常说，到处都有性受虐狂的女人挑逗他去一显身手。残疾人很会讨某种类型女人的欢心。你，罗斯小姐，如果你把对我说的恭维话对他说，那情况就要好多了。当然，他的妻子已怀孕了，我是个单身汉。

我常想，这个人（一下子）成了我的亲密好友，那他究竟是

什么人呢？这个人长得怪模怪样，个头没我高，但脑袋倒不小，头发又厚又密，连耳朵边的头发也是密密的；发型轮廓有些斜，而且长得又高，看上去就像是一团往一个方向拉紧的线团。他究竟是谁呢？大学里有位女士曾动员我去劝他把耳朵边的头发剃干净，可这事与我有何相干？其实，即便是他把那些头发剃了，那位女士也不见得会对他另眼相看，她只是自以为是罢了。这家伙笑的时候更是奇怪：笑声像是从木管乐器中发出的；如果你仔细辨别，就会觉察到，与其说是像出自单簧管，倒不如说更像来自双簧管。原因在于，他笑的时候是“双管齐下”：他那硕大的鼻翼和扁宽的嘴巴同时启用。至于他微笑时的模样，有点像《疯狂》杂志<sup>①</sup>上的封面人物——阿尔弗雷德 E. 纽曼，那位继“佩克的坏男孩”<sup>②</sup>之后的丑星。然而，他的眼神倒显得热情洋溢，使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想对他表示亲近；可等我走近他的时候，我却又得不到我渴望的东西。我的确希望赢得他的好感，对于他，我虽无信任可言，但也不乏爱戴之情。于是，为了讨好他，我就常常跟他说俏皮话。这主要是因为他本人属于那种很时髦的后现代派，讲究存在意识，又有点刁钻诡秘，当然也不无智慧，所以我才那样与他相处。此外，他在表面上还是蛮友好的。当然啦，他给别人的好印象还远不止这些。他爱好布莱希特<sup>③</sup>和魏尔<sup>④</sup>的作品，经常哼着《麦琪·梅瑟》一曲，有时还在钢琴上大发雅

---

① 《疯狂》杂志：1953年创刊的一份连环画刊，1955年改为杂志。原来创刊名为《叫你疯狂的故事》。

② “佩克的坏男孩”：美国幽默作家佩克以其儿子为模特儿，所著多部幽默小品中一个爱恶作剧的少年。

③ 布莱希特（1898~1956）：德国戏剧家和诗人，提出“史诗戏剧”理论和“间离效果”演出方法；强调作品的理性分析和教育作用。

④ 魏尔（1900~1950）：德国作曲家。与布莱希特合作了讽刺歌剧《三分钱歌剧》和《马哈冈尼城的兴亡》；纳粹执政后，移居美国。

兴，弹得高亢激昂。不过，他这番热情常常只是心血来潮、转眼即逝的玩艺儿，比如对于二十年代风靡一时的卡巴莱歌舞表演和柏林政府对待战争的态度，以及到处都在议论的属于先锋派人物。我记得他在很早以前就迷恋“垮掉的一代”作家的诗；艾伦·金斯堡<sup>①</sup>那句漂亮话“美国，我将为您的繁荣昌盛助一臂之力”，就是他首先吟给我听的。

我在后来变得非常欣赏金斯堡的作品，这都得归功于埃迪，是他使我从金斯堡那儿学到了智慧。罗斯小姐，你也许会觉得奇怪（我本人也觉得有些怪），我竟然会对这位诗人情有独钟，而且那么记忆犹新。请允许我就他一些最近的佳作中的某些内容作些说明。他告诉我们的读者，沃尔特·惠特曼<sup>②</sup>曾和《爱情成熟了》一书的作者爱德华德·卡朋特<sup>③</sup>搞同性恋；而卡朋特后来又成为声望甚微的总统切斯特·A·阿瑟<sup>④</sup>的孙子加文·阿瑟的情人；当加文已是老态龙钟时，加文又与旧金山的一名同性恋者来往；加文的最后情人就是金斯堡。整个故事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传奇：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很是完满。只不过听起来有点像声誉满城的潘罗斯博士<sup>⑤</sup>向人们诉说他自己如何得了梅毒。

① 金斯堡（1926~1997）：美国诗人，以擅长吟诵著称，其诗集《嚎叫及其他》是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之一，其他诗有《现实三明治》、《美国的堕落》等。

②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背离传统诗体，表达强烈的民主精神；作品有《草叶集》等。

③ 爱德华德·卡朋特（1844~1929）：英国作家，他拥护社会改革和19世纪晚期的工艺美术运动。他长期受惠特曼作品的影响。他的无韵长诗《走向民主》（1883年）采取了惠特曼的诗歌形式。

④ 切斯特·A·阿瑟（1830~1886）：美国第二十一任总统（1881~1885）。

⑤ 潘罗斯博士：伏尔泰讽刺作品《老实人》中的哲学家，认为世上一切趋于完善。后指过分乐观的人。

你得原谅我有些 唆，罗斯小姐。我觉得有必要从广泛的社会角度去看待我们想弄清的问题，当然，你我的感情都会因此而受到些伤害。那天，你鼓足勇气，面带微笑，有些胆战心惊地向我打招呼——或者说是想给予包括我在内的大伙儿你最良好的祝愿，但你本该先了解一下与你说话的对象是什么样的人。对你那样好心好意，我却报之以一句诙谐语。你要知道，那完全是出于我爱开玩笑的天性，连我自己都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要不是我在加拿大接到瓦利施的来信，我都想不起那天的事了。

说到他的那封信，就更怪了，信中冗长详尽的描述，宛如希伯莱文的《圣经·旧约》的全部五卷经书，只不过其中的主人公哈曼<sup>①</sup>变成了我。我猜想，这准是他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他显然一直在细心琢磨我的个性，现在总算有了个较全面的轮廓；如此用心，足见他对我的憎恶是何等程度了。这漫漫书卷，囊括了我所有的缺点、罪孽；其描述之详尽，举例之广泛，结论之清晰，是无可挑剔的。我想，一定是早在我和他情投意合、亲密无间时，他就开始对我进行了全面分析判断、归纳推理，并且逐一入账，无一疏漏。罗斯小姐，请你替我设身处地想一想，当我收到这样一份罪状时，我是怎样一种心情！那时的我，真可谓是四面楚歌，正遭受着无限的悲伤与莫大的委屈：且不说痛失爱妻的悲哀，我那个骗术高超的哥哥就够我受的了；而且，我正经受着戈雅《老年与不幸》那幅画中那个老人的不幸——我发觉我的中指竟无法动弹了；此外，我还为自己日趋艰难的生活困境而备感劳顿。

亲爱的罗斯小姐，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人们对于昭示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罪孽早已熟视无睹，但我还是弄不明白，埃迪·

---

<sup>①</sup> 哈曼：《圣经》故事人物，施阴谋欲杀绝犹太人，后阴谋败露，被悬于75英尺高的木架上绞死。

瓦利施干吗要把我三十多年前的事一股脑儿地摊出来，然后跟我算总账？奇怪的是，这解不开的谜反而激起了我对此事的极大兴趣，还竟然觉得异常兴奋，恨不得大喊几声才算痛快。这种反常心理只有等到我劳作一天，换得满身疲倦时才有所缓解。每当夜晚来临，我躺在床上，空守着这间如同小方盒子一样狭小、隔音性能不太好的卧室，我只能忍气吞声，强压怒火，总算熬住了想要狂吼乱叫的冲动。但到了凌晨三点钟，我实在无法再压抑自己，只好怒吼一气，以泄心头之恨。可是，我的那些邻居们可就受罪了。但最可怜的还是我。我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举目无亲，惟一认识的人只有一位钻研神秘文学的老太太——格雷斯威尔太太（她已到了耄耋之年），我实在不忍心让她分担我的痛苦。我和她之间的交流仅限于讨论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不过，有一次，她的一番话着实温暖了我痛楚的心：“何谓人类污秽之性？赞美诗作者说得好‘我不是人的时候我就是一条虫’；何谓人类高尚之性？可惜为数者已甚少，所以无法评说。也正因如此，人们才互相诋毁。”

我发现，瓦利施的控告书中有不少技巧像是他从金斯堡那儿学来的。于是，我往旧金山的拉爱茨城发了份订书单，买了不少以前我还没看过的金斯堡的书。没想到这家伙出版的小玩艺儿还真不少，我花了好几个夜晚才通读完他的书。这下，我才恍然大悟：所谓坦诚，原来就是不折不扣地用文字将点滴事实摆到读者面前，包括人体排泄物以及性的发泄这类事实。我还发现，金斯堡所推崇的是自由交媾，不管是男人间还是女人间或者男女同伴之间，必须无拘无束，这才算是发扬人道主义；当然，同时也不能把祈祷和静坐这些修身养性法则统统抛到脑后。他视我们当今的“文化互融”为洪水猛兽，常常不由自主地把它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在一起。除了中央情报局，还有其他谍报系统，并且与埃克森石油公司、英比尔石油公司、加利福尼亚美孚石油公司等



都有关系，还有与克里姆林宫有联系的罪恶的西方石油公司（不可否认，这些念头都有些怪诞）。谈到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及引起致癌物的石化工业，他又追根溯源到情报机构的一位高级官员——詹姆斯·杰苏斯·安格尔顿和他的朋友 T. S. 艾略特。这位安格尔顿在青年时代曾当过一家杂志的编辑，他呼吁拯救西方文化，反对“斯大林主义”。至于艾略特的供词，是在波涛汹涌中行驶的一艘扇形船上，由金斯堡亲自采访其鬼魂而获得的。据艾略特的鬼魂交代，艾略特生前曾给安格尔顿干了些间谍勾当。根据金斯堡列出的捣乱分子名单，上面还有印度的宗教领袖、白发银须的高僧、崇拜布莱克<sup>①</sup>和惠特曼的诗人、虔诚的宗教徒、热情奔放而思想简单的同性恋者。他认为，正是这伙人，使那些在暗中活动的间谍有机可乘，通过电脑网络，在人群中间培养煽动者，分发海洛因，以达到他们的破坏目的。金斯堡的这番精神变态式理论之所以显得这般惟妙惟肖，其主要原因是由于现实中也的确存在那么多使人忧虑的问题。况且，他的通篇大论还流露出某些除暴安良的愿望。所以，我读的时候，竟然觉得这些言论有一种臭美。对他的这番才能，与指控我太缺德的瓦利施相比，我更加欣赏他。我不仅欣赏，而且十分理解。他在描写7月4日焰火庆典活动时，字里行间流露出性发泄的苗头，读到这儿，我忍不住暗自发笑。但是，当我转念细想时，我又觉得他很值得同情。我努力分析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竟然越想越有趣，得意之处，我忍不住用手捋捋自己的八字须，俨然一副哲人的样子；与埃迪相比，在评价金斯堡的立场上，我要客观得多，我绝对不是盲目崇拜。请恕我打个比方，埃迪的样子很像是赌台管理员，虽属于赌场的工作人员，但他带着收钱的钱耙上场。这就叫：其用

---

<sup>①</sup> 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擅长用歌谣抒写无韵诗，主要作品有《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心，路人皆知。

瓦利施多年来最大的不利在于，人们一眼就能看出他长得像犹太人。因此，有些人就对他很有戒心，并无缘无故地对他充满敌意，总怀疑他企图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美国人。这些人总以为说话时表现得肆无忌惮就是有理有力（而力量总是受欢迎的），他们总这样问他，“你在叫瓦利施这个名字以前，还叫什么名儿？”——犹太人常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而他的实际情况是，父母都是来自爱尔兰的新教徒，母亲姓巴拉德。他签名时总是用“爱德华德·巴拉德·瓦利施”。对于那些人的议论，瓦利施装做毫不介意。照他自己的话说，由于他本人深知被迫害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他对犹太人就格外友好。我当时信以为真，并为此感到欣慰。

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拿着友谊的幌子欺骗我，到头来，他竟然说我是个傻瓜。事情还得从头说起。那时，我刚开始在公众心目中树立了一定的影响，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但瓦利施却对我不耐烦了，原来对我的情意现在就转变成了敌意。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对于我主持的音乐理论电视节目所采取的态度。而我对此也早有预感——那天，瓦利施穿了件脏兮兮的羊毛外套，一手托着胳膊肘，另一手夹着一支烟，两眼盯着电视屏幕；我按节目内容依次介绍海顿<sup>①</sup> 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然后是讲莫扎特<sup>②</sup>，接着谈到塞利尔利<sup>③</sup>。最后是介绍古钢琴，就在这时，瓦利施开始向我发起了猛力的攻击：“你算什么精英人才！简直是胡说八道！傻瓜一个！”“我的上帝！你怎么如

---

① 海顿（1756～1809）：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主要代表之一，一生作品丰富，主要有交响曲、弦乐四重奏、歌剧等。

②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主要代表，五岁开始作曲，一生作品丰富，主要有《费加罗的婚礼》、《唐璜》、《魔笛》等。

③ 塞利尔利（1750～1825）：意大利作曲家和指挥家。

此装腔作势！”“吹牛大王！”

很自然，他后来就开始攻击我的出身，我的家族——“肖穆特”。而实际上，这样的攻击早在我父亲来到美国之前就由他的兄弟——平尼埃引发过了。平尼埃戴着副夹鼻眼镜；擅长模仿、抄袭他人的音乐，人们叫他“肖伦·塞肯达”。我想，那时候的姓应该叫“沙姆斯”，或许是一个更低人一等的，如“恩特沙姆斯”。而这个姓，在犹太教堂里总是被人视做最最下流的。在人们眼里，姓这个姓氏的人都是无能之辈，游手好闲；他们的胡子总是乱糟糟，一副邋遢相；他们动不动就在身体的某个部位长个瘤子或是疖子，要不就是得淋巴结核症，反正比穷鬼更让人讨厌。“低贱之极，”我父亲常如此说，“就像是浆布一样。”他说的“浆布”是裁缝为了使衣服贴边显得挺括而在边缝里塞的那一层麻布片。那东西又僵又薄，一文不值，比裹尸布还要便宜。人们常以“那家伙穷得只好穿浆布片了”一语来形容那些穷困潦倒者。可是，在美国，“肖穆特”一姓却是马萨诸塞州一银行财团的名字。你瞧这事有多奇怪！不可思议！罗斯小姐，你也许听说过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意第绪语。意第绪语中就有不少可爱逗人、富有情感色彩的语句。但你知道吗，意第绪语本身却是一种生硬的语言，实话实说，从不拐弯抹角。当然，也有其微妙、可爱的说法，但更多的是一种毫不留情的大白话。例如，如果形容某个人的脸奇丑无比，就可以说“像倒残渣的盆子”，“像盛放猪食的槽”（可见，其中有关猪的含义为意第绪语增添了威武之势）。如果真的有造物主，并且能给我灵感，能让我信口开河，使我的嘴不受任何遮拦，那么，我想意第绪语就是我最好的用武之地了。

我这般絮絮叨叨地向你诉说这一切，是因为我深信你愿意听我讲，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会对你充满感激之情。你要知道，我

在温哥华是孑然一身，没有朋友，当然，那也完全是我自己不好。在我初来乍到时，当地的音乐大师曾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晚会，但我在那次晚会上的表现很不讨人喜欢。他们对我这个美国客人进行了一场加拿大式的考试。他们问我，是否信奉里根主义。这个问题当然难不倒我，但是第二个问题可就麻烦了，问的是：萨尔瓦多会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还没等我回答完，一大半的客人就离席而去。记得我当时振振有辞地说：“肯定不会。北部的越南战士有着几百年的战斗传统，个个身经百战，训练有素——不好对付。而萨尔瓦多人则是一群印地安人，一群乡巴佬。”我为什么不能闭上嘴巴？越南与我有何相干？当时有两三位颇具同情心的客人不忍拂袖离去，但我想索性也把他们气走算了，于是，我就又高谈阔论起来。有位来自 UBC 电视公司的教授说，亚历山大·蒲柏<sup>①</sup>认为所谓罪孽原本是子虚乌有之事，他表示自己同意这种观点。他觉得，从形而上学的最高理性角度去看，从来就没有什么罪恶肆虐于世。我觉得这家伙在故弄玄虚，坑蒙拐骗，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于是，我马上就反问他：“是吗？照你这么说，纳粹分子的毒气室里洋溢的是阵阵玫瑰花的清香喽？”

从此以后，我只好每天独自散步，倒也十分逍遥。

这儿的港湾悄然无声，山顶上白雪皑皑，景色十分美丽。港口的吞吐能力有限，因此，不少运输船只得停泊在港湾里（每天得付一万加拿大元）。不过，看到那么多船静静地停泊在港湾里实在令人觉得赏心悦目，而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国际友好访问”或是“到处漂泊、四海为家”的豪情壮志。此外，温哥华的确是个干净、文明的城市，北部有许多湖泊，湖水明澈见底；远处是苍翠的森林，绵延上百万平方英里，一直朝着北极带伸展，

---

<sup>①</sup> 蒲柏（1688~1744）：英国诗人，长于讽刺，善用英雄偶体，著有长篇讽刺诗《夺发记》、《群愚史诗》等。

给人一种广袤无垠的感觉。

我觉得，那些心胸狭隘的家伙竟然因我的某些怪癖而恼怒，这也太糟糕了。

罗斯小姐，千万不要以为我总是那么爱指手划脚，评这论那，事实上。我常常是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指教的，尤其是在我所从事的行业里，对于那些技艺高我一筹的艺术鉴赏家们，我一向必恭必敬。例如，我对那位已故的音乐理论专家，基朋伯格教授的态度，就是很好一例。那次，我们在科莫湖边的瑟波龙尼山庄开会。有一天夜里，教授让我把我的文章拿到他房间里给他看看。其实，教授本人并没有邀请我，而是我自己求知心切，事先主动提出来的，所以，他当然不好意思拒绝。教授身材魁梧，但那天，他穿了件鲜黄绿色的便装，相衬之下，使他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那件衣服又过于宽松，使他那颗聪明脑瓜显得出奇的大，仿佛是造物主在造物时出的一个洋相。他平常走路时，总是拄着两个拐棍；也许是这两个拐棍有着无边的魔法，教授常常快步如飞，谁都赶不上他。他曾出版了一部关于研究罗西尼<sup>①</sup>作品的宏篇巨著。但我不敢肯定，他是否知道，罗西尼就是一位爱说俏皮话的人，他的一些诙谐语至今仍广为流传（例如，“良宵一刻，落寞三秋”）。我还得向你描述一番基朋伯格那次住的房间。那是一套十八世纪风格的客房：沙发垫是用塔夫绸做的，床上用品全是织锦缎的，房间里还摆有雕像，连灯罩都是丝制品。那天，我去的时候，已是夜晚，窗户全都已关上。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四周显得十分宁静。学富五车、深谙世事的教授就坐在我的对面，他那扁长的嘴巴微微紧闭，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只是他那一袭绿衣，在我的视野里不断地扩大、蔓延。我发现他的两只

---

<sup>①</sup> 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以其歌剧著称，主要作品有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威廉·退尔》。

眼睛长得有些奇特，两眼相距甚远，远远地分别长在脑袋的两侧，因此，他仿佛可以同时看到两边的物体；他的两条眉毛像蛾子的两条幼虫，当然，那两只蛾子准是从知识之树上飞来的。我开始读自己的论文。教授频频点头。我说：“教授，恐怕我的文章使您感到昏昏欲睡了吧？”“不，不——恰恰相反，你的文章赶走了我的瞌睡虫。”他说。这话从他那儿说出来，如同出自天才之口，我听到他那样说，真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悲伤。自始至终，他都是正襟危坐，双手紧握着拐棍，仿佛一位滑雪运动员在山坡上准备往下滑——不过他滑向的地方是那甜甜的梦乡。但奇怪的是，即便是在他快进入梦乡的那一刻，他那特有的意识世界仍然清醒活跃。如果让我伺候他入睡，那可就难了：也许等我周游全世界回来，他的意识仍然徘徊在梦幻与现实之间。

好了，让我暂时说说瓦利施的情况吧。瓦利施一家住在乡下一所小小的房子里，房子的产权属于大学。房子四周全是树林，在我去的季节，那儿的景色显得有些灰蒙蒙。你总不会忘记，在佛罗里达州，每当秋天来临时，新英格兰的树林是什么样的吧——树林里的林烟缭绕不绝，花粉四处纷飞，大量的树叶零落成泥，树杈上布满蜘蛛网，蜘蛛网上也许还缠着死蛾子和粘着羽翼上的毒粉。他家门前有几根石门柱，每当我们去的时候，如果正好看到门柱旁摆着刚送来的几瓶牛奶，我们就顺手抓起，大喊一声，远远地就把牛奶扔进了灌木丛中。原因是这样：这些牛奶是为佩格·瓦利施订的——她怀孕了，但她讨厌喝那玩艺儿。佩格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她丈夫。在那个年代，除了黑人和犹太人，其他任何人的地位都比瓦利施高。而由于瓦利施的长相酷似犹太人，这在无形中又降低了他的身份。作为一种弥补，瓦利施从放荡不羁的波西米亚式的生活方式中汲取力量源泉，尽量使自己多一些文化气质。瓦利施太太说她很欣赏丈夫的波西米亚生活方式。她对我不那么反感，主要是因为她喜欢我主持的关于海顿的

节目。此外，还因为我是她丈夫的朋友，而且是一位朝气蓬勃的朋友。请相信我，她丈夫实在是太缺少这样的朋友了。我看得出来，她对丈夫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很是担心，我从她注视我的眼神里觉察到她希望我能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观。

佩格的长相有点像《爱丽丝漫游奇境记》<sup>①</sup>里的爱丽丝在一气喝光“神水”之后的模样，高个儿，瘦瘦的，但是很秀气，有点像无声电影时代的影星科琳·莫尔：圆圆的眼睛，一副天真少女的神态，充满活力。怀孕四个月时，她还去法林公司上班。相比之下，埃迪倒是显得有些懒散。他可不愿意为了送太太去车站而早些起床，甚至在白天还蒙着绣花被呼呼大睡。那条被子原本是粉红色的，但在天长日久之后，已变得惨不忍睹。我去找埃迪时，一见到这条已褪去粉红色的被子，我的心就觉得沉甸甸的。房间的护墙板用的是胡桃木，但上面已是斑斑点点。所有的房间都是那么昏暗，厨房里更是暗无天日。我上楼时，发现他睡得正香，直接映入我眼帘的是他突出的下颚和犹太人的厚嘴唇。我觉得他的模样像只未开化的野兽，但也有其单纯无邪的可爱之处。我发现，平日里他好不容易积攒的那点自信在他熟睡时已荡然无存。平常，我们大多数人都抱怨自己睡眠不好，太容易惊醒，瓦利施也不例外，不过他很以此为荣，他觉得自己无论在哪方面都不亚于别人。可是，我发现他在睡梦中并不比别人高明多少。

我把他叫醒了。他显得有些尴尬。他毕竟不是百分之百的波西米亚分子，依然很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他被自己懵懵不清的样子弄得有些恼火，咕哝几句后，终于钻出被窝。我看到他的腿很瘦。我俩来到厨房，在那儿一起喝了几杯酒。

我知道佩格一直坚持要他去城里找一位精神病专家看看。起初，他在我面前对此事守口如瓶，后来他委婉地说，他只需要进

<sup>①</sup> 19世纪英国童话作家刘易斯·卡罗尔的作品。

行些身体内部调理，小小的、细微的调理。也许是因为快做爸爸的缘故，我看出他有些诚惶诚恐。没多久，他妻子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我上面里 唆讲的种种都是些无关宏旨的琐事，所以我毫无出卖朋友的愧疚感，况且，我也没有欠他什么。再说他的那封信着实让我难过。你想想，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时间写这样的信！三十五年过去了，在我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他这是为了让我充分地信任他对我的友谊，以便在我没有防备的时候进行迎头痛击。什么时候是欺骗、暗算朋友的最佳时机？当然不能选择在你的敌人还年轻有力，还能东山再起的时候。于是，瓦利施悄悄地等待着这最后的时刻——当然也是我的末日。他在信中申明他本人还年轻，为此还列举了例证。比如，他对密苏里州的女同性恋者依然表示出由衷的兴趣，只有他知道她们内心最真实的东西，这些女同性恋者对瓦利施这位惟一的男性公民大开绿灯，非常愿意与他做爱。正如当年惟一化装进入圣地拉萨的西方探险家麦哥文那样，瓦利施是惟一被女同性恋者接纳的男性，难怪他那么引以为荣。那些同性恋者只垂青于年轻人，既然瓦利施如此受宠，那他当然是年轻的喽。

他在信中的诸多陈述让我觉得肝胆欲裂，无地自容。我不得不承认客观事实：我远不如他，我是个失败者。我这个人做事三心二意，生性懒惰，精神萎靡，还经常开小差。不过，瓦利施对此的评说是，我尽量使自己这种懒散脾气看上去不至于太糟糕。比如，我从不注意餐厅招待在结账时是否算错；对于自己的退赔税总额，我也是从不过问；此外，我太“不懂世事”，根本无法管理自己的投资买卖事务，就只好雇用有关专家（清理“混账”）。相比之下，瓦利施自己就显得很务实。在钱财问题上，他向来不含糊；这也是英雄本色，莎士比亚笔下的斗士就具备如此品行。当信用卡开始流通，佩格也加入使用者的行列。为此，瓦

利施煞费苦心，对服务费和利息进行了直至小数点后面四位数的严格计算后，断然从佩格手里抢过信用卡，撕成碎片，然后扔进了下水道。另外，差不多每年他都要和税务官吵得脸红脖子粗，不管是州里的还是联邦的，他都一视同仁。谁都别想从埃迪·瓦利施那里占到任何便宜。久而久之，他越来越像那些腰缠万贯的吝啬鬼，例如，那个洛克菲勒跨国财团的创始人洛克菲勒，每次给小费绝对不会超过一毛钱；还有那个亿万富翁格迪，在他家举办的周末晚会上，客人如要打电话，必须使用投币电话。瓦利施的聪明不仅仅限于在钱财方面的小气，而在于他为达目的所使用的强硬手腕以及毫不让步的坚定态度上。他的意识早已超越了资本主义初级阶段。他既熟知布莱希特的作品，也深谙列宁、斯大林主义。对于我头脑中模糊的经济意识，或者说至少看上去是这样，他认为这是我有意识采取的“半无意识策略”。他的意思是否指我想通过蔑视金钱的做法，来达到自己作为犹太人得以在社会上出人头的目的？是否说我想借此跻身于上流社会？换言之，他是说我在搞民族同化主义？或是说我只是在口头上从不承认而实际情况是：反闪米特人<sup>①</sup>是我的拿手好戏？

我自认为我在经济意识方面绝对不是装得如天使一般，不食人间烟火。罗斯小姐，事实上，是我根本就没有钱，而这也是我有些歇斯底里综合症，常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的部分原因。为此，我已备受折磨，而且还将继续吃苦。今天的瓦利施好了伤疤忘了痛，全然忘了当年自己所受的痛苦。他当时因为每天嗜睡十八小时而不得不去看精神病医生，我向他表示我很理解他的痛苦。为了安慰他，我还说：“我也有那种时候，在半个小时内，觉得神志异常清醒，但不一会儿后，就糊里糊涂，谁都可以拿我寻开心。”我说的是一种似梦非梦的境地，或是一种半糊涂半清

---

<sup>①</sup> 闪米特人：主要指阿拉伯人和犹太人。

醒的状态，这种现象在我们中间是很常见的。我从来没有想过在这种时候要采取何种策略去对付别人。我对你说过，有时候，为了现实中的某种必要性，我也不得不戴着面具，但很快就会丢掉面具，和别人以诚相待。可是，瓦利施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每一个现代人都是另一个自我所发明创造的。意思是说，你得先为自己拟定一个方案，然后塑造另一个自我——简言之，在别人面前，你得装腔作势地演戏。可是，我看到是些什么样的戏啊？你完全信任的一位亲戚到头来竟是一个恶棍无赖，或者像我那样，由着自己的妻子把一些事关重大的问题交给她最小的弟弟去处理，到头来，就是我这位内弟狠狠地骗了我。如果说别人这样做是出于没有原则或者阴险狡猾，那么，瓦利施这样说，就是有些神经错乱了。总而言之，要克己，要耐心，我已开始悟到其中奥妙了。

瓦利施在信中还这样写道：“我觉得该是让你明白你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了。”接着，他对于我的为人作了颇为罕见的总结性的回顾。他指控我利用人、诽谤人，还说我讨厌别人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使他尤其恼恨，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我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把别人的话抢过来说个精光，使别人把本来要想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还把别人搜肠刮肚寻找的陈词滥调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我这个人，在他看来，是“集合了中产阶级零部件的一个流动库房”。他的意思是说，我头脑里装满了风马牛不相关，实际上是只有疯子才有的各种信息。这些东西，一旦经我的嘴说出来，就会使那原本就够可恶的社会机器滑向一个无底的深渊。满纸都是诸如此类的话。至于我对音乐的迷恋，他觉得那仅仅是一种掩人耳目的东西。在他看来，真正的肖穆特是个精明而谨慎的商人：瞧他那本《音乐欣赏入门》，竟然走进了一百所大学的课堂（“这是不正常的”），为此他就获得了近百万元的稿费收入。他把我比作基辛格。因为基辛格也是个犹

太人，既无政治后台又无压倒多数的选票，却能在政治舞台如日中天，这全是因为他具备了推销赚钱的本事，使他最终成为社会名流……我觉得瓦利施显然不可能理解人格的力量、自然的规律、强健的体质的重要性；（他自己整天埋头昏睡——把耳边长满毛发的脑袋埋进枕头——矮小的个子蜷缩在一团粉色被褥里，他哪里还有个人样？）他无法理解在那些半文盲的政客中间，一位有着良好教育的人是如何树立自己的威信。不，这样的比喻太牵强了。在 PBS 电视台举办的关于十八世纪音乐的节目毕竟不同于政治事务；政治家的任务是运用美国外交政策处理国际事务，或是学会在国会里对付那些酒鬼和说谎家，或是运筹于各个行政管理部门，与搞音乐的人完全不同。

那么，谁称得上是位诚实的犹太人呢？看来非金斯堡这个忏悔者莫属。那些反犹太种族者，像精神病中的狂想症患者一样，硬是给犹太人加上了各种各样的罪名。金斯堡之所以深得这些反犹太人疯子的宠爱，就是因为他为这些罪名加油添醋，使之更加夸大。我觉得，他像个神经不正常的人，一会儿向别人诉说自己真的在梦里发现有人在给他的三明治里夹了块某人的肛门；一会儿是借诗发挥，叙说他把一个人造阴茎插进了自己体内。美国人最喜欢这些有声有色的色情描写，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证明这个民族的诚恳与真实。他们就是在这样的水准上向别人显示他们是如何诚恳待人，至于因此产生的怪诞和淫秽感，他们常归咎于另外一些人，比如那些阴阳人、男同性恋者、贩毒和吸毒者。我给你一句忠告：当你听到他们标榜自己诚恳待人时，你最好赶紧管好自己的钱包。

我在金斯堡身上还发现了另一些东西。诚然，他和历史上的某些犹太人所扮演的角色一样，自暴自弃，使人觉得滑稽可笑。这一传统由来已久，也许在古罗马成立之前就业已存在。但他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也颇具传统特色。除了其显而易见的诚恳态度

外（实为受到刺激后的自我表白），他还有一颗纯洁无瑕的心。作为一名美国犹太人，他必须对美国的民主表示同意并为之敲锣打鼓：美国注定将成为发扬人道主义的光辉典范，这样一个能容纳众多民族的大国（包括最微不足道的民族和国家），怎能漏掉任何一个？哪怕是一个也不行。正如惠特曼所预言的那样，美国本身将成为诗歌王国里的一首最美妙的诗。当今惟一能代表美国超验主义<sup>①</sup>的人物就是这位蓄着胡子的同性恋者——金斯堡。他是个秃子，胸前堆满肥肉，混沌的眼珠转个不停，对自己那副邋邋遢遢却浑然不知。罗斯小姐，他可是从瘴疠污秽之气中提炼出的一个纯净物。这家伙可以被视为一个由迈达斯神主宰的地球的缩影，埋于地下的腐尸最终在地面结出了硕果累累。这位犹太人并没有为了替同性恋鸣不平而赴以色列，也没有要求对《利未记》<sup>②</sup>作重新诠释。他生在美国，笃信佛教，坚持同性恋。真没想到，石油工业资本家所深恶痛绝的大敌就在自家门前。无论是谁，都会情不自禁地为这位小丑喝彩！我的出生星座和金斯堡的一样，我俩的母亲都有些神经质，我俩都会动不动就冒出几句至理名言。不过，我可不像他，我从不过高评价色情行为。我不相信只有体验手淫和鸡奸才能走向真理。值得赞扬的是，他对于自己的信念表里一致，始终如一。而我在这一点上远不如他。与我相比，他更像地道的美国人。他还是美国文学艺术院的院士——而我连候补的资格都没有——他说他发现近代有几位美国总统嗜用迷幻剂，但没有人因此取消他获得的国家级奖状和奖品。他越是诽谤别人，所得的奖励就越多（L·B·约翰逊<sup>③</sup>总统也服用麦角

---

① 兴起于美国19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倡凭“直觉”、自己的智慧和理解力去直接得到知识，掌握真理；抛开理性、提倡个性解放，崇尚精神万能。

② 利未记：《圣经·旧约》中的一卷。

③ 约翰逊（1908~1973）：曾任美国第三十六届总统（1963~1969）。

酚二乙胺毒品吗？)。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与我相比，他更接近美国社会的主流。而我呢，就连长相也不像个美国人。（不过他的外表也不像美国人）。我的出生地是印地安那州的哈蒙德（在禁酒令颁布之前，我父亲在那儿开了家小酒馆），但我的祖籍很可能是在苏联的基辅。我的身材一点也不像种地的乡下人，个头虽高，但毫无魁梧之气；我的臀部长得比别人高，因此腿就显得特别长，长得失去了该有的比例：其动力原理恐怕只有工程师才能进行计算。哈蒙德那个地方，除了黑人和南部农民，大多是外国人，尤其是乌克兰人和芬兰人。我觉得这些外国人的长相反而更像美国人，而我自己的样子却只有从俄罗斯教堂里的绘画上找到某些与我相似的人物——小脸庞，圆圆的小眼睛，弯弯的眉毛，突出的脑门。至于在复杂的社会中赖以生存的美国式才能，例如深思熟虑，谨慎处世，我全都没有。不仅如此，我还常常缺乏自控能力。我这个人，正如阿拉伯人所说，管不住自己的嘴，反成了舌头的奴隶。

罗斯小姐，我前面的叙述进行顺利——我的意思是，尽量做到了不去剖析事由。我们应该快点接近正题。但我必须先谈些令人费解的事（也许正如格雷威斯老太太说的，是一种因果报应），为此我深表歉意。为什么别人也会说些像那天我冒犯你那样的话？噢，我这样做个类比吧：一个男人走出家门，来到户外，他发现天气很不错，晴空万里，阳光灿烂，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就是想做点什么，才算对得起如此良辰美景——否则，他就觉得自己像是坐在轮椅里的残疾人，像那些自以为有病而实际上又没有病、呆在海滩上养病的人，旁边还有个护士对他说：“坐在这儿，看荡漾的海水。”

我已故的妻子格达，是位性情温良、身材苗条、五官小巧的女子，属于中世纪那种类型。每当我得罪人的时候，她就双手合

十，举到下巴，仿佛在为我祈祷，这时，原本就白里透红的肤色就更红了。我容易得罪人的阵发性毛病害得她痛苦不已，而她为了保护我的名誉还担当起善后处理的重任，去极力说服对方，使他们相信我绝无恶意。她头发乌黑，肤色亮丽。究竟是由于她身体健康，还是容易激动的气质才使她拥有那样的好肤色，我也说不清楚。她的眼睛稍稍有些往外突，但绝对正常。我还觉得这正是她的妩媚之处。她是奥地利人（不是维也纳，是格拉茨），是个难民。我对体格与自己相当的女人从来就不感兴趣——两个高个子凑在一块儿，给人的视觉效果只能是让人觉得莫名其妙。我喜欢自己寻找想要的东西。我在上学的时候，对女教师从没有过性方面的兴趣。我爱过班里最小巧的一个女孩。这种品味后来也没有改变，所以我才找了个像凡·德·维登<sup>①</sup>和卢卡斯·克拉那奇<sup>②</sup>的画像里那样的女子——格达，做我的妻子。我妻子那白里透红的肤色不局限于脸部，身上也是如此。她的肤色使人联想起一些远离当今时代的东西。她关于雅致之美的理解也属于上世纪人的概念。她的举手投足之间总给人一种杨柳依依的感觉：用餐时动作慢腾腾的；当我要告诉她一些重要事情时，她常稍稍歪着脑袋，嘴巴微启，听得极认真，全力理解话中之意。尽管她有些感情用事，但在原则问题上很是固执。她死了，她的风韵也就从此断了传人，而她本人也就此销声匿迹。我再也不可能见到她那粉红的脸蛋，粉红的胸脯，还有那双稍稍突出的蓝眼睛。

如果她听了我那天在图书馆门口对你说的话，她一定会难过得坐立不安。每次我得罪人，她都那样。我给你举个例吧。那是在我得罪你好几年后发生的事，是在另一所大学里（一所响当当

---

① 维登（1399~1464）：佛兰德斯画家，15世纪北欧最有影响的画家之一，作品有《耶稣下十字架》、《圣母圣子》等。

② 卢卡斯·克拉那奇：文艺复兴时期德国画家，擅长画人物和裸女。

的大学)。那天，在我家那张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樱桃木餐桌上，格达准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一大帮学术界的朋友，其中有三位在中途就告辞了，但我已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在用过一道主菜之后，有人把话题转到了一位名叫舒尔铁斯的教授身上。这位教授是属于那种博学多才、但也好吹牛的人，所以有些不得人心。不管别人在谈论什么样的话题，例如：中国菜肴、粒子物理、班图人与斯瓦希里人的联系（如果有某种相关性的话）、为什么纳尔逊<sup>①</sup> 阁下如此欣赏威廉·贝克福德<sup>②</sup>、计算机科学的未来，只要舒尔铁斯教授接过话头，他就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别人休想插得进嘴。教授身材高大，蓄着胡须；大腹便便，使人退避三舍；他的手指头的尖端部位都朝外弯曲。如果我是从事动画艺术的，我一定给他画这样一幅漫画：蓄着八字须，翘着十指，捏着嗓门唱歌。那天，其中的一位客人对我说，舒尔铁斯教授很忧虑，担心现在的人如此不学无术，等到他死的时候，恐怕连个会写讣告的人也找不到了。于是，我说：“我不敢说自己够格，但如果能给他带来些安慰的话，我倒是非常愿意担当此任。”当时，摆在餐桌上的鲜花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教授的脸，只知道他当时正准备用甜点。格达是否听到了我的话已经不重要，因为好几个客人立即把我的话对她重复了一遍，我看到她把鲜花挪到一边，愣愣地看着我。

当天夜里，我费尽口舌使格达相信我的话没有伤着任何人，教授夫人安娜·舒尔铁斯也不是那么容易受伤的。我说，他们夫妇俩常常一起出席社会活动——她为什么非得带着她丈夫一起来？我还说，我们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想要说什么，也不知道她心

---

① 纳尔逊（1758~1805）：英国海军统帅。

② 贝克福德（1760~1844）：英国小说家，著有小说《瓦提克》，情节离奇古怪，被认为是典型的哥特小说。

里怎么想；她说话时总爱用些语气助词，（也许与她丈夫所研究的粒子物理有关？）实在不合适，也令人费解。可是，我的这些劝说反而使事情更糟。格达当时没说什么，只是躺在床的一侧，挺直了身子，一声不吭。到了深夜，她使出了自己的绝招：辗转反侧，唉声叹气，愈演愈烈。我要想入睡是不可能的了，我只好和她一起受罪，我的神经也被弄得极度紧张。我感到，哪怕是最让我不齿的强奸行为也不会带给我如此深重的负疚感。第二天早上，我还在喝咖啡的时候，格达就打电话给安娜·舒尔铁斯，约她一起吃午饭。几天后，她俩还一起去听交响音乐会。不出一个月，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坐在他们肮脏狭小的房子里，替他们看管孩子。他家的房子是属于大学的，但他们已经把房子变成了石器时代的厨房，里面到处堆满垃圾。格达把所有调解、抚慰工作完成后，她才觉得心里好受多了。而我的看法是，作为一个男人，有勇气开玩笑，况且话已出口，覆水难收，那就应该泰然处之，不要因为受良心谴责而后悔不迭。应该像金斯堡那样，有勇气坚持到底。不管怎样，连我自己都搞不明白，究竟哪个是真正的肖穆特，是那个爱开玩笑爱得罪人的我，还是那个已经娶妻成家的我？我的妻子又是这样一位女子：她无法忍受别人因为她丈夫的玩笑受到侮辱。

你会问：既然你妻子如此心甘情愿地奋力保护你，以免使你遭受敌人的反攻倒算，你还总那样惹是生非，莫非是有些心理变态，使你无法抵御某种念头的诱惑？不是的。我当然爱着格达（她死后，我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她的爱有多深），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说那些话，完全是出于艺术冲动，也就是说，丝毫没有想惹事生非，更不想恶意伤人。也不是因为我中了邪，像那些贪杯的酒鬼一样不能自拔。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不可否认，客观上也存在一些挑衅因素。当我受到激怒时，整个人就往往处于一种剑拔弩张的状态，我只觉得地动山摇之后，仿佛从地

狱传来了天崩地裂的巨响，直冲我的两只耳朵。我的耳朵都快被震聋了，我不得不张大嘴巴。思想单纯的格达，极力想使我的话听起来不让人觉得太刺耳，为此，她拟定出计划，要和各类异己分子建立友谊，殊不知这些人缺少些做人的素质，根本不配做朋友，他们根本不想和任何人交朋友。可她呢，还给他们送杜鹃花、秋海棠，还帮他们修剪花枝，请他们的夫人下馆子。每次她从外面回来，还认认真真、兴高采烈地向我叙说她获得的各种信息，比如，她们丈夫的薪水是何等微薄，还得赡养年老病重的父母亲；或是谁家有人得了神经病；或者有个年仅十五岁的孩子闯入民宅大肆抢劫；或是又有谁嗜用海洛因。

我对格达说话从来都是柔声细气的，只有对待那些寻衅者我才会针锋相对。那次对你的态度是惟一例外——那天你并没有惹我，罗斯小姐——所以我今天写信向你道歉，这也是我第一次给别人写道歉信。你是我进行自我检查的启蒙老师。关于这一点，我待会儿再细讲。此刻，我想到了格达。为了她，我开始学习如何管好自己的嘴，充分认识沉默的价值，体会如何把刚到嘴边的话重新咽下去，并使这股恶势（如果真的是这样）在体内化解成力量。我觉得其中的奥妙有点像佛教中“劝人为善”的经文。我认为，“劝人为善”实为一门语言生理学。但是，当语言本身已变得烦琐、空洞，你再去斟酌词句，说出来的话还会有意义吗？如果拉·罗什福柯<sup>①</sup>再登场说三道四，人们就会哈欠不断，拂袖而去。这年头，谁还会相信格言警句？

舒尔铁斯教授是我的同事，格达和他们也很熟悉，因此，她还能保护我，但她也有鞭长莫及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去参加大学举办的午餐会。那次午餐会场面很正式，我坐在一位经常

---

<sup>①</sup> 拉·罗什福柯（1613~1680）：法国讽刺短诗作者，伦理学家。

把大笔钱款捐给歌剧团和乐团的阔太太身边。那天，我一身盛装：燕尾服，白领带，很有点明星风采。晚会之前，我刚指挥了佩高莱兹的《圣母悼歌》，那绝对是十八世纪最动人的作品之一。你也许会以为我的这次指挥肯定能使我在当晚变得超凡脱俗，至少到睡觉前不会惹什么麻烦。可是，你错了，没过多久我就闯祸了。我坐在这位珀格蒙太太身边不是纯粹巧合。她因为捐了一大笔钱而引起了一番轰动；有人突发奇想，打算筹建一支由学者组成的祷文领唱队；我的任务是为之锦上添花（巧妙地策划）。陷阱就这样设定了，我难逃厄运。坦白地说，我不喜欢这主意，也讨厌出这点子的那些家伙，全是一群坏种。这些人，仿佛只要有一大笔钱就能使他们变得有权有势，比任何人都强。老珀格蒙留给他太太的遗产相当可观。如此丰厚的遗产就像是来自神的恩赐，无比神圣。而我呢，又是刚刚指挥了一场圣乐，我们俩坐在一起，真可谓是神圣对神圣，十分般配。珀格蒙太太谈论着金钱，根本不提《圣母悼歌》，也没评说我对该乐曲的理解和指挥。诚然，在美国，人们谈话时，几乎所有的话题都是从谈钱开始。如果谈了一千零一个话题，也许只有一个会与钱无关。可是，在这种场合，我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不谈音乐。老太太对我说，那些大慈善家们个个都很有头脑；她还向我说明那些大财主们，如卡耐基、洛克菲勒、梅隆、福特，他们之间是如何划分领地的。我得知，在国外，他们还设立了许多名目繁多的罗斯柴尔德利息贷款和大众汽车公司基金。珀格蒙一家的投资眼光主要放在音乐领域。她还告诉我他们曾在电脑作曲和电声音乐方面进行过的投资额。对于这两项投资，我本人深恶痛绝，所以憋着一肚子火，但我还是忍住了，对这位太太报于最完美、最谦恭的一瞥；这是基辅人的风度。我曾在大街上看到过，这位阔太太的豪华轿车在校园警察的护送下驶去，为城市警卫增添了不少风光。挂在她胸前的钻石大得出奇，如同静卧在森林里的芬格湖。我得承认，有关

金钱的谈话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异的副作用，它深深地撩拨着我内心最深处。我那早已离开人间的哥哥，一辈子都在为钱奔忙，他竟然成了我母亲最宠爱的宝贝儿。我母亲今年已有九十高龄，但对我哥哥仍是爱在心头。正巧这时，我听到珀格蒙太太说她准备写回忆录，我就问——这种冲动仿佛来自尼采所说的“无我之境”——“那么，请问，您准备用打字机呢还是用点钞机写你的回忆录？”

我该说那种话吗？我真的说出口了吗？再想这些都已太迟，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老太太看着我，显得异常平静。我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她可真是宽宏大量。相形之下，我觉得自己反显得有些小人之心。我注意到她那张苍老、肌肉松弛的脸上毫无异样表情；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反使得她那双蓝眼睛显得愈发清澈；我真怀疑她是否根本就没听见我的话，或是她没听出那弦外之音。但不管如何，我的罪孽已经成为事实，无法雪洗。我连忙改变话题。我知道，这位老太太，虽然对音乐没有兴趣，但对科学技术还是尽了不少力。报纸上曾说她投资了一大笔钱用于研究癫痫病。我赶紧把话题转到了癫痫病。我告诉她，弗洛伊德曾写过一篇文章，论证阵发性癫痫病实际上是病人对父亲的死亡表示恐惧的一种症候，所以病人才表现为精神紧张，身体僵直。当病人发作时，他会极力摆脱那种疯狂状，但是，一旦当他发觉自己的挣扎只会导致咬破嘴唇时，他就干脆往地上一躺，一语不发，浑身冰凉。我集中精力大谈“虚无之境”。事实上，“虚无”是指在每一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某种常理无法触及的东西。那种东西是无法被理性驯服的。也许是由权力意志生成，而权力意志即存在本身。我醒悟了，用年轻人的话来说，就是开窍了，这种力量来自《圣母悼歌》（可是，伟大的圣母不站在我一边），我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一个无我之境看待问题。我相信自己一定完全误解了珀格蒙老太太的话。她能与我谈论金钱，那是出于一片好心，甚

至是一种宽宏大量的气度，说明她看得起我——这样一位懂音乐的年轻人，这就相当于我也拥有一笔财富，其地位或许还可以和一位有钱人相提并论。尽管我出言不慎，老太太依然慷慨解囊，资助了这个由学者组成的祷文领唱队。总不能因为一个狂妄之徒在餐桌上胡说八道就废了一个组织吧？她那么大年纪，什么样的疯子没见过？在她眼里，我只不过是使了点雕虫小技罢了。其效果，与其说吓着了老太太，倒不如说使我自己受惊不小。

罗斯小姐，老太太真是大将风度，不慌不忙。我一直想在力量上超越她，想小施计谋，如同穿过捷径走到她前面。是不是像一场力量比赛？但那又意味着什么？我为什么希望自己有力量？怎么说呢，也许是因为当你有了足够的力量时，你就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要有权有势，哪怕出言伤人，也不会招惹麻烦。就拿丘吉尔的例子来说吧，当他谈到国会议员德赖伯格时，曾这样说：“要不是因为他，鸡奸行为也不至于变得如此下流不堪。”德赖伯格听了此言，不仅没有怒气冲天，反而觉得受宠若惊。以至于另一个议员很是羡慕，硬说丘吉尔当时的话是冲着他说的。闻此事后，德赖伯格说，“他怎么会说你呢？温斯顿哪会注意你这么个无足轻重的同性恋者！”伦敦人为此事乐了好几个星期。而在人们眼里，丘吉尔依然是大名鼎鼎的丘吉尔：土生土长于英格兰莫尔伯勒城，并为该城市增添光辉的伟大人物；在人民心中，他依然是拯救祖国的伟大英雄。被这样了不起的人奚落一顿，反而能使你名垂青史。不过，丘吉尔的例子是属于那遥远的文明时代。斯大林的例子就显得野蛮些。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接见波兰共产党代表团，他说：“我怎么没看到那位善良、聪明的女同志 Z？她现在还好吧？”当时在场的波兰代表们个个低头不语。他们很清楚，正是斯大林下令杀掉了那位女同志，因此，大家只好默不作声。

但是，这种沉默并不表示在场者的乖巧，而是一种轻蔑。罗

斯小姐，说白了，这只能说明这个东方国家的君主独裁统治是何等严重。丘吉尔毕竟还是个人，而斯大林则是徒有其表。至于我们，在美国的情况，那可不一样，我们所处的是多种文明构成的民主社会，讲究民俗民风。我们当然不乏道德品行，但我们对社会风尚可谓一无所知。这完全是因为美国不是个培养风尚的地方（我说的风尚是指伏尔泰<sup>①</sup>和吉本<sup>②</sup>宣扬的那种意义，或是指圣·西门<sup>③</sup>和海涅<sup>④</sup>提倡的那种风尚）。只有在那种风尚中，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也能直抒己见，不会得罪人。如果有人因此觉得受到了冒犯，人们也会认为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不会在字面上大做文章；我在人们眼中仅仅是性格怪异、值得心理学研究的对象罢了。人们不会想着要从全方位对我的个人履历进行彻底调查以便下一个最后结论。说到个人履历，或传记，就其原意来判断，我认为在当今已失去意义。我们大家忙忙碌碌，像一群刚出壳的鸡子，全都围着权力之塔下的几个偶像转，无一例外，每一份履历都是大同小异。

那么，语言是什么呢？我接触的第一位律师（第二位是格达的弟弟），是我为了自己和我哥哥的房地产纠纷案聘请的代理人，他叫克劳林。每当要起草一份重要文书时，他总是说：“你来写吧，肖穆特。你是驾御语言的高手。”

“你是不知餍足的娼妇！”

我最终还是强忍着没说出这句话。我觉得他太厉害了，我需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

② 吉本（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史学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共6卷。

③ 圣西门（1675~1755）：法国作家，曾在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宫廷里长期供职。所著《回忆录》记述了1694~1723年间的法国宫廷生活。

④ 海涅（1797~1856）：德国诗人、政论家，以其爱情诗《歌集》著称。

要他帮忙，我不敢得罪他。

可是，我仿佛注定了要得罪他似的，而这种预感马上得到了应验。

我无法向你说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简直像个谜。那天，当我与珀格蒙太太大谈弗洛伊德那篇有关癫痫病的文章时，我的言下之意是，我本人有时也像是染了那种病似的，有阵发性倾向，但绝对不仅仅是精神问题和脑损伤引起的，也不是异常气质的问题。难道是我有一种内在的报复因子在起作用，或是恶魔附身，或是来自狄俄尼索斯<sup>①</sup>的召唤？那天，我和克劳森来到了他的俱乐部吃午饭。那可是个可怕的地方，餐厅里挤满了人，都是克劳森召来胁迫我的一帮无赖。整个场景很像杜米埃<sup>②</sup>的一幅画（我提出的全部建议都被他们断然否决，还被他们训斥了不下十几次；我付了克劳森两万五千美元的聘用定金，可他连对案子的最基本概要都没弄清）——吃完饭以后，我是指当我们一起走过俱乐部的大堂时，我看到那儿有不少人：联邦政府的法官，操纵政党核心组织的政客，铺路承包商，董事会的主席，他们在一块儿低声地商讨着什么；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仿佛整个大堂都要被震塌似的。我忙问接待员：“出什么事了？”她说：“俱乐部的整个电路在进行改装。原来的电路老是出故障，差不多每天都会动不动就停电。”我冲口而出：“趁着电工还在干活，让他们把餐厅里吃饭的人都电死算了。”

克劳森第二天一本正经地告诉我，由于某种原因，他不能做我的辩护人了。他说他和我这个当事人合不来。我知道，一个聪明人如果想使自己自在逍遥，就该远离官僚——这话绝对正确。可我竟然还投奔到克劳森那儿寻求庇护。我选择他做我的代理

---

① 狄俄尼索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杜米埃（1808~1879）：法国画家，擅长讽刺漫画。

人，主要是因为考虑到他名声响亮，为人傲慢自大，和我哥哥的遗孀聘请的律师一个样。我那死去的哥哥害得我花了一大笔冤枉钱。我是把损失补回来，还是就此作罢？我是和他们进行公开战斗还是使花招进行暗斗？要想上法庭，并且想在法庭上取胜，最重要的是你得具备厚颜无耻的坚定精神，还要狂妄自大，否则，就只能全盘皆输。可现在，我却把克劳森气跑了。就如当时我得罪了珀格蒙太太以后一样，我妻子格达对此事也无计可施——她既不能给他们送花，也不可能请他们吃饭。当时的她已经病魔缠身，奄奄一息。她对于我的前程很感焦虑。她规劝我说：“你为什么非得刺激他？他可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

“我天性中有些弱点，无法克服。我到底怎么啦？我好像本性太好，无法成为伪君子。”

“伪君子一词用得太过分了……其实只是口头上说几句漂亮话而已。”

听了这话，我说了句本不该在她如此糟糕的健康状况下说的话：“那和拍马屁又有什么两样？”

“哦，我可怜的赫歇耳，你真是本性难改！”

她身患白血病，当时已病入膏肓。所以，罗斯小姐，我就只好答应她，把案子转给她弟弟汉斯处理。她深信自己的弟弟会看在同胞的分上，对我赤胆忠心。当然，她弟弟对她的感情的确是真诚的。他爱他姐姐，可是，作为一名法官，他可不怎么样。这倒不是因为他不守信用，而是他专爱吹牛撒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法官，又是法官。我怎么老和法官纠缠不清？你也许会问。首先，是因为我爱我哥哥。其次，我们要赚钱，而赚钱又离不开法官律师。法官律师们早已在金钱世界的中心为自己建立了强大的阵营——成了王中之王。瓦利施在他的信中以幸灾乐祸的口吻

提到了我那起糟糕的诉讼案：“我早就知道你是个傻瓜。”至于他自己，他当然不傻，但那是他本人竭尽全力换来的聪明。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谁都难免有失算的时候。不过，给律师预付聘用金，的确是只有傻瓜才干的事。所以，我觉得瓦利施的话说得没错。

我的哥哥菲力普向我提了个赚钱做生意的好主意。不过，这事也是我自己不好。是我告诉他，我因为出版了一本关于音乐鉴赏的书赚了不少钱。他很惊喜地对他妻子说：“特蕾西，有人发大财了！”接着，他问我：“你打算如何安排这笔钱呢？有没有想过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少受税收部门的剥削，减少因通货膨胀引起的损失？”

我对自己的哥哥有一种仰慕之情，不是因为家里人说他是个“有创新的企业家”——我并不看重这一点——而是因为，嗨，没有什么“因为”之说，就是存在这么一个事实，一种生来就有的感情，一个解不开的谜。他对我的经济状况表示出的关心使我很感动。他认真地和我谈了一次，我就有些飘飘然了。我对他说：“我从来没想着要去赚钱，可眼下就已是腰缠万贯了。真是无心插柳柳成阴，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的话有些虚张声势，你也可以说我在撒谎。我说这话的语气也不对，仿佛赚钱是件很容易的事。我们这兄弟俩，我的哥哥菲力普为了赚钱把身体都弄垮了；而我呢，只是舞文弄墨，靠着偶然的机遇赚了些钱，仿佛来得太容易似的。我现在承认，当时的话说错了。那种话不仅引发了菲力普的坏心思，而且使他牢记不忘。我甚至能看到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菲力普小的时候就很胖。孩提时代，我和他睡在一张床上，挤得我像是跟胖乎乎的海洋动物睡在一起似的。可是后来他变得结实了许多。他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身材粗壮，大脸庞上总是一副严肃的神情，耷拉着的眼睛下面挂着眼袋。我这位已故的哥哥

是个聪明人，为自己的未来制订了许多长远计划。我对他一向敬而远之，这倒使他在我身上有机可趁。我的这份爱戴之情正是我内心软弱的表现，成年男人如此重情分实在让人有点瞧不起。他在有些方面很像斯潘塞·特蕾西，只不过比她更野心勃勃，锐气十足。他像大多数得克萨斯人那样，浑身被太阳晒得通红；发型很时髦，绝对不是一般的短发；每个手指上都戴着墨西哥产的戒指。

他在离休斯顿不远处购置了一个庄园。我和格达应邀前去参观。他在那儿的生活极其豪华奢侈。他带着我们到处转悠时说：“每天早上，当我睁开眼睛时，我就对自己说，‘菲力普，你住在公园的中心。整个公园都是你的。’”

我随声附和：“的确，和芝加哥的道格拉斯公园差不多大。”

他当即打断了我的话头，不想听我提到我们的祖籍地，那个没有现代生机的老西部地区。也许，我会往事重提：罗斯福大道两旁那些矮小的公寓；卖鱼店的门口，摆着《塔木德经》<sup>①</sup> 研究者们用于碾制辣根的大磨；独立大街上每日必有的肖穆特家烹制的食品。我哥哥讨厌我提这些往事，他显然已完全美国化了。但在另一方面，他与我一样，也不属于得克萨斯的这块土地。也许，谁都不属于这儿。在他来这错综复杂之地前，曾有许多产业主先后拥有过这个庄园，石油经营者，土地开发商等等；他们苦心经营，才使这儿有了如今的样子。但他们这伙人的下场都不怎么样，或死于破旧廉价的小旅馆中，或在国家疯人院里命归黄泉。这些人最后都诅咒这看似宏伟、实为海市蜃楼的庄园。现在，这庄园的主人是菲力普，至少在形式上，他拥有着这一财产。但是，事实上，他也不是真的喜欢这儿；他只不过是离不开

---

<sup>①</sup> 《塔木德经》：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头法律法集，为犹太人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

这儿。他之所以买下它，完全出于他妻子的压力。此外，这个庄园对于他来说还具有许多象征意义。

他告诉我说，他为我想了个万无一失的投资计划。还说，想和他合股赚钱的人趋之若鹜，而且都是上百万的投资，但他考虑到我的利益，所以把他们统统赶跑了。不过，既然要帮我一把，那就得讲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我不能过问他的生意，这也是他在生意场上的一贯风格，但我尽管可以放心，他会像个哥哥该做的那样保护自己弟弟的利益，我不用为此担心。在他那芳香袭人的花园里，他口若悬河，激动之余，竟然用意第绪语（但只用了一句）说，他不会让我竹篮打水一场空。接着，他用英语说，他妻子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很讲信誉，万一他有什么意外的话，他妻子一定会绝对尊重他的意愿，信守合同，贯彻到底。他说我对他妻子不了解，说她对他言听计从，十分忠诚。虽然不容易了解她，但她很靠得住。还说我们俩生意上的合作，在法律条款方面，不和他妻子有任何牵扯。否则，他和他妻子都会觉得不安的。你不会相信我，罗斯小姐，我真的被他这番话感动了。我就像他脚下的油门，只要他那双穿着高档鞋子的脚轻轻一踩，我就会迅速反应，全身的热血就往上冲。我满腔热情地表示同意。他提出的计划是在得克萨斯州建立一个最大的废旧汽车拆卸中心，把零部件运往南美和拉丁美洲。德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大出口商们正急需汽车零部件；我本人对此倒真的深有感触——有一次，我的那辆越野车，前轮的稳定器坏了，由于在美国市场找不到配件，只好干等了四个月。不过，罗斯小姐，真正吸引我的并不是这项计划本身，而是我觉得我和亲哥哥终于能在一起做点什么事了，这还是平生第一次。既然我们不可能在音乐世界里一起徜徉，那么，合伙赚钱是理所当然的。这份亲情在我心中激荡已久，如今总算有了表白的机会，我为此激动异常；我觉得这种情感也许在我孩童时代就有，这么多年来日积月累，现在一下子爆

发，我当然高兴得情不自禁。

“你怎么会想到干拆卸废旧汽车这一行？”格达问我，“你有没有想到那些油污、金属，还有噪声？”

我说，“凭什么要让国家财税部门收取我一半的版税？他们为发展音乐做了些什么？”

罗斯小姐，我妻子是个读书人，她选取有关书籍，反复阅读，然后在入睡前把内容复述给我听。就这样，我们通读了巴尔扎克的作品。例如，《高老头》（亲生女儿如何残忍地对待自己的父亲）、《邦斯舅舅》（那些贪婪的亲戚为了占有艺术收藏品如何蒙骗一位思想单纯的老人）……我们了解到的亲戚，一个又一个，都是些冷酷之徒。我妻子还讲述了那位轻信别人，最终身无分文的香水大王塞萨·比豪德的故事。她还选取马克思论著中的有关章节，教导我认识资本如何化解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我本人也读过此类书籍，但我坚信那种倒霉事不会发生到自己头上。我读过有关性病的书，懂得如何保护自己，就没有得那种病。更何况事到如今，再给我任何警告已为时太晚。

在我最后一次去得克萨斯的路上，我专门视察了那个烟雾弥漫、占地很大的汽车拆卸场。在回家的路上，菲力普告诉我说，他妻子已成了饲养短毛狗的能手。你也许从报纸上读到过关于这类动物的描述，它们曾使得美国的宠物饲养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这类狗是犬科动物中最凶猛的，有点像猎狗，又有点像英国的短毛狗，皮毛光滑，宽胸脯，体格极其强壮，喜欢袭击陌生人、孩子，也会袭击成年人。最糟糕的是这些家伙在袭击之前从不叫唤，所以，被袭击者连一点防备也没有。此外，一旦它们找到攻击目标，不咬死是不会罢休的，在这过程中，谁也阻止不了。如果警察及时赶到，就只能用枪把它们击毙。这些狗在斗狗场时无论是在争斗中，还是在死亡时，都是不声不响的。那些迷恋斗狗的观众，在压赌注时，常常一掷千金（斗狗是非法

的，但人为什么要迷恋斗狗呢？)。慈善机构和人权捍卫组织对此一筹莫展，到底是除掉这些狗呢，还是捍卫养狗者的权利？华盛顿的议员们曾举行投票以决定是否该对这些狗进行消灭，但在同时，对这些狗情有独钟的人们继续进行试验，尽最大可能培养出各种更凶残的狗。

菲力普深为自己的妻子感到骄傲。“特蕾西很了不起，是吧？”他说，“靠这些狗就能发一笔大财。她肯定能掀起一股养狗热潮。很多人从全国各地跑来，要买小狗。”

他带着我来到圈养狗的地方，让我欣赏那些杂种。当我们经过时，它们趴在铁丝网上，对着我龇牙咧嘴的。我不喜欢这一游览项目。我觉得自己的牙齿直打颤。就连菲力普本人看着这些家伙时也是一副心惊胆战的模样。虽说这些狗是他的财产，他是它们的主人，但它们可不会听他的指挥。倒是特蕾西，她站在狗群中间，朝我点头示意。那几名来给狗喂食的黑人雇工也显得提心吊胆，但也只得忍着。“可是，你瞧特蕾西，”菲力普说，“她是它们的女神。”

我当时准是给吓着了，没说几句讥讽话嘲弄菲力普，连这种念头都没有。当我回家时，竟然想不出有任何有趣的场景可以说给格达听。本来想说点什么，也好让她高兴高兴。在那些愁苦的日子里，我总是想方设法地让她快乐些。

可是，我由此开始浮想联翩，这大概也是我的天性，我把这一饲养恶狗行为与国家的总体氛围联系到了一起。在对待养狗这件事上产生的意见分歧给美国社会的精神概貌添加了一份怪诞的色彩。不久之前，一位女士写信给《波斯顿环球报》，指责我们的祖先在制订民主政体的时候不考虑猫和狗的权利，她认为应该给动物以同样的人权。她说，我们的祖先对于人的罪行太宽容

了，《人权法案》<sup>①</sup>应该对那些不得不依赖人类才能生存的动物规定出一些保护条例。我对此事的最大感受是，没想到平等主义已经泛滥到了动物世界，可问题又不单单是平等主义，这种观点体现了人们对于物种概念的大混合，使得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例如，你可以从一条狗那儿感受到它对你的赤胆忠心，但你也也许无法从自己的父母或是情人那儿体会到什么是真情实感。我想起了三十年代，（也许是从莱昂内尔·埃布尔的回忆录里读到的？）关于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勃雷东<sup>②</sup>在采访被流放的利昂·托洛茨基时的情景。当他们俩在讨论世界革命问题时，托洛茨基的狗跑到他身边依偎着自己的主人，托氏说，“它是我惟一忠诚可靠的朋友。”怎么回事？这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月革命的英雄、苏联红军的组建者，惟一可靠的朋友竟然是一条狗？这是这位超现实主义大师在托物言志，但对此番情景的描述是公开的，就事论事的，正如朝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放一支箭一样，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不过，字里行间流露的类似于资产阶级的那种伤感情调却是不同寻常。如今的精神病医生不会觉得奇怪。如果问他们的病人，他们最爱谁，越来越多的病人说，“我的狗。”由此看来，有朝一日，在白宫里，人们也会养狗。当然，他们不会养那些好斗的短毛狗，而是养些温顺的黄毛狗；这些狗在经过一定训练后，会衔回猎物；而这些狗的兽医则能成为国务卿。

我没有把内心的这些想法说给格达听。我也没有把菲力普身体欠佳的情况告诉她，因为那只能乱上添乱，雪上加霜。菲力普

---

① 《人权法案》：美国《宪法》前十项修正条款，主要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不受侵犯。

② 安德烈·勃雷东（1896~1966）：法国诗人、评论家、编辑、超现实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一直在生病。特蕾西让他进行一项体育运动。每天一大早，他就来到卧室旁的小房间里锻炼身体。那儿，摆着一套最新式的体育锻炼器械。菲力普穿着丝质拳击运动短装（上面的图案是像车轮似的橙子切片，我想其创意是为了表现柠檬威士忌鸡尾酒这一主题）。每天，菲力普不得不把他那肥壮的双臂吊在锃光发亮的械杆上，或是在附带里程器的跑步机上踩个不停，或练习举哑铃。当他坐在自行车练习器上，奋力蹬车，看着运动短裤上的柠檬图案时，他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在飞速前进，但实际上，他仍停留在原地。这可真奇怪，他那么个富翁，有着如此显赫的地位，却在这儿作无用功！他的孩子们个个显得很好斗，随着震耳欲聋的滚石乐狂舞不停，象征着学识渊博的西班牙式的头发在额头上上下下跳动。那些残暴成性的恶狗静静地等待着用武之时。我感到，我的哥哥仅仅是他妻子和孩子的管家。

可是，菲力普还偏偏要我在他做运动的时候，站在一旁欣赏他，让我感受他那巨大的内在力量。当他做俯卧撑的时候，我看到，还没等到他的下巴碰着地板时，他那肥嘟嘟的乳头就已擦着了地板，我觉得好笑极了，很想说几句嘲讽话，但他脸上一本正经的神色不仅抑制了我的冲动，而且还使我意识到，在他那满身肥肉的体内积蓄着巨大的原始力量，臃肿的身躯之下有着一颗坚强的心；还有他脖子上那些青筋，背部的层层肌肉，无一不是力量的象征。“我可一点也不行。”我对他承认。事实上。罗斯小姐，我真的不行。我觉得自己的屁股松松垮垮的，像只拉链坏了的帆布包。

对于菲力普的样子，我不敢当面妄加评论，因为我是他的惟一合伙人，在那些废旧汽车里，有我六十万美元的投资款。就在他的私人公园后面，摆着起重机、压实机；几百英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金属的敲打声，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到这时候我才明白，这项计划的强有力策划者是菲力普的妻子，那个小个子、圆脸、

金发碧眼、男人似的女人；她的性情总像流星一样，让人捉摸不透，而她表面上倒是显得马大哈似的。不，其实不然，我才是真正的马大哈。她在骨子里是最精于算计的。

我对于婚姻的许多想法都是来自我妻子格达对我的耳濡目染，她的温柔和关心深深地影响着我的思想。

在这次与菲力普相处过程中，我尽量想把我们的话题引向我们的母亲，想让他谈谈她，然而，他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他最不以为然的就家庭亲情。不过，他对于自己目前的小家倒是情真意切；对原来的家，却毫无感情。他说他想不起哈蒙德、印第安那，也想不起独立大街。“和那些地方相关的事物中，我只在乎你。”他对我这样说。他总算还记得有两个早已去世的姐姐，但怎么也想不起她们叫什么名字了。他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超越了现实，与安德烈·勃雷东的超现实主义相比，他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超现实主义不是一种理论，而是对于未来趋势的一种预测。

“小丁当的真名叫什么？”他说。

我不由得笑了。“什么！你竟然忘了海伦？你准是在演戏吧？待会儿，你大概还会说你忘了她丈夫的名字叫什么。你总该记得克拉姆吧？是他给你买了你第一条牛仔长裤。还记得萨贝娜吗？她帮你在罗泊一家木桶店里找到了工作。”

“这些事在我的记忆里被慢慢淡忘了，”他说，“可我为什么要记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如果我真需要想起什么，那我就去问你。你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可那又有什么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罗斯小姐，我对于这些观点不会马上进行反驳。我会先细细地想一想。不可否认，我是希望菲力普的记忆力不要衰老得太快。我要他记住我们是同胞兄弟。希望他记住我的投资没有风险，更希望拆卸废旧汽车这个行当能带给我一笔固定的收入，好让我享受生活——到科西嘉岛避暑，赶在音乐博览

会开始之前就能去伦敦。就在那些有钱的阿拉伯人把伦敦的房产价格哄抬上去之前，我和格达曾经想在肯新顿买一套公寓。我们等了又等，盼望着我的合伙人能给我们分些红利，但是迟迟不能如愿。“我们的生意非常红火，”菲力普说，“到明年，我们就能进行再抵押，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百多万美元的利润在你我之间进行分红。可是在这之前，我们只好满足于享受税金减免。”

他依然随着摇滚乐不断运动，头发上下跳动着（在房子的后面，那些短毛狗无声无息地成长，凶残的天性在一天天地增加）。我把话题转向我们的姐姐小丁当。在眼下这种氛围中，我想，最好的权宜之计是激起他的手足亲情。我追忆起我们的孩提时代，说起了在独立大街上听到的音乐与如今的是何等不同。当时，小丁当姐姐常常在钢琴上弹奏“杰米有五分钱”，我们大伙就齐声合唱，或者也可说成是大喊大叫。我问菲力普是否记得克拉姆？克拉姆推着果味汽水车转悠（因为克拉姆很喜欢海伦，所以就昵称她“小丁当”）；克拉姆能把满满的一箱瓶子叠成像金字塔那样，还在塔尖留一个小口。不，不完全像金字塔，更确切地说，是像金字形神塔。

“什么是金字形神塔？”

我向他解释，这是亚述人，或是巴比伦人文化中的一种多层建筑，往上逐渐缩小，但没塔尖。

菲力普说：“送你上大学是个错误，但我也知道除此以外，你还能干什么大事。在我们当中，除你之外，都只读了高中……我猜，克拉姆对你挺不错吧。”

我说，是的，小丁当让克拉姆替我付了上大学的学费。克拉姆长得圆头圆脑的，不知菲力普还记得吗？他个儿不高，但是很强壮，大圆脸，皮肤光滑得像萨摩亚人，他总是把他的黑头发梳得平平的，像电影明星瓦伦蒂诺，或是乔治·拉夫特那样的发型。

他为全家付房租，养活我们几个。在经济大萧条时期<sup>①</sup>，足以用来付房租。整个家，上上下下，全得靠母亲操劳，那时候，她的神经也许就有些不正常，行为夸张，爱哭闹，等到她快五十岁时，真的有些疯疯癫癫了。但在她管理这个家时，她却很有些大将风度。我们家的厨房是她的指挥部。因为克拉姆在挣钱养活我们，所以，她首先得让他吃饱，而克拉姆的胃口又极大，为此，母亲给他做炒杂碎、白菜杂烩，而且总把盘子装得满满的。克拉姆如风卷残云似的把它们一扫而光之后，还能把一个倒置型菠萝蛋糕全部吃下。母亲整日都在买菜、洗菜、切菜；煮、煎、烤、炒样样都会；然后，就是伺候大伙吃，接着就是一大摊的洗涮活儿。克拉姆最后把自己吃成个目光呆滞的家伙。他在夜里不知不觉地起床，穿着短裤，走来走去，最终走到冰箱旁。我记得在一个夏天的夜里，我看到他把橘子一个接一个地切成两半，然后用牙把它们乱咬一气。在他这次梦游中，大概毁掉了一打橘子。干完之后，他挺着他那大肚子，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床上睡觉。

“他还和凯茨·劳伦斯一起，在一家叫做‘钻石马蹄’的店里赌博，”菲力普说。菲力普并不真的想重温往事，只不过是应付我。他露出些笑意，但基本上仍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又有几分缄默。

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后来才知道，他那时已开始了他有生以来最冒险的行骗活动。

他换了个话题，问我是否欣赏特蕾西管理这片土地的才能。他说她算得上是位魔术师，整个房子的内部装潢都是她一手操办的。所用的亚麻布材料都是从葡萄牙进口的。花园也被她经营得十分美丽。她栽培的玫瑰曾获得大奖。她置办的所有家电设施从来没出过故障。她还是一流名厨。诚然，孩子们有些不听话，但

---

<sup>①</sup> 指 1929 年到 20 世纪 30 年代早期的世界性严重经济萧条。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况且，特蕾西又是个了不起的心理医生，对付这几个小无赖，还是不成问题的。只要对他们稍作调整，他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美国青年。最使菲力普感到满意的是，他身边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国化，而他这一心态也正是美国的产物。

至于我在他们家的早饭，如果我不断地催促厨子，早饭还是会有有的。一位黑人雇工为我送来了一杯经过冷冻和干燥处理的咖啡，还有一片薄如纸片的面包。对于我提的所有问题，这位员工的回答全部都是“没有”。有鸡蛋吗？或者土司面包？或者一小勺果酱？通通没有。我肚子饿的时候就不会有好心情。就在刚才我坐等那黑人雇工给我端来冷冻干燥咖啡和那脱脂棉一样的面包时，我已在心里想好了几句恰到好处的讥讽话送给特蕾西，只是想再斟酌一番，以便在讽刺的同时又不失人情味。和佣人去一争高低，实在是没多大意义。但是，罗斯小姐，很显然，我在他们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客人。没有人会在意我说什么。我几乎能听到他们的主人在对他们说：“拿出你们原来那种懒散样吧。”或是说“请尽量怠慢些，”——《李尔王》<sup>①</sup>中冈纳里尔的台词。我住的那个房间是他们的女儿原先住的，后来女儿大了，自然就嫌房间太小了。墙纸的图案是关于《傻瓜西蒙和呆子甘德》的插图，也许与房间原来的主人很不相称（但现在却显得相当吻合）。

我硬着头皮听我哥哥夸自己的妻子。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她如何聪明如何善良，是一位温良母亲，一位杰出的女主人，连那些拥有最大产业的最上流的人也十分尊敬她。她还是生意场上一位精明的顾问。（对于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当菲力普情绪焦虑的时候，她还是位极富同情心的安慰者；此外，她也是个精力旺盛的情人，能给予菲力普从未得到过的东西——安宁。而我呢，既然已经把六十万美元扔在了这儿，就只得像个傻瓜似的点头哈

<sup>①</sup> 李尔王：莎士比亚悲剧之一。

腰，继续走下去。对于他那些隐藏的虚伪，我只得点头称是，我还得在那些货单上签字，而所得款全进了菲力普的腰包。（瓦利施听了又要嘲笑我了！）亚热带的空气带着芬芳——木兰花，忍冬花，百花香橙花，不管是他妈的什么花香，迎面扑来，吹在我们这对很不相称的兄弟身上，使我觉得灾难即将来临。最奇怪的是菲力普到这时还那么自信，（自欺欺人！）他用依地语悄悄地对我说，我们的姐姐说话声音像鸚鵡的叫唤声，还说直至今天，他才在这儿有了一份宁静，一种家庭的安详。全是谎言。他家里充斥着从放大器里播出的摇滚音乐。

经过这番体育消耗之后，菲力普得好好吃一顿，出口气。因为全家出去吃饭，我们开了两辆豹牌轿车，来到了一家中国餐馆里。这家中国饭馆呈旋转式，像个供人参观的地方，餐桌很醒目，像交响乐队里的定音鼓。菲力普就在这儿当众大闹了一场。他自己叫了许多道菜，等到桌上摆不下时，他把经理叫来，说是饭店想骗他的钱，这些菜，他都只要了一半的量：半份炸馄饨，半份蛋卷，半份烤猪排。菲力普要求经理把剩下的一半由饭店收回，但遭到了拒绝。于是，他就拿着蛋卷和猪排，从一张桌子走到另一张桌子，边走边喊，“快来！快来！我请客！”菲力普每次进餐馆都会激动不已，这次，特蕾西发话了：“够了，菲力普，我们来这儿是为了吃饭，不是让别人得高血压。”但没过几分钟，他假装在沙拉里发现了一粒石子儿。他的这种把戏我以前也见过。事先，他就在衣袋里准备好了石子。就连自己的孩子也早已明白真相，其中的一位对我说：“这是他的家常便饭，叔叔。”听到有人叫我叔叔，我有些受宠若惊。

罗斯小姐，请你容忍我的 唆。我会尽快把原委说明白。主要是我在温哥华无人可以倾诉，格雷斯威尔老太太是我惟一可以说话的人，但我很难和她沟通。菲力普假作牙齿被石子咯了，接着，他从美国杂志上宣扬的美国方式（可爱的妻子，美丽的家

庭，最高档的生活)演变为好斗者常有的寻衅闹事态度——朝着饭店的经营者——几个东方人大喊大叫，还让自己的孩子打电话给律师。整个是一副美国富翁的粗野、平庸特性。但是，如今你要想成为平庸之徒，还真不容易，必须学得入世、狡猾，只有那样才能得到你原先深恶痛绝的东西。好了，再谈这些“假意识”、扯这些鬼话连篇的东西毫无意义。菲力普为了实现完全美国化，投身到了特蕾西怀中。为了这一（早已过时的）殊荣，他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不过，也许他一直怀疑是否真有灵魂这种东西存在。他之所以讨厌我，就是因为我不断地对他暗示，灵魂是存在的。我是什么人？改良大师？或是别的什么人？虽然，除了在葬礼上，菲力普听佩高莱兹的作品的耐心只有两分钟，但我难道不是——撇开佩高莱兹不说——为了赚大钱而进行投资的吗？

菲力普死后不久，报纸上就出现了有关报道。你也许读过。他和中西部的一些分管执照颁发的人纠合在一起做手脚，还和盗贼狼狈为奸，那些窃贼专偷豪华车，由他把拆卸下来的零部件出售到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国家。不过，和执照部门有关的罪没有算在菲力普头上。我俩的合股是以我的钱作为经济信誉担保的，公司理应拥有和出售土地的权力，但是由于许多财产分割权不明确，还存在着与第三方的扣押品留置权的纠纷问题。菲力普被指控犯有买卖诈骗罪。于是，灾难接踵而至。法庭宣判菲力普确有此罪。他不服罪，进行上诉。接着，他又在获得保释后逃之夭夭，去了墨西哥。后又在墨西哥被绑架，事情发生时，他正在查普特佩克公园跑步锻炼。绑架者是为获得赏金而搜捕逃犯的人。自从菲力普出逃后，承担追捕逃犯的公司就打算出巨资把他抓回来。他们张开天罗地网，静等他的出现。罗斯小姐，只要出大价钱，让人觉得值得为此冒险，就会有行家进行绑架活动。等到菲力普被遣送到得克萨斯，墨西哥官方部门就开始了引渡程序，但条件是，必须证明他是被非法劫走的，而事实情况正是如

此。我这可怜的哥哥最后死于圣安东尼奥监狱的大院子里，那天，刚好是犯人的活动时间，他正在院子里做俯卧撑。他那充满色彩的奋斗史终于结束了。

等我们把菲力普的丧事办好后，我努力想从他的地产中挽回些损失，可是，我发现他名下已没有什么产业。原来，他把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他妻子和孩子的名下。

法庭没有把菲力普的重罪转嫁到我头上，但由于我是菲力普的惟一合伙人，那些债主们就向法庭起诉我欠钱不还。所以，我就去聘请克劳森，付了定金，但就因为我在俱乐部的大堂里开的那句玩笑话，说最好把在餐厅里吃饭的人统统电死，他就拒绝为我出庭辩护。我承认，我那句话是有些刻薄，虽然没有像人们想像的那样用心险恶，但总有些虚无主义的味道，对一切采取否定态度。职业律师怎能容忍他的当事人对他说那种尖酸刻薄的话？因此，克劳森扬长而去。格达死后，我就只好把案子交给格达的弟弟汉斯。汉斯是个精力充沛，但爱走极端的人。他在经过一番周密的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太无能。他相信迅速行动是最有力的武器，所以就采取了戏剧性的行动，所以我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真是可笑！我和菲力普，兄弟俩都成了天涯流浪汉，一个往南逃，另一个往北逃，也许我也得等待引渡。可是，没有捉拿逃犯公司出高价悬赏抓我，我不值得他们如此费心。就连汉斯对我的态度也是漫不经心的。他说，我在加拿大是绝对安全的，但他自己懒得去查看有关法律，而让他的一位学徒去办这事。他的这位学徒是位漂亮的性感女郎，所以，她的咨询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此，我也就没有必要赘述了。

某些有识之士对我深表同情，当我告诉他们我的辩护律师是汉斯的时候，他们都显出满脸惊讶。他们说：“汉斯·格瑞尔？他很了不起。你应该没有问题的。”

汉斯一向穿戴考究，常常穿着香港产的西服和衬衫。他身材颀长，举手投足之间洋溢着一种风度，很像音乐会上的小提琴手；就他的风度本身而言，他足以让人为之倾倒。他看在自己亲姐姐的面上想助我一臂之力，（“她和你在一起度过了幸福的一生，她临终时还这么说。”）他把自己看作是，或者说，他力争想做我的保护人。在他眼里，我是个可怜的老家伙：刚死了妻子，天生窝囊，莫名其妙地发了些财，像个傻瓜似的轻信别人，最后被狠狠地骗了一局。“你哥哥狠狠地骗了你，他和他妻子合伙干的。”

“他妻子和他串通一气？”

“好好用脑子想想吧。她有没有给你回过信？”

“没有。”

真的没有，罗斯小姐，一封也没有。

“你仔细听听我的分析吧，哈里，”汉斯说。“菲力普想讨好自己妻子，想使她佩服他。他其实很害怕他妻子。他要战胜这种害怕，就得设法使她很有钱。她告诉他，她自己就是代表着他所需要的家。为了向妻子证明他相信她，他就必须牺牲兄弟情而换得夫妻情。这好比对他说，‘我让你的美梦成真，你只须把你弟弟的喉管切断。’于是，他就去做他该做的，一点一点地积累金钱，有了还要有，多了要更多，多多益善——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像你——然后，他就把骗得的钱转到他妻子名下。这样，等到他死的时候，她就可以——不过现在这不可能了……”

自作聪明是汉斯的拿手好戏；他纵情地演绎着，并尽量使之显得优雅动听，宛如演奏一段奏鸣曲，一个乐段接着一个乐段，最终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结构，献给我——他这位智力迟钝的姐夫。可是，他这番没完没了的絮叨对我有什么用？我的上帝，难道就真的没有人来帮帮我？我哥哥利用了我对他的信任和亲情，他玩弄我是那样的轻而易举。像揪着兔子的两只耳朵就能把它拎

起来似的。现在，这个案子由汉斯来接管，他细致入微地分析我被亲兄弟出卖的原因，连任何细节都不放过，这说明他是站在我一边，在为我说话——对吧？对于那些我从不愿过目的合伙条款，他仔细审阅，边看边找菲力普的毛病。“你明白了吗？他以名义上的产权所有人、他妻子的名义出租土地，而土地的真正使用又是以汽车拆卸公司的名义，这样，这头猪每年就能获得九万八千美元的租金收入。该属于你的那部分利润就这样到了他的腰包里。像此类交易在这些决算表上还有不少。而同时，你正做着能去科西嘉岛上避暑的美梦。”

“我明白自己天生不是赚钱的料。我很明白。”

“你亲爱的哥哥是个专职老骗子。他真应该开设一档节目，取名为‘骗子咨询热线’。而你是个专爱惹恼别人的家伙。当克劳森把你的卷宗交给我时，他说你口出狂言，很让人讨厌。所以他才不愿意为你辩护。”

“可他却不要把给我的一大笔定金还给我。”

“现在，我会为你来筹措这一切。格达已经去世了。我们三个人中间，也就只有我有能力来保证不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在我所接触过的当事人中，越是有学问的越会惹麻烦。照我看，那些人口口声声说的文化，最容易使他们走入迷途，神志不清，也因此阻碍他们发展个人前途。我相信你永远弄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让你哥哥这样猖狂肆虐，害得你如此不堪。”

虽说是菲力普硬把我拉入了他的世界，但我在向他靠拢时，心里也想得到些利益。罗斯小姐，我并不是无辜的。即便是菲力普和他的人——会计、经理、他妻子——迫使我接受他们的想法和他们所处的现实，甚至使我在情绪上也与他们相濡以沫，与他们同甘共苦，那也是我自己不好，是我想利用他们。

我后来再也没见到过菲力普的妻子和孩子，也没去看看他们住过的庄园和那些恶狗。

“那女人精通法律。”汉斯说。

汉斯奉劝我，“你最好把你所剩的财产和信托储蓄存款转到我存钱的那家银行里，那样，我就可以替你好好保管。我和那家银行的官员关系不错。他们办事很讲效率，也不会搞骗人的把戏。他们会对你备加关照。”

罗斯小姐，被人关照的滋味我已尝得够多了。瓦利施对于“感情生活”和注重感情的人的见解实在是高明。感情的质地是梦幻般的，而梦又通常都是在床上做的。而我显然一直苦于找不到一个能使自己躺下来的安全之地。现在，汉斯主动提出这样一个万无一失的安排方案，能使我不再为经济和法律事务伤脑筋，对于我来说，这些事务又是多么的繁冗、迷惑和痛苦，因此，我就接受了他的建议。我们和那家银行的一位官员见了一面。那家银行看起来倒像是一所古色古香的学院：地上铺着极富东方情调的小地毯，房间里摆着雕刻精细的高档木质家具，墙上挂着十九世纪的油画；环顾四周，只觉得广阔的空间里弥漫着浓浓的金融气息。作为开场白，汉斯和那位即将关照我的副行长先是大谈商品市场的情况。接着，又谈起了市府大楼上的刺山果花蕾，芝加哥熊队的前景，鲁什大街一家酒吧里两名和他俩很要好的女郎。我看出汉斯很想把话题转入正题，谈谈我的账户问题，但他有些无能为力。我意识到了这点，就主动配合。他们拿出许多表格，我都一一签了字。当他们觉得我这股签字冲动会一贯到底时，他们拿出了最后的两张王牌。可是，我给自己刹了车。我问那位副行长这两张东西是干什么用的。他说：“如果你忙得抽不出身，或是不在本地，格瑙尔先生就可以凭这两份文件替你进行交易——用你的账户买卖股票。”

我连忙把那两张王牌塞进衣袋，对他们说，我宁可邮寄给银行，请银行代理业务。接着，我们就谈下一项业务。

一出银行大门，汉斯就把我往一个胡同小巷口拉，一路上就

显得怒气冲冲，要大发雷霆的样子。等我们走到一家快餐店的厨房旁边时，他终于发作了。他说：“你刚才侮辱了我。”

我说：“来这儿之前，我们并没有谈及代理权的事。是你让我大吃一惊，我完全被你搞糊涂了。你为什么要搞突然袭击？”

“你是在指控我想从中捞个人好处？如果你不是我姐姐的丈夫，我现在就会叫你滚蛋。你当着我同事的面侮辱我。你肯定不会这样对待你那位亲兄弟。可是，我对你的情意远远胜过他与你的血缘关系。我绝对不会在不通知你的情况下进行买卖活动。”

他气愤得快哭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快离开这厨房的换气扇吧，”我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这些乌烟瘴气。”

他大吼道：“那你就离得远一点吧！快滚！”

“可是你却站在其中。”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鬼地方可以去？”

罗斯小姐，我敢肯定，你一定明白我们的话。我们在谈论一种恶性循环现象。用一个文雅一点的词来描述这种现象，就是法国人说的“le tourbillon”，或者是通常所说的“龙卷风”。我现在并没有远离它，只是不想置身其中。这是一种定向障碍症，我亲爱的罗斯小姐。我知道，肯定存在着能使我们各得其所的地方。一旦我由于找不到自己的地方而误入他人领地，或是看不到本该让我看到的景观，那么，我就该对别人的痛苦负全部责任，因为他们是由于我走错了地方而不快。不铲除这一根本源，我只会一错再错。换言之，我所寻找的方向，或是想像中的世界，正以极大的讽刺告诉我——还有其他和我一样依赖这种梦境才能生存的人，这个世界仅仅是一种虚构的存在，一个毫无乐趣的娱乐场。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那你还会觉得它像我哥哥的那个私家公园，就其表象而言，仿佛证明了我哥哥的苦心经营终于通向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现实中心地带。菲力普对它的外观做了精心布

置，为之不惜侵吞他人财物，可是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他只得落荒而逃，最终在查普特佩克公园被捉拿逃犯的人逮住，如此等等，不堪回首。他那样的胖子，在墨西哥那样的高海拔地方，还在跑步锻炼，这就等于自杀。

不久，汉斯的意图变得不言而喻了。我对他说：“那些证券根本无法进行交易。你不明白吗？依照法律，那些起诉人掌握着我的所有财产的目录清单。”他马上说：“主要都是些证券、契约单。”接着他又说，“这正是我将用来设法击败对手的办法。两星期前，他们复印了那些契约，现在，这些东西在他们律师的卷宗袋里。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内，谁都不会去注意那些玩艺儿。他们自以为已经牢牢地控制了你，可是，他们错了。我们接下来该做的是：把原来的契约单卖掉，你只要出点手续费就成了。这样，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自己手里只是些空头票子。他们怎么可能查到新的号码？何况到那时，我早已把你弄到了国外。”

听他说到这儿，我觉得头皮发麻，浑身紧张。我觉得他在指引我犯更大的错误，而更可怕的事又在等着我。可是，同时，我也觉得那是一种诱惑。这就好比是有人帮我把心头的乱麻一刀剪断，而我又无须做任何回报。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该大刀阔斧地干点事了，别害怕。我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正好站在一条狭小的弄堂里，两边是城里的两所院校（那家快餐店被挤在拐角口）。两边黑魆魆的高墙使巷子显得格外狭窄，就连带装甲的小型吉普车都挤不下。

“你的意思是我用新的证券替代旧的，如果我愿意的话，还可以在国外进行交易？”

眼见我开始欣赏这一计划的妙处，汉斯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说：“当然可以。你可以靠这笔钱养老。”

“这是个冒险的主意。”我说。

“也许是这样，但是，难道你想把自己的余生都耗在打官司中？为什么不离开这儿，去另一个国度，靠着所剩的资产静静地享受生活？选一个美元很经花的国家，把你的残年致力于音乐研究或是别的什么你很想做的倒霉事。况且，现在格达已经不在人世，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还有个老母亲在这儿。”

“就是那个九十四岁的老太太？近似植物人的妈妈？你可以把你著作的版权转在她名下，那笔钱就足够维持她活着了。我们接下来该做的是查看些国际法。在我办公室里工作的有一位标致的少妇。她曾在《耶鲁法学杂志》任职。她比谁都精通这方面的事。她会为你找一个国家。我让她就加拿大的情况写份报告。你觉得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如何？年老的加拿大人都爱往那边跑。”

“我在那儿连一个熟人也没有，我和谁说话？如果那些债主追来找我算账，我怎么办？”

“你已没剩下什么大钱了。你对他们来说已没多大诱惑力。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你忘了。”

我对汉斯说，我会考虑他的建议。我得去养老院看望我母亲。

养老院装修设计者的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使一切看起来如居家一般。我母亲的房间很像医院里的病房，四周挂了些人造蕨类植物，窗帘是防火材料制的。几把椅子看上去很轻，显然也是人工合成材料做的，但很像是公园里的锻铁椅。我觉得那些人造植物很不顺眼。我最讨厌的是必须用手去触摸才能知道这些东西是真是假。这容易使我联系到自己对于现实的真实性把握不定的心理。可是，母亲连见了我的面都分不出我是谁，这比我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母亲吃饭得有人喂，所以我总在吃饭时间去看她。喂她吃饭

对于我来讲意义重大。我从护理人员手里接过这项活儿。我喂她吃饭，并不是想借此和她建立融洽的亲情，我早就不指望母亲还能认出我，所以，从不对她说，“我是哈里。”以前，我曾觉得自己从母亲那儿继承了某些遗传因子，所以，我也有点疯疯癫癫，并且像她一样，对生活总是一往情深，可是，现在，再去想这些都是徒劳无益。托盘端来了，护理人员为她系好围嘴。她很情愿地喝着胡萝卜浓汤。当我鼓励她再多喝些的时候，她点了点头。但她根本不认识我。我觉得自己和她很相似，都是基辅人的脸，隆起的头盖骨。我注意到母亲身着病人穿的那种长衫，嘴唇上还淡淡地涂了些口红。粗糙、皴裂的皮肤反而使她脸上的皮肤有些血色。她居然还滔滔不绝地谈起了她的家，只不过没提到我。

“你有几个孩子啊？”我问她。

“三个。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他叫菲力普。”

她提到的这三个都死了。也许她早就属于那个世界，能和死者交流。而在这个世界上，却已经不存在太多的现实；也许那些死了的人能在另一个世界里结成某种联系。在关于活人世界的调查表里，我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

“我的儿子菲力普是个很有头脑的商人。”

“哦，是的，我知道。”

她有些吃惊，但她没有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因为我点头称是的样子让她感到我是个很有来头的人，在她眼里，这已足够。

“菲力普很有钱。”她说。

“是吗？”

“他是个百万富翁，还是个孝子。以前他总给我钱。我都把钱放入邮政储蓄。你有孩子吗？”

“不，我没有。”

“我的女儿们也来看我，但我的儿子最好。我所有的开销都

由他付账。”

“你在这儿有朋友吗？”

“一个也没有。我可不喜欢这样。我总觉得很痛，特别是两条腿和臀部。我觉得痛苦极了，有时候我真想从窗口跳下去算了。”

“但你不会那样做的，对吧？”

“唉，我想，总不能让菲力普和我那两个女儿有个残疾妈妈吧？”

我手中的汤勺滑到了汤里，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笑声有些响，而且来得突然，使她不由得审视起我来。

以前，我们在独立大街的家里，只要走进厨房，就能听到如凤头鹦鹉叫声般的喧哗声，而且大都来自雌性。在那些时候，肖穆特家里的妇女为一大家的饭菜忙碌着：大罐的白菜肉汤和切成片状的肉；刚从烤箱里取出来的菠萝蛋糕，上面还淋着棕色的糖浆；她们一边忙着干活一边高声说话，个个都是那样。在这样一个像鸟笼似的方地方，你如果不大声点，别人就根本听不到你在说什么。因此，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我很早就学会了扯着嗓子说话，那样子有点像歌剧里的女高音歌手。母亲刚才听到的那一声大笑就有点那个味儿，她的某个女儿就是这样笑的。可是我毕竟不是女高音歌手，女高音歌手一般都梳着蓬松的发式，而我是个秃头，还蓄着胡须，也没有画着眼线。母亲直愣愣地看着我，我用餐巾为她擦了擦嘴，然后继续喂她吃饭。

“可别跳下去，妈妈，那样会把自己弄伤的。”

这儿的人都称她妈妈，因此，她不会觉得我和她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她让我帮她把电视机打开，她说想看“达拉斯”这个节目。

我告诉她时间还没到，为了替她解闷，我给她唱了几句《圣母悼歌》。我唱，“Ejamater, fonsamo - o - riso。”这是室内乐，主

题是宗教的（和他的那不勒斯教堂音乐大不一样），但显然不对母亲的胃口。当然，我爱过母亲，她也曾爱过我。我至今记得，有一次，她用橄榄皂给我洗头发时，不小心把肥皂水弄进我眼里，我痛得哇哇乱叫，她为此心痛得不知如何是好。当她给我穿上府绸裤（一种用中国丝绸制成的长裤），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时，她用力亲吻着我。可是这些事现在想起来是那么的遥远，好像发生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或是在六百年前的锡耶纳的后街上。母亲为我洗澡、梳头、穿衣，还有亲吻——都像是很久以前的文物了。随着我渐渐长大，这些东西离我越来越远，遥不可及。

我在读大学时（家里人让我学习电力工程，可我却投奔了音乐），每当大伙拿自己家里人开玩笑时，我总是说，因为我出生在安息日的前一天，母亲在厨房里太忙了，顾不上生我，所以，只好让我婶婶代劳，把我生下来。

我吻了我的老母亲——她现在轻得像柳条制品。我总是想不明白，我为什么在母亲的记忆里就这样湮灭了，而那个屁股肥大、惹事生非的菲力普竟然是她的心肝宝贝，是她为之骄傲的儿子。唉，主要是因为菲力普不会像我那样骗她说“达拉斯”节目还没开始，不会为了想激起她心中对往事的记忆，自私自利地为她哼唱圣诞音乐（用十四世纪的拉丁语）。我母亲，这位已丧失了三分之二记忆的人，还有我哥哥——不知他是否知道他妻子把他埋的地方叫什么？——他们俩都信仰当今的美国社会，对其表现出的物欲虔诚无比。所以，菲力普对母亲说的话总能到点子上。而我就不行。我只会展开硕长的双臂，指挥演奏莫扎特的《弥撒曲》，或是韩德尔<sup>①</sup>的《所罗门》，其结果是远离现实，走向神圣与虚无幻景。因此，多年来，我尽说些毫无意义的话，和

---

<sup>①</sup> 韩德尔（1685~1759）：英籍德国作曲家，一生创作歌剧、清唱剧七十多部。代表作有《弥赛亚》，管弦乐曲《水上音乐》。

母亲谈话时也是怪里怪气的。有什么值得让她记住的呢？好几十年前，我还拒绝参加她的厨房竞赛活动。她属于追随大流的母亲族，她和当时大部分母亲一样，在观念上自成体系，就像斯坦尼斯拉夫体系一样，闻名遐迩。在二十和三十年代，在整个文明世界里，从萨洛尼卡到圣迭戈，成千上万终日忙碌在厨房里的母亲们显得势力强大。她们很早就警告自己的女儿，她们未来的丈夫都是强奸犯，但是，屈从自己的丈夫又是女人的天职。当我告诉母亲，我要娶格达为妻时，母亲掏出钱包，给了我三美元，说：“如果你实在憋不住了，就去一趟妓院吧。”在她看来，我要结婚，就像是演戏一样。

“别忘了我们如何受苦受难，”这是金斯堡在《祈祷文》中的话，我感觉到了由罪孽带给我的折磨。渐渐地，我替自己的母亲作出了决定，我很可能也曾为此犹豫不定，反反复复；罗斯小姐，但我对自己说，“多年来，是我一直照顾着这个神经不太正常、整日痛苦不堪、尖声叫喊的老母亲，菲力普一点也没尽职。菲力普为了积累资本，忙得抽不出身。”是的，罗斯小姐，我就是这么想的，甚至比这还要激进。菲力普建立的大厦被夷为平地，害得我也彻底完蛋。他就像是一颗水雷，在离开水面很远的地方，轻轻地碰了我一下，我所有的积蓄就被炸飞了，而从中渔利的却是特蕾西和他们的后代。眼下的我，只好滚得远远的，等待有朝一日被拯救。

罗斯小姐，我和你说实话吧，这对于我太不公平了，我都要疯了。我想，你一定觉得这的确不公平，但你只把我当做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一个大傻瓜。得克萨斯州的那个房间，菲力普家小女儿睡过的，我在那儿过了一夜，墙纸上的傻瓜西蒙就是我的化身。

因为我曾无缘无故地说过伤害你的话，我的这番坦白，以及我现在的落难，也许会使得你觉得解恨。不管你问谁，大凡上了点

年纪的人，对于曾得罪过自己的人，遇到像你这样的情况，都会这么想。只要看看历史上的事，那些让人痛心的史料，就足够说明问题了。但是，请允许我补充一点，我本人，尽管也有报复心理，可从来没有让自己沉醉于其中。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心中的宁静与力量与日俱增——我的情感发展可谓是稳定的，而不是忽冷忽热，阵发性的。

关于在得克萨斯的那个合伙公司，不管它实际上还剩多少，都由我哥哥的律师负责处理，他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并通过计算机把情况打印出来。从表面上看，仍有些资产收入，所以我仍得为此付税。如果我想继续为这场官司奔波，那么，所剩的三十万美元就会被花个精光，因此，我想还是照汉斯的计划行事，即便最终会使我的资产成为“Götterdämmerung”<sup>①</sup>也在所不惜。如果你对 these 解释弄不清楚，那也没关系，也许反而会使你永远保持头脑的宁静与单纯。汉斯说，一切都会过去的。他那看似狡猾的眼神真是个不解之谜。他显得那样狡黠，但实际上又并非精于谋略，这也真令人觉得不可思议。汉斯笑的时候，脸上泛起细密的皱纹，这使他显得颇有些老奸巨滑，也使我对他的计划充满信心。我们偷偷地施了掉包计，把诉讼人手里的那些证券复印件的号码进行了更改。没有人识破诡计，我就飞往异国他乡加拿大；虽是在国外，但我还能用同一种语言，至少和原来的有些接近。我将在这儿安度残年；这儿物价低，美元就相对经花些。我对加拿大渐渐产生了同情：和美国共享边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加拿大人惟一的乐趣——也是迫不得已——是通过电视观看（在他们富丽堂皇的家里）发生在美国的一切。可悲的是除此以外也没什么好看的。每天夜里，他们都坐在黑暗中，两眼注视着荧光屏，

① 意思是“世界末日”。

看着美国人在干什么。

“现在你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可以告诉你，”汉斯说：“看着你总算熬过来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如果你由人摆布，去受那些折磨，那可真丢脸。”

这位忙碌的汉斯的确是个吹牛撒谎的高手。关于这点，我在去温哥华之前，就看出来了。我还以为他绝对不会因为某些怪癖而损害他的职业道德。可是，就在我即将逃离本国之际，他来到我身边，要我为他解决一些本属于我职责范围内的问题。他说，他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在文化界的声誉而沾光，为此，他很不高兴。听他这么说，我大为不解，请他举例说明。他说，例如，我从未主动提出让他加入大学俱乐部。我只是请他在俱乐部里吃了顿饭，可他从此被“常春藤联合会”<sup>①</sup>阶层的人深深吸引，那高雅的酒吧台、皮沙发，餐厅里那些高大的窗户上篆刻着那些声誉卓著的大学名称，这些是那么的吸引着他。他毕业于芝加哥的德保尔大学，也不算坏。他一直期待着我问他是否愿意入会，可是我呢，不是因为自私，就是由于势利，从不问问他。现在，既然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起码我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说服俱乐部委员会，让他入会。我明白了他的意图，很乐意地照他说的做了，甚至还对他表示出欣赏。

他要我做的另一件事是为他一位女友做点好事。“他们是肯伍德地方的人。靠着一家邮购商店赚了点钱。这家人爱好音乐，很有艺术气质。她叫芭贝特，是个迷人的寡妇。她的前夫得癌症死了。说实话，我有点害怕自己会染上他的晦气，得癌症，不过，我身强力壮。我想我不会生癌。芭贝特对你印象很深，她听过你指挥的音乐会，也读过你写的音乐理论，常收看十一频道上

---

<sup>①</sup> 常春藤联合会：是指美国东北部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康奈尔等八所名牌大学。

你主持的节目。她在瑞士受过高等教育，懂多种语言，因此，我可以利用你的文化声誉去打动她的心。我想请你带我们去莱诺马饭店吃顿饭——那儿有包厢，不会有那么多的嚷嚷声。我曾带她去过城里最好的意大利餐馆——罗马假日，但那儿的招待重手重脚，乒乒乓乓，连端盘子都不会，此外，还往她要的小牛肉里加了那么多味精，差点把她毒死。所以，请你带我们去莱诺马好好吃一顿。你可以从我下次要你请客的费用里扣除这笔开支。我总觉得，你能使别人对你刮目相看，主要是由于我姐姐的缘故。不管怎么说，你的祖先只不过是俄国的小商贩，你的哥哥是个臭名昭著的大骗子。我姐姐不仅给了你爱情，还教给你高贵的气质和风度。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当年，如果该死的罗斯福总统不拒绝德国犹太难民入境，这个国家也不至于会像今天这样有那么多麻烦。我们本可以有十个像基辛格那样的国务卿，那样，在犹太人集中营中，不知会产生多少科学天才呢。”

唉，罗斯小姐，在莱诺马，我由于说话不小心又得罪了人。可以理解，我第二天就要走了，那天晚上就特别激动。我觉得自己的心像个什么容器，里面装得满满的，一不小心，就会往外溢。汉斯看中的那个年轻寡妇的确迷人，但在欣赏她的美之前，你得对美的标准作些让步。她的嘴巴像是有着哈布斯堡王室家族的血统，可她说话的频率快得惊人，这真让我为之惊叹。此外，我觉得她的个头也太高了，使人看了不舒服。我的审美观来自格达，我喜欢她那种小巧玲珑的模样。当然，我不应该把她和眼前这位放在一起进行比较。

每当她问及音乐方面的问题时，我总是有问必答，认认真真。有人曾说我在这一点上很迂腐，很滑稽，一副傻里傻气的样子。眼前这位芭贝特专修过音乐，她家里人还是“牧歌剧院”的

赞助者。她说让我谈谈对蒙特威尔第<sup>①</sup>的作品《波皮厄加冕》的看法，但是，还没等我开口，她却开始滔滔不绝地自问自答。我想，也许是因为她刚失去丈夫，精神很紧张，所以才显得有些唆。一般情况下，我乐意把话题让给别人，我做听众，但是这个芭贝特，我看着她厚厚的下嘴唇不断地运动着，实在有些受不了。她毫无顾忌地说着，几乎有半个小时，她重复着同一个话题，说着她从几位有影响的亲戚那儿听来的、关于芝加哥的有线电视特权问题引起的政治讨论。接着，她又就电影领域发表了长篇大论。我很少去看电影。我妻子对电影没兴趣。汉斯对这一话题很投入，从导演、演员到对于两性关系处理技术发展以及电影发展过程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思想变化，无所不及。在这些过程中，我一言不发。我想到了死亡，也想到了一些我这样年龄的人经常会思索的问题；我觉得，当生命旅程行将结束之际，人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万物尽显其宜人本色；我还想到了远离都市喧嚣的郊区。对于芭贝特的喋喋不休，我并不十分介意。我很欣赏她在自己穿戴方面的品味，她穿着一件紫红与白色条纹相间的衬衫，是伯格道夫时装店的精品，显得十分优雅。她把自己打扮得精心而得体，以掩盖身体某部位的不足。光凭她那厚嘴唇，就可以想像，她的肩膀一定很宽。汉斯可不在意这些；占据他思维的是如何完成一桩智慧与财富的联姻。

我在心里祈祷着不要在加拿大得中风。在那儿，没有一个能够照顾我的人，不要说像格达那样温柔、小心的人，就连像芭贝特那样的饶舌妇也没有。

在得罪芭贝特之前，我一点也没有预感。当时，我们正在衣帽间的门边，门是半开着的。汉斯告诉服务员，刚才寄存的是件齐膝长的貂皮短大衣。芭贝特对我说：“我意识到刚才我老是抢

<sup>①</sup> 蒙特威尔第（1567~1643）：意大利作曲家，创立威尼斯歌剧风格。

你的话题，整个晚上都是我一个人在滔滔不绝。真是抱歉……”

“没关系，”我说，“就当你对什么也没说。”

罗斯小姐，你最深有体会，也最能想像我这样的话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汉斯第二天跑来向我兴师问罪：“你这个人毫无可信之言，哈里，我对你如此同情，帮你把车、家具和书卖掉，同情你被自己的哥哥骗得那么惨，还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看在我已故姐姐的面子上，我对你如此照顾，可是你却如此无情无义，根本不为我想想。你使大家都受到了侮辱。”

“我不知道会伤害你那位女士的感情。”

“我本来可以和她结婚。这事本来已成定局。可我是个大傻瓜，指望你能为此锦上添花。好了，让我告诉你吧，这下，你又多了个仇敌。”

“谁？是芭贝特吗？”

汉斯对此不作回答。他想以沉默和未置可否来折磨我。他眯着眼睛直视着我，一会儿以后，仿佛又因我对他犯下滔天大罪而气得怒目圆睁。我从他愤怒的眼光里看出，他苦心经营为美好计划打下的基础由于我的不慎早已灰飞烟灭。在这个世界上，能帮助我的也就只有汉斯一个人。所有的人都已被我得罪光了。现在，连他我也别想指望了。罗斯小姐，这对于我来说，毕竟不是件好事。尽管我已不再相信我这位内弟的可靠性，但我着实为此烦恼了一阵。如果以美国商业社会所看重的沉稳个性而言，汉斯其实是个充满怪诞意味的角色。暂且不论他那思维不连贯的智力水平，单就他的长相而言就够怪异的了。他的身材很像个小提琴手，可全无小提琴手的音乐细胞；长着一双大手和如同榛子般的指甲；指甲修得光光的；他的眼睛，眼角里总是红红的，很像矮种马的眼睛，使人想起回归线地区那又闷又热的夜。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会请他们为他们打官司吗？汉斯脑子里尽是些稀奇古

怪、让人不可捉摸的念头，从来没有过什么像样的计划。他的脑子常像蜥蜴的嘴巴那样张得大大的，那些怪诞的念头从里面冒出来后，随即像用口香糖吹成的泡泡一样，顷刻间就蔫了。

至于他指控我侮辱别人，我想，我从不有意使人觉得受到侮辱。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我无须说什么就会使有些人有被我侮辱的感觉，我的存在就是对他们的侮辱。我说这番话，实在是迫于无奈。上帝知道，我向来自认为与常人一样，具有正常的社会意识，没有寻衅、中伤之意。我努力想用多种说法向你说明这一点，所以才用这些词，例如，“发作”、“狂喜”、“着魔”、“狂怒”、“虚幻”、“痴迷”，或者还可以用“宇宙风暴”——采其微观含义。对于我这种天生就有的本事，或者说是诅咒能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心人从来不把它当回事，我的直觉告诉我，你不会像瓦利施那样对我的无心快语耿耿于怀。当然，有一点，瓦利施是说对了，你当时没有惹着我什么。你是天性极其温顺的人，你也是我得罪的那些人中最无辜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特别难过。不过，话又得说回来，给你写这封信的过程也是我重新发现自我的重要历程，所以，我对你更加感恩戴德。它使我意识到你以德报怨的大度。我曾信口开河地说了让你下不了台的话，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你的痛苦上，而三十五年后，竟然还能与你这样谈心交流，换得你的理解。

还是言归正传，说说我的现状吧：从根本上讲，我是个无足轻重的老东西了，老眼昏花，举目无亲，等待引渡，前景黯淡（是否可以在我母亲的病房里多摆一张床，以疾病和衰弱为借口请求免于处罚？）。

今年，在温哥华的冬天里，我无所事事，所以就一直在考虑想编一本讥讽语选集，以摆脱自己的命运。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配做这事。我也振作不起来。不过，在我去超级市场的来回路

上，那些我读到过的和记忆中的妙语却不断涌上心头。我去购物是为了使自己高兴些，可是，加拿大的超级市场常常让我觉得困惑不解。他们的商店管理全然不同于我们的。品种也很少。像莴苣和香蕉之类的东西贵得惊人，而原来我视作奢侈品的，如，冰冻大马哈鱼，相对就便宜些。可是，我一个人，买一条大马哈鱼，该怎么处理呢？烤箱里一次放不下，我的双手又患关节炎，有力气把鱼分成几小块吗？

零零星星的片言只语，由灵感激发的警句，水到渠成的妙语，它们带着些恶作剧的心理，在我脑海里游来荡去。克莱孟梭<sup>①</sup>曾对法国总统普恩加莱<sup>②</sup>说，当他穿着皮靴子时，像个脑积水患者。在伊丽莎白女王二世的加冕典礼上，当汤加国的王后坐着四轮四座大马车缓缓驶过时，有人问丘吉尔：“那个穿着海军上将服的小个子是王后的丈夫吗？”丘吉尔回答：“我想他是王后的美味佳肴。”

当英国首相迪斯累里<sup>③</sup>躺在病床上奄奄一息时，维多利亚女王来到了接待室里，准备看望他。首相得知后，对他身边的男仆说：“女王陛下是想让我帮她捎个信给亲爱的阿尔伯特。”

诸如此类的言语，只要不是很失控、很顽固地出自我的口，听上去还是很逗人的。

“某某教授，你看起来很苍白，很疲惫。”

“那是因为我一直在和 Y 教授讨论一个问题，我觉得烦透了。”

比这个更糟糕的是我老爱玩那些容易走火的文字游戏。

① 克莱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新闻记者、第三共和国总理。

② 普恩加莱（1860～1934）：曾任法国总统（1913～1920），法国总理（1912～1913）；1922～1924；1926～1929。

③ 迪斯累里（1804～1881）：曾任英国首相（1868；1874～1880），保守党领袖。

“这个女人把‘盘子’扔给了‘胖子’。”

“他把‘老鼠’当做‘老虎’。”

“没有功劳，但有苦劳。”

“四不像的象。”

罗斯小姐，这些都是神经有些崩溃的人玩的游戏而已，也许是高血压患者的症状，或是想抵御权力之手的高压而暗地里发泄的迹象（那双手只有等我死的时候才会松开对我的禁锢）。

所以，一点都不奇怪，我愿意在很多时候与格雷斯威尔老太太一起度过。她那寒酸的房间里，那几把椅子坐起来很不舒服，但我却有如同在自己家里的感觉。老太太守寡已有四十年了，脑子里尽是一些奇怪的想法，和我坐在一起时，她显得挺愉快的。很少有人来听她讲述神的思想，而我却认真听讲，并且，对于她那些神秘难懂的讲解，我会去仔细回味。她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上帝已经从我们可视的外部世界隐退了。你能从充斥着我们生活的各种形式中，看出上帝的精心策划。尽管生物进化规律依然一如既往，但神已经从中隐退。世间万物仍是如此这般的精美，一如神的旨意，但神的精神已不在其中起作用。宏伟的世界正在褪却它原本的瑰丽色彩。老太太严肃认真地说，这就是我们人所处的世界，没有上帝。但是，就在这苍白的美丽中，人依然生存着，并且自以为洋溢着神的精神。但也只有人——我们大家——才能把失去的光彩重新找回来，只要我们不被眼前的黑暗所吓倒，这个有着神一样外表的人就不会徒有其表。我们大家顶礼膜拜的人类智慧，固然能带来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这种科学也是伟大的，但仅仅这点是不完美的。要把人类从蒙昧的自然中拯救出来，就得倚仗人类情感和上帝那双惊愕的眼睛。她说，人的身体受着自然引力的作用，而人的灵魂是轻轻的、纯纯的，不受任何力量制约。

我听着她的这番话，觉得自己心静如水，一点没有要想恶作

剧一番，和她过意不去的意思。我会想念这位老太太的。亲爱的罗斯小姐，我在作孽多端之后，真的很想听一番肺腑之言。我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从现在起，任何一天，美国联邦政府的元帅将士们，都会随时从西雅图出发，将我捉拿归案。

王丽亚 译 郭建中 校

# 今天过得怎么样

卡特里娜·戈利格自己也深感困惑。她心烦意乱，就糊里糊涂出门旅行了；这次旅行本来她是不该去的。那她怎么啦？为什么会这样到处乱撞呢？她已人到中年，有两个孩子，离了婚，住在郊区。难道她越来越人老珠黄了吗？难道她的红颜正在消失？难道她已别无选择，因而就这样鲁莽冒失，贸然行事了？容貌她是没有问题的。她现在还颇有几分姿色。黑色的头发，漂亮的眼睛；身段丰满，只是略显肥胖。但她深谙健美之道。维克托·伍尔皮，她的情人，就喜欢她这个模样儿。要说她有什么美中不足，那就是有点儿笨拙。然而，如果举止得体，笨拙却会使女人显得像少女般的纯真。但是，卡特里娜很少能做到措置得宜。总而言之，她还算漂亮，但笨拙好动。

平心而论，她在自己行动方面的自由，越来越受到伍尔皮的约束了。这倒不是因为伍尔皮任性。他有他特殊的难处——那就是他健康状况，他有点残疾，且年事已高。此外，他声望显赫。他是个大人物，世界知名的文人，艺术界的泰斗。早在那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文化界盛行之前，他就是一位狂放的艺术家。在文化界，人人都知道维克托其人。只要一谈到现代绘画或诗歌，甚至，只要一扯到任何重要的话题，就不能不提到维克托·

伍尔皮。

且说那年，时值隆冬。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市天寒地冻。一天，将近午夜时分，卡特里娜家响起了滴铃铃的电话声。维克托请她——实际上是要她——“明天一早我要在这儿见你。”

“这儿”，是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维克托正在那儿作演讲。

而卡特里娜呢，却不顾常理和自尊，顺从了他的要求：“我乘早班机出发。”

如果她现在谈情说爱的对象比维克托年轻，碰到这种情况，就会一笑置之而搪塞过去。她会说：“你这是心血来潮吧！这样冷的天气到外面去瞎逛，倒挺有意思，呃？可是，你要我马上赶到，孩子怎么办？”她可能还会告诉对方，她那离婚的丈夫，正在向法院起诉，要做他们两个女儿的监护人呢！所以，明天还得进城赴约，与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医生面谈，以判断她是否精神正常。她既会找借口婉言拒绝，又会开玩笑引诱挑逗。“星期四相会吧。到时我加倍偿还！”但对维克托，她却无法推托。最近，她觉得越来越无法对维克托说个“不”字了。健康不佳只是一种委婉的说法而已。去年维克托几乎去见上帝了。

各种原因使她没有勇气拒绝维克托——对此她倒并不感到懊恼。维克托是位伟人，在现代文化史上，他早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在卡特里娜出世前，维克托就在《变迁》和《猎狗与号角》等杂志上发表文章了；而卡特里娜还在学步时，维克托开始享有先锋派艺术家的盛名。要是你以为维克托现在已老朽不中用了，不可能再有什么惊人的作为，那就错了。对一般古稀的老人来说，也许如此，但对维克托·伍尔皮却完全不是这样。连那些最恶毒诋毁他和最嫉妒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维克托仍然是第一流的。何况，有多少美国人的心目中，有像萨特或梅洛·

庞蒂<sup>①</sup>这样的思想领袖呢？汉纳·阿伦特<sup>②</sup>曾赞叹说：“向维克托致敬！他真是个天才人物。”——而梅洛·庞蒂对维克托关于卡尔·马克思的文章，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维克托的相貌也相当惊人——他那脸庞、他那身材，更是令人难忘。不必装腔作势，他的言谈举止就能慑服人心。人们常常觉得，他好像是个不同凡响的国王；一个纽约式的国王，一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脾气好得惊人，为人随和，但却又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他是主宰，不容任何人在他面前胡扯。可是去年，正当他七十四五岁时——却一下子垮了下来。他是在哈佛大学病倒的，并被送进了马萨诸塞州医院动手术。医生总算把他从坟墓边上拖了回来。也许，是他自己一脚把坟墓从身边踢开的吧！那时，他缠着绷带，两个鼻孔里都插着管子，麻药用量已到了最大极限。看他躺在病床上的样子，怎么也不会相信，他竟还会跨出病房的门口；但，他还是跨了出来。

设想一下，要是维克托那时真的死了，卡特里娜会怎么办呢？一想到这里，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但卡特里娜的姐姐多萝西娅却说得头头是道——这位姐姐的嘴从不饶人。说实在话，多萝西娅怎么也不会放过这个话题的。“这是你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一次，我的傻丫头，你一生中第一次要像拳击运动员那样奋力拼搏了。（卡特里娜容貌漂亮，身段丰满，说话也很少提高嗓音；她的这种形象，当然与一个奋力拼搏的斗士是极不相称的。）维克托一死，你可要倒霉了。你自己想必也知道，你和维克托在一起的日子长不了！”卡特里娜知道多蒂会唠叨些什么。接下来的

---

① 梅洛·庞蒂（1908～1961）：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著有《知觉现象学》、《辩证法的探索》等。

② 汉纳·阿伦特（1906～1970）：美籍德国作家，著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类状况》等。

一连串话就是：“你抛弃自己的丈夫，与这个老头子鬼混。在这件事上，你既有性的因素，又有跻身上流社会的野心。你是想钻进文化界的圈子里去。我可真想不通，你懂什么文化！爸爸说过，你只不过是个芝加哥北郊的傻丫头。今天，他在天之灵，照样会叫你傻丫头！”

确实这样。她们已故的父亲比列·韦戈尔常把自己的两个女儿称之为傻丫头：一号傻丫头，二号傻丫头。他把两个女儿送到在香潘—厄巴纳的州立大学上学。在大学里，她俩加入了女大学生联谊会，还学习拉丁语。女儿要学习法语？行！还要学戏剧艺术？也行！为什么不可以学学呢？老韦格尔先生总认为，这一切都无聊透顶。他早先曾混迹于政界，做过估税员。他在芝加哥民主党上层领导机构中，颇有一些关系。他夫人则是智力平庸之辈。“无才女子好妻室”，社会习俗如此嘛！这样，男人们就可以自甘堕落而又能维护自己的地位。正如维克托所指出的（一切高论都出自他之口），这是中产阶级固有的普遍偏见，其中不乏色情的色彩。女子无才，就会刺激男人的性欲；持这种看法的男人，又个个自认为是堂堂的男子汉。在高级知识界层中，波德莱尔<sup>①</sup>曾经劝大家不要与才女打交道。女才子或中产阶级出身的小姐会使男人丧失性能力。艺术家只宜与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为伍。

不管怎么说，从卡特里娜小时候起，大家就想使她相信，自己就是个傻丫头。但她知道，自己并不傻。这种认识基于她女性的本能。她与维克托的关系，真可谓是纠缠不清而又令人神魂颠倒。对此，多萝西娅少不了要讽刺挖苦她；可她内心深处并不怎么反感。多萝西娅说：“我要从各个方面来正视这个问题。”这话的意思是，多蒂要从各个方面来对她讥讽一番。“我们先看看事实吧！在你做艾尔弗雷德·戈利格太太时，芝加哥有谁会看你一

<sup>①</sup> 皮埃尔·夏尔·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诗人和散文家。

眼。戈利格先生请人来观赏他的收藏品，什么象牙啦、玉石啦、廉价宝石啦，等等。碰到这种时候，就他一个人口若悬河谈个不停。你只有端盘送水招待客人的分儿。在他与之周旋的客人眼里——歌剧演员啊、现代派艺术家啊、学术界人士啊，以及诸如此类的货色——在他们眼里，你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而已。然而，由于伍尔皮的关系，你忽然与那些社会名流交往起来，什么马瑟韦尔<sup>①</sup>啊，劳申伯格<sup>②</sup>啊，阿什伯里<sup>③</sup>啊，弗兰肯特勒<sup>④</sup>啊，等等等等。你让你丈夫原来社交圈里的那些土老儿，向你匍匐求拜！不过，只要你那老巫师一闭眼，事情会怎么样呢？名流的寡妇都很快会被人忘掉——除非她们本人才华过人；所以，更不必说是名流的情妇了。”

一次，维克托去西北大学举办美国绘画讲习班。戈利格把他捧若神明。艾尔弗雷德·戈利格，时而飞到印度孟买，时而飞到巴西里约热内卢。经营范围从宝石到古玩，乃至各种艺术品；他从世界各地，收买家传珍宝、瓷器、银器、陶器、雕像等宝物。他早就渴望自己能跻身于艺术界。他可不是个怕老婆的男人。在巴西，在印度，只要他高兴，就少不了要寻欢作乐一番。然而，他错看了卡特里娜。他以为，卡特里娜是个围着家庭小圈子转的女人。她只会去店里挑选挑选糊墙纸，或是去开开家长教师联谊会，来打发时光。维克托真不愧为一个地地道道的社会名流。在埃文斯顿崇拜者的簇拥下，他神态自若，随随便便地喝着马提尼

---

① 罗伯特·马瑟韦尔（1915～）：美国画家和作家，抽象表现派的代表人物。

② 罗伯特·劳申伯格（1925～）：美国画家，以所谓“组合画”著称。其画的主题都取自美国民间传说，其手法是运用拼贴、墨水画、铅笔画和照片等组合成画。

③ 阿什伯里：不详。

④ 海伦·弗兰肯特勒（1928～）：美国艺术家。

鸡尾酒，吃着餐前点心；同时，与热心的丈夫周旋。后者则千方百计想巴结名人。没过多久，维克托就把注意力转向主人漂亮的夫人了。这女人可真是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婆娘；维克托看得出，这个婆娘会爆出个大冷门，令人目瞪口呆。由于所处的环境，卡特里娜看上去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在这种环境下，一个女人即使有强烈的个性，也只能随遇而安。她是把这种环境作为自己的掩护。就这样，她装作眼睛近视，走近伍尔皮，像是要仔仔细细看一眼这位名人。她贴近伍尔皮身边，后者甚至感到了她呼出的气息。然后，她弯下身来，眼睛久久地紧盯着伍尔皮；这一过分热切的动作，清楚地传达出性的信息。她要引人注目的这种手法，不怎么高明；她眯起一双近视眼，表现出一种困惑之情。然而，正是这一切，使她显得与众不同。她第一次与维克托握手，就告诉他一种意向，一种渴望。他明白，她已准备就绪。伍尔皮那宽阔的小胡子下，嘴角紧闭，显出深沉的缄默，表示他领会了她发出的全部信息。他只要略作表示即可。而这正是他所求之不得的。

开始，事情只不过比来访的消防队员与她调调情稍热烈一点，而这次只是一位被人宠坏了的名人而已。但伍尔皮是非同一般的名人，决不会异想天开。他是一位有教养的知识分子。他是一种象征。他已七十高龄，思想十分成熟。他没有表露过任何弱点，也没有出过任何差错，可以让那些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耻笑的。如果没有一点现实生活的经验，不能立即洞察一个匹配不当的婚姻，如果不懂什么叫虚伪，如果不会说谎——如果在某些场合下，人们谈起时还会说，“他真惹人爱！”，那还称得上什么当代思想家呢？当然，谁都做梦也没想到要把维克托当作自己的“意中人”。是对这老头怀有恶意？不！这是一种清醒的判断。但是，不管维克托开始抱有何种目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却长久地保持下来了。而对一个竟能使这样的老巫师着迷的女人，你又

该作何评价呢？当然，她绝不是一个仅仅富有性感的乡下女人，也不仅仅是个行动笨拙的矮胖婆娘。一位年迈的社会名流，竟一下子堕落到如此地步，成了色情的奴隶，这一严酷的事实，何至是荒唐而已！

离婚一事搞得很不光彩。戈利格怒气冲天，决意报复。他搬家时，把屋子扫荡一空；那些东方珍宝、玉石雕刻、水晶玩物、绘画挂毯、镶金漆像、嵌骨瓷器，乃至送给她的贵重珠宝首饰（她没有料到她丈夫会来这一手，因而事前没有把珠宝首饰存入银行），统统席卷而去。他还决心要把卡特里娜从这所古老而完好的宅第中赶走。只要他取得对两个女儿的监护权，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那些印度珍宝和威尼斯艺术品突然从家里消失了；对此，那两个小女孩倒并不十分在意，但卡特里娜的律师在法庭上据理力争，说这两个孩子连自己家都不认识了。关于这两个侄女，多萝西娅说：“我关心的是，这两个神秘的小东西将来会是什么命运。至于对艾尔弗雷德来说，他是赤膊上阵了。”她认为，卡特里娜心不在焉，根本不像一个能奋力拼搏的人。“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当然注意到了。哪儿有大拍卖，他就往哪儿飞，从不呆在家里。谁知道他以前在印度干过什么勾当！”

卡特里娜还没有离开饭桌，维克托的电话就来了。当时，家里还有一位客人，是警察局的克里格斯坦中尉。由于天气恶劣，他来晚了。他说，车子刹车时打滑，撞进了雪堆里去了，只得等拖车把他的车子拉出来。他嗓子也几乎沙哑了，还说，要过一小时身子才会慢慢暖和过来。他是卡特里娜家的常客了，就自己动手，从地窖里抱来木头生起火来。这幢住宅，是在芝加哥建筑业蒸蒸日上的黄金时代建造的。克里格斯坦说，这座宅第造得像斯特拉第瓦里斯<sup>①</sup>制作的小提琴一样精巧。壁炉上弧形的瓷砖是浅

<sup>①</sup> 安东尼奥·斯特拉第瓦里斯（1644~1737）：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制作家。

蓝色的，真有巧夺天工之妙！

“坏天气我以前也碰到过，这一次可再糟糕也没有了，”他边说，边要了一瓶“红魔鬼”牌辣酱浇在咖喱饭上，并用啤酒杯大口大口地喝起伏特加来。他的脸还冻得红通通的，坐下来吃饭时眼睛里还直流泪。他说：“啊，背后这火，可真叫人太舒服了！”

“可别把枪烤得走火了。”

这位中尉身边至少要带上三枝枪。是不是所有的便衣警察都要武装到牙齿呢？或者，因为他个儿矮，所以要多带几样武器呢？他给人的印象是和蔼的，却又是可畏的。你敢动他一下，他就会给你颜色看。维克托说他处事一般尚合乎情理，但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形影相吊的美国牛仔，又是个独来独往的墨西哥牛仔！”但总的来说，他对克里格斯坦的看法尚算宽容。

在布法罗，此时已近午夜。卡特里娜没料到维克托这么晚还会打电话来。她对维克托的言行举止，可谓了如指掌。她敢断定，她的老头子今晚上一定很不愉快。他也许正住在一家希尔顿饭店的房间里，一头倒在床上，心里不胜厌烦。脱下的衣服大部分都胡乱地丢在地上，床头柜上放着一杯高级的“黑牌”苏格兰白兰地，“以便使自己保持活力”。这次旅途之艰难，出乎他的意料。他的妻子贝拉曾劝他不要去。当然，对她的话，他只是当耳边风而已。一个分厂的经理，怎能对董事长指手划脚，说东道西呢？他出来是想与卡特里娜约会，演讲只不过是借口罢了。“我已答应他们了。”他对妻子说。当然，要说借口嘛，倒也不完全是借口。到处都要请他，所以他所得报酬极高。今晚，他在州立大学演讲；第二天，他又会向一群芝加哥的董事长们演说。布法罗之行是一箭双雕。伍尔皮的小女儿文萨莎在那儿的州立大学上学，最近遇到了些不顺心的事。维克托不像其他人，他根本不把家庭问题当做一回事——他从不为家庭问题操心。文萨莎最近也越来越不像话了，他为此大为恼火。

就这样，当电话铃响时，卡特里娜对客人说：“噢，是维克托。这么晚还来电话。你得稍等一会儿了。”对克里格斯坦，她是不必客气的。晚饭已吃完了。如果她在电话上讲话时间太长，他自己可以走。卡特里娜健壮结实，体态丰腴（增之一分就太胖了），急步离开餐室——她向来行动迅捷。她打开了厨房转门的门扣。克里格斯坦当然不想离开，他要偷听一下他们的谈话。她与维克托的关系，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他自己认为，他是卡特里娜的心腹之交。做卡特里娜的知心朋友，他是当之无愧的：他是个警察，警察是无所不晓的；他又是太平洋战争中的战争英雄，还是卡特里娜的忠实朋友。这时，他正把他那晒得黝黑的脸庞转向壁炉，把自己粗壮的大腿放舒服，双臂交叉在穿着开襟羊毛衫的胸前，开始倾听厨房里的谈话。

“怎么啦，维克托？”卡特里娜问。从对方尖声尖气的声音和讲话的措词，卡特里娜知道，这次严冬时节的旅行可把维克托累坏了。此行一定特别艰苦。本来，对像维克托这样身材魁梧的人来说，旅行就是件苦差使；更何况他膝盖开过刀，拄着手杖在机场的人流中一拐一拐地走，更显得吃力了。他戴着希腊船长式的鸭舌帽，看上去特别显眼。不论到哪儿，他都是一副乐天安命而又机智聪明的样子。对自己的残疾，他也泰然处之（在这一生中，他每天都得经受这种痛苦。对此，他也已习以为常了）。对自己一个人独来独往，他也不怎么抱怨。其他名人外出，都有助手跟随。卡特里娜曾听说，亨利·穆尔<sup>①</sup>至少有六个助手。而维克托却一个助手也没有。他的生活可真谓紧张到发狂的程度，没有人能与他共事。当然，还需要保密。很明显，这一切的关键

---

<sup>①</sup> 亨利·穆尔（1898—？）：美国雕塑家，主要从事石雕。他能充分运用石头的形状、大小和质地，雕出惊人之作；其作品结构简单，犹如原材料本来就是件艺术品而他只是略作加工而已。

是，还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卡特里娜的回答是爱情。维克托不愿承认这一点，也不愿对此作出回答。也许，他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呢！

卡特里娜觉得，维克托看上去有点神秘。在希腊船长式帽子或列宁式帽子的鸭舌下，眼睛四周布满了皱纹，犹如千足虫向四周伸出的触角。他的眼睛很长，一直向两侧延伸到太阳穴，看上去十分奇特。他的两颊红得有点病态，但又像是健康人的肤色；他从来没有脸色苍白的时候。他举止得体，从不故作姿态，却又文雅大方；他身材高大，却并不显得粗壮臃肿。他风度翩翩，你尽可以称他是个放荡不羁的老艺术家。但仅此而已，维克托不属于任何类型。

名人旅行的老一套阵式是十分令人厌倦的。你坐飞机到达了目的地，在机场上前来迎接的人你都不认识，但他们都拼命与你周旋，因为他们个个都希望你能记住他们，引起你的注意；他们处处逢迎着你，奉承你，使你感到恼火——一切都是老一套。从机场去旅馆下榻，他们把你关在小汽车里，路上就要花个把小时。然后就是喝酒——喧闹的鸡尾酒会。四五杯马提尼酒下肚，就去就餐。在餐桌上，他们把你安排在两个女人之间——而这些女人又往往不怎么媚人。这时，你得记住她们的名字，与她们交谈，应付双方的时间也得平分秋色。在这种场合，你犹如在竞选，得与许许多多握手。你吃上等牛排，喝葡萄酒；在你走上讲台演讲之前，已精疲力尽了。你不能违反这一切礼仪习俗，维克托说，你越想回避，你越会被弄得劳累不堪。但一般说来，不论是喧闹也好，喝酒也好，与陌生人谈话也好，维克托都能应付自如。他总是有话可说；每个和他谈话的人都为他的话锋所倾倒。在鸡尾酒会的喧闹声中，维克托耳听八方，却又能使自己的声音广传四方。在谈到重要话题时，他的男高音像乐队中的笛子，清脆响亮；而他的口齿，却又是那样清晰犀利！

如果演说后引起大家热烈的讨论，他整个晚上就会显得十分活跃，又是喝酒，又是谈话。这正是他所喜欢的。要是在半夜之前就上床睡觉，那就是说明演说失败了。因此，在晚上，他要么搞得精疲力尽——而这又不符合他的本性，要么单调乏味。今天晚上，一定又有人在他面前胡说八道了一通。所以，现在这位与安得烈·布雷顿<sup>①</sup>和迪尚<sup>②</sup>等当代社会名流交往的伟人，在天寒地冻的布法罗，感到极端厌倦无聊。（可以想像一下，如果尼亚加拉瀑布有一半以上结了冰，那情景将会怎么样呢？）因此，他就给远在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的女朋友打电话。而且，他在旅馆里面也百无聊赖，更使他感到难受。现在，他也许还脱下了裤子，把他那双特大号的皮鞋和衬衫一起卷成一团，往墙上一丢——卡特里娜曾看到过，在他感到不胜厌烦时，就这么做过。他也会发脾气，尤其是当他遇到的人尽是蠢货，或者是在他无所事事的时候。现在为了寻求安慰（抑或是由于恼怒），他给卡特里娜打来了电话。这时，他完全可能几杯酒已下肚，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一只手在长满浓毛的胸前抚摩着——这一动作有时似乎使他感到舒坦些。他那样子，完全像毕加索<sup>③</sup>在其晚年版画中那些好色之徒的形象，就是他脚上的那双短袜不太像。维克托本人曾就一九六八年在穆然展出的画家与模特儿组画写过评论：那些粗线条的草图，勾画出色情狂的艺术家和伊斯兰教国家后宫里淫荡的婢妃。老态龙钟、满脸皱纹的国王，从窥视孔中偷看集体淫乱的情景（维克托本人可以说既是画家和淫乱者，又是年迈的国

---

① 安得烈·布雷顿（1896～1966）：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倡导人和领袖。一九四八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诗集。

② 马塞尔·迪尚（1887～1968）：美国艺术家，生于法国，亦为超现实主义倡导人之一。尤以绘画著称；1923年后又从事雕塑。

③ 毕加索（1881～1973）：西班牙画家，法国现代派主要代表。1944年参加法国共产党。他的作品对现代西方艺术流派有很大的影响。

王)。卡特里娜侧身的形象，可能会符合毕加索的胃口（但维克托对毕加索毫不欣赏）。

“这么说来，布法罗之行不怎么成功喽？”

“布法罗！见它的鬼去吧！世上竟还会有这样该死的地方！”

“可你说过，你得在那儿看一下文萨莎。”

“这也是一桩苦差使。我宁可不去看她的好。明天早上七点，我们已约好共进早餐。”

“你的演说怎么样？”

“我向他们宣读了我的论文《论马克思的 零月十八日政变》；我想，听众大概是一批大学生吧……”

“不过，明天的节目更重要，更有意思。”卡特里娜说。

维克托应邀将对董事协会发表演说；该协会由银行家、经济学家、前国家总统顾问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等这一类社会名流组成。维克托曾慎重其事地对她说过，该团体比过分渲染的三边委员会更重要；他说，三边委员会在幕前活动，他们利用前总统或其他红人来转移公众视线，以掩盖正在进行的实际活动。那些邀他去芝加哥的人要他谈谈“东西方文化与政治问题”。但照维克托的说法，他们对艺术和文化更感兴趣。当然，他们也意识到，文化与政治问题是不能不谈的。人们一般认为，大国之间的争端，是由于东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冲突而引起的；当然，目前还没有什么迫在眉睫或令人担忧的危险。但应该了解，知识界目前在想什么。“他们听过教授或那些冒充专家的人的演说，”维克托说。“现在，他们想请个犹太佬来谈谈。出足价钱，他也许会在这方面吐露真言。”那些大董事长的威严，并没有使他诚惶诚恐。维克托说，这些人是泡沫塑料做成的。然则，他还是感到很得意。他们想要请第一流的人来演说，而请的正是他本人——这一判断既符合实际，也毫无偏见。卡特里娜估计，他这次会收到上万美金的报酬。“我可不敢想获得像基辛格或黑格那样的高额酬

金；但我的讲话远比他们的更有价值。”他对卡特里娜说。不过，他没有说具体数字到底多少。多蒂看人真有点入木三分。她说，维克托什么都可娓娓而谈，但决不谈钱的问题——绝不谈到自己的钱。

当然，多蒂的看法是不足为怪的。她的谈话往往带有阶级的仇恨——这是卡特里娜所学到的说法；这就是说，多蒂怀着愤愤不平之情。像多蒂这样的人怎么能了解维克托这样的人呢？——多蒂把维克托叫做“跷脚巨人”。可是，如果这位巨人是当代长得最英俊的男子，如果他有精巧的手脚和光滑的阴囊，那又会怎么样呢？——也许，他现在正一手拿着电话筒，一手摸弄着自己的阴囊，扯拉着四周长长的阴毛呢！他一躺到床上就会不自觉地用手去摸自己的阴囊，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了。再说，如果他博古通今，如果他对当代人的实际需要和兴趣了如指掌，那又会怎么样呢？女人与维克托这样杰出的人相处，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独立的；这像多萝西娅之辈岂能体会到呢？与维克托这样的人交谈，决不会听到任何废话，这像多萝西娅之辈又怎么能领会到呢？

“顺便问一下，维克托，”卡特里娜说，“还记得你在电话上要我记下来的那些材料吗？也许明天你要用吧！我已用打字机给你打出来了。你要的话，早晨在奥里尔机场<sup>①</sup>见面时我带来。”

“我改变主意了，”维克托说，“你坐飞机来这儿，怎么样？”

“我？坐飞机到布法罗来？”

“对，你先来这儿，我们再一起回芝加哥。”

卡特里娜原来想得挺美，现在一下子都变了。一种难以想像的忧郁感从心底里油然升起。如果维克托明天早晨坐飞机来的话，她就不必做什么准备。她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穿上绿色

<sup>①</sup> 芝加哥国际机场：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

的维范蒂<sup>①</sup>式毛衣，洒上她喜爱的卡伯查德牌香水。可现在呢？她得忙到半夜两点钟，匆匆忙忙地准备行装，安排好一切，取消在城里的约会，把闹钟拨到早晨五点，天不亮就得起床——这是她最讨厌的事了。

维克托要她去，总有什么道理吧！但卡特里娜不忍心问他——“出了什么事啦？病了吗？”这类问题她都不忍出口。但她却忍不住问自己：“我还得送他上医院吗？”……为什么得我去送呢？他女儿不就在布法罗吗？难道他要马上动手术？在马萨诸塞州医院里那些可怕的情景，难道还要再次重现吗？”一阵狂热的拥抱，开始了他俩之间的热恋；而结局呢，却是钡餐 X 光透视，大剂量的麻醉药，还有那种难闻的药味。最后，他那位严峻的夫人赶来控制了一切。

别这么匆匆就走，卡特里娜竭力克制自己。她对自己的感情从各个方面重新检验了一番。现在，他单身一人，很可能在飞机上就会瘫下来；像维克托这样的人，即使照他自己的说法，已到了败事有余的高龄，却仍然是个年轻的王子。这样的人给一位姑娘打电话——对维克托来说，卡特里娜确实只能算是个小姑娘——只是许许多多姑娘中的一个而已。但她很清楚，她战胜了所有其他的姑娘。现在，维克托不得不向一个姑娘求助，（“我改变主意了。”）并向她暴露了自己的懦弱。

此时此刻，卡特里娜得镇定。所以，当对方说：“我已给你预订好了机票，如果你可以来的话——你听着吗？”她就回答说：“让我找支好写的笔。”其实，好写的笔就用线挂在电话机旁。她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好让自己镇静下来，找个合适的答复。但卡特里娜并不怎么聪明，一下子想不出说什么好，所以就把对方念给她听的号码记了下来。她心情沉重？是的。关于自己离婚一

<sup>①</sup> 维范蒂：意大利时装设计师。

案，她不得不从最坏处着想。她，一个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住在美国北方；她的婚姻很不如意，就与来访的朋友私通——当然她也是有选择的，但也有好几次选错了对象。然后，天赐给了她维克托。

她与精神病医生曾进行过长时间的讨论（当然，现在她已不需要精神病医生了）。这些讨论使她认识到，这一切都应归咎于她父亲；她的性格的形成，或者说她性格的畸形发展，都得归咎于她父亲。十岁之前，她只知道父亲对自己十分宠爱。但她刚开始发育，麻烦就接踵而来了。父亲对她十分恼怒，说她的长相越来越像只小白鼠，并叫她骗人精，还说她像个与跑街先生偷欢调情的乡下姑娘。“这是什么意思，你懂？一打是十二，还是十三，你记得吗？十三岁的姑娘会干出什么好事来？不要多久，随便某个陌生人就可以把你拖到壁橱里脱掉你的裤子！”真该谢谢你啊，好爸爸！你给你年轻的女儿灌输了多好的思想啊！不出所料，她开始变得狡黠起来，还真的干起偷欢的勾当哩。她真的充当起与跑街先生偷情的乡下姑娘的角色了，并逐渐能应付自如，终于长成了妖娆丰满的卡特里娜。最后的结局却好得不能再好了——真得感谢上帝，这简直是奇迹；因为，正是她那个模样儿吸引了维克托——这位先锋派人物，如痴如醉地迷上了卡特里娜富有性感的姿色。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性感美，而且，还是一个淫荡的小资产阶级太太呢！这恰恰能刺激维克托的性欲。她，是个乡下娼妇，就是她父亲预言的乡下姑娘——反正，你想怎么叫都可以，妖女人，花娘、淫妇、窑姐儿；她那粗壮的大腿，半张半闭的双唇，那模样儿看上去似乎在有意无意之间，真所谓“道是无情却有情”。她这种雅中带拙的神态，像一副春药，大大激起了一位当代知识界名流的性欲。多蒂认为，维克托爱上卡特里娜，正是说明了他的堕落；而卡特里娜爱上他这个老迈的堕落文人，只是由于她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或者只是由于性欲上的互相吸

引。但卡特里娜对她姐姐的看法颇不以为然。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疑的——那就是维克托行将入土，卡特里娜随时会失去他。

如果说，维克托已不如从前那样体魄强壮，精力充沛的话（好像全身蒙上了一层尘埃），那么，他现在至少还是生气勃勃的。他肤色滋润，一头浓发，偶尔看上去有点萎靡，但那也是一眨眼就不见了。只要他一坐下来，拿起酒杯，就会侃侃而谈。这时他声音洪亮，谈吐自信，简直难以相信他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有时，卡特里娜自己感到，维克托不仅仅是她的情人而已，他是个在重新教育她的师长。她已进了维克托的研究生班；其他人要进去，那想也不要想。

“号码我都记下了。”

“你得乘早上八点的班机。”

“我把车停在奥灵顿。明天不在家，不想把车停在家门口。”

“行。你可到机场贵宾休息室找我。下午一时上飞机前，我们还有时间喝点什么的。”

“下午三点左右回来时，我就可以把你口授的材料带来了。”

“好啊，”维克托说，“我大概跟你说过，我得用那份材料。”

“我知道的。”

“我请你来见我，颇有点儿东方色彩吧！好像苏丹要他的妃子骑着大象，带上乐师，到城外去相会一样……”

“你真好，又提到大象的事了。”卡特里娜说，并马上警觉起来。

“但这一次，只不过是芝加哥—布法罗—芝加哥一日游罢了。”

卡特里娜曾想写一篇关于大象的儿童故事，但维克托对她的做法颇不以为然，认为此举无聊之至。因此，卡特里娜已好久不在他面前提及此事了。而现在维克托自己提到了大象的事，这意味着他让步了，维克托此举亦非同寻常。这就是说，维克托暗

示：要卡特里娜去布法罗，同样无聊之至，就像她想写大象的故事一样，其努力拙劣而又强己所难。

关于大象的话题卡特里娜不想再多说什么了。因此，她就说：“我希望明天能听到你演说。我真想听听你会对那些大董事长们说些什么。”

“完全没有必要，”维克托说，“你在床上听到我说的比我要对他们那些人说的话有价值得多。”

确实，在他俩意深情切之时，维克托说起话来真是妙语连篇。维克托是否认为卡特里娜很聪明？这只有上帝知道了。不过，他就是喜欢谈话，不说不行。在床上，他们是无话不谈（实际上只是他一个人在谈）；而他一谈起来，就滔滔不绝，中间也不停下来作任何解释。这既是盲目的信任，也是由于没有更合适的人与之交谈，才使维克托对她倾吐衷肠。谈着谈着，他就越来越尖刻辛辣，恶语伤人，杀气腾腾。有的人会被他说得名誉扫地，丑态毕露。某君是个抄袭者，却连怎么剽窃都不懂。哲学家某甲，只会拾人牙慧，随声附和而已；某乙的思想乱七八糟，犹如餐桌上的旋转盘，上了六道倒胃口的菜，却没有一道大菜。在床上，维克托和卡特里娜又是抽烟，又是喝酒，互相抚摩啊（一种偷欢的温柔），放声大笑啊，认真思考啊——天哪，他们还会认真思考哩！维克托把她带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境界。他活着就是为了思考。当然，他并不期望卡特里娜会理解他的思想；这他也知道不可能。人们不理解他的思想，使他的生活黯然失色。但这种情况已无法改变，维克托对此也是知道的。可当他说别人坏话时，卡特里娜则心领神会。谈到他的夙敌方斯廷曾想诋毁他时，维克托说：“他集一切奇谈谬论于一身，就像开了一家通铺小客栈，强迫人就范。”类似的妙语，并没有白说，因为这些话卡特里娜完全理解：她还想事后记下来，并希望记得一字不错。所以，维克托总是对的，她在床上听他说的要比他在公众面



子的电视系列片，维克托，你也一定得看看。”事后，他几乎不愿再跟她谈话。这大大丢了她的面子，使她久久难以忘怀。他们冷淡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才慢慢重新和好如初。因而，她得出了如下的教训：“我不能像其他人那样。”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克里格斯坦吧！他的性格迥然不同。“这么说，你要走了，”他说。他坐在炉火边，显得忧郁而又沉静，但他全心关注着卡特里娜的问题。而卡特里娜呢，则老是怀疑他是个大傻瓜。但要是他真是个大傻瓜，又怎么会是自己的好朋友呢？是啊，他俩之间有点儿距离，可谁来填补这一空缺呢？记住，他还是个货真价实的战斗英雄呢！真正要了解萨米·克里格斯坦是什么样的人，谈何容易！他矮个儿，结实粗壮，显然是当警察的料儿。他一会儿说，他在风化纠察队服役，专门干取缔卖淫、赌博之类的事；过一阵子，他又说他专门对付杀人犯或吸毒犯。有时候，他又不肯吐露一点点风声，好像他干的工作属一级机密，得绝对保密似的。“我只能对你这么说，亲爱的——如果必要，我可以在街上使用最新式的火焰喷射器。”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参加过“金手套拳击赛”，脸上至今伤痕犹存，足以为证。再年轻一些时，他则经常在街上大打出手。他又凶又狠——是个可怕的人物；可又是个谦谦君子 and 温情的挚友。第一次卡特里娜请他喝点什么时，他只要了一杯茶，可是，他把自己随身佩带的武器——摆在桌上。他腋下夹了一只大酒瓶，腰间佩着一枝小手枪，另一枝手枪则绑在腿上。他还让两个孩子玩这些枪，还说是绝对安全的。一次，他带卡特里娜去勒佩鲁凯时，谈到了谋杀、自杀、追踪、枪战等犯罪行为。他说，“难道只能坏人有武器吗？”最近有一次，他在酒吧间里，一个彪形大汉以为他是个胆小鬼。克里格斯坦露了露手枪说：“好啊，朋友，你想在两眼之间开个肛门吗？”从这一事例中，克里格斯坦从理论上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对卡特里娜说：“你们这些人，”——他主要

是指维克托——“对人世间的罪恶还该多多了解。伍尔皮先生在评论《死屋》一书时，谈到了‘标准罪犯’。现在，美国罪犯十分猖獗。一百年前，俄国还是个信教的国家。现在我们美国还没有出现圣人，可是，与罪犯共事……”中尉有幸认识名人而高兴。他本人已六十多岁了，可还在攻读犯罪学博士学位。对一般的话题，克里格斯坦都少不了要发表一通自己的意见。

维克托称他为可怕的圣诞老人，并对他很感兴趣。维克托还说：“克里格斯坦是属于美国黄金时代的迂腐派。”

“你这是什么意思，维克托？”

“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带出去约会的那些女人；他老是向那些离婚女人大献殷勤，给她们送粮送花，送意大利古西牌围巾，送犹太式贺年片等等。他从不忘记那些女人的生日。”

“我懂了。你说得不错，他确实这样。”

“他是又做巫师又做鬼，想扮演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他叫什么来着——噢，对了，叫沃特兰。”

“不过，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卡特里娜问。但对维克托来说，像克里格斯坦这种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根本不值得去追究。当卡特里娜回到餐厅时，她背后那扇装着两个铰链的门摆动的声音，表明她需要求助于他人。她需要有人帮助她，而克里格斯坦就在她身边，他也乐意帮助她。至少，他看上去是愿意帮助她的。这种人现在不多。有的人甚至连表面上敷衍一下也不愿意。卡特里娜想，她姐姐多萝西娅就是这样的人。

“时运不佳啊，呃？”克里格斯坦严肃地说，“你只好去了。他又病了吗？”

“他没有说他病了。”

“他病了也不会说。”克里格斯坦神情严肃地皱起了眉头，那脸色看上去如同旧漆未刮掉又涂上了一层新漆，也像铁锈上涂上了一层红漆。

“我得去。”

“要是那样的话，你当然一定得去。不过，事情也不见得太糟，你那黑人老太婆可以照料孩子；她以前不也带过你和你姐姐吗？”

“听你这么一说，倒确实也不怎么糟。现在，一切都得托给伊索尔了。你认为……”

“她怎么啦？”

“老太婆心理变态，越来越叫人难以捉摸了。她老是找我岔子，好挖苦人。”

“她有偏见，这你以前对我说过。她不赞成你离婚。她在监视你的行动。你怀疑她收了艾尔弗雷德的钱，向他提供有关你的情况。不过，她自己可没有孩子啊！”

“我们小时候她很喜欢我们……”

“现在又把这种爱放到你孩子身上了？我弄不懂她这么做到底为了什么？”

卡特里娜心里在想：我在和谁说这些话啊？在炉火的映照下，克里格斯坦的光头有点像只变了形的鸡蛋，就像爱德华·利尔<sup>①</sup>在《无聊之歌》中所描写的那样。他想装出一种丘吉尔式的关注神情——目前正是命运的转折点。他是在说，不能失去头脑。那些大艺术家、大思想家不会像普通人那样消亡的。想想九十多岁的帕布洛·卡萨尔斯<sup>②</sup>，还有伯特兰·罗素<sup>③</sup>等名人吧！再

---

① 爱德华·利尔（1812~1888）：英国幽默家和画家、著有《无聊之收》和《无聊之歌》。

② 帕布洛·卡萨尔斯（1876~？）：西班牙大提琴家和作曲家。

③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著有《数学原理》、《哲学提纲》和《哲学与政治》等。

看看临终前的弗朗西斯哥·佛朗哥<sup>①</sup>吧！当有人告诉他，加西亚将军前来与他告别时，这老头竟然说：“怎么，加西亚要去旅行吗？”

听这话，卡特里娜真想笑出来。但事情来得太急——正是困难重重、令人忧虑之时，因此怎么也笑不出来。

中尉说：“请放心，我愿竭诚效劳。随便什么事，只要你说一声，我一定尽力而为。”克里格斯坦往往很策略，对卡特里娜也非常尊重。其言下之意是，他希望成为卡特里娜生活中的知心人。他一直在追求卡特里娜，然而他态度谦卑；当然，他的谦卑也颇有分寸，往往使卡特里娜不知怎么与他周旋。

她说：“我不得不取消与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医生的约谈了。”

“这是第二次了吧？”

“艾尔弗雷德把维克托也拖进去了。他说，我与维克托的关系伤害了孩子。那个精神病医生对我十分粗暴。对这种家伙来说，父母亲简直就是犯罪。他粗暴极了，多萝西娅怀疑他是否已给买通了。”

“有时，这类精神病医生为了表明自己不偏不倚，故意对双方当事人都十分粗暴。”中尉说，“不过，多蒂的怀疑是有根据的。你是否与你的律师谈起过多蒂的看法？”

“他没有发表意见。律师只有在同行中才会开诚布公，如果他们也会说实话的话。”

“也许这个医生颇有点道德观念。不过有些问题仍然令人费解。在瓜达卡纳尔岛<sup>②</sup>上，我部队里的一个好朋友常说，奸诈之

---

① 弗朗西斯哥·佛朗哥（1892～1975）：西班牙军人，国家元首（1939～1975）。

② 瓜达卡纳尔岛：南太平洋所罗门群岛中之一岛，太平洋战争中，日美两军在该岛曾进行激战。

徒往往貌似公正——我可以代你去和那精神病医生谈话。必要的证件我都有。”

“噢，千万别去！”卡特里娜说。

“从客观上说，我去说对你有利。”

“你打个电话给医生的秘书，本周末约个时间就行了。”

多萝西娅一直警告卡特里娜要留心克里格斯坦。多蒂是在一次枪展茶话会上见到中尉的。“我不喜欢和他呆在一起。这个人简直是个疯子。他是真的警察呢，还是电视连续剧中那个粗鲁的警察科杰克？”

“为什么他不是真的警察呢？”卡特里娜问。

“他也许是个守夜人。不——如果他上夜班，就不会有时间和那么多单身中年妇女约会，把她们带去跳舞了。你打听过他的来历吗？他身上佩的三枝手枪，是否都有证明？”

“那些枪倒没什么。”

“他可能只是个交通警吧。不过，我敢肯定，他是个疯子！”

克里格斯坦问卡特里娜：“你有没有告诉精神病医生，你正在写一本儿童读物？”

“没有。我从来没想到要告诉他这件事。”

“你看，你这么做对自己就不利了——你得尽力给人一个好的印象。”

“真的帮个忙吧，萨姆；带狗去散散步吧。这家伙真可怜，今天一直没出去过呢！”

“当然可以，”克里格斯坦答应说，“我自己也早该想到了。”

他带着苏基走出门口，地上的积雪在他脚下格格作响，新装的路灯美观漂亮，灯光明亮，这是大家一致的看法。夏天，光线太亮，使鸟儿不辨白昼黑夜；当街灯一亮，它们以为太阳又出来了，就从巢里飞出来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冬天，那光线犹如从太空中射来似的。克里格斯坦穿着风雪衣，跟在身躯高大的雌狗后

面，缓步走着。维克托把这个警察称之为幻想家。别人有谁会用这种词语？“是个幻想家，却又没有任何发明创造。”维克托是这么说的。但中尉在身边，等于有了保镖。他曾带卡特里娜去麦考马克那儿去见美籍俄裔著名电影演员尤尔·布林纳；他身上的三枝手枪使卡特里娜增加了安全感，她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克里格斯坦是她忠实的朋友。

克里格斯坦走后，卡特里娜与姐姐多萝西娅通了话。她又一次向姐姐表明了自己对中尉违法的看法。她与她姐姐经常深夜在电话里长谈。

多萝西娅在丈夫死后，卖掉了在海兰公园的大住宅，搬到了时髦的“旧城”，把她和丈夫温斯洛在旧金山冈普商场买的中国式新婚床也搬了去。卧室不大，一扇窗面向幽黑的小巷。但她不愿丢弃那张中国床。现在，她正躺在床上，身边放着电话机。床架四周都有雕刻。在卡特里娜看来，这些雕刻犹如荆棘编织的王冠，难怪多蒂抱怨失眠和周期性偏头痛；而现在，她竟也要来规劝卡特里娜？“你堕入这种毫无希望的恋爱；你孤单一入，惟一你感到可以保护你的人，就是那个傻瓜警察！现在，你又要飞到布法罗去了，啊？”

“克里格斯坦是个正人君子。”

“他差得远着呢！”

多蒂把头发理成圆球形，身材修长，手臂和大腿瘦得像木棍；她们的父亲称之为“患了神经衰弱症的木棍”，又黑又大的眼睛似乎随时会蹦出来似的。多萝西娅神情焦躁不安，说话泼辣尖刻，抱怨起来舌头不饶人。

“孩子照样与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去上学，伊索尔十点钟到家来。”

“你得匆匆忙忙去赶路，还得在云彩里翻斤斗呢！就只是因

为那个大人物说了一声要你去。你说你没有办法，我看是你也高兴去。你倒叫我想起了主日学校的那个女人——‘她双脚从不呆在家里。’在法国留学一年，对你我毕业后都大有好处，但也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是我的看法。爸爸当估税员时，蚀掉了一些他从前搜刮到的钱。他倒好，花些钱把我们培养成巴黎小姐。当然，这比用在其他方面好。他是想以此来炫耀炫耀自己；而我俩呢，给丢在巴黎，无人过问。要不，那笔花在巴黎的钱，我现在可派些用场呢！”

噢，多蒂！又要自吹自摆，又是悔恨交加。多蒂的丈夫开了一家小塑料厂。他去世时，小厂已很不景气了。所以，多蒂现在到处兜售塑料产品。她儿子正在攻读工商业管理硕士学位，但那并非是一所名牌学校。像多蒂这样地位的女人，需要有一个讲得响的地址，她在“旧城”所付的房租贵得要命。“这样昂贵的租金，可以把老鼠都灭尽。而我却签了为期两年的租约，连房东他都在笑我。”由于不得不进入工商界，她说起话来越来越像过世的父亲了。然而，她最恨的事莫过于到外兜售产品了。要多萝西娅到处奔波，要她做点什么正经事，那简直是要她的命！要她清晨起床，那是绝对做不到的。她会一边煮咖啡，一边乱七八糟的骂人；听到茶壶吱吱作响，她那突眶而出的眼睛会怒火四射。用梳子梳头，她似乎要用尽全身力气似的。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像拉辛<sup>①</sup>作品中的太太所说的：‘他们个个都想谋害我<sup>②</sup>。’”（她所受的法国教育中渗透着芝加哥传统，而所受的芝加哥教育，却又渗透着法国传统。）“只是费德尔是你，傻丫头，患了恋爱病了！”

多萝西娅把车子开出车库，身子索索发抖。她得去——走访

---

① 让·巴蒂斯特·拉辛（1639~1699）：法国诗人及悲剧作家。

② 原文系法文。

同一公司下属的各商店的进货员，或者是各类公共机构的采购员；想一下，这等差使对多蒂来说是多么艰辛啊！她甚至到地铁去兜售她的产品，并巧妙地获得宣传伦理道德的电台的聘请，做他们的女董事。有时，她看上去似乎快累倒了，深红色的眼睑闭了起来。但在电视上出现时，她却生气勃勃，其表演令人折服。一旦引她发怒，她却厉害万分。

“伍尔皮生病，就让他回家好了。为什么他自己的婆娘不把他领回去呢？”

“别忘了，去年我差点儿永远失去了维克托。”卡特里娜说。

“你差点……差点失去他？”

“是这样。那次你也正好动手术，而我不能照顾你；但你的病情不怎么严重，是吗，多蒂？”

“我不是说我自己，而是说他那老婆，那可怜的女人。因为你以及还有其他一些女人，她受了多大的冤屈啊……只要她一走出房间，你这个埃文斯顿的傻丫头就会马上冲进去扑在那生病的老头子身上。”

多蒂就是这样粗俗，你再对她怎么讲也没有用。卡特里娜无动于衷地听她唠叨；甚至还感到有点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最后又升华为欢乐的情绪。多蒂接着说：“这老头子利用自己的声望，去勾引一个乡下姑娘，这样做是不道德的，这正如桶里抓鱼，手到拿来。你会对我说，你有秘密绝招，使他性欲勃发……”

“我说，多蒂，我没有那样做，只不过这事正好碰到我头上。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甚至喜欢我突出来的静脉血管。要是在其他人面前，我还得尽量设法不让人家看到呢。他还爱我高低不平的牙床；这在我一生中是最使我难堪的了，连我眼泡发肿，他都喜欢。”

“耶稣啊，这么说正是那么回子事了！”多萝西娅不耐烦了。“你运气好。他迷上了你！”

卡特里娜想，她一点也不同情我，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思倾吐给她听呢？这真是太可悲了。当然，另一方面，也不应该责备多萝西娅，尽管她气恼、愤怒、嫉妒，她的事业日趋衰落。她需要有个丈夫。她没有什么前途可言；而我呢，则成了一个与她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对这一事实，她尤为恼恨。这四年来，我接触的都是社会名流，像约翰·凯奇<sup>①</sup>啦，布基·富勒<sup>②</sup>啦，德科明<sup>③</sup>啦，等等等等。回家时，我与她谈起与杰克·奥纳西斯<sup>④</sup>或弗朗索瓦兹·德拉·伦塔<sup>⑤</sup>等人闲聊的情景；而她呢，只能告诉我推销塑料产品是如何不易，那些采购员又是怎样难弄、心术不正。

多萝西娅没有耐心再谈下去了。当想到卡特里娜与维克托的风情只是昙花一现的可能，她还比较容忍，也愿意多听听。卡特里娜甚至说服了她，叫她读了几篇维克托写的文章。她们先读较容易读懂的一篇文章：《从阿波里奈尔<sup>⑥</sup>到卡明斯》<sup>⑦</sup>，然后再读难懂一点的，像《保尔·瓦莱里<sup>⑧</sup>与完人》和《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当代思想界》。她们不去钻研马克思本人，但她俩法语很好，足以研究瓦莱里的《泰斯特先生》这类文章。她们吃中饭时在老

① 约翰·凯奇（1912～）：美国作曲家、作家和艺术家。

② 布基·富勒（1895～？）：美国几何学家、教育家和建筑设计家。

③ 威廉·德科明（1904～）：英籍荷兰艺术家。

④ 杰克·奥纳西斯（1929～）：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妻子，曾任白宫历史性重建工程的艺术指导，肯尼迪总统于1963年被刺杀后，于1968年改嫁于阿里斯托尔·奥纳西斯。

⑤ 弗朗索瓦兹·德拉·伦塔：不详。

⑥ 纪尧姆·阿波利内尔（1880～1918）：法国抒情诗人，超现实主义运动在诗歌创作中的先驱者，其诗作对当代诗歌产生重大影响。

⑦ 爱德华·埃斯特林·卡明斯（1894～1962）：美国诗人，他力图寻找新的表现形式的尝试，对当代诗歌产生重要的影响。

⑧ 保尔·昂布鲁瓦兹·瓦莱里（1871～1945）：法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他的创作深受马拉尔曼的影响，他的评论全面地总结了关于艺术本质的法国传统观点。

果园购物中心见面，一起来讨论这本奇妙的书。她们先去看时装；那儿是个大商场，商品琳琅满目，她们当然难以一下子静下心来研究《泰斯特先生》这篇论文。卡特里娜一直努力增加自己的见识。她学开飞机已好几年了，并取得了驾驶单引擎飞机的执照。她还开始去上中断了二十年的钢琴课。她学弹吉他。为了练习法语，她常去昂泰里奥街的法语中心。一次，她心境特别坏，就去学开外国赛车，在芝加哥北郊的高速公路上一次又一次漫无目的地兜圈子。她还学会了拉丁语，尽管这对她毫无用处。有一度她还想吃法律饭，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水平测试。她的目标是想使自己在某方面获得较为完善的发展。老果园餐厅的坐位是火车坐式的，她俩坐在火车坐上，边抽烟，边研究起瓦莱里来：“健全的头脑”是什么意思？是指“知觉完善的人”吗？泰斯特研究其夫人，为什么泰斯特夫人反而会像丈夫爱她一样幸福？为什么泰斯特夫人称其丈夫为“纯知觉的天使”？要读懂瓦莱里的文章可真不容易；伍尔皮论瓦莱里的文章，对多萝西娅来说更是不可企及的了。她要卡特里娜解释。“他把泰斯特先生和卡尔·马克思相提并论——这是什么意思呢？”

“噢，”卡特里娜竭力想解释清楚。“我们先回到前面那个句子……‘思想由虚无而进入奇妙的意念，并从外界获得灵感……’”

听到这里，多蒂就叫起来：“什么样的虚无？”她把头发梳成球形，因为她自己也知道脑袋长得又瘦又小，球状的发型可以掩盖一下这一生理上的欠缺。然则，这种做法也许仅仅是一种策略而已，其实她处世行事十分聪明。在她的心胸中，既隐藏着一种同胞姊妹之谊，又有一种烦躁愤懑之情。她对卡特里娜只能宽容一会儿，然后，她就会说：“你与那些知识分子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因为我们上庞蒂大酒吧间，那些哲学家就看不上我们吗？或者说，你是在与那老头的夫人进行一场智力比赛吗？”

不，贝拉·伍尔皮倒没有这种虚荣心。这位大人物的夫人，扮演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角色。但她尽其职责，颇以为荣。她体格强壮，皮肤黝黑，自有其特殊的魅力。看到她，会使你想到英国亨利三世的王后凯瑟琳<sup>①</sup>——一位受到轻蔑的王后。尽管贝拉本人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但她懂得怎样做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卡特里娜尽力回答她姐姐的问题：“奇妙的意念是指人类文明的历史对空虚的头脑所产生的影响……”

“这方面我们一窍不通，”多蒂最后说，“这种文章，不是为我们这种人写的，卡特里娜。何况，你的头脑，也不是他所感兴趣的东西。”

“但我认为，我可以读这种文章，至少能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读，”卡特里娜坚持自己的看法，并竭力想掌握这场讨论的主动权。“我们这种人”这句话刺伤了她，她感到自己有点眼泪汪汪了。当她感到自己快要流泪或哭出来时，她就会出现一种自己称之为“肌肉反应”来控制自己；这时，她双颊鼓起，四肢无力，感觉迟钝。多蒂说话尖刻，这是她从在市政厅里任职的父亲那儿学来的。她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女人。只好向人兜售塑料袋，只要互相有利就行。”卡特里娜完全懂得，多蒂说“我只是个低级的女人”，其言外之意是“你卡特里娜也是”！多蒂然后说：“别再来给我什么‘奇妙的意念’这类货色了。”最后，她问卡特里娜：“你的大象故事写得怎么样了？”

这话问到卡特里娜的痛处了，有好一阵子，卡特里娜在写一个关于大象的儿童故事。她想借此赚点钱，并争取自立。真不该给多蒂提这件事。当时与多蒂谈及这事，只是因为这个关于大象

---

<sup>①</sup> 凯瑟琳（1485~1536）：英国亨利三世的第一个妻子，玛丽一世的母亲。由于教皇反对亨利三世与凯瑟琳（1533年离婚），致使英国政教分离。

的故事，是以前在家里经常讲的一个故事。“就是爸爸常给我们讲的那个大象的故事，你还记得吗？我想把这个故事派一下用场呢！”但不知为什么，她至今还没有全部写好。多蒂用这个话题来挖苦她，真有点儿太缺德了。在“老果园”讨论有关瓦莱里的文章，就以多蒂这个讽刺性的问话结束了。

当然，她还是不得不告诉多蒂，她明天要乘飞机去布法罗。一听这话，多蒂在四周雕刻着图画的中国式大床里坐起，手握电话，说：“这就是说，如果有什么麻烦的话，你要我设法瞒过艾尔弗雷德，是吗？”

“我想不至于会有什么麻烦吧？不过，为防万一，给我个电话号码，明天下午我会找你。”

“我明天得在城里到处奔波。我的对手想从我手里夺走我的化学工程师。没有他，我的厂只好关门了。我自己都快要垮了，哪有闲心再管别人的事！听我说，卡特里娜，你真的那么认真吗？法院要是把孩子判给艾尔弗雷德，你怎么办？”

“我不接受判决！”

“也许你不必那么认真吧。我们自己的母亲，对我俩都极少尽母亲的责任；她更关心的是她自己穿的裙子的皱褶；直到今天，她住在海湾港的岛上，还是这个脾气。当然，你会说，你不是像我们母亲那样的人。真是往事易忘啊！”

“这与母亲有什么关系？”

“我只是想到人们一般的处世态度而已。你要带那两个孩子，会有什么结果呢？今天，就是那幢房子，也已成了你的一大负担了。艾尔弗雷德把东西统统拿走了，维修这幢大宅第就得花不少钱！如果艾尔弗雷德真的胜诉做了两个孩子的监护人，那结果会怎么样呢？你就得迁到东郊去，与那些画家和学者之流为伍。那儿除了文人和画家，没有其他什么人住的。维克托那一类人……”

“维克托不属于那一类。”

“成群成群的人追随他。你可以坚持在更多的场合下，与他一起公开露面。如果你败诉失去了孩子，这完全是维克托之故。趁他现在还活着……”

“你这么说，多蒂，使我想起了一句女人的口头禅‘有个姐姐多好啊！’”

多萝西娅笑了。“有姐姐的女人就不会那么说了！要我做姐姐，就进屋开上所有的灯。你一直不要孩子；你孩子生得太迟了。艾尔弗雷德对此很有意见呢！他这种人，行动迅捷果断。珠宝商就得这样。他在同行中是个佼佼者。只要瞥一眼宝石，他就马上可以开价。你不想让孩子跟他？你还想有选择的自由？你想等个好机会？毫无疑问，只要艾尔弗雷有可能，他就非把你整垮不可！”

多蒂说得不错，卡特里娜心里想，这是最可怕的结局了。

但对我的所作所为，我决不后悔。卡特里娜说：“我得去把闹钟拨好了。”

“我给你几个电话号码，下午四五点钟打这几个号码也许能找到我。”多萝西娅说。

五点三十分，闹钟响了。在冬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这是卡特里娜最讨厌的事。她关上壁橱的门，就穿起衣服来。心里郁郁不乐。她选了件黑色的开司米羊毛衫和黑色的裤袜，好与绿色的外套相配。她倒在长沙发上，高抬双腿，笨拙地套上裤袜。她那双靴子是鸵鸟皮制成的，还是从南州街上的新产品商店买来的。那是家城市牛仔们喜欢光顾的商店，颇合黑人纨绔子弟的胃口。斑斑点点的鸵鸟皮，尚算光滑漂亮，但靴子尺码小了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这靴子，以及卡特里娜的模样儿也正合维克托的胃口哩！

她还挤出十五分钟的时间带狗去散步。今天，伊索尔不肯带狗出去散步。像她那样大的年纪，在冰上摔一跤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摔碎了屁股你会照顾我吗？”那黑人老太婆问）。但卡特里娜很喜欢带苏基出去遛遛。部分原因是像多蒂所说的，“她双脚从不呆在家里。”家也确实使卡特里娜感到空虚而痛心，因为，艾尔弗雷德把最好的地毯、椅子、印度瓷像、中国卷毛狮等等，都席卷一空。当然，她从来就不喜欢干家务活。她需要的是活动，而遛狗也是一种活动嘛！要是碰到其他遛狗的人，就可以攀谈几句。他们谈话的内容，有时倒着实令人吃惊——他们甚至会提出一些不像话的建议。卡特里娜当然不必认真对待这些建议，只是听听而已。至于苏基呢，她已经老了。兽医一直转弯抹角地表示，像苏基这样又病又瞎的老狗，早该处理掉了。也许，克里格斯坦可为苏基做件好事——把她带到森林保护区一枪打死。那两个孩子会不会为此伤心呢？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这两个孩子，沉默寡言，真看不透她俩的心思。她们一直在注意观察自己的母亲，但从不发表意见。克里格斯坦却说，这是两个了不起的小女孩。但卡特里娜认为，像这样的孩子，朋友家是不会喜欢的。当然，像那些属于美国黄金时代的迂腐人家，也许又当别论了。克里格斯坦曾经提出过一个十分古怪的建议，要这两个女孩子进武术训练班，要卡特里娜鼓励她俩的进取心。他还曾想说服卡特里娜，让他带孩子去看警察的手枪射击训练。卡特里娜说，枪声会把孩子们吓坏的。可克里格斯坦却认为，情况恰恰相反，这对孩子会大有好处。多萝西娅则把她的这两位侄女称之为“神秘莫测的小鬼头”。

带苏基散步不能走得太快。这条老狗毛发是黑色的，背脊下陷，温和可亲；它走在雪地上，一碰到其他狗撒下的尿粪，总要上前闻闻嗅嗅。它兜着圈子，然后又改变主意。它该在哪儿撒尿呢？撒错了地方，就破坏了事物的平衡。在直觉的交响乐中各司

其职（维克托语）。在这寒风刺骨的天气里，脚下的冰块格格作响，但苏基还是不紧不慢地走着。一轮灰蒙蒙的太阳升起了。有那么一会儿，空中飘起了雪花；之后，天空彤云密布。这将是阴沉的一天。

卡特里娜唤醒了两个女儿，吩咐她们起床穿衣，然后到楼下吃燕麦薄饼。妈妈得去开会。隔壁的基蒂八点钟来送她们上学。两个女孩子好像根本没有听她在说什么。她俩什么地方像我呢？卡特里娜有时不禁怀疑起来。她俩的嘴和母亲一样，半开半闭，有一种似无意而有情的魅力。维克托不喜欢谈论孩子，尤其避免谈论卡特里娜的孩子。但就年轻一代而言，他还是作了一些理论上的阐述。他说，年轻一代似乎获得了一种权利，他们可以用罪恶来摧残老一代。无权无势的小人物的子女是可怜的。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和家里的大人疏远；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大人是不合格的孩子。也许你以为这种看法会使维克托沮丧。不，恰恰相反，他反而兴高采烈。这种事例，对维克托来说也不是偶然的。他秉性平稳冷静。卡特里娜准备走了。她穿着羊毛夹里的大衣走进厨房。两个女孩子还坐在桌上吃燕麦饭。她俩磨磨蹭蹭地吃着，牛奶都已变色了。“我在墙上贴了一张条子，上面写了今天该做的事；伊索尔来了你们告诉她。放学后见了。”没有回答。卡特里娜离开家里感到高兴；她能驾车去奥里尔国际机场，随后坐飞机去布法罗，这多惬意啊！即使维克托病了也没有关系。然而，她又不太愿意承认自己的这种急于离家的心情。

喷气式飞机吞进冰冷的空气，咆哮着升空而起，离开地面。灰色的大地在机下滑过；飞机逐渐上升，经过飞机库，越过工厂、池塘、平房、橄榄球场以及雪地里断断续续蜿蜒伸展的铁轨。然后，在飞机的南边，出现了一幢幢高耸的摩天大厦。在下面已经无法分辨的人行道上，两个女儿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她们也许听到了飞机飞过的声音吧，可她们怎么知道，她们的妈妈正

从她们的头上飞过呢？现在，飞机已飞临大湖上空，下面一片灰茫茫的水面；风吹过水面，时而掀起片片涟漪，时而刮起阵阵白浪。再见了！坐在飞机上在云层上空飞行，往往使卡特里娜感到平静安宁。忽然，明亮的阳光穿过无垠的空间照进了机舱，使机舱内充满了温暖和色彩（那广漠无垠的空间，据说是一片寒冷的黑暗）。有一次，她在维克托房间里拿起一本康定斯基<sup>①</sup>写的书，她读到里面这么说，这位画家定居俄国僻远之地，那儿屋内都挂满了圣像；他说，一幅画也应像房子的室内一样，艺术家应吸引看画的人进入其间。谁不愿意进入画内呢？卡特里娜想。在密执安州上空，卡特里娜喝着咖啡，那一小时过得平静而又舒畅。飞机上乘客奇少，几乎是空的。

她一度又想到了写那个大象的儿童故事的计划。她写得成，还是写不成呢？

卡特里娜的故事是这样的：一家大百货公司，为了推销五楼上的印度玩具，租了一头雌象；大家都认为，这个主意很聪明，还颇有创造性。驭象人想叫象走进运货升降机，但这绝非易事。那头象用一只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发现有点摇摇晃晃，就逡巡不前了。但驭象人尼拉德最后总算把象引进了升降机。到了五楼玩具部，这头象可神气了。存货一下子就卖完了。这头象叫玛吉，但报纸上称它拉吉，意思是“大个子”；当然，各种报纸上都大规模报道了这个“大个子”。营业部顾客盈门。一个月到了，这位玛吉—拉吉又被牵到运货升降机前。这一次，它又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可怎么引它都不肯走进升降机。这样，在瓦巴斯街的一家百货公司的五楼玩具部，一只大象呆在那儿，上不去下不来。谁也想不出办法把象弄走。

---

<sup>①</sup> 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1928年入德国籍，1939年又入法国籍。他的作品对抽象表现派有重大的影响。

经理们又是开会，又是讨论，还召来了专家。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人，不断地打来电话，提出离奇古怪的建议。捅开屋顶，用大吊车把象吊出来怎么样？是否可以推倒一边的墙壁，然后用几个钢琴搬运器慢慢把象放下来？用麻醉药把象麻倒，再拖进升降机不行吗？但这么大的象一旦麻倒了，怎么能拖得动呢？何况，保护动物协会反对用麻药。出租玛吉—拉吉的马戏团就要走了，坚持要百货公司信守合同。驭象人尼拉德似疯如狂；“大个子”象则忧郁成病，患了失眠症了。难道没有什么办法了吗？卡特里娜脑子不怎么灵，不知怎样结束这个故事才好。灵感就是不来。克里格斯坦则想，军队里是否有特大型直升飞机，要不，百货公司里是否有中央顶楼，或者像铁路运货场上的那种升降机井道。卡特里娜曾与维克托讨论过这个故事两三次，现在不得不放弃这种想法了。你总不能老是用那些无聊的故事去纠缠维克托吧！维克托和克里格斯坦两人真是天壤之别啊！

如果维克托真的病得厉害，就会取消这次讲座。所以，他要卡特里娜去，是想见她（这是最好的设想了）；或者，他仅仅是希望有个人陪陪他而已。这些想法，合乎情理，使卡特里娜颇感安慰。在阳光明媚的高空中，卡特里娜飞了约一小时，她感到自己犹如画中人了。当飞到克利夫兰市东面，阳光消失了；这就是说，飞机开始下降了。又是一片黑暗。飞机下是伊利湖——一个露天的大粪池，这是卡特里娜从一个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嘴里听到的。这时，喷气式飞机正向阴沉沉的布法罗市滑下去，卡特里娜越来越焦躁不安了。要她来布法罗干吗？是因为他病了，老了，尽管他会名垂千古，还是因他去布法罗，是为了卡特里娜之故？确实，他来布法罗是为了会见卡特里娜。他出来不带助手（像亨利·穆尔或其他像维克托一样的名人，出外都带助手），是因为性爱需要保密，是因为艾尔弗雷德正在千方百计打听卡特里娜的行踪——艾尔弗雷德当然比卡特里娜精明狡猾，棋高一筹。

而这次竟败在卡特里娜手下，不禁使他狂怒万分。如果艾尔弗雷德胜诉，维克托就有责任照管卡特里娜了。可维克托会要她吗？当然，这种事是决不可能发生的。

在布法罗机场走下飞机后，卡特里娜先进了盥洗室。她对着镜子仔细打量了一下自己，发现脸上的粉涂得太厚，眼神焦虑不定，感到很不满意。她开始涂口红（艾尔弗雷德怒火冲天，而她竟还在涂口红）。她又把头发梳了一遍，就出了盥洗室，向贵宾休息室走去。

维克托乘飞机从来不坐头等舱——为什么要浪费金钱？他只是享用头等舱乘客享用的设备。他没有乘坐头等舱的那些大董事长的派头。他永远是个艺术家，只配坐飞机的后舱。由于他膝盖有毛病，所以总是与老幼病残者一起先上飞机。尽管他看上去身体还健康，但他总是要求坐在靠过道的位子上，因为他的腿不灵便。事实上，他老是要人家为他服务，好像他是个总统似的。不知什么原因，这一点使多萝西娅感到特别恼火。她说：“他把什么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次，他来到芝加哥的西北部——就是那一次要命的访问——借了一辆又旧又破的车子，连出五十元美金买个蓄电池都不肯，可每天他打电话请来一批批吃白食的人吵吵闹闹。他这个人，光在当代绘画界，就值上百万元美金。”其言下之意是“他算是什么东西”！

“我也不知道，”卡特里娜说，（当她固执己见时，眼睛就向下看；她表面上越顺从，内心反抗就越激烈。）“维克托是确实确实主张平等的。但就他来说，身有残疾，人家对他稍加照顾，也不为过。”

维克托在社交场合一出现，大家也确实为他让路：有人给他送上膝垫，有人则给他递上酒杯。他接过人家送上去的酒杯时，从不中断自己的谈话。即使他那些有钱的朋友，也竭力为他捧

场。给他派小汽车，给他租好高级套间（譬如，在像华道尔夫饭店<sup>①</sup>这类豪华的旅馆里），而他自己从不住高级旅馆。他本性是个老派的乡下人，在沙利文街租了一个房间供他写作：那儿是意大利人聚居区。他工作时，一边从面包盒里吃着意大利薰干酪和面包屑，一边从派热克斯玻璃杯<sup>②</sup>中喝着威士忌或咖啡，躺在床上（床单也许一年才换一次）苦思冥想，各种思想在他头脑里翻腾起伏；可以说，在这种时候，他的头脑犹如一系列高级反应室。重要的是思考。在他思考的时候，乌黑的眼睛在浓密的睫毛后闪闪发光；他那眉毛又粗又长，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其神态是不容置疑的，但还算和蔼。他眼睛向两颊伸展，形成一种奇特的角度——从各个方向看上去都是奇特的。他在沙利文街的寓所里，不需别人的照顾。他自己上街在意大利店铺里买意大利蒜味咸香肠和香烟，自己拿着物品走上三楼的房间——因为公寓里没有电梯，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这种时候，他是完全依靠自己的。要是外出，他就让人给他派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有一次，卡特里娜坐在装配着隔音玻璃的劳斯莱斯高级豪华的大轿车里，听维克托与亿万富翁伯林纳的谈话。（豪富伯林纳三十年代从纳粹德国逃亡到美国，随身携带着制造合成橡胶的专利证，后来买下了十多幅当代法国名画家马蒂斯<sup>③</sup>的作品）这一次，维克托与他的谈话是十分认真的；从七十六号大街到华盛顿广场的路上，卡特里娜一直仔细听着他们的谈话：从神圣罗马帝国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签订苏德和约时期的现代德国政治，超现实共产主义之真谛，基斯勒的建筑风格，汉斯·霍夫曼<sup>④</sup>的影响，自由民主

---

① 华道尔夫饭店：纽约最豪华的一家旅馆。

② 即硼硅酸玻璃杯，原是一种耐热玻璃的商标名。

③ 亨利·马蒂斯（1869～1954）：法国画家。

④ 汉斯·霍夫曼（1880～1966）：美籍德国画家。

派对艺术发展所规定的种种规范。还有其他两三个精彩的话题，卡特里娜已记不起来了。此外，还谈到了关于经济危机、冷战、形而上学和性学等问题。这位柏林犹太人的头长得像一只发酵的圆面包的面团，表面凹凸不平，四周粘着面粉，但他是聪明的、幸运的，他提的问题都恰到好处。这倒不是因为给维克托派了高级轿车，所以他就想讨好人家；这种事维克托是从来不做的。

多萝西娅想尽力找出最坏的字眼来形容维克托。她常说，“他是个塔蒂夫<sup>①</sup>。”

“你叫我包法利夫人，”卡特里娜说，“这两个人怎么能匹配呢？”

啊，多蒂！你获得了硕士学位，这是货真价实的，可现在你却只能兜售塑料袋。

这种看法往往会通过巧妙的措辞，从卡特里娜的嘴里脱口而出。她的嘴角上经常浮现出一种嘲弄的神情，好像在说，维克托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人物，她因为与他保持着特殊的亲密关系而感到骄傲。他能对她说知心话，而她知道他真正的想法。对此，他俩对外界都秘而不宣。在维克托愉快超脱的时刻，卡特里娜能与他呆在一起；人们（几乎绝大部分人）是不可能像维克托那样有超然物外的时刻的。在这有言论自由的国度里，维克托发表自己的意见。卡特里娜成了他惟一收下的学生，她付的学费就是使他愉快。

就他俩的关系而言，这至少是一种可能的解释吧。卡特里娜最喜欢的也是这种解释。

机场的走廊，两侧都是玻璃。走过这玻璃走廊时，卡特里娜望了望天空；天空阴沉得可怕，飞雪纷纷扬扬，飘落在机场的水泥地上。她的心也与天气一样阴郁。交通尚能维持正常，飞机一

<sup>①</sup> 塔蒂夫，法国17世纪喜剧作家莫里哀所作同名喜剧的主人公，伪君子。

架接一架地飞向机场，降落滑行在跑道上。天气是阴沉的，但自己的心绪不宁也不见得都是天气之故。何况，一进入贵宾休息室，天气好坏也就毫无影响了。贵宾休息室一般都设有套间，光线柔和，环境安静，是休息的好地方。饮料是免费的。这时，维克托一只脚正搁在咖啡桌上，手里拿着一杯酒；他的手杖丢在身边的沙发垫上。那杯威士忌的作用也许不大，因为他那件黄绿色的灯芯绒外套拉上了拉链，纽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的——他还怕冷。卡特里娜吻他时，一阵浓郁的卡伯查德牌香水味从她的衣服、围巾和喉头散发出来——连她自己也闻到了。然后他们互相凝视了一会儿，都想猜透对方的心思。她看不出维克托有什么病，他看上去没有病，身上也没有药味，这种药味在他上次生病期间，卡特里娜是闻惯了。至少他没病！这就不必担心害怕了，但他的情绪不好，这一点倒是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似乎又焦躁，又厌烦。她了解他那种沉默忧郁的火气。沙发边放着几件行李。那只军用帆布袋她是很熟悉的：布料又粗又厚，上面满是斑迹，里面可以装上一个管子工的全套工具。沙发边的角落里，还有另一样东西放在那儿。

好啦，你叫我来，我就来啦。是真的需要我吗？还是因为他今天脾气特别不好？

“准好赶到，”她边说边瞧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

“很好。”

“原来想做的事，只好以后再做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呃？”

“只是得与法院指定的精神病医生重新约个时间，另外，要是给艾尔弗雷德知道的话，又要惹出什么麻烦了。”

“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在他这样的年纪，还要那么做，”维克托说，“为什么你丈夫总是装作像个决斗士那样呢？为什么他的所作所为像是歌剧里的疯子一样呢？”

“是啊，维克托，你也知道，艾尔弗雷德是个非常自信的人；现在你成了他的情敌，这无疑大大地损伤了他的自尊心，他怎么能受得了呢？”

维克托这个人从不关心个人的烦恼，任何人的烦恼他都不感兴趣，包括他自己的在内。

“那旅行袋旁边的是什么东西？”

“先来杯威士忌再告诉你吧！”一般，维克托早上不喝酒。现在喝酒，说明他情绪不好，要想借酒浇愁哩！他一举手，侍者就看到了，马上把酒端上来。在古老的地中海沿岸国家或在亚洲，也许可以看到像维克托这样身材魁梧的人。他给人一种鹤立鸡群之感；同时，由于腿不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卡特里娜怎么也搞不清楚，他的腿到底是什么毛病。在开刀时，采用了导液法，在肌肉里穿了两个孔。有时，在穿孔的周围出现一些颗粒状的沉积物。后来，她也慢慢看惯了。维克托还就自己魁伟的身材开玩笑，说是他身躯太大了，不宜做给一般人做的精细的开刀手术。他老说自己是古代的一种巨象——猛犸象，说是他们没有把手术做好；他还提到，许多天才人物都是小个子。当然，这些只不过是说说罢了。他心里对他自己的模样是十分满意的。他根本不像猛犸象。在世界上，像他这样有风度的人，也是屈指可数的，而且，他自己也知道，他头脑反应非常灵敏。像维克托这样的一张脸，完全可以用做一本以古代世界为内容的书的封面：他的脸盘轮廓分明——额头、颧骨、狭长聪慧的眼睛，那老年人特有的眉毛，那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往往带有一种顽皮的意味。他的嘴也很大，胡子修剪得非常整齐。他讲起话来，整个脸盘就变得更宽大，使你感到他的意见是不容置疑的。他双颊绯红，好像化了妆的演员；即使在他病危期间，他的脸色照样十分红润。如果说他也会死，这似乎是造化的误会了。他的身材特别高大，真不知道他躺在一般人睡的病床上会多么难受。当他睁开眼睛时，眼

神里流露出一句话：“我快死了！”然后，不到几个月，他又忙碌起来了：吃啊，喝啊，写评论文章啊——照样忙得不亦乐乎。维克托·伍尔皮，一个坚毅不屈的人！即使他那一瘸一拐走路的样子，也表现出一种坚毅不屈的精神；他不像一般瘸子拖着那条瘸腿行走，而好像是要把挡在路上的障碍物一一踢开似的。维克托只尊敬那些有思想的人，因为，不管你自己是否意识到，人人都有思想，或高尚，或低卑，或聪明，或愚蠢。他的神态俨然像个什么君王——也许是犹太君王吧。不久，你就会发现在维克托身上，高下之别是多么的鲜明；他既不高贵，也不低卑。简而言之，他的鞋子已穿旧了，他的裤子穿得歪歪扭扭。

但第二杯威士忌下肚，他感到暖和起来了，就脱掉了灯芯绒外套，露出了他常穿的那种衬衫。那衬衫像保尔·克利<sup>①</sup>的画布——那些由绿色、红色、黄色、紫色的线条构成的图案，图案虽已褪色但仍非常好看。他那只大箱子是暖色的，可称得上是件艺术品。不管怎么说，他是艺术界的首领和权威，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甚至他的怪癖，也自然而然地染上一层权威的色彩。他既是国王，又是艺术家，还是个民主主义者，一直十分活跃。当然，他现在衰老了，但女人们竟然还在追求他。

喝过威士忌，他的嗓音洪亮起来，就开始谈话了。他说：“文萨莎说，她的几位老师竭力要她把父亲请来作个讲座，而实际上这主要是她自己的主意。然而，她却没有出席讲座，说要去演奏室内乐。”

“你有没有见到她的古巴男朋友？”

“我正要讲到他。他比其他人好多了。”

“这么说，不存在什么宗教问题喽？”

---

<sup>①</sup> 保尔·克利（1879～1940）：瑞士画家。他分析了作画的因素过程，提出构图的辩证论，显示线条、色彩、形式对感官的作用。

“曾经吵吵嚷嚷过一阵子，说要做拉比，要让她进希伯莱联合学院，后来她就不再谈这些事了。她的思想似乎是要在犹太人的神庙里当犹太人的头头——当犹太成人的头头，并且从讲坛上向他们大喊大叫。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堕落了，不仅会默许人家对他们叫骂，还要把自己挨骂的事到处吹嘘呢！现在，你骂人，挨骂者还会在报上登广告，说当众挨骂是自己进步的表现。”

“她现在爱上了那个古巴学生了。在卡斯特罗政权下，他们还信天主教吗？她给你安排了讲座，而那天晚上自己却去参加音乐会的演奏。”

“还不止这些呢，”维克托说，“他要我把她的小提琴拿到芝加哥去修理。这架小提琴倒颇为名贵，我得送到美术厅的贝因—富希公司去修理。可不能放在布法罗给修坏了。那是一把格瓦尔尼里斯<sup>①</sup>小提琴。”

“你们一起吃早饭了？”

“对。后来她就带我去男朋友家里。他是个阿基米德型的年轻人，是个奇才。他们一家是难民，可能是因为战争逃难出来的吧。说句公道话，古巴人送给我们的罪犯中，总有一两个天才……”

“你能肯定他是天才？”

“当然你不能光听我这么说。他获得四年的生理学奖学金，数目还相当可观呢！他的几个兄弟是餐馆里的打杂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就是尼莎与之交往的一家。他们的母亲身体不好。”

“后来她就把小提琴交给你——叫你给她跑腿？”

“我接受了这个差使，否则事情可能会更多。买这把小提琴

---

<sup>①</sup> 格瓦尔尼里斯是 17 至 18 世纪著名的制造小提琴的家族；格瓦尔尼里斯小提琴即指该家族的人制造的小提琴。

的时候，我付了不少钱；现在价钱可能涨了五倍了。我要让贝因—富希公司的人估估价，我怕尼莎心血来潮，把小提琴卖掉，然后和她的古巴男朋友私奔。谁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一起去贝因—富希公司。”

这下卡特里娜的事更多了。维克托把文萨莎支走了，以免遇到自己的女朋友包法利夫人。

“我们可以把小提琴放在座位下。我想，那位左翼学生出席了你的讲座了吧。”

“为什么不出席呢？那天听众多得很。十八世纪雾月政变对美国政治和美国社会的影响……第二帝国的闹剧。这些内容是十分适时的。”

“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美国人的胃口。”

“什么？难道比日本电子产品、德国汽车、法国烹饪更没有美国风味吗？难道比定居在堪萨斯州的老挝难民更富有异国情调吗？”

是的，她完全理解这一点，也理解这类题目自然符合维克托的胃口。因为他出生在纽约东头，是个流浪儿，所以对混血儿、移民和外籍美国人富有同情心，对女儿的男朋友是古巴人也毫不介意，他自己也那么富有异国风格——他那脸庞，他那希腊式的帽子也许还是台湾制造的呢！

维克托滔滔不绝地谈着。现在，他谈到他在旅馆里收到一位几年前相识的朋友给他的便条——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为此他很不高兴。“他用老朋友的口气说，阔别三十年后能再见，实在欣慰万分。他正好也在布法罗，是一个格林尼治村人——其实他们根本谈不上什么朋友关系，更不喜欢重温这种‘旧好’。不过，他已成了名人，这倒也是事实。”

“可以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吗？”

“拉里·兰格尔。最近，他的一部电影十分成功，叫作《克鲁

诺斯原动力》，是部像《二〇〇一年》和《星球大战》一类的科幻片。”

“是啊，”卡特里娜附和说，“就是那个兰格尔吧，《人民》杂志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人物特写文章。人们称他大器晚成。十年前他还在拍色情电影呢！真有意思！”她现在讲话措辞非常小心，因为旧金山的那次谈话使她大丢面子。直到现在，她还不敢肯定维克托是否原谅了她；那次，她硬要维克托去看电影喜剧片《陆军流动外科医院》。那一次卡特里娜的言行，一定在维克托的思想深处留下了一个污点。研究犯罪行为，情趣不高，维克托曾这么说过。“他一定非常有钱了。《人民》杂志中的那篇文章说，他那部电影总收入达四亿美元。他有没有来听你的演讲？”

“他便条上说，他事前已有个约会，所以要晚一些来，并希望演讲后一起喝杯酒。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可我没有给他打电话。”

“你怎么啦，累啦，还是不高兴？”

“过去，每次和他相处十分钟左右还可以——他就是那样的人，希望人家都重视他。这种人越认真，越使人讨厌。他是中西部人，到纽约大学学哲学。他去雪松酒吧间与画家们交往，又去赫德森大街与作家们交谈。我还记得他，记得很清楚，小个儿、诡诈、敏锐，但还算不落俗套。我想，他大概靠给连环画杂志写连载故事为生——像《巴克·罗杰斯》<sup>①</sup>啊、《蝙蝠人》<sup>②</sup>啊、《闪电戈登》<sup>③</sup>啊之类的科幻电影故事。他随身携带着草稿本，随时记下想到的故事情节。后来，我与他失去了联系，也不想再和他

---

① 《巴克·罗杰斯》：科学幻想电视连续剧中的主人公，1929年第一次出现于连环漫画中，故事为他一觉醒来已进入25世纪以后的情况。

② 《蝙蝠人》：美国40年代开始流行的连环画和广播节目，曾拍成电影和电视节目。因服饰动作都模仿蝙蝠，故名。

③ 《闪电戈登》：美国1939年以来流行的科幻连环图画和电影中的主人公。

联系——卡特里娜，董事协会给我发出了邀请，但我发现，有些情况使我感到不安。”

“什么情况？”

“我发现，有一个叫布鲁斯·贝德尔的家伙，是演说家委员会的主要顾问，正是他决定邀请我，并一定要通知我这件事是由他经手和安排的。他知道我不喜欢他，他是个卑劣的小人，是个大学英语系的教师，后来成了华盛顿政府里的文化官员。在尼克松执政初期，他对斯皮罗·阿格纽寄予极大的希望。他老是对我说，阿格纽一直在读一些严肃的、有价值的书，并经常向他借这类大部头的优秀经典著作。什么读书！你要看透贝德尔的思想，就得用直肠镜。我突然发现，今晚发表演说的人中也有他。这还不够，更奇怪的是，将要给我作介绍的人是路德维格·费尔舍。这名字本身对我来说倒没什么，但他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一九一七年之前，美国有一批俄国移民。俄国革命后，列宁利用了其中一些人为他服务——这种人像阿曼德·哈默；这个哈默就是利用和共产世界在政治上的关系大赚其钱，最后成了巨富。贝德尔把苏联列宁格勒的一所博物馆里的一些名画带出来卖，为布尔什维克筹款。杜维思和贝伦森公司对这些国宝标价极低。”贝伦林曾得罪过维克托本人，因此，他死后维克托都余愤难消。

“这么说来，你的伙伴不好，你不喜欢和他们一起发表演说？”

他用双手捧着大腿移动了一下位置，以便坐得更舒服些。坐好后，他说话更尖锐了。“以前，我也曾与卑鄙的小人在一起过，我尚能容忍。但要和现在这些家伙在一起，真太令人厌恶了！仅仅为了几千元美金，不值一提！我认识这个费尔舍。从格伯乌<sup>①</sup>到克格勃，他与美国资本家的关系是无懈可击的。他年事已高，

<sup>①</sup> 格伯乌：即 1922 至 1935 年间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简称。

容易气急，脸色绯红，看上去像个割不开的脓肿。不管什么人，只要有足够的钱，总统就会拥抱你。竞选中你出了钱，带着非官方的使命去莫斯科，回来后在白宫椭圆形总统办公室受到总统的拥抱。”

维克托确实烦恼不堪，因为他不得不与小人为伍。这就是他要卡特里娜来的原因，而不是因为发现自己有什么病变。

“我真不想见到贝德尔。他头脑里除了鱼泡泡什么也没有。他全身都散发着恶毒和阴谋。为什么这些大公司的老板那么愚蠢？”

卡特里娜设法让他谈下去。她穿着靴子的双腿盘了起来，脸上露出一副全神贯注倾听的神色；她手握拳头，下巴搁在拳头上。

“对这些人发起的演讲会，我只能对你直说，我感到讨厌。”他说。

“不过，维克托，你可以压倒他们，让他们尝尝你的厉害。”

当然，只要他高兴，他完全可以做到。尽管他也得花不少力气。但是，维克托不像当代那种神经过敏、胆小懦弱、纵容放任的知识分子。他毫不客气地疏远这种人。卡特里娜从两个主要方面来看待维克托。一方面，非常滑稽的是，维克托的形象，使她想起了卓别林无声片中的一个身材魁梧的坏家伙，这个坏蛋把街上的煤气路灯杆弯下来点燃自己的香烟，他那又宽又长的眉毛好像用油彩化妆过的；另一方面，维克托兴趣细腻，对事物能辨微辨味，对卡特里娜来说，是根本无法看出其间的细微差别的。自从他那次得病后，就常常说，他要积蓄精力，做一些真正重要的事情。那么，这些董事们对他来说是否重要呢？对他来说，他们一文不值。与蔡斯曼哈顿、世界银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对他来说不足挂齿，他曾这么说。他从不追求这些东西，而且，看来他们那些人也知道他的观点。他认为，不管东方、西方，在

上层领导中，没有什么人格可言。在世界各国中，超级大国有能力毁灭全人类，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的最高层领导人具有人应有的才能。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权力掌握在小丑手中，掌握在伪君子手中。对艺术的忽视、轻蔑和排斥，是他们堕落的主要原因。要是维克托被激怒起来，那些大董事长就会听到他谈论关于人生的价值的宏知卓见；这些见解又与他关于艺术的价值看法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现在，他病痛缠身，精力日衰，脾气乖张，这就是维克托其人。他甚至认为，他不该到这儿来。隆冬季节，他来布法罗机场干吗？他坐在这贵宾休息室里又干吗？去芝加哥干吗？像今天这样的日子里，他感到自己不是人们注目的中心，而只是陪衬而已，甚至感到有点黯然失色。有一些不佳心情应该绝对摆脱的，但他就是无法摆脱。他感到自己被一种莫名的恶势力所制约。

他说，“对兰格尔其人，我倒也还有一点好感。他是乐队的预备小提琴手，因为是个左撇子，他把他用的小提琴的弦线颠倒排列。那时，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专长也颇为重要。他才智不高，走了很长一段路，终于成了大获成功的科幻电影编导。”

侍者给卡特里娜端上了一小瓶迪尤尔酒。她倒入玻璃杯里，把杯子举到光亮处，看了看杯里的烈性酒，只见酒气蒸腾，烟雾缭绕。然后她说：“看看我给你打的材料吧，也许有用。”

“好，看一下吧！”

她戴上了老花眼镜。维克托倒不用戴眼镜。在某些方面，他根本不像个老年人。他身材魁伟，却举止优雅；他年愈七十，却充满活力。克里格斯坦也许说得不错，勤于思考的人不易衰老——这是卡特里娜的那位当警察的朋友不知从那儿听来的，也可能是从《论坛报》的“妇女问题”栏里看来的吧！他自己是决不会说出这种高明的见解的。

贵宾休息室的坐位是飞机坐，灯光从天花板上方斜射下来，

因此，维克托只好举起稿子就着灯光看起来：“老话重谈，”他说，“不期望有多大反响。‘为什么人们总是说事实比小说更离奇’——我是不是说过事实比小说更‘有力’？因为自由民主主义思想使人们形成一种淡薄的自我意识。不知是谁说的，他宁可向公众发表意见，尽管公共社会既粗野不堪，又充满缺陷，但他不愿向私人社团讲话，因为这些社团自以为是，固步自封。这种薄弱的自我意识只能写成蹩脚的小说，缺乏思想。那些职业社团（律师啊、医生啊、工程师啊等等）有集体的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虚假的‘标准’；这些虚假的‘标准’又成了他们的职业道德。个人的欺骗意识消失了。对他们来说，取得‘稳定’的第一步是取消个人的道德准则，因此，领导地位就可由那些伪君子获得。”

“你认为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伪君子吗？”

“你不认为这样吗？”

维克托看上去情绪很坏。两颊出现的红晕是由于愤怒，还有其他一些迹象也表明他正要大发脾气。他两眼瞪着卡特里娜的样子，好像又一次在审视她是否可信。这使卡特里娜感到羞辱，但她对他的疑虑表示同意，也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最好的办法是让他发泄，即使他肯定人家不会理解他，也最好让他把话讲完。他低下了头，好像一只公牛正在考虑是否用牛角向对方发动攻击，接着，他又讲开了。卡特里娜最喜欢听他讲一些挖苦人的刻薄话——譬如，他说某君的头脑，无异于脑壳里的一只鱼泡泡之类的话。要是他认真起来，就令人担忧了，此时此刻，他正十分认真。他对卡特里娜说，这份材料没什么用处。在有关马克思的讲演中，他说过同样的话，而且说得更好。马克思把个人的觉醒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当社会上各阶级发现自己不能在政治上发挥作用时，阶级斗争就暂时中止了，觉悟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觉醒、睡觉、梦幻，一切都难以区分了。

维克托是否还认为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卡特里娜很想知道。她对自己的轻率感到害怕，但使她更害怕的是沉默。“我问这个问题是因为你谈到了阶级斗争，也因为你认为那些共产国家都失败了。”

他说，在他青少年时期，他的思想受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训练，这种影响将是无法消除的——他现在怎么不会是马克思主义者呢？重读《雾月十八日政变》一书后，维克托深信，马克思预见到美国当前的情况。讲到这里，维克托的腿伸展开来，就像海军上将纳尔逊军舰上包着炮衣的大炮；在那纷乱的眉毛下，他的眼里闪烁着那特有的逼人光芒。他说，布法罗的演说与芝加哥的演说是有关联的。当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和专业工作者对物质利益失去兴趣时，他们可以说是走出了历史舞台；这时，非阶级利益就占了上风。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一种精神病状态；一个做戏的时代就开始了。巨大的革命变革为演员们平凡的表演所掩盖。丑角演员或拙劣演员统治了社会，或看起来他们好像统治了社会。表面上看来，这似乎是场喜剧，但其实质也地地道道的是场喜剧！

维克托是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因为他绝对与众不同。卡特里娜想到的是，与那些次要人物相比，维克托与他们有天壤之别。他自己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演员。在这场严肃谈话的间隙里，他看上去更像他自己本人，而不像正在舞台上演戏的演员。这样的谈话使他恢复了本性。这时，卡特里娜向他承认说，“我刚刚还为你担心呢，维克。”

“为什么？因为我叫你来！我对芝加哥那些家伙感到恼火，所以我把你叫来对你说说。我感到灰心失望，精疲力尽。”

卡特里娜知道了，维克托跟她谈的事，在其他场合下是绝不会说的，因为他太高傲了。他像个孩子。卡特里娜想，不仅我自己的孩子跟着自己。身为母亲，我好像是个机器人。是不是因为

做了母亲就不能再过性生活？她对维克托说，“我想，这阴沉沉的天气和长途旅行影响了你的情绪吧！”

噢，阴沉沉。维克托注视了卡特里娜一会儿，他知道“阴沉沉”对他来说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谈到自己感到“灰心失望”，但并不是说感到沮丧。他情绪不低，而是很高，高得异乎寻常，有失常的危险。他现在头脑特别清楚，这是他往往求之不得的；但他也要为此付出代价：越接近死亡，思想越清晰，犹如死亡来临前夕的回光返照。“我从不企望长生不老，但也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至于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呢？他也说不清。这种情况既明确无误，又模糊不清。在这种时候，卡特里娜给了他支持，给了他肉欲上的支持。卡特里娜，一个身材丰满的女人，正坐在他身边，肥大的屁股曲线分明。他身穿一件深绿色的毛线外套，黑色的靴子裹着她两条结实的大腿，撑得鸵鸟皮上斑斑驳驳的羽毛孔涨成了个个泡泡。对他来说，卡特里娜的身材体型充满着一种肉欲的魅力——那结实的背脊，那叉开的大腿。她那模样对维克托产生了一种淫荡的感觉——不知卡特里娜自己知道不知道？维克托没有对她说过这种感觉；这样，她就不知道她的那双手对自己的吸引力，尤其是她那手关节上的褶皱和她那手指尖——维克托暗自称之为刺激性欲的手指头。卡特里娜显然是他的爱神厄洛斯；对这个忧郁滑稽的女人，他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此他只得容忍她的许多愚蠢的言行，并竭力克服自己种种恼怒的情绪。她有时激怒得他几乎心脏病都要发作了，因此，他不禁自问，这值得吗？为什么不摆脱这笨女人？难道他没有更好的办法安度晚年吗？难道他运气已尽？他以前总是能掌握自己事业的命运。现在，他不相信命运安排的信念开始动摇了。开初，卡特里娜只是她的情妇，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只是逢场作戏而已。后来就更可笑了，因为，维克托从卡特里娜身上看出，自己被她激起的性欲，只是一种维多利亚式的性爱，加上一些莫名其妙的特

殊的吸引力。然后，发展到波德莱尔诗句中所描写的那样：

那熟悉的抚摩，  
使他起死回生……

只是维克托不相信现实生活中会发生这种奇迹。他不是因为病态而性欲特别强烈。他感到，他与这类异想天开的名堂毫无关系。卡特里娜确实有那种魅力，她的抚摩使他死而复生，但其中不存在什么巫术或者色情狂的作为。显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具有正常人所有的那种正常的性欲。这一点不管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都如此。他并不因为有这样正常的性欲而感到羞耻。卡特里娜能使他保持强烈的性欲；他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性生活，他不知该怎么办。因此，他乘飞机到处跑来跑去。他还不想死；他对死毫不在意，就像小狗在拖他的裤脚管时一样不在意。

谈到阴沉的严冬天气，他对卡特里娜说：“我怎么也暖和不起来。听说吃辣椒能使人暖和，因为能使毛细血管扩张。昨晚最糟了。我把脚浸在热水里，穿了两双袜子还感到冷。”

“这方面我可以帮忙。”

真神奇！女人竟有何等的力量啊！

“今天早晨，文萨莎——她怎么样？”

“啊，”他说，“这些孩子是想让你也为他们所服务的势力出力。老一代的人也正好愿与孩子们合作。那古巴青年的母亲感到困惑；这我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她的眼神似乎在说：‘你们这些人到底在干什么啊？’”

“噢，你见到了她！”

“当然见到了。今天早晨，我坐在她家的厨房里，那孩子当我们的翻译。这小青年智力非凡。他母亲说，她对文萨莎没什么意见。尼莎已使自己成了他们家庭的一员，她已取得了他们一家

的信任。她帮他们削马铃薯、洗锅子。她和男朋友从不上馆子，也不看电影，因为男朋友没钱，而男朋友又不愿意让她花钱。因此，他们整日整夜地学习；他俩都是优秀生。我女儿只是在胡来。她诱拐了他们一家的天才，他是他兄弟姊妹和妈妈的救世主。”

“她说她爱他；她那长长的眼睛是你遗传给她的，看起来来那样子和你一模一样。”

“她是个小巫婆。我发现，她竟然给她母亲性生活方面提出劝告，告诉她母亲一个‘摩登’妻子应怎样在性生活方面取悦丈夫，还说必须寻求新的性生活方法取悦于老头子丈夫。她还告诉贝拉有关同性恋的种种奥秘。她给她母亲一家商店的地址，去那儿可以读到一些性交前如何刺激性欲的片段，但这种书不必买。”

卡特里娜对此并不感到有什么奇怪，但她仍然醋劲大发。“你也让她那样玩过吗？”

“让贝拉那样玩我？除非我们大家都疯了！”

不，贝拉决不会那样的。只要想一想，你就会明白，贝拉是决不可能那样做的。她的言行举止表现出一个主妇的自豪感。她以红种印第安人的那种自尊心，维护着自己的威严。她是个忧郁的人（是维克托使她忧郁——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她像北美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酋长的妻子，或者像我们已提过的英国亨利三世的结发妻子凯瑟琳王后。那些女人，或穿着华丽，或衣饰朴素，但每个人的内在气质都不一样。贝拉沉默寡言，保持着一种惊人的自重。对这种高傲的人来说，要她按照性生活指南之类的书中所建议的方法行事是根本不可能的。然而，卡特里娜还是感到心中隐隐作痛。毫无尊严，恶欲邪念；要是贝拉一想到这些，也会感到有失尊严的。长期以来，贝拉受尽折磨。从根本上说，贝拉心胸开阔，这一点卡特里娜本人是深有体会的。

“这就是新一代人，”维克托说，“当你考虑到一些事实，你

就会得出结论，这些事实为人工流产提供了论据。我最小的孩子，是三个孩子中最撒野的！现在她已放弃学做拉比的计划，但看上去比以往更像个犹太人，两耳边扎着小发辫。”

奇怪的是，维克托毫无私人感情。他谈起妻子、父亲、孩子等这类问题，从来不会影响到自己的见解。在谈论自己女儿时，他可以不掺杂任何个人感情在泛泛而谈，就像他谈论其他任何问题一样。这倒不是他毫无慈爱之心，也不是一般的利己主义。卡特里娜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说清楚。

不管怎么说，她俩一起坐在贵宾休息室里。对卡特里娜来说，使他和自己呆在一起，是她最大的快乐。走在纽约的街道上，维克托常常会被认出来——不是被读者强留住作长谈，就是被画画的人所打扰（要知道，成千上万的人都会画画）。但是，在这偏僻的小城市里，卡特里娜认为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的。她错了。有一个人走进了休息室，那样子显然是在找人。要找的人也只能是维克托。她头一抬，给维克托打了个信号；维克托小心地转过头来，然后低声说，“就是他——那个给我留便条的人。”说这话时，维克托显得闷闷不乐。

“噢——噢！”

“这小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身上的那件大皮袄倒挺不差，一定是斯华慈设计的。”这么一说，他的脾气似乎好了一些。他微微一笑。

“那件皮袄一定很贵。”

那皮袄完全是为了摆阔，非常漂亮，可是穿在来人身上，一直拖到地，毫无风度可言。拉里·兰格尔身材瘦小细长，那光秃的脑袋长得出奇：那两侧灰白的头发，没有好好梳过，好像头发弄湿后在床上睡过了那样；一条又长又厚的白色丝围巾搭在皮袄

上，挂在身前，肮脏不堪；围巾下面，用一块从伍尔沃思百货公司<sup>①</sup>买来的红色印花大手帕打了个结。那白色的皮袄一定是他旅行时穿的外套，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南部，根本不必穿皮袄。他的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很瘦，皮绷得很紧——也许动过整容手术，消除了脸上的皱纹？卡特里娜沉思着。他那光秃的头皮上布满了斑点——这是因为在加利福尼亚长期日晒而生的。浓黑的眉毛弯得很好看；他的嘴很薄。看上去既显得有点腼腆，又非常机敏。

两人握手时，维克托说：“昨晚我没法到你那儿去。”

“我也想你不可能来。”

兰格尔拉过一只当代瑞典式椅子，没脱下白皮袄就坐了下来。不脱皮袄，大概是因为想缩小维克托和他自己身材的差别吧——一个魁伟高大，一个瘦小细长。

他说：“我想，那么多人围着你，你当然走不脱啦。加上那么晚了，你也一定疲惫不堪了。天气那么坏，来听你演讲的人还真不少啊！”

兰格尔也没有怠慢女人。他边说边打量着卡特里娜。他也许正在捉摸为什么维克托选中了这个女人。从前，往往有整班整班野心勃勃的女研究生追随着维克托。

卡特里娜很快对兰格尔产生了好感——一个精明的小个子；对卡特里娜，他没有摆出目中无人的神气；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对卡特里娜不友好。他只是渴望与维克托交谈；为了这次谈话，他已期待好久好久了；这是一次第一流的严肃的谈话。而维克托呢，身体不佳，情绪也不佳，当然想尽快摆脱他。

兰格尔快速地变换着话题，希望能尽快地找到维克托感兴趣

---

<sup>①</sup> 伍尔沃思百货公司：美国一家著名大百货公司，由原来的一角商店起家，售中下档商品。

的东西。他提到了古老的雪松酒吧间，也提到了第八街上的“艺术家俱乐部”；他谈到了巴齐奥茨，谈到了阿希尔·戈尔基<sup>①</sup>和他在联邦广场<sup>②</sup>上的寓所。他也说到了帕克·泰勒<sup>③</sup>及其论帕维尔·彻里丘<sup>④</sup>的著作——彻里丘又名伊迪丝·西特韦尔，她后来爱上了彻里丘（伍尔皮嘲弄伊迪丝·西特韦尔说，“丁丁当当的诗句，像套在马脖子上的铃”）。兰格尔哈哈大笑；从笑声中可以听出，他情绪颇为紧张。他那腼腆而又机敏的表情，使他看起来眯起了眼睛，甚至流露出一种嘲弄的神情。他竭力装出一副兴高采烈、讨人喜欢的样子，然而他又不知道如何讨好维克托。卡特里娜可以称得上讨好维克托的能手了，她完全可以指出兰格尔在那儿做得不得法。维克托的态度是，很少掩饰自己的不耐烦情绪。卡特里娜感到，此时此刻，维克托是过于严厉了。他应该给兰格尔一个机会。维克托感到，与兰格尔这样的人谈话，大大降低了自己的身份，因为他自己是个名人。

仔细一瞧，原本该洁白无疵的白皮袄，沾满了油渍和酒渍；他那丝围巾也肮脏不堪——这当然都是不应该的（只是因为他太有钱）！尽管如此，卡特里娜对兰格尔还是颇有好感。兰格尔也注意到让卡特里娜也参加谈话。如果他提到像恰罗蒙德或布雷德这些人的名字，他总是解释说：“他在同行中是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他是把德国现象学介绍到美国来的人。”

可是，维克托不想多谈这两位同乡。他问，“你来布法罗有何贵干？这种季节离开加利福尼亚不是见鬼吗？”

“拍一部关于精神病人的电影，”兰格尔回答说，“医院的精

---

① 阿希尔·戈尔基（1904～1948）：美国画家，生于亚美尼亚，抽象派表现主义的创始人。

② 联邦广场：在纽约市曼哈顿南部，左派活动的集中地。

③ 帕克·泰勒：不详。

④ 帕维尔·彻里丘：即伊迪丝·西特韦尔（1887～1969）英国女诗人。

神病医生常建议我拍部片子，表现那些精神病患者的狂想。在布法罗这儿，我见到了几个年轻的电子计算机迷——他们被送进了疯人院。”

“这倒是个新招，”维克托说，“不过，我说，你不必离开加利福尼亚。”

“你是说，最疯的疯子是在太平洋沿岸的各州，是吗？”

“噢，也许现在不是那样，”维克托说。接着，他发表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只有严肃的政治家才能使现实保持真实。在我们国家有一些地方，思想温和化的过程正在加速进行。加利福尼亚南部从一开始就是专门培养美国错误头脑的温床。在那儿产生的怪念头与他们生产的莴苣和橙子一样多。”

“对，我也这么看。”兰格尔说。

“至于知识分子起的作用嘛……是啊，我想，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与马萨诸塞没什么不同。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也正在演戏，‘他们’，我是指知识分子，他们不可能维持下去了。而且，他们毫无教养，连善恶都分不清。维斯帕西安<sup>①</sup>在征收粪便税时，也不得不说明理由，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有金钱不发臭。”

“说得对，现在的知识分子真可耻……。”

卡特里娜发现，兰格尔的眼睛呈现碘色，就连他的眼白也染上了碘的颜色。

“那些有地位的有钱人轻视知识分子。我是特别指那些给娱乐业提出建议的人，他们的建议加剧了公众的僵住症，或者说是歇斯底里症。”

兰格尔十分谦卑地接受了这种意见。他似乎自己独立思考了一番，并作了进一步考虑。“当然，那些银行……”他说，“像拍这样大部头片子，要花两百万元左右，他们大概能获得百分之三

---

<sup>①</sup> 维斯帕西安：(9~79) 罗马皇帝 (69~79)。

百的利润。谈到钱，我记起了杰克逊·波洛克<sup>①</sup>；他在东汉普顿的树丛中一边高速开吉普车，一边与车内的姑娘调情。要是他还活着，他是决不愿意靠政府发给的福利救济食品券过活的。他玩弄女人，玩弄艺术，玩弄死亡，最后成为大富翁。现在，他那些平庸的画能卖多少钱呢？”兰格尔说这些话时语气平和，因而没引起维克托的不快。“当然，那些投资者把我看成是一座金矿；他们讨厌我，我也厌恶他们。”他问卡特里娜，“昨晚你有没有听维克托的演说？四十年来我第一次像学生一样记笔记。”

卡特里娜不知道，此时此刻，维克托对兰格尔会有什么看法。如果他感到够了，就会站起来一走了之。那些想久久缠住他不放的人都无法拖住他。目前，他似乎不急于把来人打发走，对此，卡特里娜感到高兴，也感到兰格尔饶有趣味。她十分小心地转动了一下手腕上的手表，不露声色地撩起袖口看了看时间。不久，家里的两个孩子就要吃午饭了。沉默的珀尔，寡言的苏里。她给她这两个孩子讲过正在写的那个关于大象的故事，可是她俩毫无反应。只要她们有什么看法，也许就能启发她写完这个故事，可怎么也无法使她俩做出什么反应。甚至克里格斯坦中尉拿出手枪给她们看，她们也无动于衷。当克里格斯坦卷起裤腿，给两个小姑娘看绑在他那粗壮而又短小的腿上的手枪时，这使她俩十分困惑；另外，他有时戴假发，有时又不戴，这也使她俩感到不解。

维克托决定让兰格尔继续谈下去。如果他认为这种谈话纯粹是浪费时间，就会立即站起来，倒提着手杖，像马球运动员提了根马球棍那样；然后，一言不发，一走了之，像帕尔一样沉默，像花园里一样寡言。因为他喜欢与人交谈，他的这种做法就充分

---

<sup>①</sup> 杰克逊·波洛克 (1912~1966): 美国画家, 美国抽象表现派领袖, 50年代和60年代流行的光效应艺术运动的创始人。

表明了对谈话人的蔑视。“你昨晚的演说引起了我的深思。”兰格尔恭维说，“你关于路易·拿破仑及其乌合之众穷汉的精辟见解，尤其是这一切在当前的应用——你把这叫做‘无产阶级化的当代’。”他拿出了一本小小的笔记本，卡特里娜一眼就看出，这是加西<sup>①</sup>产品。他开始读自己记下来的笔记。“‘无产阶级化：人们被剥夺了以前称之为人性的一切品质。’”

兰格尔昨晚怎么样，那毫无关系。维克托正在使自己适应今天的活动。他挪动了一下身子，使自己坐的姿势不至于引起大腿的剧痛。自从去年动手术以来，他的肚子特别容易疼痛，容易发胀，容易积食；那些汗毛好像都倒竖起来，刺得他肌肉直痛。伤口四周的神经末梢犹如散乱的电线头。而兰格尔看起来则身体健康——年纪虽大却充满青春的活力，人虽瘦小筋骨却很不差，也许他是个吃素的人。维克托正在考虑兰格尔该属于哪一类人呢？介于古典思想（黑格尔）与报纸的滑稽漫画和字谜栏之间吧。这时，在他的头脑里，不由浮现出《卡曾贾马的孩子》<sup>②</sup>滑稽连环漫画中的那个快乐的无赖和船长这两个人的形象——那分明的色彩，那中国朱红色的条纹，以及片片绿色的森林。维克托坐在那儿听着，看上去庄重凛然，内心则心烦意乱。兰格尔眼睛红肿，也许昨晚他确实没有睡好。他脸上表现出一种讥讽、沉思而又饥渴的表情；他那白色的丝围巾，会使人想起勒断伊莎多拉头颈的围巾。他谈话的语气开始活跃起来。他读过《雾月十八日政变》，也可以证明自己确实读过这一本马克思著作。为什么法国革命采

---

① 加西：巴黎和纽约的一家著名意大利皮革店，以制造精美华贵的女用皮包、皮鞋著名。

② 《卡曾贾马的孩子》：美国画家鲁道夫·德克斯于1897年创作的滑稽连环漫画，后由哈罗德·尼尔从1912年起继续绘制，其中人物是金发的汉斯和黑发的弗里茨两兄弟。

取了罗马方式？所有的革命者都读过普罗泰克<sup>①</sup>的著作。马克思谈到，他们受到过“古代诗歌”的启示，“古代的传统像梦魇一样对活人的头脑产生着影响。”

“看来你下过苦功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他的著作真可算得上是杰作。”兰格尔不想生气。卡特里娜十分同情他。此刻他十分规矩。他说，“看看我能不能把你的想法连贯起来。目前，还是一场与历史传统负担的斗争。死亡与生命交接。你认为，当代先锋派希望摆脱传统的死亡和控制。艺术之为生命为艺术家提供活动的素材，艺术家再运用自己的想像创造出自己的世界，与古老的人文主义毫无继承关系。”

“啊，对！那又怎么样呢？”维克托问。

卡特里娜的印象是，兰格尔对自己感到满意。他感到自己的口才也还不差。“后来你又说，历史只是一场笑剧，一八一五年的那次所谓的革命，是今天骗人政治的序幕——政府由丑角式的人物控制着；他们利用大规模的娱乐技术手段来欺骗人民；他们编造虚假的人物，虚假的事件。”

卡特里娜开始为兰格尔担心起来，就挪动了一下身子，坐在沙发的边缘上。她感到维克托可能会马上站起身来就走，把这场谈话打断。“这样，你就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到处找精神病医生谈话，是吗？”她问。

她的插话并不受欢迎，但兰格尔还是非常客气地回答：“是的。”

“这倒是提供大众娱乐的一个新的途径，”维克托说，“把精神病患者也动员起来了。”

“怎么也不能不考虑这些人，”兰格尔说，只是稍稍有点儿拘谨。“在底特律，我碰到一个叫福克斯的人，他出版了一个叫达

---

<sup>①</sup> 普罗泰克 (46~125)：希腊散文家和传记作家。

阿米斯的作者写的纪实材料；此人有时也用鲍利辛斯基的名字。据说这位作者突然失踪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发现——这当然是一个危险的发现——我们这个行星被外星球的政权所控制着。这一切在福克斯先生的书中都能找到根据。外星人通过一种叫做‘机体、思维公司’输入了改变和控制人种的程序。他们是通过一个中央信息库来实施其控制的；许多最大的公司、银行界和政治界都已掌握在他们的手中。其代表人物中有戴维·洛克菲勒、斯通·韦伯斯特公司的惠特尼·斯通和阿科公司的罗伯特·安德逊。整个计划是想破坏我们的生命机制，然后撤离地球。人类将迁居到更合适的星球上去居住。”

“那地球会变得怎么样？”卡特里娜问。

“地球将成为地狱，不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地狱；‘机体、思维公司’准备放弃这个世界。鲍利辛斯基说，当这种以数量限定的长期的控制开始时，人类就会接受纯粹的人造智力，自然的头脑就会被科技的头脑所替代。”

“你认为，这可以拍部电影吗？”卡特里娜又问。

“如果他们在版权方面要价不太高的话，我也许会有兴趣。”

“那么，你将怎样来拯救我们呢？——我是指在电影中，你将设想用什么方法来拯救人类呢？”维克托问，“也许，马克思会给我们一些启示吧，你可以把马克思的学说与自然的头脑这样的问题联系起来思考。”

卡特里娜希望兰格尔能经受住维克托的追问；后者倒也毫不妥协。一味的敬畏不会有什么结果。要想听到维克托的高见，只有与他争辩才行。兰格尔回答说：“我忘了马克思是个多么伟大的作家啊！他的想像力又是多么丰富啊！罗马帝国的鬼魂包围了新时代的摇篮。资产阶级革命家像暴风雨般地席卷世界，节节胜利。‘人人都天天欣喜若狂。’每个人、每件事物都闪闪发光。”但是从往昔的诗句中鼓动起来的革命，终于以沉寂和郁闷结束。

真正的革命决不是模仿或演戏。那是现实的事件。”

“噢，好吧，”维克托说，“你急于和我谈你的看法。为什么不把你的看法完全说出来呢？”

“我的问题与阶级斗争有关，”兰格尔说，“即关于社会各阶级的命运。你认为，各阶级停止在社会上发生作用，引起了虚假的行为——说谎、欺骗、虚伪。这一切看来似乎真实无疑，但真正的现实是在幻象背后的那些看不见的扰乱。你把欧洲人关于阶级的概念，强加到美国人的头上了。”

卡特里娜想，啊，他竟想与这位大人物开玩笑。她担心维克托的感情会受到伤害。

“那你有何高见？”维克托问。

“噢，”兰格尔说，“我有位朋友，他说自然赐予人的灵魂，美国人的灵魂，已经被人造的灵魂所替代。因此，当人们想对任何事物作出判断时，不可能形成什么真实的看法。他们是以基本理论作为生活的准则的。他们制定了一套行为准则的体系。”

“这就是你的鲍利辛斯基的所谓人造智力吧！”维克托不无讥讽地说。

“这与鲍利辛斯基无关。鲍利辛斯基表达的观点在时间上晚多了。”

“你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加利福尼亚人？他是不是一个受下属崇敬的头头？”

“我真希望我们能有时间认认真真地谈谈，”兰格尔说。“你十分看重思想，维克托。这一点我记得。是啊，我从多方面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深信，大部分的思想是无关紧要的。真实的思想也是真实的印象。如果思想真实，现实也就真实，随之而引起的感情也是真实的。没有真实，思想就成为躯壳了……”

“噢，天哪！”维克托拿起手杖，卡特里娜担心，他会用手杖猛击兰格尔，并会使劲地猛打。还好，这事没有发生。维克托把

手杖向前面的地上一拄就站了起来。这站起来的动作颇为复杂。他先把身子向坐位前挪动，吃力地用膝关节支撑着身子，然后举起那条瘸腿，他的脸色绯红。记住（卡特里娜是记得的），他那伤残的腿时时刻刻在折磨着他。

卡特里娜边拿起行李袋和小提琴盒子，边解释说：“我们得去赶飞机。”

兰格尔凄然一笑，说：“是啊，航班时间不可更改，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维克托把帽子正了正，就向门口走去，腿尽管瘸，步子却迈得又大又有力。

到了休息室外，卡特里娜提醒他说：“我们还得等半小时呢！”

“开车出去遛遛。”

“他太令人扫兴了！”

“对，确实令人扫兴，他来到东部，就是为了要和我斗嘴。也许，他的朋友告诉他，他已有足够的本领来和我较量。他谈到帕克·泰勒和彻里丘时，无意中暴露了自己的意图。彻里丘攻击过我，这你也知道。彻里丘说，他对世界有他的想像，而我主张的抽象画，则像一个疯女人等待医生上门给她看病，就把粪便当化妆品拼命打扮一番——像是别人的情妇。兰格尔想用这种污辱来刺痛我。”

天气坏极了，狂暴的加拿大北风夹着飞雪，刮过边境。但是，乘客照常走上飞机。维克托是第一个。由于他的特殊需要，他在后舱占了个靠走道的坐位，这是理所当然的。卡特里娜走进幽暗的空机舱，心情不禁有点忧郁。天空灰沉沉的，使她感到不安。他们的坐位在飞机尾部靠近厕所的地方。她把小提琴放在上面的行李架上，把拉链行李袋放在坐位底下。维克托在自己的位

置上坐下，挪了挪身子，往后一躺就闭上了眼睛。他这个样子，不是太累了，就是想独自静静地思考一会儿。

机舱内人坐满了。尽管天气恶劣，但与大家在一起，卡特里娜稍感安慰，这些人的思想要现实得多，他们毫不怀疑。他们将从布法罗起飞，在芝加哥降落——一次平平常常的公务旅行。当然，他们的命运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但这只不过日常的旅行。和其他旅客一样，卡特里娜也完全知道这一些，可她总感到心神不定，不知怎么办才好；她无法集中思想，因而对自己的疑虑也感到莫名其妙。在某一方面，多蒂倒是千真万确的：卡特里娜只要有机会，就离家与维克托约会。维克托却与众不同，尽管他开始衰老了，随时可能离开尘世——他是活不了多久了。其他大部分人都显得黯淡无光。他们都显露出贫困的迹象，周围缺少空间和空气；作为人，他们一无所有，而维克托则放出明亮的光芒。奇怪的是，身材瘦小的兰格尔既自负又愚蠢；他竟然要与维克托严肃地交流思想。正如维克托所怀疑的，他是个骗子；他骄傲自大，令人作呕。但当他谈到“人人都天天欣喜若狂，”或“每个人、每件事物都闪闪发光”时，卡特里娜完全理解他的话。他说到时代的潮流一旦停止流动，世界就会更沉寂郁闷；这话卡特里娜更能理解。进一步说吧，她自己决不会发出闪光。但要是有人带动她，她就会参与其间并作出贡献。这种贡献是女性的、性爱的；这种贡献是重要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不会有什么创造性的贡献。在骗人方面，她倒是颇有创造性的。她努力想写好那个大象的故事，好充分显示自己的才智。但关于那次看电影《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事，她的自尊心深深受到了挫伤。电影院里的情况也给他带来了不幸。他们四周都坐着一些嬉皮士<sup>①</sup>，而且

---

<sup>①</sup> 60年代美国青年中出现的颓废派青年的称呼。他们对社会怀有某种不满，便以奇装异服、蓄长发、吸毒等来发泄。

年纪都不小了。坐在他们前排的那个人蓄着胡子，口中咂咂作声地吃着棒冰。他还站起来对着他俩大放其屁。维克托说：“这家伙吃的鱼子酱经过发酵后一并放出来了。”卡特里娜还没有明白过来，维克托已站起来说：“我不想再坐在这臭气熏天的地方了。”当他们走到街上时，看电影时受到的羞辱与震惊，以及旧金山的那些颓废派，使卡特里娜真想一头撞到从马克·霍普金斯山上开下来的电缆车上。

此时，她一手撑在额际，目光从维克托的身上移开；维克托凝视着窗外的机场。她能不能想出办法解决那该死的大象问题？让一个会催眠术的人把大象催眠。人们对大型的哺乳类动物的智力有新的发现。例如，鲸会互相唱歌，有人甚至认为它们还会做诗。鲸鱼还能用汽泡筑起围墙，把成千上万的虾围在其中。如果让一位古怪的动物学家去百货公司，也许会想出什么新花招吧？与此同时，那家百货公司的经理还得派人送来大量的饲料，那头大象每天拉下的粪便犹如一座金字塔那么高。那头大畜牲大为悲伤，掉下的泪珠大如杏桃。驭象人则要求运来大量的泥沙。如果不尽快让玛吉在泥沙中打滚洗个澡的话，她暴怒起来就会把整个五层楼破坏殆尽。阿贝克隆比—费奇公司<sup>①</sup>（不知他们是否还在芝加哥营业？）愿意派个专打大型野兽的猎人来。对他们来说，要是能一枪把大象打死，等于给他们做了个大广告。可是保护动物协会的会员就会大发雷霆。那么，让一个漂亮的女中学生出来解决这个大难题怎么样？如果这个女中学生是个中国姑娘又怎么样呢？在中国的神话和传说中，在远古时代，这个世界的主人是象，而不是人类。那么，此后该怎么办呢？

维克托也在动脑子，尽管说不上是在思考。他感到似乎有一种既轻柔又沉重的东西扩展到全身，好像照 X 光的技师把那件铅

<sup>①</sup> 系一家著名的体育、狩猎、旅行用品商店。

制围裙套到了自己的身上。他伸展一下自己沉重的身子，尽管他的体形看上去还是温文尔雅的；他感到好像刚从沉睡中醒来，连举起手臂的力气都没有。机场上，寒风凛冽，各种机械都停开了，其颜色比天空还灰暗；整个机场为白雪所覆盖，就像一座钢铸的雕像。这情景使他回忆起——噢，大约是一九一二年的下东城<sup>①</sup>。男孩子们（今天要是他们还活着，都已是年愈古稀的人了）读着基督教《旧约全书》的首五卷。街道、肮脏的人行道也正像一页希伯莱文的经书——你如果懂希伯莱文，就能翻译。雅各<sup>②</sup>躺在那儿梦见了天梯。看着上帝的天使沿着天梯上上下下。这并没有使维克托感到惊奇。那时他几岁了？大约六岁吧？对他来说，这不是梦。是雅各在做梦，维克托在读《圣经》。这不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这事就发生在现在。教室设在地下室，一扇狭狭的窗子正好对着人行道；向窗口上望去，勉强可以瞥见积雪下的太平梯，还可以瞥见挂在铁栅门上的中国洗衣店的金字招牌，以及爬上爬下的天使。这一切不必想像，而是恍恍惚惚地出现在眼前，犹如穿上了沉重而柔软的铅制围裙。这时，飞机开始起飞前的滑行；不久，“禁止吸烟”的信号就会灭掉。维克托本想抽支烟，可是他感到手臂沉重，懒得动一下。

他是不喜欢回忆的，尽管他回忆了；最近，回忆的次数越来越频繁了。现在，他记起来了，他母亲把一根大白鹅的气管放进荷兰烤锅，然后把锅子放在煤炉上。气管烤干后，母亲就给了他。他用父亲的折叠式剃刀在上面开了个洞，做成了一支哨子，但哨子一做好他就感到厌恶了。尽管气管烘干了，但仍然呈可怕

---

① 指纽约市曼哈顿区沿东河南端一带，是纽约市的外来贫苦移民集中的地区。

② 雅各，基督教《圣经》中的人名；雅各有好几个，其中一个是犹太人的祖先之一，即以以色列。此处即指梦见天梯的以色列。

的血红色；管子摸上去很粗糙，吹起来嘴里留下一股难受的味道。这决不是马克思关于历史的梦魇，即人类必须从历史中解放出来。那生家禽的味道实在令人作呕。但在太平梯上爬上爬下的天使却十分可爱；他感到他们的存在是十分现实的，尽管这是四千多年前的事了。这些事发生在很久以前的遥远的地方，但维克托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包罗万象的光明照亮了每个人，其中有父母、父母的前辈、天使、上帝——还有你自己。维克托不想追根究底，他只是在恍惚中感觉到这一切，也许是由于疲劳和伤残的缘故吧。他也自然而然地想到了马萨诸塞州医院；在那儿，医生在他血淋淋的肚子里切掉了一个瘤。他也提醒自己尚在病后恢复期——还提醒自己，波德莱尔认为，艺术家的精神状态，一直像在健康恢复期中的病人。（今天实在是波德莱尔的日子，不久前，正是那抚爱使人起死回生）刚从死亡的阴影中逃脱出来，这个在健康恢复期的病人愉快地坐在飞机上，感受到了人类生命的气息。污染有什么关系！一个病后正在康复的人的精神状态，犹如一个孩子，对一切都感兴趣。天才必须以创造性的意愿，回复到孩提时期的聪明才智。对这一切，维克托了如指掌。把成人的分析能力和儿童的幻想结合起来，就会有新的发现。基督教《圣约·新约》中的《启示录》暗示了上帝的孩子犹太人要坚持不懈地以成熟的智慧，决心实现上帝对成人神圣的诺言。这使他们招恨于世人。他们往往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阐明。

但现在，我们假定，他并不是在病后恢复期，而是在其他状态下。医生必须定期给他检查身体，不是因为他正在健康恢复期，而是因为他变得越来越衰弱，乃至一蹶不振。正在这个时候，卡特里娜闯了进来。她的抚爱使他起死回生，并把他本来正在日益衰竭的精力重新集中起来，组织起来。他扪心自问：她能刺激我的性欲，是不是因为我爱她？或者仅仅是因为她那样的女

人正好能引起我的性欲？他并不喜欢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但他有许多许多的感触，有许多许多冬天的回忆——在这以前，他度过了七十个冬天。冬天的大地给他带来一种声音；这种声音不是能用耳朵听到的，而必须用其他感官去感受，而这又是不可言传的，实际上也是不值得言传的。这只是每个人生命延续的一部分。人人都充满想像，这些想像在平时被压抑下来了，很难浮现出来。但一旦你病了，就很难驱散这些想像。

“告诉你吧，维克托，飞机已升空了，我也放心了。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回芝加哥。”飞机倾斜着飞行，可以瞥见右侧倾斜的伊利湖绿色的水面，然后就上升飞进深灰色的雪云中去了。飞机颠簸得十分厉害。顶头风十分强烈。“我有没有跟你谈起过我家里那女佣人的丈夫？他是个黑人，年纪很大了，但却长得相当英俊。以前他曾在餐厅里做过侍者。现在他爱赌博。他那模样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伊索尔很怕他。”

“干吗谈他？”

“我不知能否与他谈谈伊索尔。如果她受了艾尔弗雷德的贿赂，如果她在法庭上作不利于我的见证，那问题就麻烦了。艾尔弗雷德的律师会提出伊索尔曾抚养过我，她对我的底细了解得一清二楚。”

“难道她真的要和你过不去吗？”

“噢，她老是疯疯癫癫的。以前她常常说自己是巫婆。她厉害得很，老是给我惹麻烦。”

“不知为什么飞机飞得这么低。现在早该飞在云层上面了。”维克托说。

飞机在广阔无垠的云层上空飞了约十五分钟。然后又坠入了黑暗之中。“是啊，怎么会飞得这么低呢？”卡特里娜附和说。“这是怎么搞的？”

机舱里，系上安全带的信号又亮了。乘务员宣布：“由于天

气情况恶劣，芝加哥国际机场暂时关闭。五分钟后我们将在底特律临时着陆。”

“我可不能呆在底特律啊！”卡特里娜说。

“放心，卡特里娜。现在，芝加哥时间还不到一点。我们在这里稍作停留，马上又会起飞的。”

突然，飞机下方出现了机场——仓库、飞机库、高速公路以及湖面。飞机速度开始减缓，卡特里娜经常从地面上看到飞机着陆的情景：波音客机底下的肚子打了开来，放下了直立起落架。维克托叫住了一位航空小姐。她对他们说，“芝加哥天气坏极了，下着暴风雪。”

他们一下飞机，就发现有一大批旅客因班机停飞而滞留在那儿。只要一混入滞留的旅客群中，你就会担心无法摆脱了。幸运的是，维克托没有显出忧虑忡忡的样子。他一瘸一拐地大步向前走着。他的眉毛犹如长老树干上突出而扁平的蘑菇。此时的卡特里娜却显得十分紧张。机场里的各种标牌对她来说毫无意义。“行李提取处”：他们无行李可提取。她手里提着文萨莎的宝贝小提琴。“出口处”：维克托一瘸一拐一直向出口处走去干吗？“那儿该有问讯处。”

“不，从他们这儿你问不出什么消息。”维克托说，“我们也无法去打电话。已有十多个人排队等在那儿了。找个座位坐下来再说吧！”

他们缓慢地向前移动着。从门口吹进来的冷风和从鼓风机里吹来出的热风，轮番扑向他俩的腿部和脸上。他们只找到一个座位，维克托径自坐了下来。面临不测事故，或原订计划受到干扰，维克托总是镇定自若，并希望卡特里娜也能像他一样沉着冷静。贝拉似乎已学会保持安定的情绪了，但卡特里娜还没有学会这样做。维克托把手搁在旅行袋上，把小提琴盒子夹在两腿之间，然后又把手杖在自己前面一插。这样，来来往往的人就不会

再碰着他。

卡特里娜想去打听打听消息。她碰到一个穿蓝灰色制服的人，看上去像个飞机上的机械师。他身子斜靠在墙上，双臂交叉在胸前。卡特里娜注意到，他那双黑皮鞋擦得闪闪发光，而且脸上气色极好。她想，他也许能告诉她点什么消息吧。她刚开口说“对不起”，这家伙竟掉过头去，看都不看卡特里娜一眼，但卡特里娜还是接着说：“请问哪儿能打听到点消息？我的班机被迫在这儿着陆了。”

“我怎么知道！”

“既然你穿着制服，我想……”

他伸手在卡特里娜胸前一推。“你想干什么？”卡特里娜叫起来。她感到眼泪快要流出来了，眼睛也开始模糊起来，并感到一阵刺痛。“你这是怎么啦？”但更糟的是，那家伙盯着卡特里娜的脸，也不向下看一下，竟一脚踩在卡特里娜的脚背上。他这么做倒不是因为生气之故；看来完全不是因为发怒，而是另一种强烈的情绪所致。她想看清楚别在那人胸前的姓名卡，但还来不及辨认清楚，那人就走开了。卡特里娜想，我现在竟落到如此地步，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伤害我，并一走了之。好像我不该离开埃文斯顿似的，而这一切别人也似乎一目了然似的。也许，那家伙是个穿着制服的厌婚者或精神变态者吧！她肚里不禁升起一股痛楚的怒火，几乎使人昏厥；这股怒火一直升至胸口，穿过喉头，直至脸颊。尽管她的感情受到了极度的伤害，她还是想，也许由于她自己对那人的职业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吧，因而使他怒火中烧，好像没有把他当机械师看待，而只是把他当机舱里的侍者看待了吧；也可能他正好满肚子怨气，有人碰上他，正好让他借机发泄一通。如果维克托在场，一定会用手杖向他头上猛击下去。不管有病没病，维克托的头脑一直是十分清醒的。

卡特里娜排在问讯的队伍里。尽量不去想刚才不愉快的遭

遇，并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从那人穿着整齐的样子看，也许出生在郊区一个相当不错的家庭，过着尚算舒适的生活——维克托在高谈阔论时，称这种人为“普普通通的动物人”；用他喜欢的一个作家的话来说“是一些充满欺诈的、不可捉摸的人”。维克托就是喜欢这种富于刺激性的话。还好她穿着驼鸟皮靴；否则，她的脚指头都可能给踩断了。

轮到卡特里娜了，但写字台后面的女人却提供不了多少消息。只要芝加哥国际机场一开放，马上就会宣布新的航次。“那时，大家都要抢着买机票了。我是否可以先买两张一等舱的机票？”卡特里娜问。

“我无法预售机票。计算机没有提供任何情况，我再按键盘也没有用。”

“不过，我还是想先买两张一等舱的机票。我有信用卡。如果没有班机再退票也可以。”

她从旁边走近维克托，发现他戴着鸭舌帽，看上去十分愉快——静静地、呆呆地坐在那儿出神。只是下半部的脸上，已呈现出年迈的痕迹：下巴凹进去了，两侧却凸出来了。从侧面看去，年龄的痕迹更为明显，更令人忧虑感伤。卡特里娜没有意识到自己难看的脸色，重新涂过口红的双唇，以及走路时胸部起伏的样子，都表现出颓丧的情绪。维克托的境况，拥挤不堪的人群，刚才那穿制服的人对她所表现出来的轻蔑并踩了她一脚，以及担心自己会被耽搁在底特律——凡此种种，都使她情绪低落。但从正面看维克托，却依然“容光焕发”。然而，她已无法从维克托身上获得多少力量了。即使在这底特律，也有不少伍尔皮迷。要是他们知道他在这儿，公路上就会出现长长的车队，风驰电掣般地开向机场。他们这些人当然比卡特里娜更能理解维克托的思想——她却只会死死缠住他去看《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电影。这些从城里来的伍尔皮迷，就会谈啊，唱啊，还会把他接到自己的

家里。而她自己呢？只能回到自己原来的地位——一个埃文斯顿出生的女人，尽管处境恶劣，却无能为力，迟钝呆笨，头脑中缺乏创造细胞。

很少见到维克托会慌乱一团。他总是十分平静——什么也打不了他。“你饿了吗？我饿了。”维克托说。

“我想，我们该吃点东西了。”

“我看去找个快餐店吧。”

“光吃个汉堡包怕不够吧。”

“……吃太多了，今晚的宴会就吃不下东西了。”他说。

他们开始穿越中央大厅。在平时，维克托走起路来也还可以。尽管有残疾，但他从不为此烦恼。但今天这儿人太挤，确实令人感到有点畏惧。加上行李车、清道夫、轮椅等，东碰西撞的。行动大为不便。不多一会儿，卡特里娜就说：“我们这样走到什么时候去。现在，芝加哥时间已一点多了。”

维克托说：“我倒不怕。你的老佣人在家，还有你妹妹，你那个当警察的朋友。”

“我姊姊其实并不怎么同情我。”

“你常说她好挑剔。不过，她总不见得看着你倒霉吧！”

“即使她处境最坏的时候，我也一直帮她的忙。去年夏天，她拿了一把铲子开车出去，说是去墓地要把她的丈夫挖出来。她说，她就是想再看他一眼。我把她拖到园子里，用酒灌醉了她。而她却说，正当她在医院动手术时，我却去波士顿和你约会，让她一个人受苦。她割掉了一个子宫瘤。”

维克托听了这话，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卡特里娜在诉说时，他还不时地点着头——伤心的妻子，歇斯底里的妹妹。读读描写这类事情的书，也是颇有兴趣的；当然，如果书写得不错的话。但听人家讲这类事情，却兴味索然。卡特里娜无法表达当时自己把妹妹灌醉后的心情——多蒂的脸上淌着汗珠，又湿又热。脚下

的泥土使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坟墓。想像一下吧：多蒂挥动她那骨瘦如柴的双臂，在挖坟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幅图画啊！只要挖上几分钟，她就会昏倒过去。

维克托脑子里想的尽是历史的镜头：从华沙恩克拉帕拉兹被送到纳粹死亡营去的充满罪恶和斗争的历程，从西贡撤退的可怕景象；他当然不难想像多蒂挖掘她丈夫尸体的情景，但什么时候才会去想像这类情景呢？那就很难说了。维克托曾在文章中写过，“非人道主人”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特征；他也曾写过当代人的懦弱、卑劣和醉生梦死，以及这一切对艺术、对政治的影响。他的名声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派作家们的极端主义分析的基础之上的。他是名画家和名作家的导师。卡特里娜曾钻研过他的那些杰作；然而，你看，她得和他个人打交道。而作为私人朋友，他与她谈得更多的是对艺术的看法：艺术是对思想空虚的一种补偿，是对现代派赤裸裸思想的掩饰。关于怎样缩小他俩私人之间的差距和缺陷，他却谈得不多。但即使谈到这些，维克托也不乏惊人之语，他常常妙语连篇。

“你怎么走路只着力在左脚上，靴子太紧吗？”

“有人踩了我一脚。”

“你撞了什么人了？”

“我向一个金头发的小伙子打听消息，他却冲着我走来，一脚踩在我脚上。”

维克托停住了脚步，低下头来居高临下地审视了她一眼。  
“你为什么不抓住他？”

“他走远了。”

“越来越多的疯狂行为冲着你来了。一切变得多厉害啊！在泰坦尼克号沉没时，首先抢救的是妇女和儿童。中产阶级的骑士

风度，与比德米亚<sup>①</sup>一起消失了。”

“伤倒是没有伤，只是有些痛罢了。噢，维克，看我们为吃点东西浪费了多少时间！我们就这么耽搁在这儿吗？”

“我想打个电话给今晚主持演讲会的人。让我找找放在皮夹里的电话号码。”他把手杖往肩上一挂，从屁股裤袋里拿出一只军用钱夹。“对了，大陆银行。霍勒斯·金斯莱克。为什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呢？如果他今天晚上要我去演讲，他得设法把我们从这儿弄出去。你给他挂个电话吧，卡特里娜，好吗？”

“你要我和他谈？”

“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与联合航空公司或美洲航空公司的头头们一定有联系。我想，你带着电话信用卡吧？”

“我带了。”卡特里娜回答说。

“机场的电话通讯设施是不错的，就是在纽约市曼哈顿的中央火车站，也有总机值班人员。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电话。”他们刚开始向前走，维克托突然又拉住了卡特里娜，说：“看我们的那个伙伴兰格尔又来了。”

“他一定看到我们了。你太引人注目了。”

“他看到我们又怎么样？……他说过，他要来底特律，是吗？”

“当你走开时，我感到很尴尬。”卡特里娜说。

“他不该到机场休息室来找我。”

“应该这么说，他从加利福尼亚不远千里，特地来听你演讲，找你谈话的。”

“我看，他是来和我算老账的！现在这个时代，现实也如梦幻，”维克托说，“正如法国人说的：‘大白天见鬼了。’”

---

<sup>①</sup> 比德米亚：德国作家卢德韦格·埃奇罗特幽默诗中的一个人物名；现指艺术中的庸俗气味与中产阶级过分的依从俗例的行为。

“你把金斯莱克的名片给我吧！”

奇怪的是，维克托没有想要回避兰格尔，而兰格尔呢，当他发现了维克托他俩在中央大厅时，高兴无比——这也出乎卡特里娜意料之外。按理说，他因刚才受到维克托的怠慢，本该有点儿不高兴的。可是，他一点也没有生气的样子。尽管他仍显得有点腼腆，但还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你没有说你也要到底特律来啊！”

“我们本来不想来这儿。我们是去芝加哥的，因为天气不好给耽搁在这儿了。”

“噢，那你们只好在这儿等了。既然这样，何不和我一起去吃午饭？”

“那当然很好，”卡特里娜说，“不过，我们得马上去打个电话。事情很急。”

“到饭馆去打更方便。我刚才路过一家供应烤肉的酒吧间，那里看上去还不错。”

那酒吧间又大又暗，天花板垂得低低的，装饰颇有英国都德王朝的风味。侍女一出现，卡特里娜就看到兰格尔向她手里塞了一张好像是十元的美钞。为什么他不能大手大脚地花钱呢？要知道，拍摄《克鲁诺斯原动力》一部片子，就给他净赚了四亿美元呢！他们立刻被带进放有皮坐椅的沙发椅上。“喝酒吗？”兰格尔问，“先订饭菜，再打电话，好吗？”然后他对侍女说：“小姐，请让这位女士用一下你们的电话。你想要点什么吃的，亲爱的？”

“一客火鸡夹肉面包，要烤面包片夹鸡脯肉的。”

“橘汁鸭，”维克托说。在这样幽暗的餐厅里，吃什么都不清楚。要卡特里娜给他点菜的话，她一定会要一份简单一点的饭菜。琥珀色的灯光从上面射下来，照在兰格尔的头上和他穿着的那件白色的厚毛皮袄上。

“最好指名要他本人听电话。”维克托对卡特里娜建议说。

维克托建议对了。霍勒斯·金斯莱克这个人真难找。电话转来转去转了好几次。最后才听到对方说“金斯莱克”；卡特里娜从对方的声音中马上听出，这是一位机敏的经理人员。由于受了维克托的影响，卡特里娜对那些温文尔雅的董事先生们也抱有轻蔑之感。当然，即使对方的客气并不十分真诚，但能与这样的人谈话还是颇感安慰的。“怎么，给耽搁在底特律了？这可不行，是吗？已经到了两百来人了，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要是伍尔皮……那就太糟了。我真有点担心，也非常抱歉。有没有早一点的班机？”到最后关头还节外生枝，他心里也许正诅咒着维克托呢！

“芝加哥天气真的那么坏吗？”卡特里娜想问清真实情况，以证实自己不幸的预感。

金斯莱克先生是在餐厅的雅座里接到卡特里娜的电话的；一个高级董事，整天呆在第七十层楼上的办公室里，怎么会知道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呢？他听到过一些报道，说天气异常，有暴风雪。“不管怎么样，我们会设法让伍尔皮到这儿来的。我把王牌驾驶员找来。半小时左右听回音。”

“我们在底特律这儿的电话号码是……芝加哥国际机场今天关闭了吗？”

“还有米德威机场和梅格机场呢！”

卡特里娜心里定了一半，就回到了皮沙发雅座。她这样地位的女人，冒了风险，不顾一切后果和维克托交往——做这个大人物的情妇；但当她从侧面端详了维克托之后（那是在那个飞机机械师踩了她一脚之后，她真想哭出声来，但又压抑在心头），对他自从与自己相识以来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才有了新的认识。

维克托畅饮了两杯酒之后，精神显然好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只大口厚玻璃杯——这已经是第三杯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只要有吃有喝，再加上一个可以休息的雅座，精神就来了。他完全可以自己把卡特里娜带到这儿来，自己给侍女塞张十元的美钞，

并用这酒吧间里的电话。但，他是决不会干这种事的。他如果这样做，等于牺牲了原则。所以，碰上兰格尔他感到很高兴。兰格尔使他十分兴奋。他要了一客橘汁鸭，真有点够他呛的。其实，他需要有个随从。有个助手，才能满足他的虚荣心。另外，还得有人给他付账。卡特里娜承认，这一切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卡特里娜把打电话的事说了一遍，维克托说：“好啦，我们可以放心了，等他回电吧！关于今天晚上的安排，我会自己跟他谈的。坐下吧，小亲亲，喝杯酒。”卡特里娜靠墙角在他身边坐了下来。文萨莎的小提琴竖放在他俩的背后。当时，卡特里娜对兰格尔是十分感激的，因为，她需要有人一起和她帮助维克托。她感到维克托的情绪忽高忽低，有点儿失常。《今日心理学》杂志经常用到的一个术语叫“变态心理”。维克托就有变态心理。今天兰格尔陪他，他感到高兴。他好像忘记了自己对彻里丘那些尖利刻薄的嘲讽。卡特里娜想，兰格尔也许从未听到过维克托对彻里丘的讽刺。当然，在维克托看来，兰格尔拍摄的那类电影，对美国人，以至对国际社会的精神生活都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但，此时此刻，他们并没有在谈论兰格尔的电影。他们显然正在谈论春宫电影，因为，卡特里娜正好听到兰格尔在说，他本人没有干过这个行当。“拍摄这类电影，不需要电影脚本。”

“真的不需要吗？”维克托问，“只要让两个不同种族的男女进行性交就行了？”

“请您叫侍女给我来杯红玛丽酒<sup>①</sup>好吗？”卡特里娜说。

“当然可以，”兰格尔说，“我来给你介绍一下我离开格林尼治村后的写作生涯。我做过各种各样的写作工作。最有意思的一次是，我和一伙在得克萨斯州的人合作，写出了约翰逊总统的回

---

<sup>①</sup> 一种借用英国玛丽女王（1516~1558）的绰号的混合酒；成分主要是伏特加掺西红柿汁，再兑上一些柠檬汁。

忆录。”

“你怎么会干起这个来？”卡特里娜好奇地问。

“在一次粮食面包会议上，我碰到了几位华盛顿的记者，还有罗伯特·弗罗斯特<sup>①</sup>以及几位哈佛大学的先生。迪克·古德温推荐了我。这样，我就在奥斯汀参加了约翰逊的写作班子。那时，约翰逊已退休了。”

“你们怎么写的——就是那本回忆录？”维克托问。

“开始是上洗脑筋课。我们经常集中在奥斯汀的联邦大厦的顶层；这座大厦还是由约翰逊总统在任期末建造的。在大厦里，他有自己的套间，他从自己的农场坐直升飞机来，飞机停在屋顶上，然后他走下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一天。他把他对每一个事件的经过和观点，反复向我们叙述和说明，直至他的谈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子里为止。你会碰到这类神话创作家，他们用不断重复的手法把你催眠，然后，你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他们的说法。罗伯特·弗罗斯特也是向我们灌输约翰逊观点的人之一。谈话的是他们这些人；他们反反复复地谈，直到你无法接受其他的叙述和观点。约翰逊也把我们带到他的农场上去。我们坐在他的林肯牌轿车里，驶过片片牧场。他的保卫人员则坐在另一辆林肯牌轿车中，跟在后面。当他要喝酒时，就把车窗放下；保卫人员的座车就从后面赶上来，和我们的车并驾齐驱，并给他斟上一杯威士忌。我们绝大部分人都被他慑服了——像我这样的人是很容易被吓住的，维克托，而不像你那么不易驯服。”

“噢，我也遇到过这类事。有一次，在贝伦森的别墅里，那位著名的妈妈出场了。我从小就受教育，要尊敬老年人，尽管我在文化界也颇负盛名，但我并不在意。”

---

<sup>①</sup> 罗伯特·李·弗罗斯特（1875~1963）：美国诗人，专门写关于新英格兰的农村生活情景。

“有句拉丁话说……”卡特里娜提醒他说。

“是 *lacrimae rerum* 吧，哇！要是拍拍庇护人的马屁就成的话，那狗娘养的会流下不少眼泪呢！后来，他又说，他知道我在纽约艺术界颇有声望。而我说，把我说成艺术家，犹如把施洗者约翰叫做水疗法医生。我曾想把讨论的话题转到当代绘画上来；当然，我一直没有成功。”

这是一次友好的闲聊。现在已两点半了，中午时，卡特里娜还担心维克托会把手杖向兰格尔的头上猛击下去，因为后者说了“大部分思想都是无关紧要的”这句话，而现在，他俩却谈得多么融洽啊！

“你的意思是，你不会是像施洗者约翰那样的人吧？”兰格尔问。

“不，要我找庇护人的话，除非我疯了！”

此时此刻，维克托正令人喜欢。“大部分人都知道怎样使人高兴，”维克托曾对卡特里娜这么说过。“即使粗暴的人，也自有其令人喜欢的地方。有些人永远让人喜欢，像弗兰克林·罗斯福；有些人总是令人扫兴，像斯大林。当总是让人喜欢的人和总是令人扫兴的人在雅尔塔会晤时，总是令人扫兴的人轻而易举地获胜了。”在内心深处，维克托不喜欢讨人喜欢。风格，对了，风格才是根本的。要讨人喜欢，就不可能有清晰的思想。现在，维克托谈吐可人，开着施洗者约翰的玩笑，那是因为他怕兰格尔又要拿出那本加西公司生产的高级记事本，再谈到《雾月十八日政变》的话题。

显然，兰格尔的目的是想继续那次认真的谈话，并想把话题深入下去。正是想与维克托作一次认真的交谈，他才从洛杉矶出发，横越美洲大陆，来到布法罗。卡特里娜开始发现，兰格尔这人真有点坚持不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他能赚上亿美元，也不是偶然的。在维克托面前，他似乎显得“受宠若惊”，

但他还是谈自己的看法，并坚持自己的看法。在过去，不，即使是现在，维克托不屑与他为伍——完全没有把他看做一流的人物——但兰格尔决心提高自己在维克托眼里的形象。他认为，自己也完全当之无愧。当然，这只是卡特里娜的看法。这位穿着北极狐皮大衣的人，既腼腆又聪明，终于使维克托和自己长谈了一番。但维克托的健康已日益不佳了，这一点兰格尔当然是不知道的，因为，维克托的言谈举止，依然果断有力，尤其是几杯威士忌酒下肚后，又像一位王子那样，庄重威严。其实，他已今非昔比了。今天，他有意呆在机场特有的那种灯光幽暗的餐厅里，这种餐厅，在平时他是决不会去光顾的。他把桌上的芝麻糖和饼干一扫而光。当他把一只手放在卡特里娜的背上时，尽管她穿着羊毛线衫，但透过丝织衬衫，还是感到冰冷刺骨。

正当上茶时，维克托给叫去接电话了。兰格尔要侍者把饭菜端回厨房去热着。

维克托向右一歪，以免碰着用镀金链条悬挂着的装饰品，就站起来跟着侍女去接电话了。

“你知道吗？”卡特里娜等维克托一走马上开腔了，因为她不想让兰格尔与她谈论维克托，“你开始是怎么给科幻喜剧片写剧本的？我对此很感兴趣，你一定写得很快吧？我在写一个儿童故事，一只大象给耽搁在芝加哥一家百货公司的最高一层楼上。你不知道，这真使我大伤脑筋。当把大象牵到运货升降机前面时，它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后，非常勉强地走了进去。那是驯象人——就是那个驯象人——用甜言蜜语把它骗进去的。在百货公司里，它扮演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角色。可到了时间，要它下楼时，它又用脚踩了踩升降机的地板，却怎么也不肯走进去了。”

“他们拿它没办法了？怎么把它弄下来？”他笑了，像往常一样，这笑有点紧张而又克制。“你想了些什么办法呢？”

“用钢琴搬运架、救火队、麻醉剂、催眠法、推倒一面墙、

在楼梯上架上木板。”

“可以用建筑工地的起重机嘛！”兰格尔说。

“这当然可以，但得打开屋顶。”

“屋顶当然得打开，即使有天窗也不够大。不过，看看这个办法怎么样——他们可以临时用铁条在升降机地板下面加固，它就会进去了。或者，让大象信得过的人先在升降机里，用干草和药蜀葵喂它，再利用机械力突然使升降机全速下降。这样，大象就可下楼了，并可让它在密执安大街上走一遭呢！”

“啊，这个办法太好了，真是绝妙透顶！”卡特里娜说。

“只要在大象踩升降机时地板牢固就行了。”

“真是妙极了！大象真的爱吃药蜀葵吗？你真有办法。现在，我想可以写下去了。你看，在这方面我毫无经验。”

“能对你有帮助，我真太高兴了。再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给我，这张名片上的电话号码都可打。”

“你真是太好了。谢谢啦！”

“这故事挺不错，是一个很好的儿童题材，很能吸引人。但愿你能大获成功！”

当时，卡特里娜对他说，能依靠自己，获得成功，对她来说可非同一般。尽管兰格尔已功成名就，但看得出来，他也有过不走运的时候，有过惨痛的失败，有过难言的失望。因此，她很想和对面这个人畅谈一番。这会给这阴沉而寒冷的冬日带来一些光亮和温暖，带来一种真挚的感情，但过分坦率却又有失体统。他帮我解决了大象问题，但还得想想维克托啊！这位兰格尔先生可能很想从我嘴里听到有关我自己的事；这样，他也就掌握了旁人不知道的关于维克托的事。对此，他也许正心怀叵测，贪得无厌呢！

“维克托是个了不起的人，”兰格尔说，“我一直对他钦佩之至。我认识他时，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他当然也不会认真

看待我。我和他的关系，已有好久好久了；他自己也许并不在意。你看，我曾经仔细地研究过他。对他，我曾有过一番深入的思考。我得坦率地承认，他使我着迷了。我读过他所有的著作，搜集他的文章。”

“他认为，你是特地从东部赶来和他谈话的。”

“是的。他能猜到这一点，我也不奇怪。去年他生了一场病，是吗？”

“差点儿死了。”

“看得出来，他不如以前了。”

“我希望，你不会想把他的思想扭过来吧，兰格尔先生？”

“谁？我？你以为他会听我的？不，这一点我比你了解得多。”

“我也希望你告诉，我是不会把你的看法告诉他的。”

“我为什么要你转告我的意见呢？我把意见写下来寄给他不是更简单吗？不管你信不信，加拉格尔小姐，这主要是感情问题。”

“尽管你三十年来没见过他？”

“心灵上的日历是不同的，”他说，“不过，你说得并不完全对。只要认识维克托的人，都自然而然地想谈论他。关于他，可谈的可多啦！”

“你可以和各种各样的人谈论维克托——受他影响的著名画家，或者像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肯尼思·伯克、哈罗德·罗斯伯克这一类人物——或者随便哪位第一流的艺术理论家。还有成千上百的各式各样人物的夫人们。”

“你是个音乐家吧，加拉格尔小姐？你带了个小提琴呢！”

“那是维克托的小女儿的。我们要拿到芝加哥去修。如果我真的只是个小提琴演奏家，那我干吗还要写大象的故事呢？我知道，你以前拉过小提琴。”

“维克托还记得我用左手拉的吗？——那架小提琴是特制的。真献丑了。”

“噢，你不是想要谈谈维克托吗，兰格尔先生？”

“维克托应该说是个伟人。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的人，他的思想既广博宏大，又精细入微。他有他自己独特见解；他不能说是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上星期，我拜访了西德尼·胡克，他是我在纽约大学时的老师。我们谈到了在纽约的老一代的激进派。西德尼对他们嗤之以鼻。这些人从来都不认真，也没有组织起来形成什么气候；像欧洲的左翼分子和他们就er不一样。他们兴高采烈，高谈阔论；他们谈论列宁，谈论罗莎·卢森伯格<sup>①</sup>，谈论德国法西斯主义，谈论左翼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他们还谈论什么莱昂·布吕姆<sup>②</sup>啊、托洛斯基对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解释啊、詹姆斯·伯纳姆啊，等等等等。他们就这样什么都谈，在讨论中过日子。如果他们感到自己的思想是对的，就不胜满足。他们是群思想的蜂鸟。花儿正红，却无花蜜。但，只要他们是有独创精神的，只要他们画出一张很大、很大的画——一张极大的画，那就够了。现在，我们用这个观点来看维克托在布法罗说的话吧，他说，只有严肃的政治家才能使现实保持真实……”

卡特里娜装作听不懂的样子，好像对方找错了谈话的对象似的。“理论问题，我一窍不通，”她说着，还把身子向前一探，好像要对方注意地看一下她的额头，表明在额头后的脑子里毫无思想可言。她是个农民的女儿，连一打有多少都没有记住，但她从兰格尔不出声的笑脸上看出——他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会不

---

① 罗莎·卢森伯格（1870~1919）：德国社会主义者。她曾参加了1905年的俄国革命。

② 莱昂·布吕姆（1872~1950）：法国政治家、作家，社会主义领袖和1940至1945年的人民阵线政府的缔造者。战后曾任法国看守政府总理（1946~1947）。

会他已在加利福尼亚用手术消除了面部的皱纹呢？——反正，卡特里娜从他嘴角上那种友好的嘲讽神态中看出，她根本骗不了他。

“维克托的文章，对许多画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告诉这些画家他们正在做什么和他们应该做什么。不管怎么说，社会并不关心艺术，而是正忙于其他事情。艺术成了知识分子的玩物。真正的画家、真正的作品是非常少、非常少的。受过教育的人成千上万，他们都会对你说：他们喜欢诗歌、喜欢哲学、喜欢绘画，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也没有写诗、学哲学或作画；实际上，他们也根本不关心这些，也不愿为此作出任何牺牲，更不可能为此花什么时间——他们不读，不看，也不听。他们真正的兴趣是在商业上、专业上、政治上、性生活上，以及财务上。他们不必靠艺术生活，没有艺术也照样可以生活，也不必通过艺术而获得生活。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心甘情愿地受艺术的影响。这就是权威评论家们所做的工作。这些权威评论家也对艺术家产生影响。写文章的人引导了拿画笔的人。这就像一个叫做布思的将军<sup>①</sup>，带了一个大型的铜管乐队，把艺术家引向虚无缥缈的天堂。”

“你真会说话，兰格尔先生。你的意思是，维克托充其量只不过是个宣传家罢了！”

“不，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是个十分复杂的人，丰富多彩，影响深广。维克托与其他那些蹩脚的评论家不同，他有自己的灵魂，真的。至于谈到宣传家嘛，他既然能居群龙之首，又怎么能做一些宣传工作和实际工作呢？再说，清白纯真的人又怎么样呢？没有一点虚伪能获得成功？我不是说维克托是伪君子；我是

---

<sup>①</sup> 约翰·威尔克斯·布思（1829~1912）：基督教救世军的缔造者和第一任将军。

说，他没有时间把精力浪费在傻瓜身上。而且，他也完全知道，在美国，做个傻瓜也无伤大雅。在这个安全而又舒适的国家里，思想上有点混乱，也没什么关系。当然，思想上的混乱对艺术和文化则是致命的……”

“你这么说，是不是在问我：维克托已堕落到什么程度了？”卡特里娜问。她感到十分苦恼；尤其使她苦恼的是，她百感交集，难以言状。她是不是应该斥责一下兰格尔呢？听兰格尔这么讲，是不是对维克托的不忠呢？然而，她又听得有点儿入迷了，并且还想听下去。而如果她提出这个忠诚问题的话，维克托本人就一定会把她当做傻瓜。像他这么一位大人物，决不会斤斤计较这种道德上的细微末节。而兰格尔则乘维克托不在的时候，尽量倾吐自己对维克托的看法，他是个十分精明的人。现在，卡特里娜感到，自己真是个傻瓜，竟会和他谈起大象的故事。

他想给卡特里娜一个深刻的印象，还有点儿神气活现的样子，（难道他也有意于卡特里娜吗？）但是，他要了解维克托的热情则是真诚无疑的。

“维克托是位宣传家。他的宣传工作做得好，做得极好，并且是独自一人进行的，但他没有一点虚饰。他实实在在地研究了艺术这一重要的问题——艺术与技术、艺术和科学、艺术在大众生活时代中的意义。他了解，在美国，艺术家的发展受到了阻碍；实际上，美国并非是艺术的国土。在我国，艺术并不是什么严肃的东西。决不会像预防天花而要种牛痘那样严肃对待。即使对那些有关的专业工作人员。像评论家啊、博物馆长啊、编辑啊，等等，艺术也只不过是废话而已！但艺术应该像你呼吸的空气和你喝的水一样，成为生活所必需，像营养和真理一样必需。维克托了解问题的实质。要是你问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告诉你，没有艺术，我们就无法判断生活，也就根本无法区别和整理一切事物。那时，‘现实世界’就不再是现实的了；而正是

这个‘现实世界’，是那些‘制定计划的人物’、将军、舆论制造者和总统的活动舞台。但即使维克托的兴趣在政治上，他的政治见解有时也是傻乎乎的；在法国的学生危机中，他就赞同萨特的意见，说什么我们正处于一场鼓舞人心的、真正革命的前夕。他被冲昏了头脑。他的政治见解只能产生蹩脚的艺术。在政治上，维克托依然有点感情用事。他有一些超绝的思想，对人类生活的复杂多样也有深刻的理解。但他对康百莱周围天空的色彩，不可能像普鲁斯特<sup>①</sup>那么沉迷入神。他对山楂花和教堂的尖塔不感兴趣；在横穿马路时，他也不会给车子撞死，因为他眼睛还看得见。”

卡特里娜说：“你对他研究得这么仔细，换了维克托，我真不知道会有什么想法呢！”

“要不要再给你谈件重要的事情？在科幻电视连续片《巴克·罗杰斯》中，不只有一个地方暗示了维克托·伍尔皮。”

这位身材矮小的名人，他的照片登在《人民》杂志的封面上；他固执己见、生性敏感、感情丰富，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怪人。在火焰状的灯泡发出闪闪的黄色光线下，他的脸上交织着敏锐、固执而又欣喜的表情。

他接着和卡特里娜谈起了自己的儿子，是个独生子。“是我第二个妻子生的，”他说，“是个年轻的女人。我的汉克现在已二十一岁了。他一生出来就带来了麻烦，好像他来到这世上就是要让大家吃惊一番似的。有的孩子服用麻醉品，打架，偷汽车——这要算是最好的了。如果他用我的名义开支票，我支票簿上就少存点钱。而他把家里闹了个天翻地覆，连他自己的母亲也呆不下去了。他母亲实在无法忍受，就去和别人住在一起了。汉克大约

---

<sup>①</sup> 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小说家，他的作品对长篇小说艺术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十四岁时，就开始做起非法交易来。在高速公路上，他被警察跟踪追击过。他甚至去骗贩毒犯的钞票，他们几乎把他杀了。后来，我和孩子断绝了往来——他头脑里不知道乱七八糟装了些什么。现在他正关在教养所；那儿规定，亲人不能去探监。他们像对待婴孩一样对待关在里面的犯人。吃的是婴孩的食品——面粉糊，还强迫他们垫尿布。其理论必定是，这些犯人的问题出在婴儿时期，所以那儿制定的改造计划是，强迫犯人回到婴儿期。这是心理学家对人类生活的解释。”

“真使人伤心。”卡特里娜说。

“噢，我可不能伤心。他是我的疯狂的押沙龙<sup>①</sup>。他母亲和他脱离了母子关系。她只和我交谈，从来不和儿子说话。但他长得很像他母亲：金黄色的头发，瘦小的身材。一个天生的机械师，摆弄发动机的天才。只是他把我的波斯克牌汽车拆得一塌糊涂。零件丢得满地都是。”

“他恨你吗？”

“他不说这种话。”

是啊，也许有一天，这孩子会把他杀死呢，卡特里娜想。忠诚的人最终将以生命为代价。

“够了，孩子的事就谈到这里吧，”兰格尔说，“我们还是再来谈谈维克托吧。我对艺术的态度，倒不是受了他的观点的影响，而是受了他为人的影响。我实在并不怎么赞同他的思想。过去，在思想方面，我把他比做弗兰克林·罗斯福；对罗斯福的为人，我是很敬仰的，但对他实行的政策，我却不敢苟同。”

像罗斯福！比得好！两位都有残疾。卡特里娜迅速地拿他们两人作了一番比较。贝拉就像埃莉诺·罗斯福，而她自己，卡特里娜，却像利汉特小姐。卡特里娜记得曾听说过，利汉特小姐与

<sup>①</sup> 押沙龙：基督教《圣经》中人物，大卫王之宠儿，后因背叛其父被杀。

罗斯福曾有过一段风流韵事；后来，她病了，就离开了罗斯福，最后终于一病不起而死了。当时，罗斯福忙于战争，根本没有时间想到她，也从来没有问过她。罗斯福是伟大的，但也是冷酷的。维克托也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孤独和冷酷——并认为这是当今的时代特征。当代的现实是严酷的。与一位中产阶级的女子发生性关系，就必须满足她的温情。但用冷峻的目光来判断，这些都毫无历史的现实感。当代人真是又伟大又可怕，除非你否定非人道主义化。维克托像毕加索画中那个赤身裸体的老色鬼那样躺在床上时，就会说这种话。而卡特里娜则躺在他身边——一个丰满的女人，也可以说是一个肥胖的女人，充满着女性的气息——就会比维克托自己更了解他。

这时，他们看到维克托正向包厢这边走来。兰格尔示意侍女把饭菜端来。那浇上糖浆的橘汁鸭看上去真恶心。那调味汁漂浮着一圈圈的油腻。维克托已饿极了，就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那盛威士忌的玻璃杯上很快沾满了油腻腻的手指印。他把面包撕碎，放在菜盘子里，再用汤匙把沾满油腻的面包片舀来吃。他心情烦躁，兰格尔想进行交谈，以尽东道主之谊。当兰格尔指出童话片与抽象派思想之间的联系时，卡特里娜阴郁地看了他一眼，但还算不上有什么恶意——更确切地说，是瞪了他一眼。当人们谈论“清晰”的思想时，他们是不是指原始艺术<sup>①</sup>的思想呢？人在原始艺术中用事物来表现。如果看上去有新奇感的话，那也还可以接受得了。但，如果其创作意图没有什么新奇感的话，那你获得的印象就只不过是当代主题的抽象派的浓缩，就像

---

<sup>①</sup> 原始艺术，或译质朴艺术、还原艺术、最简单派艺术等，是一种将图形和色彩等化为最简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既不加修饰又没有什么情节的一种抽象派艺术形式。

用速写符号来代表人一样。假如把毕加索和多米埃<sup>①</sup>看作漫画家吧（在这方面，他们对维克托这位专家是十分尊重的）。公正地说，多米埃处理的是社会题材：中产阶级和审判室。但毕加索不同，在他的画中，有一种虚无主义的味道；其画越抽象，虚无主义的味道越足。兰格尔穿着皮袄，脖子下围着丝围巾和印花大手帕，显得神经紧张，语气犹豫，两颊抽搐不停。

“那理性是怎么回事？”维克托问，“你开始对我说，思想是无关紧要的，思想是一成不变的；那你现在又来和我讨论思想，这是什么道理？”

“我说，抽象派思想和漫画是有关联的，这就没有什么矛盾了，是吗？”

“我没什么兴趣讨论这个问题，”维克托回答说，“等你回到加利福尼亚去再谈也不迟。”

“是的，我想不会迟的。”

“好啊，那就收起来吧！放在肚子里吧！藏起来吧！”

“真遗憾，我在科幻电影方面获得的成就，今天竟对我自己产生了不利的影晌。实事求是地说吧，我在哲学方面的知识，比一般学哲学的还要好呢！”

“不过，我现在没有兴趣讨论哲学问题。我也不想讨论理性与虚无主义问题。我认为，你那天体物理学和神学的大杂烩，把千百万人的头脑都搞乱了，你也因此而出名了。你的问题是，偷偷摸摸地假正经。好了，你已经在这方面大有贡献了。你的高见已载入史册了。”

“你自己也写过‘神学上的混乱’啊，维克托！我认为，任何人，不管其在世上的地位高低，如果他在世上受过苦，他就应

---

<sup>①</sup> 奥诺雷·多米埃（1808～1879）：法国画家、雕塑家、漫画家；他用现实主义手法讽刺了法国资产阶级社会。

被允许进入天国，因为他已付出了购买进入天堂的入门券的代价。”

但维克托已不愿听他唠叨了。他做了个鬼脸，那样子既有嘲讽，又凶相毕露，又滑稽可笑，要在平时，卡特里娜真看不下去了；可是，今天却不一样，维克托表现了他以前从未表露过的一面。他嘴唇向两边一缩，露出牙床；又像哑剧演员那样，装出喋喋不休的样子，却又不发出一点声音。然后，又伸出舌头，装出像一条狗在喘气的样子。他眯起双眼成一条线，你只能看到眼角四周的皱纹和眼睫毛，又伸出两只大拇指放在两边的太阳穴上，并摇动双手的其他四个手指。最后，他就站起来走出包厢座，拿起帆布旅行袋，径自向门口走去。卡特里娜把文萨莎的小提琴夹在腋下，对兰格尔说：“我代他向你道歉！也许你还不了解他的为人。他今天情绪很坏，兰格尔先生，这你自己也看到了。去年，他差点儿送了命。现在，他每天都受着病痛的折磨。只要想想这一点，你就会原谅他的。今天这事，我感到很抱歉！别让他影响了你的情绪。”

“是啊，这倒是个很好的教训，真使我难过，是的，我也可以看出，他情绪不佳。唉，真遗憾。”

这使兰格尔很伤心，卡特里娜很有点同情他。“谢谢你。”她边向外走，边回头来说。她希望从背后看上去自己不至于显得太笨拙。

维克托正在中央大厅里等她。她生气地对他说：“你太没有礼貌了。我不想和这样不讲礼貌的人在一起。”

“当他开始和我谈起多米埃和毕加索时，我实在听不下去了，一分钟也听不下去了。”

“你自己心情不好，可你把气出在他头上。”

维克托默认了这一点。

“你对我也不讲情理，你只字不提你和金斯莱克的谈话。我

们到底能不能到芝加哥？”

“他将给我们派架他们公司的飞机来，他说他能安排好飞机来接我们。”

“你明白，要是我给耽搁在底特律这儿过夜，那就麻烦了。”

“不会的，飞机就要到了。”

他们又一次回到了成千上百的人群中去了。在这中央大厅里，人们摩肩接踵，人头攒动，使她感到莫可名状的忧郁。维克托在一家妇女时装用品小商店明亮的橱窗前停下脚步，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卡特里娜的脸色。他正在对她讲话，可她什么也听不见。她的耳朵好像给什么东西塞住了。

“你早该告诉我了。你知道我一直担心怕耽搁在这儿。”

“还不是兰格尔这家伙的缘故！”他说，“成千上百的人冲着我来。他们要向我解释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想消除我对他们的不良印象，或者要向我表明，他们从此将改邪归正。他们需要一种更好的陈腐思想赖以生存。像兰格尔这样的人，应该获得另一个‘自我’。因为，他目前取得的地位，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他当年在格林尼治村出现时，拉着他那弦线顺序反装的小提琴，给连环漫画编造故事，倒也给人留下颇深的印象，而他自己真正热衷的却是黑格尔和帕斯卡尔<sup>①</sup>哲学。现在，他成了大众心目中的大人物了，因而完全忘乎所以了。穿着北极狐皮的皮袄，嘿！是啊，如果你没有勇气面对现实生活，如果你没有意志和才华面对现实生活，你就只能靠幻想过活，并对这种幻想作出平庸的解释。但这些平庸陈腐的解释又毫不留情地刺痛了这些人，因而他们不得不尽量发挥创造性。只要看看兰格尔的努力就清楚了。他希望我成为他的保护人，也许做他精神上的依靠吧，像个叔叔那样保护他的侄子——做他的父亲当然年纪太大了。不久前，我收

<sup>①</sup> 布萊斯·帕斯卡爾（1623～1662）：法國科學家、數學家、哲學家和作家。

到一封信，是一位艺术家写给我的。他在灭火器厂工作。他说，他正在保卫人类的灵魂不受罪恶的纵火犯的破坏。他除了画灭火器，决不画其他什么东西。他要我祝福他。可我没有秘密警察保护我。我得自己避开这些纵火犯。”

“行啦……飞机到达之前，我们怎么办呢？”

“楼上有家旅馆，就在这乱糟糟的大厅楼上。金斯莱克已给我们预订了一个房间。”

“谢天谢地！再在这大厅里给挤来挤去，我实在受不了啦！”卡特里娜说，“他们派来的是什么飞机？”

“飞机就是飞机呗，我怎么知道？你太紧张了。事情并不那么严重。你家老黑人不会不管孩子的。再说，还有你姐姐呢！”

“我一直对你说，我姐姐神经已经有点不正常了。”

“我对金斯莱克谈了对费尔舍的看法，就是今晚要给我作介绍的家伙。我对他说，此人是个老牌的斯大林分子，品行低下。今晚这种场合让他出面，岂不大煞风景！当然，现在要换人为时已晚，但我公开申明，我反对他为我作介绍。”

“我们上楼到房间里去吧，好吗，维克托？你可以休息一下，而我要打个电话。”

他们向旅馆的登记处走去。房间已订好，维克托签了个字就行了，但他不要侍者带他们去房间。“不必了，我们没什么行李。我们在等飞机。”给你用钥匙开一下门，你就得掏出一元美金，这不值得嘛！

一进房间，维克托就一头倒在床上。卡特里娜脱了鞋子。这双鞋子的尺码一定有十六吧。不过，她那双脚的样子却生得很好看。鞋子脱下来时，冒出一股人体的热气。她在维克托头下塞了一个枕头。当维克托挪动身子想躺得舒适点时，感到肚子里的神经末梢又在刺痛了。这是开刀后留下来的后遗症啊！神经末梢磨损后，就像铜丝刺进肉里一样疼痛。

“我要给我姐姐打个电话。放心，我会告诉接线员，如果芝加哥来长途电话，就马上给接上。”

她照着多蒂给她的电话号码一个一个地挨着打。那些接电话的人都态度粗暴，并立即挂上了电话——人们越来越不讲礼貌了。最后总算找到了她姐姐，说是正在芝加哥南部，离家有十五英里，离埃文斯顿二十五英里。开车真不容易啊！“这场雪下得太糟了。”卡特里娜说，语气中流露出一种满足而倒不是同情。

“你有没有给埃文斯顿通过电话？伊索尔在家吗？”

“伊索尔要我告诉她你在哪儿。她不相信你在绍姆堡<sup>①</sup>。她还说，克里格斯坦给她打了好几次电话。他倒确实想帮你的忙，是吗？他爱你，特里娜。”

“他只是我的一个朋友罢了。”

“顺便问一下，你现在在哪儿？”

“我们被迫在底特律着陆了。”

“底特律！耶稣啊！我听说芝加哥国际机场已关闭了。那你回得来吗？”

“要稍晚一点才能回来了，但也不会太迟。伊索尔有没有说艾尔弗雷德去过电话？现在这时候，那精神病医生一定已告诉律师，下午的约谈取消了。如果艾尔弗雷德的律师知道了，我的律师也一定知道了。”

“你太纵容克里格斯坦了。”多蒂说。

“我只是他许多女朋友中的一个罢了。你知道，他同时可以向十个女人求爱。”

“他的确这么说过，但真正爱上的是你。维克托一离开你，他就会向你进攻。到那时，你会措手不及，无法抵抗。”

“你讲这话太使我难堪了，多萝西娅。”

---

① 绍姆堡：芝加哥郊区一小镇。

维克托这时已拉了一个枕头放在头顶后面，像头上戴了个帽子似的。他闭着眼睛说：“别跟她多 唆了。抑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吧！”

“好吧。我们就谈到这里吧。有个客户打来了电话，”多蒂说。

“我指望你帮我忙了……”

“今晚去埃文斯顿是不可能了。我已应邀赴宴了。”

“昨晚上你没有说要赴宴啊！”

“我和商务上的几位同事聚聚，”多蒂说，“六点至八点，你可给我家里打电话。”

“好吧，”卡特里娜说。她听从维克托的话，轻轻放下了电话筒。

“做做好事吧，卡特里娜！给我把空调关上。旅馆房间里这种该死的人工气流，我讨厌！这马达声使我难受！这种地方越来越像殡仪馆了。”

卡特里娜转身关掉了空调器，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情——她姐姐的话刺痛了她的心。“多蒂和我好像本性不合。在我倒霉的时候，她总是还要投石下井。”

“没有她也照样过日子。我们坐董事长的喷气式飞机回去。你可以坐大型高级轿车回埃文斯顿。”说完了这些安慰话，维克托又补充了一句：“孩子们喜欢下雪。她们可以出去玩雪，可高兴了。这我可以和你打赌！”他语气十分温柔，连他自己也颇为吃惊。他情绪开始好起来了。即使他向兰格尔扮鬼脸时，似乎也不是对他冷酷无情，而只不过是嘲弄嘲弄而已。怎么看待下面这种情景呢：一位艾弗肯族年迈的印第安酋长，穿着系腰带的长袖长袍，头上插着染红的金雕毛。这叫什么？——野蛮美。伍尔皮完全可能这么看的。他的创伤给他带来的恼怒渐渐平息了。他没有听卡特里娜给伊索尔打电话。现在，他在思考的是人生的界限

问题。这个问题以前他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只是最近几年，才成了他经常思考的一个部分。现在，他正从各个方面在思考这个界限问题：“你给他规定了他无法逾越的界限。”对这位美国活力和美国行为的代表人物来说，这种无所不在、近在咫尺的界限，真是既可笑，又可悲。“一个身体虚弱的野蛮人”是什么样的？爱好新奇的人需要帮助。一个有活动能力的哲学家，必须自己能行动。当然，伍尔皮需要人家的帮助也是有限度的。（《圣经》上说的那“规定的界限”对他来说是不适用的；他所说的界限来自另一个世界——那就是 yivrach katzail<sup>①</sup>，意即“他消失了，就像一个影子”，这是他小时候从书上读到的）那条瘸腿对他来说还不是什么限制。这对他步步高升反而是个帮助，就像俄狄浦斯王的脚坏了一样。不到三年之前吧，有一个下午，他那辆破旧不堪的庞蒂亚克牌小汽车变成了临时救护车。他把病重的母亲安置在后座，开着车子到处转。他的一位年迈的堂兄打电话告诉他，他在老年疗养所<sup>②</sup>的母亲已完全不会讲话了。后来他去探望这位不会讲话的老妇人，就给她打点了行李，从疗养所里领了出来。那天下午，天气热得厉害。他开着车子，从一个疗养所转到另一个疗养所，想给他母亲找个可以安置的地方。进屋时，他只得把老人锁在车子里（那儿都是一些贫民区）；他爬上台阶，一步跨两级，真够受的！进了疗养所，就查看病房、厨房和卫生间，与那些精神病人的“行政管理人员”或“美钞精神病患者”讨价还价：这些人就是想从你身上抢钞票。（他倒不是没有与那些人为每一块美元争吵不休。他们对他说：“这是用合法的手段抢钱！这是可怕的骗钱勾当！”）到下午四点钟，他还没有给母亲找到一

---

① 意第绪语。

② 美国一种私人小型医院，专门接收失去独立生活能力而需要护理的老年病人。

个合适的地方。现在，那老人躺在他那辆破旧的汽车后座里，处于半昏迷状态，但又是至尊的象征。当他在阿斯托里亚和杰克逊山丘上转来转去时，他正想入非非，好像卡特里娜开着车紧跟在他后面，最后把他逼到一垛灰砖砌成的红墙面前。这位幻觉中的卡特里娜只穿了件外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准备好随时上床和男人睡觉。当他停下车子走进屋子时，他想像中，卡特里娜停下车子，且又令人难以察觉；在扣紧着的外衣下，她身上洋溢着性的气息。他完全知道，这只是普通的幻想，但他喜欢这种幻想。他显然需要想像女性的气息——那种潮黏黏的气息——由此会引起维克托特有的激情。最后，维克托总算找到了个好地方，或者可能是不想再继续再找了。他们把他母亲抬了进去，而维克托签了张支票。几个月后，他母亲就去世了，让维克托留在世上去思考、去旅行，去发泄性欲——整个生活充满活力而又激动人心；他是个重要人物，发表重要的谈话，出版重要的文章。他母亲死后不久，他自己也进了马萨诸塞州医院。在那儿，他总算捡了条命；但从此他意识到，该考虑一下那规定的界限了。像一条大河，也会改变流向。密西西比河会有新的河床。整座整座的城市将被人淹没；整幢整幢的房屋会拔地而起，冲过墨西哥湾，我原来坐落在委内瑞拉的沙滩上。

“你到底在哪儿，特里娜？”伊索尔问。

“我在绍姆堡开会，我给耽搁在这儿了。”

“那好，”伊索尔说，“告诉我你现在的电话号码。”卡特里娜回答不出。伊索尔就说：“只要你能说谎，就从不说实话！”

我们可以想像这样的情景，在她俩之间，横亘着大片寒气凛冽、大雪纷飞的世界。那又矮又胖的黑妇人，臀部受过伤因而走路有点瘸；此时她正握着电话筒，满头白发，却比卡特里娜精明得多（那黑鼻子、棕嘴唇是自然赋予她的，看上去令人好笑）；而她对卡特里娜的谎话和古怪行为也感到好笑。卡特里娜正在思

想斗争。如果告诉她，“我和维克托·伍尔皮在底特律的汽车旅馆里。现在他正起床去洗澡。”把实话对她说又有什么用呢？伊索尔说：“你的朋友，那个警察和你姐姐都打电话问你了。”

“如果我五点钟还到不了家，利尔伯恩到来的话，你给他点喝的，并留他吃晚饭。”

“今晚我们要去玩纸牌，并在教堂里吃晚饭。”

“我给你五十美元。你在教堂里玩纸牌也赢不了这么多。”

伊索尔还是不答应。

卡特里娜又一次感到，人人都能支配她。艾尔弗雷德要惩罚我，还有法官、律师、精神病医生、多蒂，以至自己的女儿，个个和我过不去。他们都用同一标准来看待我；可这个标准对什么人没有任何用处，只是用来敲诈我。这就使我更靠近维克托，因为，他不让任何人为他规定什么条件。只有其他人为他让步。我也是这样，我要其他人让步。只是我还没有获得像他那样的自我；这是高如大山的自我。啊，现在得回答伊索尔了。“你在听我讲吗，伊索尔？”她问。

“特里娜，你付我五百美元我也不干。今晚我一定得与利尔伯恩斗一下。你看你什么时候能回家？”

“尽量早呗！”

“那好，孩子们没问题。我锁上门，她们可以看电视。”

他们都恨我们。伊索尔挂上电话后，卡特里娜自言自语地说。他们恨透了我们。

她的眼睛痛得厉害，得擦点眼药膏了。冬天，她的眼睛老是要发炎。她认为，这是因为天气寒冷，废气就升不高，因此，冬天的空气就更坏。她打开手提包，坐在床沿上，在钥匙、连镜小粉盒、手纸、钞票、信用卡、砂板等杂七杂八的东西中乱找。

“看得出来，你打了电话，可什么结果也没有，”维克托说。此刻，他站了起来，用手抚摩着她的头发。当他和她亲近时，在

温柔中总夹杂着一种疑虑，好像对她感到某种歉意，对她永远也无法理解的、他永远也不会做的事感到歉意。然后，他漫无目的地随便聊起来——这在他看来是非同寻常的。他又谈到了空调器。他找不到开关。这使他记起了他第一次听到机器声的情景；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腿上开刀，他给麻醉了。他失去了知觉，仿佛看到了一轮明亮的满月。一个老妇人想爬过一道栅栏，那轮满月在晃动。如果她爬过栅栏，他就要死去。“那机器声可能就是我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从此，那看不见的机器一直影响着我。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隐蔽的机器——所有的喷气式飞机、硅片制成的计算机……好了，卡特里娜，给我做做好事吧。把我的皮带松一下，用你纤细的小手伸下去摸摸我那个。我能享受的东西不多了。”

她照他说的做了。要一个成年妇女这么做，这种请求不算过分，只是尽朋友之谊罢了。性欲往往是一时的冲动，难以抑制。

“快点来一下怎么样，特里娜？”

“可能马上就会来电话。”

“那更好，越急越带劲。”

“不脱靴子吗？”

“你把裤子拉下去就行了。”

维克托向她俯下身子，用自己的脸在她裸露的肉体上摩擦，大腿上、肚皮上，还有肚脐下的阴毛上，热脸贴着温暖的肉体。电话铃没有响。电话沉默着。他们在极力赢得时间，赢啊，赢啊，赢啊。他们赢了！

维克托对她说：“我们好像又回到了过去。”

“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过来了，”卡特里娜说，“真幸运，我头都晕了。”

“我们躺一会儿吧，你别起来。有句俄罗斯谚语说：赴约既晚，就慢慢走。我们尽情享受一番吧！金斯莱克派不出飞机，就

会打电话告诉我们的。”

“你看现在天晚了吗，是吗，维克托？”

“在这儿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现在是在中央大厅上面的旅馆房间里。你担心什么？只是晚一点回家罢了！他们非得把我送到芝加哥不可。没有伍尔皮，就不会有好戏看！这对他们也是个考验！是他们自作自受！”

他们在床沿边躺下休息了，脚悬空挂在床边。他握着卡特里娜的手，吻着她的手指。他是个骄傲专横而又愤世嫉俗的人。但在这种时刻，他对卡特里娜则完全不是这样。卡特里娜也把此作为一种标志——表明他非常喜欢她。他就喜欢像这样躺在一起高谈阔论。卡特里娜还记得在这种场合下进行的很多有意义的谈话。“你的文章要比方斯廷写的好得多。”——此人是维克托的夙敌——“如果你脱下鞋子，用你红润的脚跟去踏打字机的键盘，或者就干脆撩起裙子，把你漂亮的屁股坐在打字机上，你这样写出的文章，也更受读者欢迎。”

维克托又谈到了兰格尔。“他想和我搭上关系。”

“他对你很尊重——很钦佩，”卡特里娜说，“他说过，当他五十年代刚来到格林尼治村时——他还只不过是个孩子——而你在他的眼里，是属于弗兰克林·罗斯福一类的人物，是个伟人。”

“我也知道，在我打电话时，他一定会大谈特谈的。是啊，对他的赞誉，我倒也不必太谦虚，卡特里娜……”（他现在又有什么好谦虚的呢？他俩一起躺在床脚边，从肚皮到膝盖都赤裸着，他的手臂压在她的肩膀下）“在某些方面，我也明白，我知道我应该怎样使用自己的权威。与那些从来没想到权威的知识分子相比，我就更胜一筹了。这就是他们不会思考的原因。我比别人坚强。我的思想更具有权威性，因为我在进行思考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权威人士是应该怎样思考的，这也是我的本性……”他停顿了一下，“这也是我过去的本性。现在，我暂时放弃我的本

性。因为，我希望能加强我一直所喜欢的不带任何偏见的观点。”

“性生活之后谈这种问题？”卡特里娜说。

“要是我做领导，一定会做得不错。我有敏感的气质，不怕被人指责。我天生具有政治头脑，因此，也非常自然，我蔑视那些在私生活中也毫无生气的人。不论思想也好，绘画也好，都应该有力地表现现实的真理，那种先验的激情。你有多少勇气去探索真理，你就得到多少真理。”

这些话他只有对我说。卡特里娜常常这么想——她为他感到难过。如果她手头有本子的话，就会把他的谈话记下来。对他所说的，她略能理解。

“我们所感到的最大的痛苦，有些是来自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那种宁静。有些人最会挖掘自己的心灵深处，但外表却一点也看不出来。我常常想，‘他，或者她，在两条不同的隧道里挖掘着，紧张地工作着，但这是两条平行的隧道，且互相距离甚远，因而也永远不会交叉。两个挖掘的人，对双方的工作又都一无所知。’这可以说是对人类痛苦的最大的嘲弄了。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把种种可怕的艺术形式称之为‘创造性’。”

“难道兰格尔说的话都毫无价值？”

“他关于受下属尊敬的头头的谈话，我也许还有点兴趣。但我感到他这也是拾人牙慧。我认为，兰格尔不会有什么使我感兴趣的东西。如果说，这是像人类文明末日一类的问题——这对头脑敏锐的人，一切也都清楚了，是一目了然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不是指我们说出来的那些思想——我们说的话，大部分是废话——在内心深处的思想中，头脑敏锐的人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一切。在兰格尔的话中，也许也有点儿什么的——仍然是关于他拾人牙慧的那些头面人物的论点——关于真实的思想与现实有关的话：真实的思想反映与之相应的现实的形象。你知道，我为什么与兰格尔断绝来往了吗？听到一个加利福尼亚人，对我一直

在思考的一些事物进行拙劣的模仿，实在令人作呕。我烦恼极了，卡特里娜。六十年来我形成的那些思想，都无法抵御这种烦恼。我竭力主张明白清晰……”

“难道你还不明白、不清晰吗？”

“那是我头脑的清晰。我一直有着一些十分清晰的印象，像梦啊，幻觉啊，但没有思想的清晰。”

“这是什么意思？”

“噢，那就是，有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我们都从不谈论；那是在心灵深处的东西。”

“譬如说像什么呢？”

“譬如说那种神秘的固执的信念：死者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死去。还有，正如那电影中无聊的谈话所提到的，思想不是我们想出来的。思想是现实的，是已经存在在那儿的。一个现实的思想可以进入你的头脑。我想，我了解我怎么会有这种事。从事艺术生涯这么多年了，你就会认为，生活的价值与艺术的价值是紧密相联的。这种联系没有什么理论的基础。因而你又会怀疑，正是理论缺乏现实的意义，而理论又会反驳，这正是由于社会机能的削弱所引起的。”维克托克制了自己，没有谈到这个问题性爱的方面——魔力般的、艺术的、性爱的方面；他也没有谈到这次突然激发的性欲的含义。也许，这意味着他为了印象的清晰付出了他最后的活力，并且性爱表明，他依然活着。但是，力量和活力，只是自欺欺人而已，并对自身的存在进行虚假的描述。他没有告诉卡特里娜，那地下的乐声表明（对马克·安东尼<sup>①</sup>来说，也一样表明）大力神赫尔克里斯<sup>②</sup>正在离他而去。

---

① 马克·安东尼（前82～前30）：罗马将领，凯撒在高卢的代理总督。

② 赫尔克里斯，希腊和罗马神话中的大力神，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比的英雄。

他换了个话题。他对卡特里娜说：“真可笑，兰格尔竟然把我和罗斯福相提并论了。”

罗斯福也是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去世的。当他在温泉脑血管破裂时，不是身边也有个女人吗？

“你有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有过，但我并不喜欢这个念头。斯大林着着实实地愚弄了他一番。去德黑兰和雅尔塔的旅行，把他置于了死地。就消耗的体力而言，对他来说是毁灭性的。我敢肯定，斯大林是想要加速他的死亡。这正是一次可怕的旅行。为了表现自己的活力，罗斯福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斯大林不动声色，而罗斯福却自我毁灭了，只是为了证明他这位大国首脑的力量和他个人的‘高贵品质’。”

这时，卡特里娜把自己圆乎乎的脸靠近他——这是一个女人摆好姿势，要让自己的情人脸贴脸地抚爱一番。她说：“你不冷吗？把被子拉上来给你盖一下好吗？不要？那你把手伸到我下面来暖和一下也好。”

为了让他好好地抚摩一番，卡特里娜侧过身。她知道这种做法是屡试不爽的——她那光滑好看的屁股，白得像奶油一样。每次她主动让他抚摩时，他总禁不住要笑，并把他柔软的大手伸过去。他是惯会讨好女人的，并且，随着年龄的增大，越来越会玩女人了——就像毕加索笔下的淫棍塞列努斯把手伸向赤身裸体的美人。即使让他捏弄自己的两只乳房时，卡特里娜也感到某种让贵人温存的满足。他量着她生在两颊上的斑点是否对称——她两颊上各生着一个胎痣，犹如两只眼睛。“噢，你眯起了眼睛。啊，你又斜起了眼睛。哟，你在打什么鬼主意啊！”维克托停顿了一下说，“这就是那小个子兰格尔说的关于童话片和抽象派艺术的高论，是吗？做这样的鬼脸？”然后，他又轻轻地抚摩着她，并说，“你这样漂亮的身段，真使我张口结舌，惊叹难言；我这么

说，决不是夸张。”

正当这时，电话铃响了，响了一次又一次——真是太无情了。那是服务台打来的，说是他们的飞机已经着陆了。高级轿车已经开出来接他们了，请他们五分钟之后下楼。

在凛冽的寒气中，他们在明亮的灯光下等着。维克托手持拐杖，戴着海员帽——那宽阔的胡须，那漂亮的脸庞，以及在任何情况泰然自若的神色，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他是位思想王子。卡特里娜知道，自己从来也没能符合过他的高标准，因而睡在他身边颇感相形见绌。她还得照管那把该死的小提琴。她手持乐器却不会弹奏。这样，她好像成了一个当地的搬运工人。她还应该把那小提琴顶在头上。现在，他们正在底特律的郊外，站在一片灯光下。这北方像其他北方那些灿若群星的大城市一样——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圣路易斯等——正忍受着暴风雪的袭击。那原来荒芜的田野，在夜色中呈现一片金黄色，看起来十分美丽。

“这根本不是什么高级轿车，”当车子停稳时，维克托说，“这是本田牌<sup>①</sup>小轿车，真见鬼！”

但他没有再多发牢骚，就打开车门，一手抓住车顶的边缘，就准备坐进司机旁的座位。他先把那条僵直的腿伸进去，一直伸到了驾驶员座位的手刹车旁，然后低头弯腰，转过身子，从上到下塞满了整个车座。最后，卡特里娜在后座安放妥行李，并慢慢坐了下来。他是在为即将来临的演讲给自己壮胆而作预演吧？“你有没有读完我给你的那本塞利纳<sup>②</sup>的书？”

---

① 一种普通的日产小汽车。

② 路易·费迪南·德图什·塞利纳（1894~1962）：法国作家，著有《茫茫黑夜漫游》（1932年），对社会极尽讽刺能事。

“是那本《游记》？我总算读完了。”

“书不怎么好懂，但这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书里谈到一些法国的事情，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

“像波德莱尔？”

“对。”驾驶员已把车子开进一条幽暗的岔路，沿着篱笆向前急驰。维克托在狭小的坐位上费力地转过身子；他想看她一眼。显然，他不仅想用话，而且还想用脸部表情说明什么问题。“你不认为塞利纳太可怕吗？他用的语言是人们到处都讲的话。他表达了人们的真实思想和感情。”

“上次我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你说，正是这些思想，使法国在一九四〇年垮了下来，而那些德国人却也有着同样的思想。”

“我想，实际上，我并没说过这种话。至于谈到虚无主义……”

为什么他要让她念那本书呢？小说结尾时——那简直是个恶梦——一个名叫鲁宾逊的冒险家，坚决不肯告诉一个女人他爱她，而那位“可爱的”的女人在盛怒下一枪打死了他。甚至，在出租汽车里，当她把枪对准他时，他也不肯说“我爱你”这句话。尽管他本是个无赖、恶棍和凶手，但在其身上却还有一点诚实；而且，这点诚实表现在他生命的最后关头。他宁愿死，也不愿谎称他爱这个恶魔般的疯女人，让自己与她假装相安无事地度过一生。书本身倒不怎么使卡特里娜吃惊——书毕竟只是书而已——使她吃惊的是，他，维克托，竟要她读这本书。当然，他老是向最不容否认的历史现实提出挑战。整个宇宙都是他活动的场所。一个十十足足的世界主义者，一个思想界的巨人，在思想界占着中心的统治地位。“正视那些毁灭性的现实吧！已经是不可救药了。”

“那书与凶杀集中营相差无几。”她说。

“这一点我并不否认。”

“对了，在旅馆里你说过，世界各地头脑敏锐的人都已看到了同样的事实，但在塞利纳的书中，那些事实却不太一样；甚至与你说的事实也不一样。”

这时，车子已停在一座私人候机大楼前，没有时间回答这个问题了。司机走下车子，给卡特里娜开了车门。她感到司机的脸部已变形了。也许，严寒使他的脸变成这副怪相。维克托从车子里挤出来，重又抓住了车顶，往后一跳，再把那伤残的腿从车子里拖出来。

他们走进灯火通明的房间。柜台上的电话正滴铃铃地响着。卡特里娜向调度员报了伍尔皮的名字。那人说：“好的，你们的塞斯娜号飞机已着陆了。我马上通知飞机滑行过来。”

她把调度员的话转告了维克托，他点了点头，又接着谈起来。“就算你说得对，法国人过去一直受了思想意识的骗。思想意识是统治阶级发出的咒语，是遮盖虚伪的一张网。揭开这张网就会激怒人。这就是塞利纳言词那么激烈的原因。”

“人？某些人吧？”

你与女人偷情，又要你的情妇读一本怀疑爱情的书，而塞利纳的书又是爱情怀疑论之最，这倒有点儿像是给情人的情书。

她走在维克托的前面，上了塞斯娜号；她那鸵鸟皮靴子并没有使她显出多少优雅。她感到笨拙迟钝，毫无女人的优雅风度。她胸前抱着文萨莎的小提琴。在机身旋转着的灯泡发出的红光下，她看着人们搀扶着维克托上了飞机。两位机组人员特别热情地接待了维克托和卡特里娜。这些人经常给大董事长们开飞机，这方面当然是训练有素的。他们的乘客就是他们的客人。要不要来杯咖啡？尝尝刚炸好的油炸饼圈好吗？那来杯威士忌怎么样？他们离开芝加哥时，下午的报纸还没有到。不过，机上有《巴伦周刊》和《华尔街日报》。机内坐位十分豪华，前面空当很宽，腿脚可以随便伸展，供阅读用的灯光十分柔和明亮。身边的控电

板上有不少开关，但是，两位乘客现在都没有心思看书。

驾驶员说：“我们将在米德威机场着陆，再由那儿坐直升飞机到梅格斯机场。”

“好吧，这就行了，”维克托说，“你看？”她理解“你看”的意思是，他没有耽误了她。他把她叫来了，现在，正把她送回芝加哥。他有权力使一切顺顺当当。他举起了威士忌酒杯。为你我干杯。他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但却又显得烦恼不快。他那双眼睛眯成一线，因受到极度的伤害而怒火四射。他的那些权力——给他派来专车专机，享受各种特权——对他来说犹如粪土。只不过像金丝雀的鸟笼那样的小玩艺儿而已。“噢，对了，你自己也能开飞机。”他记起来了。

“不是这种型号的飞机。”卡特里娜说。她把手抬起来在灯光下看了下手表。这时，伊索尔已离开她家了。

突然，一阵引擎的怒吼声打破了机舱内的寂静。什么都听不见了。飞机在盖满碎冰层的机场上颠簸着。接着就全速滑行，终于升空了（谢天谢地）。飞机向西南飞行，并将越过密执安湖上空。在这样阴霾四布的天气是不会看到湖面的。机舱内的布置和陈设清洁整齐，犹如一间客厅，给人一种安全感。她尝了口咖啡——咖啡已经冰冷了，一点也没有热气。她咬了一口涂果子冻的油炸饼圈，很欣赏油炸面团，可不喜欢那冰冷的果子冻。

他要她读塞利纳的书，也许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目的。要有什么特殊的目的，那又为什么此时此刻会谈起这事呢？那么，他那位年迈的贵妇人贝拉，当文萨莎向她介绍同性恋的书时，又是怎么想的呢？他们一家人都是书呆子，不是吗？但如果以为贝拉也是书呆子，那就完全错了，就像你以为维多利亚女王也是书呆子一样大错特错了。维克托不想多谈论贝拉。有时，他谈到什么“某种类型的妻子”。“对某种类型的妻子来说，她们真正的幸福是在于使她们的丈夫无法自由行动。”这话暗示的意思是，一个

七十多岁的老人，差一点死在马萨诸塞州医院里，现在又拖着一条伤残的腿，也马上要失去行动的自由了。你同样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尼亚加拉瀑布冻住。排除情敌的妒忌和内疚的心理，客观地评价一下贝拉，那应该说，她为人高尚。当维克托在马萨诸塞州医院看来几乎就要离开人世的时候，贝拉问他要不要见一下卡特里娜，当时，卡特里娜正躲在一间等候看望病人的休息室里。维克托确实很想见她一下，贝拉就派人把卡特里娜叫来，自己也离开了病房，让他俩最后告别。卡特里娜和维克托手握着手，他几乎已不能言语了。她伤心地痛哭流涕。她对他说，她将永远爱他。他紧握着她的手说：“是的，亲爱的。”他的舌头已经不怎么听使唤了，但她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讲这句话时，态度真诚，口齿清楚。自那次后，她认为，她有权接近他，他对她的感情也应该得到承认；这两点对她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不只是在与一个女人通奸而已；对他来说，她也不只是一个逢场作戏的情妇而已。人之将死，其情亦诚，当她冲进病房时，她已失声痛哭起来。她所忍受的痛苦也使她有资格获得这种权利。他俩之间的关系已合法化了。在病房里的这次告别，犹如为他俩的关系盖上了公章而被认可了。永别了。他快要死了。他放开了她的手，那意思是她该走了——对他来说，感情上已难以忍受了，也许是太痛苦了——她啜泣着走出了病房。她看到，贝拉高高的身影在走廊的尽头，在看着她，也许正在仔细地观察着她。

那么，维克托病愈后，贝拉的豁达大度获得了什么呢？只是使这对情人更易于经常往来了。这时，那位想做拉比的女儿教六十七八岁的母亲怎样用手指抚弄男人的生殖器以刺激他的性欲，怎样进行口交，怎样使用先进的淫具等。这样的女儿，真令人毛骨悚然，简直是在胡闹，多管闲事，真是臭娃娃！（我真想把她的那把小提琴丢到下面的湖里去！这小巫婆！）贝拉竭力表现出自己的尊严，尤其是对维克托这样的丈夫——他会这么说：

“别人得听我们的判决，你是自由的！”最后，维克托自己对“爱情”作出可怕的最后判决——爱情是肮脏的东西；像腐烂发臭的肉，狗都要跑开，但情人们给它浇上一些“温柔的调味汁”，使爱情成为一道美味精致的菜肴，奉献在君王的面前——这就是他要卡特里娜看的书。

但是，在马萨诸塞州医院的病房里几乎快要死去时，他不是这样的。

她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想使她感情麻木，这样，她死的时候——他感到，他活不了多久了——她就不会太痛苦。

但他确实待人粗暴。几年前有一次，他曾对她说，某个叫乔的年轻诗人，很不错，很漂亮，尽管此人好幻想，但对她很殷勤。“你看你会喜欢他吗？”这也许是一种试探吧，但也完全有可能是想摆脱她。他说某某人很有才华（实际上人人都知道他毫无才华），实际上是告诉卡特里娜，他对她的评价是十分现实的——一个动作笨拙的、富有性感的女人，突起的静脉、高低不平的牙床、乳白色的大腿内侧；要是没有这些就毫无吸引力了。她的那些特征正合他的胃口。但是，除了这些特别的气质外，也还有现实的标准。自从他神奇般地康复以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要给她介绍对象了。他甚至在怀疑她，在把她引进了这个富有魅力的世界之后，她自己正在找对象了。如果维克托在羞辱兰格尔的同时，也顺便把她作为羞辱的对象，她是不会感到惊奇的；这样做，那位著名的电影制片人就不可能再成为他的情敌了。维克托真是狡猾透顶。譬如拿今天下午的做爱来说吧，他当时真是出于自己的需要呢，还是仅仅是为了取悦于她？不，不，连多蒂都说：“只有你能引起他的性欲。”这倒是真的。她使维克托新生了。“那熟悉的抚摩，使他起死回生。”她重又唤起了他的情欲。

飞机驾驶舱的门开了。越过驾驶员的肩膀，可以看到仪表盘上的各种指示灯。副驾驶偶尔回头看看两位乘客。过了一会

儿，他说：“飞机有点儿不稳，系上安全带吧。”是一股气流？事情比这糟得多。飞机受到撞击，好像一艘快艇在波涛中颠簸飞速前进。维克托一直怒气冲冲，一言不发，这时也警觉起来。他握住了卡特里娜的手。驾驶员关上了驾驶舱的门。那些塑料杯、酒瓶、油炸饼圈，在脚下都向左边滚去。

“你感到了吗，飞机倾斜得厉害，维克托！”

“他们想爬到气流的上面。在大飞机上，你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了。比这更坏的天气我们也飞过。”

“我可不相信。”

头顶上的灯光越来越黯淡了。卡特里娜的脸上掠过层层阴影。维克托两颊上的红晕好像是用画笔涂上去的。“不会是引擎出了毛病吧，你说呢，维克托？”

“不会的。”他习惯于作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结论不仅要卡特里娜相信，而且包罗宏富。现在，他们坐在塞斯娜号飞机上，因为他应邀要去发表演说。这次旅行对他来说，也是可去可不去的，现在看来却生命攸关，可他安之若素。对卡特里娜来说，更是毫无必要了。他对卡特里娜感到歉意。她坐在飞机上，只是因为他把她叫来的缘故。但是，他然后也想到，他无法理解那种与他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生活。为什么人人都像她那样生活着呢？我知道我自己为什么这样生活。为什么她会那样生活呢？这个问题有点刻薄，这样提出来也有点可笑；事实上，这问题本身就包含着可笑的成分。但一当提出这个问题，他不知不觉地感到，自己面临着一种令人痛苦的结果。假如说，他自己的生活的确有其重要性；这种生活产生了真正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又引起了意义巨大的理智和艺术的改革。这一切都是十分严肃的事。那卡特里娜呢？毫无严肃性可言。离婚，然后追求一位名流——追求感情，追求高雅的享乐？老一套了——毫无严肃性可言！然而，他俩现在在一起，在倾斜飞行的飞机上，身子也都倾斜着。他俩的命运

现在是一致的。他是为了她才来的，她（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他而来的。由于女人相忌，文萨莎使卡特里娜怒火中烧；但她双膝（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富有性感的）仍紧紧地夹住了那把小提琴，保护着它免受损伤。他以前常说，他认为，最隐匿、最强有力的问题，是男女之间的了解，这个问题比政治更深刻。他也知道，卡特里娜对他抱有十分荒谬的幻想——把他从贝拉手上夺走，照料他的余生，并把自己的社会地位提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在他死后，她就会像传说中的女人那样，以学识渊博、聪慧敏锐而流芳百世。这个头脑混乱的卡特里娜，种种形象真令人焦躁不安，既庸俗又那么富有魅力。在她面前，这位善于言辞的人有时竟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他过分地爱上了她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她的仪态介于笨拙与优雅之间，是因为她的手指头对他的感官所产生的神奇的作用，是因为她双膝夹住小提琴的那种哀婉的神情。她关心他，当然胜过关心任何小提琴。那么，请你告诉我，这一切与维克托·伍尔皮的思想又有什么关系！使他对兰格尔真正气恼的是，这家伙竟然说大多数思想是无关紧要的——那意思主要是说，维克托的那些思想是无关紧要的。如果维克托无法解释为什么卡特里娜对他的性吸引力那样强烈——这位使他免于崩溃的爱神，那么，兰格尔的话不是有点道理了吗？如果把卡特里娜作为思考的问题，那真是最无关紧要的了。你什么都可以不想，但绝不能不考虑你自己的存在。否则，你就毫无希望了。当你的祖先赫尔克里斯遗弃你时，你就会感到心力衰竭。此时此刻，你只剩下清醒的头脑，临终前的头脑是绝对的清醒，直至到达死亡的边缘；而现在，他随时都可能越过这一边缘，进入另一边的世界。

以前，他也曾听到过飞机受到气流冲击而格格作响的声音，但从没有像这一次那样；他四周的金属似乎要撕裂开来似的，机上的金属铆钉好像老式的领子纽扣要暴出来似的。机翼终究是十

分单薄的。即使在蔚蓝色的晴空下，两片机翼在空中抖动；看到这情景，你也会想，那只是两片钢板而已。

“维克托，我们又向另一边倾斜了。飞机像一张扑克牌似的在抖动。”

“如果我们掉下去的话……”

“那应归咎于我，是我把你叫来的。”

飞机一度平稳了些。维克托感到奇怪，怎么他的心跳没有加快。当飞机又一次下降时，他既没有气喘吁吁，也没有汗流满面。

“你好像根本无所谓。”卡特里娜说。

“我怎么会无所谓？”

“好吧，维克托，听我说，如果我们随时都会死去，如果飞机失事掉在湖里……我想请你告诉我一件事情。”

“别那么说，卡特里娜。”

“事情很简单。我要你说出来……”

“别胡闹，卡特里娜。这种时候，什么事不好想而想这个！你问我这个吗？你问我我爱你吗？”由于生气，他的声音又尖利起来。他的嘴角向两侧伸展，胡须也变得宽阔起来。他正待发作。

卡特里娜立即打断了他。“现在别跟我过不去了，维克托。如果我们就要死了，你为什么还不肯说呢？”

“你是抓住这个机会想要挟我。”

“如果我们之间没有爱情，那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到这儿来又是干什么呢？”

“我们来这儿，因为你是女人，我是男人。这就是我们到这儿来的原因。”

他的想法真古怪：这等于无神论者施行天主教徒的临终涂油礼。这是在妻子的催逼下，临终的丈夫才点头表示同意施礼。为

什么不同意呢？

过了一会儿，他们感到飞机重又得到了控制，并开始上升了。这时气流平静，飞行平稳。尽管卡特里娜还有点儿提心吊胆，但刚才担惊受怕的心情现在开始消失，情绪也逐渐恢复正常了。

“也许我们能平安无事。”维克托说。

但她感到，此时此刻，她的心情是最不平静了。她在想，上帝啊，我已失去了多少机会啊！

驾驶舱的门又开了，副驾驶员说：“没问题吧！刚才有点够呛的。现在，我们很快就要到芝加哥南郊了。”从米德威机场的控制塔上传来了一阵窸窸窣窣、劈劈啪啪的说话声，但说些什么却听不清楚。维克托沉默不语，但看上去心情好多了。他真能镇静自持！他并不因为你曾做过什么荒唐的事而看不起你。在这方面，他真可算得上是个正人君子。关于电影《陆军流动外科医院》的争执就是一例。他不肯说“我爱你”。如果这样说，他就不诚实了。即使面临死亡他也不肯说，当飞机飞临芝加哥并着陆时，她一直在反复想着她自己刚刚说过的话，也反复想着维克托刚刚说过的话。他们在格格颤动的机翼下走过，迅速地被送进直升飞机。一路上，她还是一直在仔细考虑着他俩刚说过的话。女人总受到下面这种思想的熏陶：别担心，亲爱的。爱情会解决一切问题。使自己值得受人爱，别人就会爱你。大家都疯了，但也没有疯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你实际上也不会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你会挺过去，抱着这种想法，你就开始行动了——这种想法是你那位头脑糊涂的母亲灌输给你的，而这位母亲也真笨得可以！

维克托对她说：“你看到了吗？这些大董事长什么都能办到！”

“看，快六点了吧？我要迟两小时回埃文斯顿了。”

“他们把我送到后，就可开车送你回家。我会吩咐他们送你的。请你帮我把小提琴带回家去。”

“行，我给你带去。”明天，她还得把乐器送到贝因—富希公司去呢！

在梅格斯机场上他那个样子，她实在说不上喜欢。要在别的时候，在这儿着陆她也许会感到兴奋。蓝色的地面照明灯是那么明亮，旋转着的红灯在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既活跃，又清晰。但维克托走下飞机时，动作缓慢，她看了不觉感到心酸。有人上来与他握了握手；他就是金斯莱克。他把他俩让进了一辆大轿车。他们途经水族馆和博物馆，威风凛凛地向前行进，犹如出丧的车队；他们穿过伦道夫街，向北驶过密执安大道，在 333 号大楼前停下。维克托一路上保持沉默；但在走出车子之前，捏了捏她的手。

“明天？”他问。

“是的，明天。祝你顺利！别让那些家伙占你的便宜。”

“别担心。我现在情绪极好。”维克托说。

是的，他现在情绪确实不错。他还把她送回了芝加哥。

卡特里娜坐在豪华的大轿车里，舒适温暖；车子向北驰去。她在想：这时候，维克托正在富丽堂皇的电梯里，迅速向上升，向上升；她不禁感到一阵揪心的痛楚——感到可怜他；可他自己却不感到可怜。他确实也不感到自己可怜。时间紧迫，又有那么多问题要思考。这些没完没了的脑力劳动，使他永远、永远不得空闲。如果他知道她在为他感到揪心的痛楚，他是决不会高兴的。

但是，对他这样地位高的人发怒，并用这样庸俗的陈词滥调去打扰他，这样做合适吗？但，维克托有一个好的地方，那就是对轻微的过错看得很轻，尤其是女人犯的过错，他更能原谅。尽管如此，他还是应该满足她的要求，讲出她所要听的话。他根本

不必担心日后她会利用他讲过的话来责难他。

公路外侧的车道紧贴湖边；在黑沉沉的天空下，湖水猛烈地冲击着木桩和沙滩，惊涛裂岸，激起阵阵白浪——他们刚刚还坐在塞斯娜号上，穿过阴云密布的天空，从广阔无垠的湖面上掠过。

在霍华德大街上，白色的陵墓和凯尔特人十字架面对着湖面。这块美丽的土地竟然成了墓地，真是大煞风景。她很不喜欢在这一段路行车，就对司机说。“警察最喜欢埋伏在这儿抓超速行驶的车子了。”司机无意回答她的话。“请你送我到奥灵顿。”她说。

她从车库里把自己的车子开出来向家里驶去；家门前的车道积满了雪，她只得把车停在远离路边的原先留下的车辙里。

家里一片漆黑，空无一人。起初，她担心艾尔弗雷德回来把孩子抢走了。她走进暖和的门厅，推开那扇漂亮而沉重的白色大门，感到有个有生命的东西抵住了门：原来是苏基——这条可怜的老狗倒还能听到卡特里娜用钥匙开门的索索声。

开亮灯后，她发现，苏里和珀尔放学后曾在起居室里剪过劳作纸。也许是伊索尔让她们剪的吧。她们老是喜欢让别人要她们做这做那，可她们到哪儿去了呢？卡特里娜到厨房里看看有没有留下条子。可墙上贴条子的地方什么也没有。餐室的桌上也什么都没有。她打电话给艾尔弗雷德。他人在，却不愿接电话。她打电话给多萝西娅，打了第二个号码时，电话里传来的是多蒂的录音，卡特里娜一听就感到厌恶——多蒂是在故意作弄人：“铃声一停，请留下大名和口信，谢谢！”那只铃和床一样，也是中国货。卡特里娜说：“多蒂，我孩子究竟上哪儿去了？”接着马上挂了电话，并给克里格斯坦中尉打电话。没有人接电话，她想了一下，是不是该给她的律师打电话。这位律师特别不喜欢他在家里的時候别人去打搅他。现在还不必考虑给他打电话。主要的

是，她其实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可以告诉他；她只是担心孩子的父亲趁她不在家的时候把孩子们拐走了……那她到哪儿去了呢？乘飞机去和情人约会了。

苏基跟着她走进厨房，身子紧贴着她，希望她能带她出去遛遛。卡特里娜若有所失，不禁温柔地抚摩起苏基那黑色的颈项。狗的毛发很厚，可摸上去很容易脱毛。卡特里娜想，我先带它出去走走，同时好考虑考虑该怎么办。因此，她就把系狗的皮带夹在狗的项圈上。邻居家门前的积雪都已铲除干净了，只有戈利格家门前的路上仍然积着雪。狗马上活跃起来。显然，这整整一天没有人想到这条狗。卡特里娜扭动着丰满的屁股，慢慢地走到墙角边，她把帽子向后一推，露出了额头——她太累了，竟然不感到冷。一天的劳累使她的脸都感到隐隐作痛。会不会伊索尔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去了呢？或者带到教堂里去看玩纸牌赌博了呢？但这种可能性是太小太小了。

转过墙角，她发现正好有辆小轿车在她家门口停下来。由于车灯直照着她，看不清那是谁的车。她仍穿着那双鸵鸟皮靴子，快步迎着车子走去，一边叫着：“快，苏基，快走。”

有人正把两个孩子一一抱过积雪的车道，放到门口的人行道上。从那人戴着的浅顶软呢帽和穿着的宽大碍事的风雪大衣以及他的动作上，她就认出是克里格斯坦。

“你到哪儿去了？从哪儿回来？怎么不留个条子？”

“我带孩子们吃晚饭去了。”

“苏里，珀尔，今天过得怎么样？”卡特里娜问。

两个孩子什么也没有说，但克里格斯坦回答说：“我们在伯格·金<sup>①</sup>快餐店吃了晚饭，妙极了。他们的炸牛排与其他快餐店不一样。他们把肉放在烤架上炙烤。后来我们又去了巴士金·罗

<sup>①</sup> 在美国仅次于麦克唐纳的一家新兴快餐公司，分店遍设全国各地。

宾冰淇淋店<sup>①</sup> 买巧克力果汁奶油冻。质量挺不错。”

“你到家里来把她们带出去的吗？”

“不，我从你那个黑人女佣人伊索尔手里接走的。你给她打过电话，是吗？”

“那当然喽！”

“我抽时间来看孩子们，她没有告诉你吗？”

“她要我知道，她五点离开我家。”

“这是她在作弄你，”克利格斯坦说，“我要她告诉你，我会来的。”

“噢，真得谢谢你了，萨姆。”

走进门厅，他帮她脱大衣；他总算把大衣从她疲惫不堪的身子上脱了下来。

这时，卡特里娜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联想。为什么维克托一定得把“我爱你”这句话说出来呢？他去布法罗，是为了她。难道他到那儿去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罗斯福应斯大林的邀请，去雅尔塔，去德黑兰，从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如果说维克托就像罗斯福，那么，一个声称爱他的女人，为什么要迫使他疲于奔波呢？

“这小提琴是谁的？”克利格斯坦问，“以前我没有看到你家里有小提琴。”

他脱下自己的风雪大衣和因放着手枪而鼓鼓囊囊的上装，然后用手搓着晒黑的脸和冻红的眼睛。

她在塞斯纳号上对维克托说：“你好像根本无所谓。”这话她是说对了，尽管维克托竭力否认这一点，当然，除了否认，他还有什么办法呢？她的猜测是，他向往死亡；死了一切也都清楚了。有些思想与死亡紧密相联，只有死亡才能使这些思想在头脑

<sup>①</sup> 美国一家冰淇淋店名，分号遍设全国，品种有三十余种之多。

里清晰地浮现出来。他也许感到自己活得太长了，尽管他爱她，但他无法使这种爱情维持太久了。

“你有没有给精神病医生打过电话？”她问。

“不只打电话呢，特里娜。接电话的秘书说不去也得付钱。所以我亲自去找那医生谈了一下。”

“我也得付钱？艾尔弗雷德应该付钱。医生和你谈了吗？”

“相信我吧！沉默寡言，耽误工作，想爬上警察中尉的职位，那可能吗？我给他的印象是，你是个坚忍不拔的人。他和我有着共同的语言。我正在攻读犯罪学博士学位，因此，我们之间互相很容易了解。我对他说，你不能来，是因为你得了妇科急病。你得去看妇科医生。我是她家里的朋友，代她来向他说明情况。我知道什么样的人才是坏母亲。我当警察的经验告诉我：有吸毒的母亲、色情狂的母亲、武装妓女、酗酒的母亲，等等。从我的谈话中他可以知道，你是一个坚定的人。”

“我得到厨房里去了。孩子们该吃点心了。”

他们摆好了碗和调羹。她用勺子去舀巧克力果子冻。两个孩子也没有问“妈妈，你到哪儿去了”，她们没有要她说明她去了哪儿。她俩把前额的头发都剪成刘海式：两张小脸都毫无表情，但她俩的眼睛确实也有点古怪，好像科幻小说中描写的那种眼睛，炯炯发光，从远处看去也感到不寒而栗。也许，兰格尔曾看到过这样的眼睛。从外星球来的间谍，从空间掉到地球上的种子成长成人，那些小个子的入侵者脑壳里藏的是铀。维克托说得不错，你知道，那些《星球大战》一类的电影对大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使大家甚至怀疑自己的同胞。啊，行了，我现在也有办法把大象的故事写下去了。

她走出厨房对克利格斯坦表示感谢，同时想催他早点走，可他却想留下来，再多听听她的感激话。“这种时候你能帮助我，真太好了，”她说，“伊索尔把我吓了一跳，我真怕艾尔弗雷德会

来把孩子抢走。”

“我愿为你尽力效劳，卡特里娜，”克利格斯坦回答说，“近来你是给维克托迷住了。顺便问一下，他怎么样？我对你的忠诚不企望任何报偿。没有任何附加条件……”

是啊，现在，卡特里娜也只得承认，多蒂的目标是找准了。克利格斯坦表现出一位情场得意者的姿态，谦卑恭顺，却又坚忍不拔。也许，这是因为他是个警察，能够打枪。尽管证据不足，我们姑且假定他是个好人吧，假定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正人君子吧。他就要获得犯罪学博士学位。他会做警察局长，联邦调查局局长，会使小埃德加·胡佛<sup>①</sup>相形见绌。因为艾尔弗雷德把所有的艺术品都搬走了，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但与克利格斯坦这样的人在一起，她才更深切地感到什么才是真正的空荡荡。

“现在，你要是能体谅我的话，萨姆，最好立即回家，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我想锁上门洗个澡。我一定得洗个澡。然后，安排孩子睡觉，自己再吃颗安眠药。”

“真对不起，”克利格斯坦说，“你情绪不好，我也不该再说什么知心话了……”

她站起来，把风雪大衣递给了他。“再给我说什么知心话，我可要彻底垮下来了。”她双手捂住耳朵说，“你这样看着我，我可真要受不住了！”

郭建中 译

<sup>①</sup> 埃德加·胡佛（1874~1972）：曾任美联邦调查局局长（1924~1972）。

# 泽特兰：人格见证

是的，我认识那家伙。我俩小时一起住在芝加哥。他真够绝的。他十四岁那年，我俩成了朋友，那时他就什么都懂，还会热心地告诉你世间万物是怎么产生的。过程是这样的：太初，地球是宇宙间一团融融元素，熊熊发光。然后热雨普降，形成氤氲升腾的大海。在地球一半的历史中，大海是无生命的。后来生命开始出现。换句话说，首先是天文学，然后是地质学，过了很久才是生物学，生物学后面是进化论，然后是史前期，再就是历史——史诗和史诗英雄，大时代和大人物，然后是小时代和小人物，然后是古典、希伯莱书、古罗马、封建制度、天主教会、复兴运动、理性主义、工业革命、科学、民主，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泽特兰于二十年代后期在中西部的时候从书里读到的。他是个聪明的孩子，他的书生气人见人爱。他戴着一副大眼镜，淡蓝色的眼睛显得有些紧张。他的嘴唇丰满，长着孩子气的大板牙，隔得开开的。淡茶色的头发径直往后梳，露出大大的额头。圆脸蛋上的皮肤总是绷得紧紧的。他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但身体却不太好。七岁时，他同时患了腹膜炎和肺炎，然后又是胸膜炎和肺气肿，还有肺结核。这些病倒是彻底痊愈了，但小疾微恙不断。他的皮肤很特别，不能在太阳底下呆得太长。暴露在阳光下

会引起棕色的斑状皮下淤血和褐色红晕。因此，当阳光灿烂之时，他总是拉下遮阳帘，打开台灯看书。但他也绝不是弱不禁风，尽管他只在阴天玩网球，但球技却很精湛。他的蛙泳亦颇引人瞩目，用的是青蛙动作，下唇还像蛙儿似地探出来。他会拉小提琴，而且擅长于见谱演奏。

周围的邻居大多是波兰人与乌克兰人、瑞典人、天主教徒、东正教徒，还有路德派新教徒。犹太人很少，街道破败不堪，建筑都是些平房和三层楼房。后楼梯和围廊都是用粗糙而灰暗的木头搭成。树木是杨榆还有臭椿，草是马塘草，灌木是紫丁香，花是向日葵和秋海棠。当你在等有轨电车时，夏日里酷暑似火，冬天则风剑霜刀。在泽特兰家里，他父亲固执任性，两个未出嫁的姑妈是“无照护士”<sup>①</sup>，专门护理那些出不了门的（通常是濒死的）病人。他们爱读俄罗斯文学和意第绪语诗歌，对文化有狂热的执著。他被鼓励成为一个小知识分子。因此尚未成年，他便是一个小伊曼努尔·康德，既像腓特烈大帝或埃斯特哈齐那样喜爱音乐，又像伏尔泰那样机智诙谐，还像卢梭那样的多情善感而激进，并同尼采一般抛弃诸神，甚至还像托尔斯泰那样献身于心灵与爱的法则。他是积极进取的（有他那不屈不挠的父亲的早期影子），但又有游戏心态。在他的变声期，他不仅研究休谟和康德，也找到了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而将巴黎有名的纪念碑都蒙上条纹床单之类的胡闹也很吸引他。他谈论荒诞的重要性，谈论在游戏般崇高中包含的自相矛盾。他教导我，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准了这一点。知识分子（卑琐的布尔乔亚市民）是自大狂。他身居斗室，胸怀世界。为此，他既有可笑的痛苦，又有尼采所谓的“快乐的智慧”<sup>②</sup>；既是海涅，又是“天堂的阿里斯托芬”。他是博

① 未经过专业训练，有实际经验的护士。

② 原文为德语。

闻多学的小伙子，他就是泽特兰。

芝加哥不缺书籍。二十年代，沿着汽车路都是公共图书馆的门市部。夏日里，在飞转的胶木道上。一九二九年，美国处于崩溃之中。我们泛舟在公有泻湖里，彼此诵读济慈的诗歌，船桨缠住了水草。芝加哥已不复存在，已经没有它的地盘。它已经散入美洲的空间。列车从四面八方汇集于此，邮购物品又从这里发往天南海北。而在这泻湖上，只有打转的小舟，惟湖水共长天一色，同样的澄碧，同样的湛蓝，因为这个大制造中心令人讨厌的力量被窒息了（工厂瘫痪了，冒不出烟来，萧条的工业使大气层得益了）。泽特兰背诵着“在那甜蜜的午夜……”岸上波兰佬的孩子们则向他们大扔石块和烂苹果。

泽特兰学习法语、德语、数学、音乐。他房间里有贝多芬的胸像，还有舒伯特（也戴着圆眼镜）的石版画，舒伯特坐在钢琴前，音乐撼动着他朋友们的心灵。遮阳帘拉下了，灯打开着。胡同里，为防中暑，小贩的马戴上了草帽挡住阳光。泽特兰也挡住了大草原、不定产、芝加哥的商业和劳务。他研究了康德之后，又专心攻读布莱顿、里斯坦·查拉。他摘录了这样的句子：“地球是蓝色的，就像橙子一般。”他满脑子是五花八门的问题。列宁真的打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吗？杜威的《人类本质和行为》中的观点真是无懈可击吗？“有意义的形式”的主张能使绘画硕果累累吗？原始主义艺术的前途是怎么样的？

泽特兰自己也写超现实主义的诗：

绛唇吮吸沉睡的翠峦……

唾沫四溅的教士惹恼电鱼！

泽特兰家的公寓房间宽敞轩朗，但住起来却不堪舒服，带着一九一〇年标准的沉郁风格。嵌在墙内的碗橱和餐具柜，餐室的



护墙板挂着荷兰风格的纺织品，壁炉里装着煤气取暖管，壁炉架上方是两扇污迹斑斑的小窗户。上发条的维克特拉留声机播放《培尔·金特组曲》中的《山神宫中》，夏尔亚宾唱的《浮士德》选曲《跳蚤》，加里·库里奇唱的《拉克美》中的《铃声之歌》，还有俄罗斯的军队合唱曲，他说，马克斯·泽特兰当然给了他的家庭“一切”。老泽特兰是移民，他是慢慢地开创自己事业的。先在富尔顿街鸡市场学做鸡蛋生意，后来成为城里一家大百货公司的采办助理，做奢侈品生意——进口奶酪、捷克火腿、英国饼干和果酱。他壮实得像后卫，下颚间有一条黑缝，大嘴巴。你就是花上一辈子劲也没法使他那尊口摆脱非难的表情。他之所以非难是因为他看透了生活。他的第一个妻子，伊莱丝的母亲，死于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冒，他同第二个妻子生了个弱智的女儿，第二位泽特兰夫人死于脑癌。第三个妻子是第二个妻子的表妹，年轻得多。她来自纽约，在第七大街干过活，有一段前科。正由于这前科，使泽特兰嫉火中烧，雷霆大发，骂不绝口，摔盘子砸碗。“历史。”<sup>①</sup>泽特兰说，继续练他的法语。马克斯·泽特兰是个彪形大汉，体重两百磅，但也不过是发发脾气而已——有惊无险。第二天一早，他同以往一样又站在卫生间的镜子前，用那把兢兢业业的铜制吉列须刀剃胡子，使那张充满非难的脸庞干干净净，用军用刷子将头发抚平，像个美国经理的模样。随后，按俄国人的习惯咬着方糖喝茶，浏览《论坛报》，然后去隆普公司上班，多少还算“按部就班的”<sup>②</sup>，与平常日子无异。他从后楼梯下去，抄近路去高架铁路。他从一楼窗户望进去，能看见厨房里信东正教的父母。爷爷正拿喷雾器对着自己长满胡子的嘴巴——他有哮喘症，奶奶在做橙皮糖，橙皮在蒸汽暖气上干燥了一个冬

① 原文为德语。

② 原文为德语。

天。橙皮糖存放在鞋盒子里，喝茶时用。

马克斯·泽特兰坐在高架列车中，舔着手指翻看厚厚的报纸。高架铁路俯瞰着小砖房，如同精英之桥君临这讨厌的贫民窟。就在这些小房子里，波兰人、瑞典人、爱尔兰佬、西班牙佬、希腊人，还有老黑们过着醉生梦死的日子，充盈着赌博、强奸、野种、梅毒和喧嚣的死亡。马克斯·泽特兰都懒得去看一眼，因为他能在《论坛报》里读到这一切。这小火车有藤制座椅，折叠的手动金属门齐腰高，供乘客上下车。洋铁皮尖顶覆盖着高架铁路的月台。长长的楼梯的每一台阶立面上都有林达宾海姆蔬菜联合公司的广告。缺铁使女士们苍白。马克斯·泽特兰本人也是面容白皙，长着白色的肉嘟嘟下巴，神情尖刻，不过倒不至于让人望而生厌。他走进韦白希大街的销售中心，他在办公室干净利落，打电话随机应变，语音流利晓畅，不过同其他操俄语的人一样，遇到词首 H 音时会有些小磕碰，发同一种柔和的咕啾声。他对事实、表格、价目和合同了如指掌。他站在写字台旁抽着烟，将烟憋在肚里，烟雾从他鼻孔里不绝如缕地飘出来。他低头环顾四周，目光似炬，以犹太人的势利评判着那些放纵不羁、头脑空虚、只知道玩高尔夫球的异教徒，他们敢穿着短裤在球场的限制平道上招摇，他们也会成为他看上去的那样，没有深埋心底的愤懑，没同放纵的纽约姑娘结婚，没有失去母亲的白痴女儿，也没有死过人的房子。马克斯·泽特兰那剪裁得体的上衣所掩饰的结实的大肚子，从裤腿里鼓出来的肌肉强健的小腿肚，那烟味浓烈的鼻子，不露声色的恼怒——不错，在生意圈里，就该是个规矩人。他是一个大零售企业的经理，也确实是个规矩人。他的圆脑袋并不怎么深邃，脸膛儿倒很宽，肌肉发达，心宇间充满自我意识。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梳得很平整。门牙隔得开开的，泽特兰也有这遗传特征。惟有他父亲下巴的那块那没法剃尽的折叠是一个痛苦的象征，而这个使得马克斯·泽特兰显得有些可怜的暗

示又被他那俄国军人的精壮强悍、粗俗放恣的抽烟方式、哑然作响的豪饮烈酒掩盖了过去。他的儿子在朋友间用五花八门的名字称呼他，通常叫他的名字有：将军、政委、奥斯帕维奇、奥兹曼达斯。“我的名字叫奥兹曼达斯，王中之王。您瞧我的工作，陛下，举世无双！”

在他第三次结婚之前，鳏夫奥斯曼达斯从鲁普公司回家时总是带着桃色纸印的《美国晚报》。晚饭前，喝上一杯威士忌，看着女儿。也许她并不笨，只不过是暂时性发育阻滞罢了。他那聪明的儿子告诉过他，卡萨诺瓦在八岁前一直是个脑积水患者，被认为是低能儿，而爱因斯坦也是个迟钝的孩子。马克斯希望可以教会她缝纫。他从用餐方式着手，有一段时间她吃饭的样子实在可怕，但孺子不可教。在她的眼里，家里人的脸都被压缩了，变小了，同猫脸差不多。她说话口吃，步履蹒跚，大腿细长，发育不良。她会在众人面前拉起裙子，她会在没关门的卫生间里细水长流。这孩子将家庭的所有缺点四处喧嚷。亲戚们都很同情，但马克斯感到姑妈和堂兄弟们的这种同情是一种自我庆幸。他冷冷地予以回绝，眼睛盯着前方，拉长他那平直的嘴唇。当人们以同情的口吻同他聊起女儿时，他恨不得立即拧下他们的脑袋。

父亲泽特兰阅读俄语和意第绪语诗歌。他很喜欢结交艺术家、波西米亚服装设计师、托尔斯泰主义者、埃玛·哥德曼和依莎多拉·邓肯的追随者、戴夹鼻眼镜穿俄罗斯衬衣蓄列宁和托洛斯基式胡子的革命者。他参加讲座、辩论、音乐会和朗诵会。乌托邦主义也使他感兴趣。他尊重智者，接受高雅文化，当时的芝加哥的文化氛围是很浓的。

在加利福尼亚路休谟玻尔特公园的对面，芝加哥的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产业工会成员有自己的论坛；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他们兄弟互助会、教堂、舞厅；天主教犹太人有犹太会堂；犹太女会有她们的慈善保育院。一九二九年之后，迭维仁大街上小储蓄银行

倒闭了。一家成了鱼行，养鲤鱼的水池就是用银行大理石砌成的，保险库成了冰库。一家电影院成了殡仪馆。附近，芜藤杂草中建起了一个红色的公共电车库。素食者在“托尔斯泰素餐厅”的橱窗里挂了一张巨大的老托尔斯泰伯爵照片，瞧那胡子，瞧那眼睛，瞧那鼻子！伟人们拒绝了芸芸众生的卑琐和凡俗，包括他们自己身上的凡俗。鼻子是什么？软骨。胡子是什么？纤维。伯爵是什么？高贵种姓，压迫时代的产物。只有爱、自然和上帝才是善良伟大的。

百分之一百工业的现代芝加哥像泄了气的破轮胎，没有绿洲或活水，毫无可爱之处。像泽特兰这样的聪明孩子，尽管也喜欢这世界，但不会长期被表面现象迷阻。没人带泽特兰去钓鱼。他不去森林，也就没有人教他射击，没人教他清洁化油器，甚至没人教他玩台球或跳舞。泽特兰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书籍上——他的天文学、地质学，等等。起初是一团眩目的物质，然后是无生命的海洋，然后是肉鼓鼓的生物爬到岸上来了，简单的生命形式，然后是复杂的生命形式，如此等等。然后是希腊，然后是罗马，然后是阿拉伯代数，然后是历史、诗歌、哲学、绘画。他还穿着孩子的短裤，却已经应附近的研究团体之邀作演讲，论生气盎然，论康德与黑格尔之差别。他俨然一副教授派头，日耳曼式的，神童般的，他是马克斯·泽特兰的秘密武器。老泽特兰是家里的顶梁柱，小泽特兰则是家族的天才。

“他要我成为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泽特兰说，“或者是小伊兹考维兹之类的怪才——在八岁时就成为希腊文和微积分灵童。真见鬼！”泽特兰坚信自己的童年被欺骗了，被剥夺了天使般的人生权利，他认定那些髫龄遭难、天趣荡然、背上童真十字架的老话说得没错。他为什么会病殃殃的？他为什么近视？他为什么肤如菜色？就是因为阴郁的老泽特兰要他呕心沥血，在所不惜。父亲使他成为了受责的沉默羔羊，父亲要求他为世人瞩目，

却从不——真是从不——赞成任何事情。

可以这样说，成为知识分子是人类发展的下一阶段，是人类的历史命运。现在普通大众都在阅读，我们可以向各个方面发展。泽特兰相信这一点，而这一心灵发展的最初阶段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暴行、犯罪、疯狂。泽特兰说，难道诸如《卡拉马佐夫兄弟》之类的书不是这个意思吗？难道封建的农民俄罗斯的理性主义不是产生了腐败吗？难道革命的第一个结果不就是犯上作乱吗？难道不是对现代环境与现代潮流的抵抗吗？难道不是罪恶与自由的可怕抗争吗？难道不是先驱者的自大狂妄吗？成为知识分子就是成为一代新人，这些新人的目的就是祛除他们身上的原始的野性冲动，祛除他们疯狂的劣根性，改变自己，大公无私，热爱真理，变得崇高。

自然，泽特兰被送进了大学。大学等着他。他在诗歌、散文比赛中获奖。他参加了文学协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他同意托洛斯基的观点：斯大林背叛了十月革命，因此他参加了斯巴达克斯青年团，但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又是相当茫然的。他师从卡尔纳普学习逻辑，后来又师从伯特兰·罗素和莫里斯·R·科恩。

上学的最大好处是他可以离开家了，租上一间房子，越脏越好。最好的莫过于位于伍德朗路的刷白之后的前煤仓里。烟煤依然堆放在隔壁的棚子里，从白色木板缝里漏出来。屋子里没有窗户，水泥地上有块似乎随时会散碎的破地毯。里面有一张老橡木桌子，上面有香烟灼迹，还有一盏没有灯罩的落地灯。整座房子的灯光都照在泽特兰的行军床上。租金是每周两个半美元。那真是一方快活的天地——波西米亚式，欧洲式的，尤可称道是，它是俄罗斯式的！房东派奇克说他曾是希里尔大公的狩猎助手，日俄战争爆发时，他被抛弃在堪察加半岛，他千里跋涉，穿过西伯利亚回来。泽特兰可以同他讲俄语。派奇克鹤发鸡皮，蓄着两撇细细的胡子，架着廉价的弯腿眼镜。他在屋后用汽水瓶搭起了一

个小房子，那是推着小车从胡同里收集来的。焚炼炉里烧着垃圾，热风从节气门里喷出来。房东用假声唱着民谣和赞美诗。真没比这地方更好的了：杂乱无章，灰尘乱飞，不成规矩，无拘无束。你可以整夜聊天，白天沉睡不起。无论你怎么想，怎么感觉，有什么新奇念头，悉听尊便。他沉浸在幸福之中，在派奇克的房子里尽享其乐，讲字谜，作演说，说笑话，唱歌曲。他可以是洗衣机、时钟、拖拉机、望远镜。他一个人表演了《唐·璜》的所有角色和噪音——“Non sperar se non m' uccidi..... donna folle indarno gridi.”他再现了宣叙调中的竖琴背景音乐，和圣职者的灵魂离开肉体时的黑管音色。随后他会成为对党代会发表演说的斯大林，或讲德语的卖富勒牌刷子的推销员，或者是击沉美国货轮的潜艇艇长。在实际生活中泽特兰也是助人为乐。他促使别人付诸行动。他为结婚的研究生看管孩子，为病人做饭，为出城的人看管猫狗，在下雪天为困在家里的老太太们购物。眼下，他正处于敦实的孩子和近视的年轻人之间，心中充满古怪念头和新奇主意。他俨然一个方济会修士，充满爱意，却是个傻子，很容易受骗上当。少不更事者。到了十九岁，他已经很有一些狄更斯心肠了。当他在比林医院擦地板挣得了一些小钱之后，就同临床病人一起享用，给他们买香烟和三明治，借给他们车资，陪他们过马路。他对痛苦以及苦难悲惨的象征很敏感，当他进入大萧条时期的商店时总是热泪盈眶。干瘪的土豆，发芽的洋葱，还有映入眼帘的愁眉苦脸的店主。他的猫流产了，因猫妈妈伤心之故，弄得他也悲痛不已。我将死猫从无挡板的肮脏地下室厕所里冲了下去。他总是那样，真让我烦了。我说他将感情倾注于任何东西。他警告我，别那么硬心肠。我说他夸大了一切，他指责我麻木不仁。对两个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这样的争论真够怪的。我感到在大萧条期间，美国化的力量遭到挫折。我们游离了出去，并抓住这个机会使得自己更加外国化。在大学里的文化精

英眼里，我俩是可笑的一对。这些精英们如果不引用威廉姆·詹姆斯、卡尔·马克思，或者维列尔·德·伊斯阿坦和怀特海的语录是没法开口辩论的。我俩分别是威廉姆所谓的那种软心肠和硬心肠的人，但詹姆斯还说过，若是在一天时间里洞悉一座城市发生的一切，那么就连最硬的心也会破碎的，谁也没法使自己心硬得像所需要的那样。“如果你不注意，你会失去同情心。”泽特兰说。他总是这个口吻，他的语言总是那么优雅。上帝才知道他那贵族般的风格是从哪儿来的——也许来自培根爵士，还须加上休谟以及桑塔亚那的一些成分。他在刷白的地下室里同他的朋友辩论，语言非常纯洁而富于音乐性。

他还很喜欢音乐。如果不是哼着海顿的四重奏或鲍罗丁或普鲁考费夫的曲子，他是不会走上大街的。他的外套一直扣到脖子下，拎着手提箱。他戴着毛皮衬里手套的手指摁着小提琴的弦，音乐从他的喉咙和双颊间送出来。他有份好心情，却没有好肤色，他的皮肤是那种黄葡萄的颜色。他胸膛里回荡着大提琴声，小提琴的高音从鼻子里流出来。树木长在用扫帚扫起来的脏雪堆里，扎根于路面下的泥土里，阴沟的渗水滋润着它们。泽特兰和松鼠一起享受着主观能动的特权。

当他进入卡博大厅，热浪立即包围了他。大厅内部是浸礼会特有的棕褐色，质朴无华，清漆照面，很像古老的教堂。楼里灼热，他立即感到扑面而来的热气，它们打在他的双颊上。他的眼镜蒙上了一层雾。他停止了节奏缓慢的鲍罗丁四重奏，叹了口气。叹气之后，他露出广闻博识的表情，喜爱音乐的表情已经荡然无存。他现在对符号论和象征逻辑作好了准备——也是托尔斯基、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杜威的读者。一个肤色难看的敦实小伙子，平整的茶色头发发出绿盈盈的光泽。他坐在硬靠背椅上，掏出香烟，扮演各种人物，他真是天才。在他那起团的毛衣和缺门牙的身体里装着斯基·琼斯，眉头缠结的兹维奇，还有达克·迪薇

——可爱、敏锐、苍白的姑娘——还有克莱海扬小姐，一头红发，结巴得厉害。他现在是出色的逻辑实证主义者。

有那么一会儿，他能以心灵的方式做任何事情，但他并不准备成为逻辑学家，却被理性分析所吸引。人类的情绪斗争从未解决过。带着激情，带着狂热的愚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情绪的斗争也在重复着——冲动、本能、欲望、自我防卫、扩张、对幸福的求索、对正义的求索，存在与逝去的经验，从空无一物到空无一物，穷极无聊。毛骨悚然。命运。现在，数理逻辑能将你从所有这些毫无意义的存在中摆脱出来。“你瞧，”泽特兰坐在那张肮脏的包豪斯式的帆布椅上，滑下的眼镜使他的短鼻子显得更短了。“命题有对有错，但它们都是合理的。莱布尼茨可不是傻瓜。假若你真的知道它是什么，那么它确实就是什么。不过，就如同真正的实证主义者那样，我在这个宗教问题上还没完全定下主意。”

就在那时，整齐划一的芝加哥有着冬日的蓝天，棕色的黄昏，水晶般的寒霜，工厂的汽笛销声匿迹。五点钟。老鼠皮色的雪花与笼子似的小屋。焚炉熊熊，派奇克的铁锹咯咯地插入煤仓。楼上的无线电的响声穿过楼板，传到我们下面来。这是“合并”<sup>①</sup>，舒施尼格<sup>②</sup>和希特勒。维也纳现在同芝加哥一样的冷，但更加阴郁。

“绿蒂在等我。”泽特兰说。

绿蒂长得不错，也算得上会逢场作戏的交际女郎，当然以她特有的方式。她是一位牙齿上咬着木槿花的异教徒美人，一位聪明的年轻女人，她爱一个有趣的男人。她来煤仓看他，他住在她的房间里。他们一起找到了一个英国式的地下室。然后搬进一张

① 原文为德语，尤指1938年德国对奥地利的合并。

② 当时任奥地利总理。

老橡木桌子，用玫瑰色的天鹅绒玩艺儿装饰一番。他们养了猫狗，一只松鼠，一只宠物乌鸦。在他们第一次争吵之后，绿蒂又用蜂蜜涂在乳房上，以示和解。在毕业之前，她借了一辆汽车，开到密歇根城去结婚。泽特兰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一个哲学研究员的职位。大家为他们在肯姆马克大街的一套老公寓里举办了结婚兼告别聚会。才分开五分钟，泽特兰和绿蒂就从走廊两头奔过来，抱在一起，浑身战栗地亲吻着，“亲爱的，突然间你不在那儿了！”

“甜心，我一直在那里，我会永远在那里！”

这两个年轻人如胶似漆，百无禁忌，在公开场合里显示他们的爱，使更多的爱意还没表现出来。他们互相爱慕，况且已经像夫妻那样生活了一年了，还有那些狗、猫、鸟和鱼和植物和小提琴和书籍。泽特兰有模仿动物的天才。他像猫那样给自己洗脸，像狗那样蹲着咬身上的跳蚤，作出金鱼般的怪脸，像鱼鳍那样摆动自己的手指。当他们去东正教堂做复活节祷告时，他学会了跪下来，做出东正教风格的划十字手势。在泽特兰拉小提琴时，绿蒂随着节奏点着头，像是他心爱的节拍器，但拍节稍稍差一点儿。泽特兰总是想显示些什么，而绿蒂也好炫耀。泽特兰说，也许没有什么办法使人类不演戏。只要你知道灵魂在哪里，即便把自己当成苏格拉底也无伤大雅，只有当某人连灵魂都找不到了，却还在演戏，这才是不可救药了。

因此，泽特兰和绿蒂并不是简单的结婚，而是快乐惬意的结合。泽特兰得到的并不是那个可怜的马其顿姑娘——她那念念有声的移民母亲对泽特兰下咒语，诅咒他，而她的父亲摇着手铃穿梭于胡同弄堂磨剪子镩菜刀——泽特兰得到了 *das ewig-weibliche qd*，一种自然而全方位的辉煌力量。而绿蒂则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谁像泽特兰，”她又加了一句：“在各方面都如此。”然后放低声音，声音是从嘴角里发出来的，是以一种黛德丽般的古怪魅

力，用芝加哥人硬邦邦的风格说出来，“我也不是黄毛丫头，我要你知道这一点。”这并非秘密。她同一个叫霍兰姆的家伙同居过，他是一个教育心理学家，修复的兔唇上蓄着胡子。在他之前，她还有别人。但现在她是妻子，洋溢着妻子般的爱意。她熨烫他的衬衣，给他的土司抹黄油，为他点烟，像西班牙少女一般凝视着他，美目流盼，这使有些人感到有趣，这是温柔的热恋，但也惹恼了一些人，而父亲老泽特兰则是怒气冲天。

这对夫妇离开勒赛尔大街车站去纽约，乘硬席车前往。车站看上去很古老，矿山般的。蒸汽升腾到污黑的天窗上。高架铁路的桥墩在冯保兰大街上震动，那里是当铺、军用品商店和廉价理发店的所在。红帽子在搬行车，泽特兰对奥兹曼达斯说起这些黑人搬运工的宫廷做派。姑妈们也在那里，她们并不怎么明白泽特兰的这个稀奇古怪的看法。他谈到了车站的黑色，红帽子搬运工的黑色以及他们必恭必敬的非洲人举止。老姑娘们互相交换的目光表示她们认为他在胡扯，可怜的伊莱亚斯。她们责怪绿蒂。泽特兰的生活刚刚展开，结婚和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员使他激动不已。但感到他父母的阴郁阴影投给了他，使他黯然神伤。泽特兰蓄了棕色的大胡子，他那孩子般的大板牙分得开开的，同这成熟的胡子古怪地结合在一起。他的胸部发达，几乎算得上结实的敦实身材就是他父亲的缩小版。但奥兹曼达斯有俄国军人的举止，他不相信笑逐颜开和蹿跳腾挪的模仿。他直挺挺地站着。绿蒂对每个人都说着友好的话语。她穿戴着苹果花色的连衣裙和相配的无边帽，还有苹果花色的高跟鞋。列车发出碰撞声和喷气声，但依然能听到绿蒂俗气的高跟鞋快步走动的笃笃声。她那东方人的眼睛，她那幽默的乡下人鼻子，她那赏心悦目的胸部，还有泽特兰不断伸手抚摩的柔滑而性感的臀部，都引起了奥兹曼达斯家人沉默而强烈的注视。她叫他“爸”，他以一种权充微笑的表情将烟雾从齿间滤出来。是的，他强作欢颜。马其顿亲家父母

根本没露面，他们坐的有轨电车半路堵车了。

在这悲伤而快活的时刻，奥兹曼达斯在克制自己。尽管他戴着一顶夏天的平顶宽边草帽，上面有一条红、白、蓝相间的条纹，但他还是显得很欧洲化。这位城里的采购经理受过良好的训练，能掩藏和化解心头怒火，他通过收缩有黑纹的下颏来平息自己的火气。他暂时要失去儿子了。绿蒂吻了她的公公，吻了姑妈们，这两位无照护士常在轮椅和临终床边读着罗曼·罗兰和沃维克·迭平的书。在她们看来，绿蒂的妇女卫生方面大可指摘。玛莎姑妈以为时时袭来的气息是由于痛经引起的，其实，还是处女的玛莎姑妈不熟悉女人热天做爱之后发出的气味。这两个年轻人总是抓住机会互相补充。

姑妈们也学着她们哥哥的样，用无经验的嘴唇假惺惺地吻别。绿蒂快乐地叫了起来，他们要离开芝加哥这个世界上最乏味的地方了，并摆脱了乖戾的奥兹曼达斯一家，还有她那当巫婆的母亲和磨刀剪的可怜父亲。她同泽特兰结婚，他的魅力、温柔和聪慧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强上千万倍。

“哦，爸，再见！”泽特兰动情地伸出手搂住他严酷的父亲。

“干正事，读书。做个有用的人。如果碰到什么麻烦，打电报来要钱。”

“亲爱的爸爸，我爱你。玛莎、杜娜，我也爱你们。”绿蒂说，红红的脸庞挂着泪水。她抽泣着将他们一个个吻遍。小两口搂在一起站在车窗旁，挥着手，车滑动了。

皮斯曼克号列车开走了，父亲老泽特兰对着尾车晃动着拳头，顿着脚。他冲着毁了他儿子的绿蒂叫道：“你等着！我会要你的命，五年，或者十年，我一定会要你的命。”他嘶声大吼：“你这母狗——你这肮脏的臭B。”

狂怒中他吐出俄语来，叫出“臭B”！他的妹妹们没听懂。

旭日东升之时，泽特兰和绿蒂仿佛从天上悠然飘进纽约市，这正是坐在皮斯曼克号列车里沿着哈德逊河风驰电掣时的感觉。千万条的青紫新枝倒垂水面，随即蒙上一层玫瑰红，然后是初阳下河水沉甸甸的光亮。他们坐在餐车里，眼皮也沉甸甸的。夜里，座席车里时断时续的瞌睡使他俩目眩眼花，委顿劳乏，喝着有“纽约中央车站”字样的锡壶里倒出来的浓如皂石的咖啡。他们来到了东海岸，这里气象更新，一切更美好。空气里包涵着深深的蕴意。

在哈尔蒙列车改由电力机车牵引，他们踏上了更快更急切的旅程。丛林、长河，还有苍穹，漂浮着飞速退去。桥梁、建筑，最后是隧道，纷纷扑面而来。压缩空气制动闸发出嘶嘶响声，这列流线型火车刹车了，纵横交错的网络闪着黄色的灯，刹车管里的空气从泄气孔里喷出，车门打开了。旅客们拉直自己的衣服，拿着行李川流而出。泽特兰和绿蒂来到四十二大街，这一对来自死气沉沉的芝加哥的难民，在路边上不断地拥抱和亲吻。他们来到了世界之都，在这里，人们的行为举止更深沉，更和谐。在这里，他们可以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地表现自己。在这里，知识、艺术、卓然不群都有立足之地，无须任何借口。泽特兰相信，连出租车司机都理解这一点。

“啊，亲爱的，亲爱的——感谢上帝。”泽特兰说，“这是人类能正常生活的地方。”

“哦，泽特兰，阿门！”绿蒂含着眼泪兴奋地说。

起初，他们住在城北西区，小小的丁当作响的无轨电车依然在歪斜的百老汇上行驶。绿蒂在褐砂石住宅的后部选了一套所谓的工作间。工作间兼卧室，洗澡间兼厨房，盖上一块厚重光滑的木板，浴缸便成了厨房灶台。这可以在洗澡时摆弄煤气灶。泽特兰喜欢这样。你坐在水里就可以煎鸡蛋。当你在喝咖啡时可以聆听到有节奏的滴水声，或者观看蟑螂在碗柜里爬进爬出。烤面包

机的弹簧太紧了，将面包弹到外面来，有时烤焦的蟑螂也会弹出来。天花板很高，但采光不足。壁炉是用小块瓷砖砌成的。你可以从百老汇带回家一只苹果箱，然后烧上十分钟，它就只留下一点儿灰烬和许多弯曲的钉子。工作间成了泽特兰的栖息地，泽特兰—绿蒂地盘：污黑肮脏的门帘，从廉价旧货店里弄来的地毯，扶手光秃发亮的填垫椅子。泽特兰说，这真像大猩猩的蔽身处。窗户正对着一个出风口，这不算什么，泽特兰在芝加哥拉下遮光帘的房间和刷白的煤仓里都住过。绿蒂买了一个桃色瓷罩的台灯，那灯罩就像古代黄油碟那样卷起荷叶边。这房间如同私人祈祷室般阴暗，像昏幽的避难所，这正投主人所好。当我后来参观南斯拉夫的东正教堂时，我认为自己找到了原型，泽特兰栖息地的原型。

泽特兰夫妇住下了。面包屑、黄油、咖啡渣、狗食盘、书籍、杂志、乐谱架、马其顿烹饪的气味（羊肉、酸乳、柠檬、大米），装在球茎瓶里的契林白葡萄酒。泽特兰考察了哲学系，将一摞摞书带回家来，投入工作。他的勤奋也许会使奥兹曼达斯满意，但他总是说，没有什么能真正使那老家伙开心。也许，无论多大的快乐都不会使他感到满意。绿蒂自己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学位，便去一家事务所工作。泽特兰说，这个年轻女人如此活跃，如此有效率，是个多么棒的行政秘书啊。瞧，她办起事来多稳当，起早摸黑毫无怨言，这证明她这个巴尔干吉普赛人是个多么可靠的雇员。他在其中也看到一种悲哀，并为此惊讶不已。他试过办公室的工作，这简直会要他的命。奥兹曼达斯替他找过工作，但例行公事和累牍文案把他的神经都弄麻木了。他在公司仓库里干过，帮助动物学家弄清使榛子、无花果和葡萄干变质的原因，检查各种害虫。这很有趣，但他的兴致维持不了多久。有一个星期他在野生博物馆的工场里干活，学做昆虫栖息用的塑料叶子。他了解到，动物尸体是浸泡在毒液里的。他说，他感到当一

名雇员也是处于同样的境地——一种有毒的环境。

绿蒂正是这样工作的，下午漫长难熬。五点钟，泽特兰和狗等她回家。她终于回来了，带着杂货，从百老汇匆匆回来。泽特兰和卡塔莎在街上急急地迎上去。泽特兰叫道：“绿蒂！”那只棕色的狗在地上抓搔着呜呜叫。绿蒂倦容满面地从地下铁道里出来的，温暖可掬，当初被吻时，从喉咙里发出女低音般的响声。她带回家汉堡包肉和酸乳，给卡塔莎的肉骨头，还有给泽特兰的小礼物。他们依然沉浸在蜜月里，他们在纽约陶然销魂。这种大欢喜，只有动物的狂欢才能相比。他们在楼里同一位通俗作家和他的妻子交了朋友——基廷和盖特露迪。基廷写西部小说，泽特兰称他为荒原的巴尔扎克。基廷则称他为西方的维特根斯坦。于是，泽特兰可以同别人说说自己兴味十足的创造。他大声朗读联合科学百科全书里滑稽的句子，并将基廷最喜欢的小说家黑·里德·哈格德纳入符号逻辑学的语言中去。到了晚上，绿蒂又恢复马其顿吉普赛人的模样，她妈妈的宝贝女儿。泽特兰说，她妈妈是斯科普里的巫婆，用猫的小便和蛇的肚脐下咒。她知晓古代激起性欲的诀窍。显然，绿蒂也知道这些。这使得绿蒂的女性品质很丰富，很深沉，很甜蜜。浪漫的泽特兰为此感铭斯切，溢于言表。

在这丰满充实的甜蜜里，在这巧克力般的生活中，神经兴奋过度，便出现焦虑的苦痛。但他说，这种焦虑本身又是精美的。他解释道，有两种销魂：感官的和病态的。在纽约起初几个月里，生活之丰富超过了他的承受能力。他的肺病又犯了，还发了热，浑身酸疼，小便痛苦。他躺在床上，褪色的深红睡衣在他的腹股沟处和他粗壮的胳膊下绑住了他。他的皮肤变得同过去那样敏感。

在几个星期里，他那多灾多病的童年又回来了。长大成人，新婚燕尔，却又重陷此境，未免可怕，但它也是甜蜜的。童年住

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他被麻醉时，脑袋里嗡嗡直响，他的肚子拉开了可怕的伤口。创口感染，久久不愈。滴下的液体接到了橡皮管里，管子用普通的尿布别针固定住。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但依然阅读滑稽读物。所有医院里的孩子能看的只有滑稽读物和圣经：狡猾的吉姆、蠢人麦克、诺亚方舟、夏甲，以实马利的彩色读物都在这里聚了头。那是一个严酷的芝加哥冬天，早晨，偶像般的金色阳光透过结霜的窗户射了进来，丁当作响的有轨电车在地上爬行。他总算熬到了出院，他的姑妈们在家里喂他骨头汤、热牛奶和黄油酱，还有像扑克牌大小的苏打饼干。患病纽约又将他带回散发着腐烂气息的创口，用尿布别针固定以免掉进肚子里面去的橡皮管，还有褥疮。他不得不在八岁时又重新学走路。一种极早而又真实的生命精力耗竭的感觉，那痛苦、困难、纷繁复杂的化学—电转换和组合，彩色的灿烂光流，以及所有的气味和刺激。这种结合实在是太强烈了，这种飞旋实在是太过分了，它对灵魂造成的麻烦和威胁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一切古怪的存在与生物中之最古怪的人类，我们究竟为何而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清澈的胶质眼睛是如此清晰地看到了颤动着的宇宙，有那么多的人类信息须给予和接受。多骨的皮囊用来思考和储存思想，而模糊的心灵用以感觉。浮游生物，碾碎其他生物，将它们肉调味和加热，再吞食。一种充满了对死亡的认识的生命形式，同时又充满了无穷的渴望。这种奇特的思维警句并非刻意而为。事实正是如此，它们自然而然，不由自主地降临于泽特兰，而此刻的他正与自己探讨彼此纠缠不清的光明和可怕的本质。

于是，泽特兰抛弃了他的逻辑书，它们已经一无所用。同他在八岁时的那些滑稽读物一样，都被弃如敝帚。他不再需要鲁道夫·卡尔纳普，就像不需巴博·麦克纳特一样。他对绿蒂说：“其他一些都是什么书？”她走到书架前，念着书名。当她念到《白鲸》时，他止住了她，她递给他这本大部头书。读了没几页，他

就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去做哲学博士了。海水涌进他的内心世界。密歇根湖的灵魂。他告诉我。大洋般的寒冷正好是发热的身体所需的。他感到被污染了，但他读到了纯洁。他已经进入了一个自我禁锢、不满现状、不求上进的糟糕阶段。他病了，但他想出去。然后，他读了这部令他神往的书，它向他席卷而来，他本以为自己会被吞没，但他并没有被吞没，而是漂了起来。

肉肉的患病之躯冲进了厕所。由于肠胃作怪，他得拖着步子坐到板上，在瓷缸上方，在与污水管相连的泄孔和积水的上方——这种不雅观的姿势是必要的。在他昏花病眼中，地上眩目的马赛克恍若六角形铁丝网，大洋的蓝紫色也出现在药箱镜子的斜面上。鲸的白色力量，浴缸给予它闪现的形象。抽水马桶就在那里，反胃，还有舒适的肠胃气味又飘回童年，古老的棕褐色。还有嘶哑的咳嗽引起的恐慌和甜蜜，以及发烧引起的热带般的溽湿。但大海也升起来了，一直穿过通风管，往西，左转到哈德逊河。大西洋就在那里。

他认定，他生活中的真正事业同富有理解力的眼光有关。他一直在研究哲学中普遍特质的相似性理论。他原先对“相似”的本质已有一种认识，但它已经完结。当他生病时，他变得处事果断。他发了虚汗，拳头放在嘴边。瞪大眼睛，咳出了蓝色的痰。绿蒂在他咳嗽时为他端着茶杯。他清清喉咙对绿蒂说：“我想我没法再待在哲学系里了。”

“这很使你担心，是不是？有天夜里你睡梦中还说到哲学。”

“是吗？”

“说着认识论之类的梦话。我不明白那玩艺儿，这你知道。”

“哦。不过，我也不怎么明白。”

“但是，宝贝，你不必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转到另外方面上去，我会一直支持你的。”

“哦。你真是可爱的人儿，但我们必须没有研究员工作也

能过下去。”

“这又有什么？那些贱种本来就没有给你足够的生活费用。泽特兰，亲爱的，让钱见鬼去吧。我能看出来，你是因为那本书发生了心灵变化。”

“哦，绿蒂，这真是个奇迹，那本书。它使我离开了这个世俗的世界。”

“这是什么意思，泽特兰？”

“我是说，它把你带出了心灵外化的世界，或者说带出了由普通社会实践的或心理习惯引起的与世隔绝的虚构，它给了你最根本的自由。而真正使你从这些社会实践和心理习惯的虚构中解脱出来是另外的虚构，艺术虚构。没有诗歌确实也就没有人类生活。啊，绿蒂，我一直渴望符号逻辑学。”

“我现在就想读那本书。”她说。

但她并没怎么看下去。大海的书是给男人看的，而且她也并非书生气十足；她太好动了，任何书她都没法耐着性子读下去。那是泽特兰的知识范围。他会告诉她她需要知道的有关《白鲸》的所有信息。

“我必须去同艾德曼教授谈谈。”

“只要你恢复体力，就去谈，然后就离开，离开就行了。那样更好。你何必去当什么教授？哎呀，那狗！”卡特莎正对着邻院的一个什么动物嗥嗥狂吠。“闭嘴，你这母狗！有时我真讨厌这可恶的狗。我感到她就在我的脑袋里叫唤。”

“把她送给那个洗衣服的中国伙计，他喜欢它。”

“喜欢她？他会煮了它。现在你瞧，泽特兰，你什么也别担心，去它的逻辑。好吗？你能做许许多多的事情。你懂法语、俄语、德语，而且你的脑袋很聪明。我们的生活不需要很多的东西。我也不要什么花里胡哨的奢侈品。我是在联合广场买东西的，那又怎么样！”

“有美妙的马其顿姑娘投怀入抱，”泽特兰说，“其他一切无关大局，上帝保佑你的豪乳，你的坦腹，你的丰臀。”

“如果你的热度在周末降下来了，我们就去乡下，去基廷和盖特露迪那里。”

“爸爸要是知道我从哥伦比亚辞职会不高兴的。”

“那又怎么样？我知道你爱他，但他总是怨天尤人，你根本没办法使他开心。嗯，也去他的。”

他们在一九四〇年搬到了城里，在贝利克街住了十多年。他们立即成了格林尼治村里著名的一对。在芝加哥，他们不知不觉地就成了放纵不羁的波希米亚人，而在格林尼治，泽特兰被认同于文学先锋派和政治激进派。俄国人入侵芬兰后，激进政治遭到了嘲笑。马克思主义者在争辩工人的国家会不会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对泽特兰来说实在是太无聊了。然后便是纳粹和苏联签订条约，战争爆发了。康斯坦丁是在战时出生的——绿蒂想要他有一个巴尔干名字。泽特兰想服兵役。当心灵主导着他的行动时，绿蒂总是支持他，而且还支持他对抗他的父亲。他父亲当然是一脸非难。

郭少波 译

# 银 碟

人死了，你该怎么办呢？我这里说的的是一个老父亲的死。如果你是一个现代人，今年六十岁，又见多识广，就像伍迪·塞尔伯斯特那样，你怎么办呢？就拿居丧这件事来说吧，而且就是现在。在当代这个背景下，你怎么为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居丧呢？他双目几乎失明，心脏扩大，肺部积水，而且已经颤颤巍巍，步履艰难，全身散发着臭气——老年人特有的霉臭气。老到了这种地步！我看，你怎该像伍迪说的那样，现实一点。想想我们这个世道是个什么世道吧。报纸上天天登的都是这样的事：根据人质的叙述，卢夫特汉茨客机<sup>①</sup>的驾驶员在亚丁曾经双膝跪在地上，恳求巴勒斯坦恐怖分子饶命，但他们还是开枪打穿了他的脑袋。后来他们又被别人杀死，别人又被别人杀死，或者被自己人杀死。你在报上念到的，电视上看到的，饭桌上议论的，都是这一类新闻。我们现在知道，整个人类社会每天发生着的事情，就好像是一条在全球爬行的散布死亡的蠕虫。

伍迪，南芝加哥的一个商人，可不是愚昧无知的人。他所知道的词汇远远超过了一个瓷砖承包商（办公室、休息室和厕所他

---

<sup>①</sup> 西德航空班机。



麻。大家尽情享受这美味。那是父亲参加的最后一次盛宴；他也是个喜欢冒险、目空一切的人。伍迪将那些从非洲带来的大麻种子种在后院里，想让它们生长，但是没能成功。不过，在他停放林肯大陆牌轿车的库房后面，他倒是种了一小块地的大麻。伍迪并不想干什么坏事，但是他不喜欢完全受法律的约束。这仅仅是一个自尊心的问题。

过了那一年的感恩节，他爸爸的精神渐渐不济了，好像他身上有洞，在缓慢地漏气一般。这种状况延续了好几年。他一会儿住院，一会儿出院，体力越来越衰弱，神志也开始恍恍惚惚，即使是在抱怨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的思想也难以集中。只有每个星期天，当伍迪按期来陪伴他的时候，他才觉得好受一会儿。父亲莫里斯是个业余弹子爱好者，就连那位职业圣手威利·霍佩也怕他三分。但是现在，哪怕是最容易得分的球他也没办法打了。他只能在心中设想应该打如何如何打；他开始从理论上研究起三联弹这个大难题。海琳娜，那个和他像夫妻一样同居了四十多年的波兰女人，如今也上了年纪，不能去医院里照料他，因此这件事情就不得不由伍迪来包办。伍迪的母亲——她已经皈依了基督——同样需要人照顾，她已八十多岁，也常常住院。他们每个人都有糖尿病、胸膜炎、关节炎、白内障，而且都离不开心脏起搏器，每个人都是靠着躯体才能活到现在，而现在，他们的躯体已经在逐渐消亡。

伍迪还有两个妹妹，她们都没结婚，如今都已年过半百；她们是虔诚的基督徒，为人也很正派，如今依然和妈妈住在一幢完全是基督教风格的小平房里。伍迪承担着她们的一切费用，有时候还得把其中一个（她们都变成了多病的老姑娘）送往精神病疗养院进行疗养，不过病情并不严重。他的妹妹当年都是绝色的女子。但是这两个可怜虫，却没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这些人各有自己的信仰，因此不得不彼此分开——妈妈皈依了基督；两个

妹妹相信原教旨主义；爸爸呢，只要他还能看报，就只看他那份意第绪语的报纸；海琳娜则是个天主教徒。至于伍迪自己，既然对神学有了四十年的研究，他宣称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爸爸的宗教知识，不会比那份意第绪语报上讲的多多少，但是他叮咛伍迪务必将他葬在犹太人中间。现在，他躺在那里，穿着伍迪到火奴鲁鲁参加瓷砖承包商大会时买给他的那件夏威夷衬衫。伍迪没让殡仪馆里的人给他穿衣服，而是自己来到停灵的大厅，亲手给遗体穿上那件衬衫。为了确保能够迅速腐烂，老人像本－古里安<sup>①</sup>一样，是躺在一副薄棺材里下葬的，这样的安排完全是按照伍迪的意思办的。他站在坟墓旁，脱掉了上衣，将它叠好，然后卷起衬衫袖子，露出长满雀斑的二头肌，朝着停在旁边的小推土机挥了挥手，叫它让开，自己开始将土铲入墓穴。他的那张大脸下端宽阔，上端渐渐变窄，活像一座荷兰式的房子。他那排整齐的下齿咬着上唇，一铲一铲地尽到了做儿子的最后责任。他的身体非常健壮，所以他的脸涨得通红，绝不会是因为铲土的缘故，而是因为他感情非常激动。葬礼完毕之后，他陪同海琳娜和她儿子米托希回家——米托希在体育馆里为曲棍球和篮球比赛弹奏风琴；既然这个职业需要挑起观众的激动情绪，干这一行的人也就必须非常机灵——然后又在那里和他们喝了一点酒，对那位老太太说了一番安慰的话。海琳娜确实很伤心；对于莫里斯，她始终是一片真情。

打那以后，伍迪整个星期一直很忙。他得外出承包生意，处理公司的业务，还得履行家中的种种责任。他单独一个人住；他的妻子、他的情妇也是一样：各人都有自己的住处。他的妻子和他已经分居十五年，但是还没学会自己照料自己，因此伍迪每个星期五都得为她采购，把她的冰箱装满，这个星期还得陪她去商

<sup>①</sup> 以色列政治家，曾两度担任以色列总理。

场买鞋。每个星期五的晚上他照例要和海伦住在一起——海伦是他实际上的妻子。星期六是他每周一次的总采购日。星期六晚上他要陪伴母亲和妹妹。因此，他一直无暇哀悼已故的父亲，只能偶尔自己提醒自己：“今天是入土后的第一个星期四。”“第一个星期五，天气晴。”“第一个星期六，他该渐渐习惯了吧。”他有时也会低声喃喃自语：“啊，爸爸。”

但是到了星期天，当各种各样的教堂钟声——乌克兰的、罗马天主教的、希腊的、俄罗斯的、非洲卫理公会的——此起彼伏，响彻整个南芝加哥的时候，他真正体会到了悲哀的滋味。伍迪的办公室设在他的货栈里，他在顶层为自己造了一个非常宽敞舒适的套间。因为他总是在星期天早晨七点钟离开这里去陪他的父亲，所以已经记不清塞尔伯斯特瓷砖公司的周围究竟有多少教堂。他听到钟声的时候仍在床上，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了自己是多么可悲。一个六十岁的人，一个讲求实际、注重物质、而且又是饱经世故的人，竟会突然感到如此痛苦，这是一件叫人很不好受的事情。每当心境不好的时候，他总相信只要喝点什么就能解愁。因此就想：我该喝点什么呢？可以帮助解愁的东西有的是：他的地窖里藏着整箱的苏格兰威士忌，还有波兰的伏特加，阿尔马耶克的白兰地，摩泽尔的甜味酒，布尔戈尼的葡萄酒；冰箱里也有牛排和野味，还有阿拉斯加的大螃蟹。他一向出手阔绰，这些东西都是成箱成打买来的。但是待他下床之后，除了一杯咖啡之外，却是什么也没吃没喝。趁着煮咖啡的时间，他穿上一件像是日本摔跤运动员似的衣服，坐下来陷入了沉思。

每当周围的事物显出本来面目的时候，伍迪总是很受感动。屋顶的桁条是本色的，高层公寓里不加修饰的水泥柱是本色的。不论什么东西，一旦经过修饰就不好了。他讨厌伪装修饰，石头是本色的，金属是本色的。星期天的这些钟声也很正直。它们冲破束缚，震撼着，振荡着，它们那回荡在空中的轰鸣声对他很有

好处——洗涤了他的肠胃，净化了他的血液。一口钟就好比一条声带，不能同时告诉你两件事情，伍迪静静地倾听着。

钟声与教堂向来和他有缘。他多少也算是一个基督教徒。按出生，他是犹太人，长相也是犹太人的，同时带点儿易洛魁人或是切罗基人<sup>①</sup>的味道。但是他的母亲早在五十多年前，在她妹夫的影响下，皈依的基督教；她妹夫科夫纳博士原是研究犹太法典的学生，但是后来离开了辛辛那提希伯莱联盟学院，当了一名基督教牧师，建立了一个慈善机关。伍迪从小就从他那里受到了基督教的熏陶。伍迪的父亲现在已和这些原教旨主义者分道扬镳，他说犹太人去基督教的慈善机关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得到些咖啡、腊肉、菠萝罐头、隔天的面包以及牛奶、牛油。即使他们不得不听牧师的布道，那也关系不大——在那个萧条的年代，你没办法过于讲究——不过他也知道，他们后来又把腊肉卖掉了。

福音书里说得明明白白：“拯救世人要靠犹太人。”

资助科夫纳博士先生的都是些有钱的原教旨主义者，其中又以瑞典人为主；他们迫切希望改变所有犹太人的宗教信仰，从而使基督早日再次降临。这些支持者当中，最起劲的是一家大规模乳制品企业的老板的遗孀斯科格隆太太，伍迪受到她的特别恩宠。

伍迪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扔下了他那脾气古怪信仰基督的妻子、皈依了基督教的儿子以及两个小女儿，和在他店铺里工作的海琳娜同居。一个春天，父亲来到家中的后院，对伍迪说：“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家之主了。”伍迪当时是在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里打杂，给高尔夫球场清除蒲公英。父亲来到后院时穿着一套好衣服，不过有些不合时令，太厚了些。当他脱下那顶软呢帽的时候，额头的皮肤上露出一道深深的箍痕，脑门上沁出了一颗颗

<sup>①</sup> 均属北美印第安人血统。

的汗珠——比头发还多。他说：“我就要搬出去了。”父亲虽然很不安，但还是要走——他已下定决心。“不行，这样的生活我没法过。”想到父亲简直不能不过的那种生活，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伍迪完全能描绘出它的种种情形：怎么在弹子房里打弹子，怎样在铁路桥下掷骰子<sup>①</sup>，或是在布朗—科佩尔俱乐部的楼上打桥牌。“你就要做一家之主了，”父亲说，“别担心，我已经为你们申请社会救济了。我是刚从沃班西亚大街来，从救济站来。”怪不得会有这套衣服和这顶帽子。“他们马上就会派人来了解情况。”他然后又说，“你得借点钱给我买汽油——你攒下来的糖果钱。”

既然父亲没有他的帮助便走不了，伍迪也就把他在温纳特卡“日落乡村俱乐部”里挣的钱全给了他，他父亲觉得自己传授给儿子的宝贵的谋生之道，要远远超过那几元钱；而他每次哄骗儿子的时候，那只鹰钩鼻和那张红通通的脸，总是露出一副犹太祭司长般的表情。儿童总是从电影里获得最最美妙的启示，因此他们把他叫做理查德·迪克西；后来有了连环漫画，他们又管他叫迪克·特雷西。

伍迪现在听着那颤抖的钟声，回想起这段往事，发现自己当时是在用钱帮助父亲把自己遗弃。哈哈！他觉得这件事情实在有趣——尤其是他父亲的那种态度：“给你一个教训，看你以后再相信你的父亲不。”因为，这是现实生活，是不受约束的本性的一个写照，它和宗教与虚伪完全背道而驰，不过它的主要目的在于教人不要做傻瓜，它是对于愚蠢的一种嘲弄。父亲很讨厌科夫纳博士，这倒不是因为他背叛了犹太教（父亲才不在乎哩），也不是因为那个慈善机关完全是骗人的鬼把戏（他承认博士本人是诚实的），而是因为科夫纳博士实在愚蠢：他说话像个傻瓜，干

<sup>①</sup> 掷骰子是非法的赌博活动，因此必须隐蔽进行。

的事情又是弄虚作假。他甩起头发时的腔调很像是帕格尼尼<sup>①</sup>（这可是伍迪自己补充上去的，其实他父亲连帕格尼尼的名字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件事情可以证明他不是精神领袖：他之所以能使犹太女人改信基督教，是因为他偷走了她们的心。“他把那些贱女人弄得神魂颠倒，”父亲说，“他本人甚至一点也不知道。我敢发誓，他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会把她们的心偷走的。”

另一方面，科夫纳也常常警告伍迪：“你父亲是个危险的人。当然，你是爱他的；你应该爱他，应该原谅他，伍德罗<sup>②</sup>，但是你的年龄也不小了，你应该懂得他过的是一种罪恶的生活。”

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父亲的罪行犹如孩子犯的错误一样，因此在一个孩子身上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母亲犯的罪也是这样。做妻子的难道不也是孩子吗？母亲常说：“我希望你祈祷的时候别忘了那个狠心的家伙。瞧他对我们有多狠，但是只许你为他祈祷，不许你去见他。”但是伍迪常常和他见面。伍德罗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既圣洁虔诚，又亵渎神明。他接受了耶稣基督，把他当做自己灵魂的拯救者。丽贝卡姨母利用了这一点，把他叫来干活；他也不得不在丽贝卡的手下干活儿。他来到慈善救济机关，充当了看管房屋的打杂工。冬天，他得给锅炉加煤，夜里常常睡在靠近锅炉房的弹子台上。他也常常撬开储藏室的锁，拿点菠萝罐头，用小刀从大块的腊肉上割下几小块，不烧不煮就往嘴里吞。他天生是个大个子，肚子总得填满才行。

只有到了现在，当他呷着梅利塔咖啡的时候，他才自己问自己：就真是那么饿吗？不，他只是喜欢斗气罢了。当他拿出小刀站在木箱上去割腊肉的时候，他是在和丽贝卡·科夫纳姨母进行

---

① 帕格尼尼（1782~1840）：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家。

② 伍迪的爱称。

斗争。丽贝卡姨母对这些事一点也不知道，她怎么能证明伍迪，这个诚实、健壮、目光坦然、性格直爽的小男孩竟会是一个贼呢？每次丽贝卡姨母朝着他看的时候，他心里明白，她从他身上看见了他父亲的影子；从他鼻子的线条、眼珠的转动、厚实的身体、健康的面色，她看到了那个心术不正的大恶棍——莫里斯。

你可知道莫里斯以前是利物浦街头的一个流浪儿——伍迪的母亲和姨母按出生来说都是英国人，莫里斯全家是波兰人，他们是在前往美国的途中把他扔在利物浦的，因为他当时眼睛得了传染病，他们怕到埃利斯岛后会被遣返。他们也曾在英国停留几天，但是莫里斯的眼睛还是泪流不止，结果只好将他扔下，他们是偷偷溜走的。莫里斯不得不在十二岁就开始在利物浦独自谋生。母亲的出身要好一些，那时父亲睡在她家的地窖里，后来爱上了她。十六岁的时候，他乘着海员闹罢工的机会，在一艘船上当了一名铲煤工，随船横渡大西洋，后来在布鲁克林偷偷上了岸。他变成了一名美国人，但是美国当局一直不知道这件事。他虽然参加了选举，但是并没有证件；他也当过司机，但是没有驾驶执照；他什么税都不付，他抓住每一个机会赚钱。如果依次排列，他平生最大的爱好是女人、弹子、纸牌和骏马。他果真爱过谁吗？（因为他实在太忙）对，他爱过海琳娜。他爱过自己的儿子。直到今天，母亲依然相信父亲最爱的是她，并且一直希望他能够回到自己的身边。这样就给她提供一个机会，摆一摆女皇的威风——她手肘圆润丰满，还有一张已经枯萎了的俨然维多利亚女皇的脸庞。“我已经吩咐两个女儿，绝对不许他进门。”她说，说话的语气活像是印度女皇。

这个星期天的早晨，钟声撞击着伍迪的灵魂，使它不停地回旋，从室内转到室外，从过去转回到这幢结构奇妙的货栈顶楼上的角落。那钟声此起彼伏，金属和金属撞击着，声波一直扩散到仲秋季节的整个南芝加哥，扩散到它所有的炼钢厂、炼油厂、发

电厂，扩散到所有那些匆匆赶往教堂做弥撒或是唱圣歌的有身份的克罗地亚人、乌克兰人、希腊人、波兰人和黑人。

伍迪自己从前也是唱诗班的优秀歌手，他至今仍然记得那些赞美诗。他以前也曾当众宣告自己改变宗教信仰。丽贝卡姨母常常打发他去坐满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教堂，当众宣布他，一个犹太小男孩，改信了基督教。她为此赏他五角钱——她负责出纳、记账，是慈善机关的总管兼财务主任。博士先生对这些事一概不闻不问。他的职责在于激起热情。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教士。伍迪自己呢？他同样充满激情。他对博士先生非常钦佩；博士先生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过着较好的生活。但是除了较好的生活，余下的就是芝加哥了——芝加哥的种种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那么自然，因此没有人对它们提出疑问。比如 1933 年，（那是多么遥远的时代啊！）在“本世纪进步世界博览会”期间，伍迪那时是个苦力，他头戴一顶尖顶草帽，撒开健壮有力的腿，拉着一辆人力车快步小跑，而坐在车上酩酊大醉的乘客——身体粗壮、皮肤红润的农民，则哈哈大笑，纠缠着要他们为他们找妓女。那时他虽然已经是神学院里的一年级学生，但当那些妓女求他拉些生意的时候，他觉得为她们拉拉皮条，从两边讨点小费，这也没有什么不好。有次在格兰特公园，他和一个健壮的女人亲嘴，但是那个女人得赶回家去给儿子喂奶。她和他紧挨着坐在一辆开往西区的有轨电车上，一路上她拧着他那人力车夫特有的大腿，奶水湿透了她的上衣，散发出一股奶味。那是罗斯福街上的一辆电车。他已不记得当时在她和她母亲的那间房里，是不是有其他的汉子，他惟一记得的，就是那股强烈的奶味。第二天早晨，他照样念他的希腊文的新约全书，并不觉得这中间有什么矛盾，光照在黑暗里——to for en te skotia fainei——黑暗却不接受光

明<sup>①</sup>。

当他握着车杠，在博览会广场上飞跑的时候，他的心中有个想法——和这些进城寻欢作乐、追求肉欲的彪形大汉并无任何关系：一切的目的、目标和宗旨都是（他无法解释为什么会这么想。一切的现实都和这种想法相反），或者说上帝的想法是：这个世界应该是个爱的世界；它迟早会获得新生，成为一个充满了爱的世界。他是不会对任何人吐露这个想法的，因为他自己也看得出这想法是多么愚蠢——个人的愚蠢之见，然而这种想法却是他的一切感情的中心。与此同时，丽贝卡姨母对他所说的那句话也是对的，不过那完全是对他一个人说的，甚至是贴在他耳边说的：“你是一个小骗子，跟你父亲一个样。”

这句话也确实有些道理，或者在丽贝卡这样一个性情急躁的女人看来，不是口说无凭的。伍迪成熟得很快——他非得这样不可——但是他心里又想，他怎么能指望一个十七岁的小青年去理解一个中年女人，而且又是个割掉了一只乳房的女人的想法和感情呢？莫里斯对他说过，只有受到冷落的女人才会碰上这种事，那是一种标志。莫里斯说，女人的乳房如果没有人摸，没有人吻，它就会生癌，以示抗议。癌是肉体的一种呼声，在伍迪看来，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他曾在想像中把这个理论应用于博士先生，结果相当灵验——他无法想像博士先生会怎样对待丽贝卡姨母的乳房！莫里斯的这个理论使伍迪一看到乳房就联想到汉子，一看到汉子就联想到乳房。就是现在，他也依然如此。如果真有哪个男人不受父亲那套有关性的理论影响，这个男人必定是少有的精明；而伍迪却没有那么精明。对于这一点，他自己心里很清楚。就他个人经历而言，为了不使女人惨遭这种不幸，他曾自不量力地花过很多气力。这是本能的需要。他和他父亲都是粗

<sup>①</sup> 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五节。

俗之辈，但是即使再粗俗的人，也会有一些细腻的思想。

博士先生在传教，丽贝卡在传教，有钱的斯科格隆太太在埃文斯顿那边传教，母亲也在传教。父亲站在肥皂箱上也传过教。每个人都在传教。迪维逊街从头到尾，几乎每盏路灯下面都有人发表演说：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单一税主义者、犹太复国主义者、托尔斯泰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简直应有尽有。有的发牢骚，有的鼓吹某种希望，有的宣扬某种生活方式或者救世之道，有的则表示抗议。为什么历史累积下来的愤懑与忧虑，一旦移植到美国就脱颖而出呢？

不过那位漂亮的瑞典移民艾西（他们念奥西）是支持科夫纳博士的。艾西原是斯科格隆家的厨娘，后来嫁给了他们家的大少爷，结果变成了一个笃信宗教的有钱寡妇。她当年的身材必定很像合唱团的女歌手，而她当时把发辫编成一个高髻的技艺，现在的妇女看来已经不再知道。艾西把伍迪置于她的特别保护之下，为他付了神学院的学费。父亲说……但是现在，在这个钟声一停止就立即陷入死一样寂静的星期天，在这个芳草如茵的秋日，在第一次霜还没有降下以前，你肺部的血液比在酷暑的日子里流得更快，每次呼吸，都会感到一阵疼痛，仿佛你肌体里的铁质急需氧气，仿佛秋寒随着呼吸直送入你的体内。可是父亲，埋在六英尺深地下的父亲，永远也感觉不到这种愉快的刺激了。最后一次的钟声依然在晴朗的天空中不断地回旋震荡。

每逢周末，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那种空虚又来到了这幢仓库，从门下面钻进了伍迪的套间。这种在星期天感到的空虚，就和教堂平日里的空虚一样。每天上班之前，在把卡车和工人分派出去之前，伍迪总是穿着那套达爱迪装<sup>①</sup> 缓缓漫步五英里。但是

<sup>①</sup> 一种很像是运动服式样的便服。

今天，他还得为他的父亲守孝，虽然他心中很渴望出去走走，排遣一下心中的忧伤。今天早晨，孤独之感侵袭着伍迪的心头。他想，只有我和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和我。这就是说，总是有些事情在起间隔作用，譬如上街去买些什么，拜访朋友，画上一幅画（他是一个很有创造性的业余画家），按摩或是吃饭——都像一块盾牌，将他与那个把世界当做是它贮藏库的恼人的孤独隔离开来。但是，啊，爸爸！上个星期二，伍迪还在病床边陪伴他父亲，因为他老是要把静脉输液针拔出来。护士把针重新插进去后，伍迪便在她们惊奇的目光下，爬上病床，双臂抱住挣扎着的老人。“忍着点，莫里斯，莫里斯，忍着点。”但是他父亲依旧有气无力地摸索皮管。

钟声停止后，伍迪还没有发现他的王国，塞尔伯斯特瓷砖库房已静如死水一潭。他听到和看到的，只是一辆芝加哥的红色老式电车，那颜色就和即将给赶进屠宰场的菜牛差不多。这种电车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就已经绝迹——它们速度低，车身太宽，座位是用硬藤条编的，还有许多供站着的乘客拉手用的铜吊环。这些电车每一英里要停四站。开起来颠簸摇晃，散发着一股石炭酸或是臭氧的气味；每次气压机充气，车身就要跳个不停。售票员拉着一根打了结头的带子发着开车或停车的信号，司机则一路用脚跟不停地踩着脚铃。

伍迪仿佛又看见自己和父亲乘着这样一辆电车在大风雪里行进。他们两人都穿着羊皮外套，手和脸冻得发痛；车门一开，雪花就从后面的平台吹进来，飘到地板上的直缝里，车厢里的那点暖气根本别想把它们融化。据发起建造这条电车线的人说，西马路上的这条电车线是世界上最长的电车线——仿佛这也是一件值得大肆夸耀的事。不知是哪位制图员，用丁字尺一画就画了二十三英里；电车轨道的两边尽是个些工厂、货栈、机器行、废车堆放

场、电车停车场、煤气站、殡仪馆、六层楼的公寓、公房以及专门堆放垃圾的场地，从芝加哥南边的草原一直延伸到北边的埃文斯顿。伍德罗和他父亲是到埃文斯顿北面，豪尔德街还得再过去一点，去见斯科格隆太太。到达终点站后，他们还得再步行五个街区。此行目的何在？是为父亲去借钱。父亲好不容易才说服伍迪带他来的。这事如果被母亲和丽贝卡姨妈知道了，一定会大发雷霆的，伍迪心里直害怕，但是他没有办法。

莫里斯跑来对他说：“孩子，我碰上麻烦事了。糟糕透了。”

“什么事，爸爸？”

“海琳娜从她丈夫那儿偷偷拿了些钱给我，现在一定要赶在老布杰克发现之前放回去。要不然他会把海琳娜杀死的。”

“海琳娜为什么要把他的钱拿给你呢？”

“孩子，你知道那些赛马场的人是怎么收账的吗？他们派来的人是打手，他们会把我的脑袋敲开花的。”

“爸爸！你知道我是不会带你去见斯科格隆太太的。”

“为什么？你难道不是我的儿子吗？那个婆娘想收你做儿子，对吗？难道我不该利用这种关系救救急吗？你把我当做什么啦？把我当外人吗？你瞧瞧海琳娜怎么对待我？她为了我连命都豁出去了，而我的亲儿子却对我说‘不’。”

“可是布杰克是不会伤害她的。”

“伍迪，他会把她揍死的。”

布杰克？脸色和他工作服一样灰不溜秋，长着一双短腿，全身只有制造模具用的那双前臂和几个手指头才有一点气力，老是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这就是布杰克。但是根据父亲的说法，布杰克却是一个凶神恶煞，瘦小的胸膛里装着一只沸腾的熔铁炉。伍迪从来没看过布杰克动手打人。他不是那种好惹事的人。要是发生事情的话，很可能是布杰克害怕莫里斯和海琳娜两个人会合起来大叫一声将他杀死。不过父亲绝对不是那种会杀人的亡

命之徒。至于海琳娜，她可是个冷静、稳重的女人。布杰克把储蓄藏在地窖里（银行那时候都差不多快停业了）。他们最多不过是拿走一部分钱，准备以后归还。在伍迪看来，布杰克是通情达理的。他对自己的不幸一向忍气吞声，对海琳娜只有几点最起码的要求：准备一天三餐的饭菜，打扫房间，对他表示尊重。不过对于偷盗他的钱，说不定他的忍耐也会有个限度。因为钱是另外一回事，钱是性命攸关的东西。如果他们果真偷了他的钱，那么出于对钱的尊重，更出于对自己的尊重——出于自尊心，说不定他真会采取行动。但是你也很难肯定，什么赛马场收账的啊，什么打手啊，什么偷了钱啊——所有这一切不是父亲编造出来的。这种事他是做得出的，如果你不提防着一点儿，你很可能会上当。莫里斯知道母亲和姨母曾告诉过斯科格隆太太他有多么坏。她们是用宣传画的色彩来描绘他的——紫色代表罪恶，黑色代表他的灵魂，红色代表地狱里的火。总而言之，他吃喝嫖赌样样俱全，同时又是抛弃了自己的妻子儿女的无神论者。正因为这样，莫里斯才决定去见斯科格隆太太。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危险的事。科夫纳牧师举办慈善事业的费用是靠斯科格隆乳制品公司维持的，伍迪上神学院的学费是由这位寡妇支付的，伍迪两个妹妹的衣服也是她买的。

六十岁的伍迪，又高又胖，活像美国物质主义的胜利象征。他躺在长躺椅上，手指抚摩着两只扶手上比女人皮肤还要柔软的皮革，内心深处却被一些斑斑点点折磨着——那是他头脑里的光点，是在他的胸中痛苦和快乐交织着的点（它怎么会跑到那里去的？）。紧张的思索使他的双眉拧在一起，几乎到了头痛的程度。他当时为什么就依了父亲呢？他怎么会同意那天在弹子房的一个昏暗角落里和他见面呢？

“但是你对斯科格隆太太怎么说呢？”

“你是说那个老太婆吗？别担心，可以对她说说的话多着哩，

而且全是真话。我难道不是在竭力挽救我那个小洗衣铺吗？法警不是下个星期就要来没收我铺子里的东西了吗？”父亲在西马路的那辆电车上排演起他的那套把戏。他把希望寄托在伍迪那副健康年轻的仪表上。他的表情是那么坦率诚恳，利用他去完成一场骗局是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芝加哥的冬天是不是还有以前那样的暴风雪？现在的暴风雪好像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凶猛了。以前的暴风雪常常是从安大略，从北极圈，直接猛扑下来的，一个下午就能积起五英尺厚的雪。然后就得从车场里出动那些生了锈的绿色平板车，一边转动着一把大扫帚，为电车道扫雪，十辆或是十二辆电车慢吞吞地跟在后面，有时候则是一串一串地停在那里等候。

电车经过河滨公园大门的时候耽搁了很久；公园里所有的游艺设施都因为冬天的到来而封闭了——转龙啦、自动跷跷板啦、滑板啦、转轮啦，还有由布杰克那样的能工巧匠安装起来的那些电动玩具等等，统统都给钉上了木板。暴风雪在公园的大门里面任意肆虐，里面的情形根本看不清楚，只见木栅栏的后面亮着几盏电灯泡。伍迪刚把玻璃窗上的雾气擦干净，却发现窗外防护网里的白雪已经厚厚地堆到了齐眼高的地方。他抬头往高处看去，除了一股股从北面直扑过来的暴风雪外，其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前面一张座位上坐着两个黑人铲煤工，头上戴着林德伯格<sup>①</sup>飞行帽样的皮帽子，两腿之间放着一把铁锹，看来是刚刚下班回家。他们身上散发出一股汗臭味、麻袋味、煤味；虽然全身一片黑灰，但也有几处闪闪发亮。

乘客不多。一般人是不会在这个时候出门的。这样的天气，不论是在室内还是在室外，都会被冻成木乃伊；这样的天气应该留在家里，伸开两只腿坐在炉子旁边烤火才对。只有像父亲那样

<sup>①</sup> 美国第一个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员。

心里另有打算的人，才会不顾这样的坏天气出门。这样的暴风雪甚至是违反了大自然的常规，只有一心想要骗到五十块钱的人才会去和它较量一下高低。五十块啊！那在一九三三年可真管用哩。

“那个女人迷上了你。”父亲说。

“她只不过是个好心肠的女人罢了，她对别人都很好。”

“谁知道她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你是一个健壮的小男孩，而且也不是个孩子了。”

“她是个信教的女人。她是真心诚意信教的。”

“你不单单是你母亲的儿子。我不能让她和丽贝卡、科夫纳用他们的思想塞满你的脑子。我知道你母亲恨不得把我从你的生活中清除掉才好。但是，如果我撒手不管，你连生活究竟是怎么回事也不会知道。因为他们自己就不懂——这些愚蠢的基督徒。”

“是，爸爸。”

“对你妹妹我可无能为力。她们太年轻了。我为她们感到惋惜，但是我没有办法。你的情况不同。”

他希望我能跟他一样，成为一个美国人。

狂风不住地呼啸，发出尖利的叫声。和菜牛一样颜色的电车停在车轨上，等着触轮重新接上电缆，因此伍迪和他父亲被困在风雪中。到了豪尔德街，他们不得不冒着风雪向北步行一段路。

“到时候你先开口。”父亲说。

伍迪具有推销员和小贩的天赋。这一点，当他在教堂里站起身来，面对着五六十人起誓皈依基督教的时候，他已意识到了。尽管丽贝卡给他报偿，但他每次谈起自己的信仰，他的心依然要被自己所感动。不过有时候，他也会不知不觉地心驰神移，嘴里说着上帝，心却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在他心不在焉的时候，他那虔诚的神情给他帮了忙。他总是靠着脸上的表情，说话的声调，以及举止帮他解围。这时候，他的两只眼睛会越聚越

拢，而在他眼睛越聚越拢的同时，他也会尝到虚伪所带来的痛苦，他脸部的抽搐随时有泄露出他内心秘密的可能。这时他必须使出全部本领，保持住那副诚实的外表。有时他由于忍受不住嘲弄，也会求助于恶作剧。说到恶作剧，这可是他父亲的拿手好戏。父亲总是能够顺利地通过所有这些矛盾，越过一个又一个沟壑，最后完整无恙地到达彼岸——依旧是弯弯的鼻子，宽阔的脸膛。对于父亲说来，根本就不存在诚实不诚实的问题。他就像是歌里唱的那种人：心里想要什么，就要什么。父亲是讲求物质的；父亲消化能力很强，血液循环正常，也有性的本能。如果父亲也有认真的时候，那他谈的总是有关洗一洗胳肢窝和大腿叉，或者是脚丫子应该保持干燥，再不就是关于晚餐、洋葱、扑克，或者阿林顿赛马会上第五次比赛中的某一匹马。父亲只讲求世俗的需要。怪不得和他在一起总感到轻松愉快，不必为宗教和那些玄妙的理论等等操心烦恼。至于母亲，虽然她自以为是超越世俗的，但是伍迪知道，她不过是在欺骗她自己。当然，她总是喜欢带着多年未改的英国口音对上帝说话或是谈论上帝——总是上帝如果愿意，上帝如果允许，感谢上帝等等——但是其实她却是个终日为面包和牛奶操心的地地道道的讲求实际的健壮女人，对于两个女儿履行着实实在在的责任，例如喂饱她们的肚子，保护她们免遭不幸，教育她们讲究礼貌，保证她们清白无瑕等等。而这两只在她卵翼之下成长起来的鸽子，却是长得过于肥胖了一点，屁股和大腿也过于粗壮，那可怜的脑袋因此就显得又细又长。而且，神经不正常。可爱，但是有点不正常——波拉老是疯疯癫癫，约娜则患了抑郁症，经常会好端端地发作起来。

“我一定尽力帮你，但是你要答应我，爸爸，别在斯科格隆太太面前出我洋相。”

“你怕我英语说得不好让你丢脸？我说话有外国腔？”

“不是的。科夫纳的外国腔也很重，她并没有介意。”

“这些傻瓜蛋凭什么看不起我？你也是个大人了，你爹有权利要你给他帮帮忙，他如今有困难。我要你带我到她家去，是因为她是个宽宏大量的人，再说，除了她之外我也找不到别人可以帮我的忙。”

“我懂，爸爸。”

电车开到德文街，那两个铲煤工站了起来。其中一个穿着一件女式外套。那个年头没办法考究，男人常常穿女人的衣服，女人也常常穿男人的衣服。他毛皮领子上的毛因为沾了雪水，像一根根钉子似地翘了起来，上面还有许多煤灰。他们疲倦地拖着煤锹走到前门下了车，电车慢慢向前蠕动，很慢很慢。他们到达终点站时已是四点多钟，天色已经一片昏暗，路灯下面飘卷着雪花。豪尔德街上乱七八糟地停着一些被暴风雪阻塞的汽车，扔在那里没有人管。人行道也全给堵塞住了。伍迪走在前头，终于到了埃文斯顿；父亲沿着路中心卡车留下的车辙，跟在他的后面。他们冒着风雪步行了四个街段，然后伍迪踏着厚厚的积雪，来到一座包围在白雪之中的大宅邸，两人用力推开了一扇后面积有一层厚雪的大铁门。这座气派庄严的大房子共有二十个房间（也可能更多），但是只有斯科格隆太太和她的女仆约迪丝住在里面。约迪丝也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伍迪和父亲一面等着开门，一面掸着羊皮领子上的雪水；父亲又用围巾角揩了揩眉毛，身里流汗，身外结冰。门上的铁链子响了几下，约迪丝抽开木闩，在防风玻璃门上打开了通气孔。伍迪把她叫做“和尚脸”。这种脸上毫无女性特点的女人目前再也看不到了。她没有丝毫的修饰打扮，完全保持着上帝创造她时的模样。她问：“是谁？什么事？”

“是伍迪·塞尔伯斯特。是约迪丝吗？我是伍迪。”

“没让你这时候来。”

“对，但是我们已经来了。”

“什么事？”

“我们是来见斯科格隆太太的。”

“找她有什么事？”

“你只管去说我们来了就行了。”

“我必须对她说清楚你们事先不打电话就来找她的原因。”

“你只要说是伍迪和他父亲就行了。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我们是不会冒着这样的大风雪赶来的。”

独身女人原该小心谨慎的啊！何况是过去年代的两位正派女人。如今的埃文斯顿，那些有着大阳台的深宅大院——约迪丝那样的仆人腰间系着一大串钥匙，掌管着所有的食橱、衣柜、梳妆台的抽屉以及地窖里上了锁的食品箱——已经不再有以前那种可尊敬的风尚了。圣公会基督教科学妇女节制派的埃文斯顿，那时是不会有生意人来拉前门的门铃的，只有应邀前来的客人才会这样做。但是现在，却有两个流浪汉，在大风雪里经过了十英里的艰难路程，从西区来到这座大公馆。这座公馆里住着一位从瑞典移居来的女士，她原是个厨娘，现在是一位乐善好施的寡妇。凋零了的丁香花枝不住地敲击着她的防风窗，她在一片白雪的包围之中梦想着一个新的耶路撒冷，梦想着耶稣的第二次降临，梦想着耶稣的复活，梦想着最后的审判再度到来。为了耶稣早日降临，为了实现所有这些理想，她必须感化他们——这两个冒着暴风雪前来行骗的叫花子的心。

她们当然让我们进去了。

随后便是一股暖气突然袭向他们用围巾紧紧裹住的下巴。伍迪和父亲这时才感到了这场暴风雪的真正威力：他们的脸颊已经冻成了两块硬石板。他们站在前厅里，筋疲力竭，全身发痒，融化了的雪不断从身上往下滴。这才是真正的大厅啊！一座带柱子的庄园式的石雕台阶，台阶顶上还有一扇巨大的彩色玻璃窗，上

面绘着耶稣和那个撒马利亚的女人<sup>①</sup>。这给人一种感觉，好像这些不信犹太教的人倒和天堂非常接近。也许，当伍迪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他更容易用犹太人的眼光去进行观察。虽然父亲最大的犹太人特点，仅仅在于他只能用意第绪语阅读报纸。父亲和波兰人海琳娜在一起，母亲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伍迪则吃着从大块猪肋上割下来的生腊肉。但是，有时候他依然会有犹太人的感受。

斯科格隆太太是个最最清洁的女人——手指甲也好，雪白的脖子也好，耳朵也好。父亲隐隐约约对伍迪说什么她是出于女人的淫念，这完全是错误的，因为她实在过于清洁，老使伍迪联想起一泓瀑布——虽然她身材高大，体态端庄。她的胸脯很大。对于这一点，伍迪曾反复想过。他原以为她用什么东西把乳房绑得很紧很紧，但是有一次，她同时举起双臂，托起一扇窗子时，他看到了它，她的胸脯，就在他身旁，那对无法捆绑住的乳房。她的头发和浸泡之后才能用来编篮子的柳麻一样硬，颜色很淡很淡。父亲脱掉羊皮外套后，里面就只有绒线衫，没有上衣。他那东张西望的目光使他显得诡谲狡诈。对于长着一只鹰钩鼻和一张貌似坦率的大脸膛的塞尔伯斯特父子来说，最困难的事莫过于装出一副诚实的模样。不诚实的种种痕迹总是在他们脸上时隐时现。伍迪常常对此感到迷惑不解。是因为肌肉的关系？归根结底是下巴的问题——下巴的棱角过于突出？还是妹妹把父亲叫做迪克·特雷西，但是伍迪·特雷西可是个大好人呀。父亲能叫谁相信呢？想到这里，伍迪抓住了一闪而过的念头。也许正是因为父亲的这副神情，敏感的人才会感到内疚，后悔对他进行了不公正的诅咒，后悔对他的判断有失厚道。不过，难道就真仅仅是因为一

---

<sup>①</sup> 撒马利亚为古代以色列王国都城，耶稣曾在雅各井旁向一妇人讨水喝。详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四章。

张脸的关系？有些人肯定是尽量往好的方面想。父亲正是趁着这个机会叫他们就范的。但是约迪丝却是个例外。不论有没有大风雪，她都会立即把父亲赶到大街上去。约迪丝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是也很精明。她乘着统舱来到美国，又在芝加哥工作了四十年，哪能一点收获也没有？

斯科格隆太太，也就是艾西（或者奥西），把客人领进前房。这是这幢房子里最大的一个房间，必须多生一只火炉才能暖和。天花板有十五英尺高，窗户也很高，因此约迪丝一直把火炉烧得旺旺的。这是一只专门放在客厅里用的漂亮火炉，有一个镍做的冠部，或者说是顶部，打开顶部的同时，一只铁炉盖就会自动地掀起。顶部下的炉盖上，就和别的炉盖一样，尽是烟灰和铁锈，只要把煤斗轻轻一翘，一块块无烟煤就会哗哗地掉进炉膛。透过云母片做的小窗，可以看见炉子里面既像是蛋糕又像是穹顶的火苗。这是一间很漂亮的客厅：三面墙壁都有镶板；火炉和大理石壁炉的排烟管连在一起；地板是镶木地板，上面铺着阿克西明斯特地毯；嵌线的维多利亚式椅套和椅垫都是红酸莓的颜色；一只大橱里面有个衬着镜子的中国式的古董陈列架，上面放着银质水罐，斯科格隆的奶牛赢得的奖杯，形状奇巧的糖夹子，还有一些雕花玻璃罐和玻璃杯。室内还放着几本圣经，挂着几幅耶稣和圣地的图画，充满着一种异教的气氛；一切东西仿佛都曾在淡淡的醋酸溶液里面刷洗过。

“斯科格隆太太，这是我父亲。他想你以前没见过他吧？”

“是的，太太，我是伍迪的父亲，塞尔伯斯特。”

父亲穿着绒线衣显得很矮，但是态度大方得体；他虽然腆胸凸肚，但是并不显得肥胖臃肿，而是非常结实。他是属于那种腹部结实的人。谁也别想把父亲吓倒。他从来不会在人家面前显出一副乞求的可怜相，全身没有一丝一毫的卑躬屈膝味儿。他故意

将“太太”两个字念得不那么准<sup>①</sup>，为的是让她立即明白，他可是个有志气、有主见的人。他的神情举止也表明他知道怎样和女人打交道。斯科格隆太太好似顶着一只用自己的头发编结成的花篮，风度雍容端庄。她已经年过半百，比父亲要大八九岁。

“我因为知道你对我儿子一向非常慷慨，所以才要他带我来见你。同时你认识一下他的父母亲，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斯科格隆太太，我父亲的处境很困难，除了你之外，我不知道还能去找谁帮忙。”

这几句开场白对于父亲说来已经足够了。于是他把话题一转，对这位寡妇瞎扯了一通他那只洗衣铺的情形以及他所负的债务，又详详细细说了一下他的财产、扣押他的财产的通知、法警的职权以及他们就要对他采取的行动，等等。然后他又说道：“我是个靠小本经营糊口的人。”

“你没尽到抚养子女的责任。”斯科格隆太太说。

“对。”约迪丝说。

“我没那个能力。如果我有那个能力，我会不尽自己的责任吗？城里面到处都是排队领面包和菜汤的人。岂止我一个人。我只要有一点东西，马上会分给他们，分给我的孩子的。我是一个坏爸爸吗？如果我是一个坏爸爸，你以为我的儿子还会把我带你家里来吗？他爱他爸爸，信任他爸爸，他知道他爸爸是个好爸爸。每次我开个小店什么的，总是刚开张就给人家排挤掉，我这次开的那个小店铺，如果能够维持下去的话，多少可以赚点钱。我雇了三个人，由我付给他们工资。如果我那个店铺关门，这三个人也会流落街头。太太，我可以给你写张借据，两个月后归还。我是个粗人，但是我是个勤奋的人，是个你可以信赖的人。”

---

<sup>①</sup> 此处应称 Missis，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会念成 Missus，伍迪的父亲故意念成 Missus，表示自己不愿装腔作势来讨好斯科格隆太太。

父亲使用“信赖”这个词使伍迪大吃一惊，仿佛有一支军乐队从四面八方吹响了震耳欲聋的大号，在向全世界发出警告：“骗子，骗子！这是一个骗子！”但是斯科格隆太太深深沉湎在宗教的幻想里，好似置身于某个遥远的地方。她什么都没听见。虽然住在世界这一角的每个人都过着一种讲求实际的生活除非他神经不正常，你和你的邻居除了有关实际的事务之外，彼此就无话可说，但是这位斯科格隆太太尽管很有钱，却是超凡脱俗，三分之二的身心早已远离这个世界。

“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证实一下我的为人吧，”父亲说，“你一定会看见我将给我的孩子带来什么好处的。”

斯科格隆太太于是犹豫起来，然后说她必须上楼去一下，到她房间里祈祷上帝给她启示——因此请他们稍坐片刻。火炉旁边有两张摇椅。约迪丝朝着父亲狠狠瞪了一眼（一个危险分子），又用责备的眼神看了看伍迪（他带来了一个危险分子，破坏分子，想要伤害两位信仰基督的善良女人），然后跟着斯科格隆太太走了出去。

她们刚刚走开，父亲就从摇椅上跳了起来，气愤地说道：“祷告？这是什么意思？敢情要上帝借给我五十块钱？”

伍迪说：“这不是因为你的缘故，爸爸，这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向是这个样子。”

“不，”父亲说，“她回来的时候一定会说上帝不许她借钱给我。”

伍迪不喜欢父亲这样，他觉得父亲说出这种话来过于粗俗，他说：“不，她是很虔诚的，爸爸，你应该理解。她容易动感情，容易激动，可为人诚恳，不论对谁都很乐于帮助。”

父亲又说：“那个佣人会阻拦她的。那家伙不是个好对付的人。她脸上那副表情好像一眼看穿了我们是一对骗子似的。”

“我们现在争论也没用，”伍迪说。把他摇椅往炉子边挪了

挪。他的鞋子全湿透了，好像再也不会干了。火炉里的蓝色火焰像一群鱼儿似地不停跳动着。但是父亲却走到那只中国式的古董陈列橱前，试了试把手，然后打开他的小刀，一下子就把那扇曲线形玻璃门上的锁打开了。他从橱里取出了一只银碟。

“爸爸，你这是干什么？”伍迪说。

父亲不动声色，心里完全明白他是在干什么。他重新锁上橱门，走过地毯，一面侧耳静听。他把银碟塞进裤带，推到了裤子里，然后伸出一只又短又粗的手指，放到唇边。

伍迪只好压低了嗓门；但是全身却在打战。他走近父亲，一把抓住他的手。他紧紧盯住父亲的脸，同时感到自己的眼睛正在越变越小，仿佛有一样什么东西在不断地收紧他的头皮，如果你感到皮肤紧缩，全身轻飘，心头发闷，头晕目眩，这种现象叫做呼吸过度频繁。他气急败坏地说：“把它放回去，爸爸。”

父亲说：“这是真银子做的，是件值钱的玩艺儿。”

“爸爸，你说过不让我出丑的。”

“我不过是把它当做一个抵押品，以防她祷告之后回来说‘不’。如果她说行，我就放回去。”

“怎么放回去呢？”

“会放回去的。如果我不放回去，你把它放回去好了。”

“你会撬锁，我可不会。我不知道怎么撬。”

“那没什么难的。”

“我们现在就得放回去。给我。”

“伍迪，它在我的裤裆里，在我的短裤里。不要为这点小事大惊小怪。”

“爸爸，我真想不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

“好了，别再 唆了。如果不是相信你，我就不会让你看着我干了。你太不懂事。你怎么啦？”

“爸爸，趁着她们还没下来，把那只碟子从你的长裤里拿出

来吧。”

父亲板起面孔，摆出一副威严的架势，说：“不许再说了，我命令你！”

伍连不由自主地朝他猛扑过去，和他撕扭起来。他紧紧抓住父亲，一只脚伸到他的身后，将他逼得走投无路，这真是大逆不道。父亲措手不及，大声叫道：“你是想要海琳娜给人家杀死吗？那你就杀吧，你打吧，你要负责的。”他开始愤怒地进行抵抗。他们扭来扭去，转了好几个圈子，伍迪使出了他在西部电影里学来并且曾在操场上用过的招数，一下子将他父亲摔倒，两人一起跌在地上。伍迪已经比他父亲重上二十磅，压在他父亲的身上，他们跌在火炉旁边——为了保护地毯，火炉是放在一只马口铁做的大盘子里。伍迪发现，即使他已经把父亲摔倒在地，但是这样压在他那结实的肚子上是无济于事的，他不可能把手伸进他的裤带里将银碟拿出来。父亲大为震怒。儿子竟敢动手打父亲，做父亲的当然有权利震怒了。于是抽出一只手来，朝着伍迪的脸上狠狠打去。他朝着伍迪的脸中心狠狠打了三四拳，伍迪为了躲避他的拳头，将头紧紧顶住他的肩部，同时对着他的耳朵说：“天啊，爸爸，我求求你，求你别忘了我们这是在什么地方。那两个女人一会儿就会回来的！”但是父亲却跷起两只短腿拼命挣扎，同时用下巴把伍迪的牙齿撞得格格直响。伍迪以为他想用牙齿咬自己。既然他是神学院的学生，心里不免这样想：“真像是个邪恶的妖魔。”他紧紧按住父亲不放。父亲也渐渐不再挣扎和反抗。非常阴沉，活像一条大鱼。伍迪把他放开，伸出手去将他拉了起来。他这时心中产生了许多许多痛苦的想法，但是他知道父亲从来不会感到这种痛苦，永远也不会。父亲从来不会产生这种有失尊严的感情。这正是父亲比别人优越的地方。他是绝不会有那种感情的。他和中亚的骑士、海上的强盗一个样。只有来自利物浦的母亲才会那样高尚文雅，才会讲究那一套英国的风度和礼貌。

只有那个穿着一套黑衣服布道的博士才会那样。你高尚文雅，可是别人却只晓得压在你身上？见它的鬼去吧。

长形的门开了，斯科格隆太太走了进来，说：“是我的错觉呢，还是真发生了什么事情，把房子都震得发抖了？”

“我刚才正拿起煤勺想往火炉里加煤，但是煤勺从我手里滑到地上去了。对不起，我太笨手笨脚了。”伍迪说。

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还在发愣；他那稀疏的头发披散在前额上。他虽然紧闭着嘴，但是从他胀得鼓鼓的肚子可以看出，他正憋着一肚子的气。

“我祷告过了。”斯科格隆太太说。

“但愿是好结果。”伍迪说。

“不论什么事，没有上帝的指引我是不会做的。不过他的回答是‘行’，我现在可以安心地做了。请你们稍等一会儿，这就到办公室去开一张支票。我已经叫约迪丝给你们送咖啡来。你们是冒着这么大的大风雪来的。”

但是父亲本性难移；斯科格隆太太刚出门，他就说：“支票？见它的鬼去吧。给我现钞。”

“她们是不在家里放现钞的。你明天到她存钱的银行里去兑换一下就行了。不过，如果她们发现丢失了那只银碟，爸爸，那她们就会通知银行不让你兑换的，那时候你怎么办？”

父亲正把手伸进裤带，约迪丝用茶盘端着咖啡走了进来。她恶声恶气地对他说：“这是你整理衣服的地方吗，先生？这是男人用的盥洗室吗？”

“那么，厕所在哪里？”父亲说。

约迪丝用的是厨房里最脏的咖啡杯子。她砰地一声搁下茶盘，然后就领着父亲往走廊里走去；为了防止父亲在房子里到处乱跑，她一直守在浴室的门外。

斯科格隆太太把伍迪叫到她的办公室，交给他一张折叠好的

支票，然后说他们应该一起为莫里斯做一下祷告。所以，伍迪又一次跪到了地上——头上的档案架上放着一排排用云石纸包着的发了霉的卡片，旁边的书桌边上放着一盏玻璃灯，镶着荷叶边的灯罩很像是一只糖果盘。狂风抽打着树枝，撞击着屋外的墙壁，将雪片不住地刮到玻璃窗上。斯科格隆太太带着斯堪的纳维亚的口音，像个感情丰富的女低音似地提高了嗓门，做起了祷告：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光明吧，赐给我们启示吧，在莫里斯的胸中换上一颗新的心吧。伍迪别无所求，只是祈祷上帝让父亲把银碟放回原处。他尽量拖延时间，使斯科格隆太太在地上跪了很久。然后他露出一副诚恳的神情（尽其所能），感谢她发扬了基督的慈悲精神。他接着说道：“据我知道，约迪丝有个亲戚在埃文斯顿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不知能否请她打个电话，为我们搞一间房间过夜，免得我们再冒着这样大的风雪赶回家去？青年会差不多就在电车站那里。说不定电车已经停驶了。”

听到斯科格隆太太叫她，满腹狐疑的约迪丝走了进来；她已是怒火心中烧。他们闯了进来不算，进来以后又是这样大模大样，一会儿要钱，一会儿又得招待他们咖啡，没准儿还在抽水马桶上留下了淋病的病毒，现在又……不过她还是给青年会打了个电话，给他们订了一间有两张帆布床的七八毛钱一夜的房间。

因此，父亲有充裕的时间，再次打开那只镶着玻璃镜或是涂着镍银（那是一件非常精致细巧的玩艺儿）的古董橱。塞尔伯特父子俩道谢、告辞之后，刚刚走到雪深齐膝的街中心，伍迪便说：“我给你打了掩护，那件东西放回去了没有？”

“当然放回去了。”父亲说。

他们一路顶着风雪，来到了青年会的那座小楼房——装着铁栅栏的门窗统统紧关着，很像是警察局，就连大小也是完全一样。大门已经上了锁，但是他们将铁栅门摇晃了一阵之后，一个小个儿黑人为他们开了门，拖着疲倦的脚步把他们领到了楼上一

条水泥地走廊里。走廊两边是一扇扇短小的门，很像是林肯公园里哺乳类小动物住的地方。小个儿黑人说已经没有吃的东西了，于是他们两人脱掉湿透了的裤子，紧紧裹着一条咋叽军毯，躺在帆布床上沉入了梦乡。

第二天一早，他们第一桩事就是到埃文斯顿的国家银行，兑换了那五十块钱，但也不是一帆风顺。银行里的出纳去给斯科格隆太太挂了一个电话，很久以后才回到出纳窗口。“这家伙跑到什么地方去啦？”父亲说。

不过那家伙回来的时候说道：“要多少钱一张的钞票？”

父亲说：“一元一张的。”他对伍迪说：“布杰克藏的全是一元一张的。”

现在，伍迪根本就不相信海琳娜偷了那个老头的钱。

然后他们来到街上。扫雪的工人正在扫雪。早晨的天空一片蔚蓝，阳光灿烂，白雪皑皑的美景即将消失，芝加哥全城很快就要从积雪之中解放出来。

“昨天晚上你不该把我按在地上，孩子。”

“我知道，父亲，但是你答应过我不同意我出洋相的。”

“不过，算啦，既然你后来还是站在我一边的，这件事我们是能忘掉的。”

只是父亲还是拿走了那只银碟，他肯定拿走了。没几天斯科格隆太太和约迪丝就发现了。没出一个星期，她们就在救济站科夫纳的办公室里等着伍迪了。神学院的院长克拉比博士先生也在场。伍迪一路匆匆赶来，立即遭到了一阵猛烈的围攻。不过他态度从容，声称自己是无辜的；即使是在无法招架的时候，依然一口咬定，他们冤枉了他。不论是他还是他的父亲，他都否认曾经碰过斯科格隆太太的任何东西。那件失踪了的东西——他甚至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很可能是一时被放错了地方，以后总有一天会自己出现的，那时候他们一定会后悔不迭。当别人一一说完该

说的话之后，克拉比博士先生说：在伍迪没说出事实真相之前，不许再去神学院上学，再说，他在那儿的学习本来就不能令人满意。丽贝卡姨妈将他拉到一边对他说：“你是一个小骗子，和你父亲一个样。从此以后你不许再进这里的大门。”

父亲对于这件事情的评论是：“那又怎么样呢，孩子？”

“爸爸，你不应该做那样的事。”

“不应该？对你实说了吧，我才不在乎哩。如果你想回去和那些伪君子言归于好，我可以把银碟给你。”

“我不愿意欺骗斯科格隆太太，她对我们那么好心肠。”

“好心肠？”

“好心肠。”

“心肠也有它的标价。”

和父亲进行这样的辩论，你别想辩得过他。不过，这四十多年以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辩论，只是随着他们之间关系的不断变化、发展和成熟，他们辩论时的心情，内容的深浅，各自的出发点，也在不断变化。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呢，爸爸？为了钱吗？你那五十块钱是怎么用的？”几十年之后，伍迪曾经问他。

“我付清了赛马场的账，剩下的全用在店铺里了。”

“你又到赛马场试了几次运气？”

“也许是的。我做那件事等于是下双赌注<sup>①</sup>，伍迪。对我没有一点坏处，但是对你大有好处。”

“是为了我？”

“你的那种生活是一种不正常的生活。那不是你应有的生活，伍迪。跟那些女人在一起——科夫纳不是个男人，他是个不男不

---

<sup>①</sup> 赛马时同时在两匹马上下赌注，赌本不需增加多少，但是赢时则可获数倍的钱。

女的家伙。如果他们把你造就成一个牧师，一个基督教的牧师，后果会怎么样啊？首先，你自己就受不了，再说，他们迟早会把你赶出去的。”

“也许是的。”

“你也不可能叫犹太人皈依基督，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这是什么年头，你还去给犹太人添麻烦？”伍迪说，“至少我没有麻烦他们。”

父亲最终还是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一边——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体格跟自己一样结实，性格跟自己一样粗俗。他们都是天生不合适过精神生活的，根本不配。

父亲并不比伍迪更坏，而伍迪也并不比父亲更好。父亲不喜欢讲大道理，而始终为伍迪指出一个目标：豁达乐观，精神饱满，保持本色，讨人喜欢，不要相信什么原则。如果说伍迪有什么弱点，那就是他毫不自私。这个弱点对于父亲非常有利，不过他依然为此责备伍迪。“你承担的义务太多了。”父亲总是这么说。事实也确实如此，伍迪正是因为父亲自私才会这么爱他。一般说来，自私的人总是最被别人爱。你克勤克俭，他们却得其所哉，而你却因此爱他们。你对他们献出你的爱。

想到那只银碟的当票，伍迪突然笑出声来，以致呛得咳了起来。他被神学院开除，从慈善机关给赶了出来后，父亲曾经对他说过：“你想再回去吗？这儿是当票。我把那玩艺儿当掉了。并不像我想像的那么值钱。”

“他们给你多少钱？”

“我只当了二十五块钱。不过你想赎回来的话，你得自己想办法筹钱，因为我已经全花光了。”

“在银行里的时候，出纳员去给斯科格隆太太打电话询问那张支票的事，你一定吓出一身汗了吧？”

“我是有点紧张，”父亲说，“不过我相信她们不可能那么快

就发现那只银碟丢了。”

偷盗那只银碟，是父亲对母亲进行斗争的一部分，是对母亲、丽贝卡姨妈和博士先生的斗争的一部分。父亲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立场。母亲则是宗教力量和多疑症的代表。在过去的四十年里，这种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经过一段时间后，母亲和两个妹妹变成了依靠别人施舍而生活的人，她们失去了个性。唉，这三个可怜虫，她们现在完全依靠别人赡养，脾气也变得十分古怪。与此同时，伍迪，这个罪人，却是一个克尽职责的儿子和兄长。她们住的那座平房，从盖房顶到嵌填墙壁的材料、电线、绝缘、空调设备等等，完全由他掏钱；暖气费、电费和伙食费也是由他支付；她们身上的衣服都是他从西尔斯、鲁伯克以及维波德这些大服装店里买来的。他还给她们买了一架电视机——她们看电视就和她们作祷告一样虔诚。波拉还上过训练班，学会了流苏花边和针绣花边的手艺。有时候她也找点轻松的活计干干，比如在疗养院里负责病人的娱乐活动什么的。不过她自己的神志既然并不正常，这样的工作也总是做不长。至于心地邪恶的父亲，他大半辈子都是为别人清除衣服上的污点。他和海琳娜过去这些年一直在西罗杰斯街上开“洗衣店”——其实不过是洗衣作坊式的小店铺罢了——这一行的生意倒也轻松，使他常有一些余闲时间打打弹子，看看赛马，玩玩朗姆和皮诺科牌戏<sup>①</sup>。他每天早晨来到隔板后面，检查一下洗衣机的过滤器。在那些扔进洗衣箱的衣服里，他常常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玩艺儿，运气好的话，还会发现金项链或是别针什么的。他总是先用一只大塑料杯往洗衣箱里加上一些蓝颜色或是粉红色的洗涤剂，然后便一面喝着第二杯咖啡，一面看他那份《犹太前进日报》；这以后，他把一切丢给海琳娜，

<sup>①</sup> 两种以赌博为目的的扑克牌戏。

自己出门去了。他们付不出房租的时候，就由伍迪接济一点。

佛罗里达州的新迪斯尼游乐场开放之后，伍迪请他的全家到那儿玩了一次。当然，他是分批请他们去的。所有人当中，海琳娜玩得最开心。一提起那个林肯机器人发表演说的情形，她简直没完没了。“太有意思了！他站起来时的那副样子，还有他的手势、他的嘴唇，就跟真的一样，还有他说话的声音，多动听啊！”这些人当中，要数海琳娜最正常，最富有人情，同时也最诚实。现在父亲死了，伍迪和海琳娜的儿子米托希、体育馆里的那个风琴手——一起负责照顾海琳娜；她虽然有社会救济金，但其他方面的开销则由他们两人共同分担。在父亲看来，人寿保险完全是骗人的把戏，所以除了一些过时的洗衣机外，他什么也没给海琳娜留下。

伍迪自己也很会自得其乐。有时每年一次，有时还不只一次，他会扔下公司里的事情听其自然，将他手下那帮伙计托付给银行的信托部门照管，自己到各地去旅游。他的旅行既讲究气派，又富于想像，同时也很阔绰大方。在日本他并不把时间浪费在东京，而是到京都玩上三个星期，住在那家大约是建于十七世纪的塔互里亚小旅馆里。他在那里按照日本人的风俗睡在地板上，用滚烫的热水洗澡。他既游览了许多古刹圣地，也看过世界上最下流的脱衣舞。他访问过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和德尔夫，也到过缅甸以及东非的乌干达和肯尼亚，不论是汽车司机、贝都因的牧民，还是东方国家集市上的商人，他都一律平等相待。他性格开朗，慷慨大方，平易近人，虽说是越来越胖，倒也依然结实健壮（他经常散步、举重）——他赤膊时的身体越来越像文艺复兴时期一些油画上穿着朝服的宫廷伴臣——肤色越来越红润，一看就知道是喜欢户外活动的人；不过他的背上却布满了雀斑，红光闪闪的额头和那只诚实的鼻子上也已有有了寿斑。有一次在亚的斯亚贝巴，他把一个埃塞俄比亚的美女从街上带到自己

的房间，在淋浴的莲蓬头下，他用那双温柔的大手给她擦肥皂洗澡。在肯尼亚，他把美国人的一些脏话教给一个黑人女人，为的是能够一面和她亲热，一面听她嘴里大声叫着这些下流话。尼罗河畔靠近穆奇逊瀑布的淤泥地里，卡着高大的蓝桉树。许多河马站在沙堤上对着过往的游艇恶狠狠地大声吼叫。其中一头在潮湿的沙地上乱蹦乱跳，一会儿纵身跃起，一会儿又四蹄落地，重重摔下。那头小水牛被鳄鱼一口咬住，拖到了河里面，伍迪就是在这里看见的。

母亲——她不久也要随着父亲去了——这几天的神态不太正常。当着别人的面，她总是把伍迪说成是她的小男孩——“你觉得我这个小乖乖怎么样啊？”——好像他才十岁似的。她对伍迪的态度也有点荒唐，她举止轻狂，差不多是在卖弄风骚。但是她对这些事情似乎一点也不知道。而在她后面，正有许多人在排队等着，就像是游戏场上许多儿童在排队等着滑滑梯一样；一个个依次站在台阶上，慢慢向着顶端移动。

伍迪那套兼作办公室的住房上空凝聚着一潭死水似的静穆，教堂的钟声传播到哪里，静穆也延伸到哪里。在这个忧伤的灿烂秋日的清晨，伍迪在这一片静穆之中默默哀思。他在对人生进行着一次全面的思考。就他自己的一生而言，他着重回顾的是世俗的一面——当然也想到另外的一面，尽管那一面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回顾。但是，如果他心中的痛苦依然不减，他就一定要出去走走，得到一点排遣。慢慢走上三英里——如果必要，就走五英里。你以为这样的散步仅仅是一种体力活动，是吗？其实，这里面还有别的作用。因为，以前他在神学院里做学生的时候，曾在世界博览会上拉过人力车。当人站在两根车杆之间，拉着车（又轻快又稳当）向前快步小跑的时候，他常常有许多灵性上的感受。也许，所有的那些感受只是一种感受的重复而已。他感到太阳正将真诠精义送进他的心间。他接收到一种信息，这信息既光

明又温暖。这时他就会远远离开乘在他车上的那些来自威斯康星的好色之徒；每次当他想得入神的时候，尽管这些农夫坐在车上狂呼乱叫，嚷着要他拉皮条，他也几乎听不见。这时候，那明灿灿的太阳又会向他传来一种神秘的信念：这个世界之所以存在，目的就是要充满着善，浸透着善。尽管发生过许多荒唐的事情，有过狗咬狗的闹剧，吃人的鳄鱼也曾把某个人拖进了它的河泥里。斯科格隆太太贿赂他去改变犹太人的信仰，催促耶稣早日第二次降临，但是世界总不会变成她所希望的那个样子，而是一定会变成另一个样。这是他迟钝的直觉所感到的。仅此而已。因此，他完全遵照生活本身给他安排好的那样生活下去。

今天早晨还发生另外一件事情，表面看来是属于肉体的。最初只是手臂和胸膛上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由于受到压力，渐渐传到了他的体内，传到了他的胸膛里。

事情是这样的：当他走进医院病房时，他看到父亲病床两边的栅栏拉起来了，好像是一只童床；父亲非常虚弱，正在不安地扭动，嘴里一颗牙齿也没有，就像一个婴儿一样；他脸上已经满是污垢，连皱纹里也嵌满了——他一面从喉管里发出临死前的微弱呼噜声，一面想要把插在皮肤下的输液针拔出来。贴在针上的纱布沾满发黑的血污。伍迪于是脱掉鞋子，将床边的栅栏放下，爬到床上，用双臂将他抱住，使他安静下来。他对父亲说：“别这样，爸爸，爸爸。”仿佛他是父亲一样。然后，两人便厮扭起来，就像那次在斯科格隆太太的客厅里情形一样——那时父亲勃然大怒，变得像个邪恶的妖魔，伍迪竭力劝他息怒，警告他说：“那些女人马上就要回来的！”在那只火炉旁边，父亲用头对着伍迪的牙齿狠狠撞了一下，然后便是脸色阴沉，活像一条粗壮的大鱼。但是父亲在医院里的搏斗，却是这么虚弱——多么虚弱啊！伍迪心头一阵怜悯，紧紧抱住父亲——父亲仍在挣扎、颤抖。父亲曾经对他说过：“从那些家伙身上，你再也别想发现生活的意

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懂生活是什么。”对，父亲——但是，生活究竟是什么呢，父亲？父亲探索了八十三年，而且拼命想继续活下去，但是现在却什么也不想了，仅仅是希望挣脱束缚。伍迪怎么能让他的老父亲把针头拔出来呢？固执的父亲，他想要怎样，就一定要怎样。但是在这最后的时刻，他究竟想要怎样呢？伍迪无法理解，因为这变化实在太大了。

过了一会儿，父亲的抵抗停止了。他越来越虚弱。他靠在儿子的身上，缩蜷着瘦小的身体。护士进来，对他们看了看。她们劝说伍迪不要这样，但是伍迪——他腾不出手来挥手叫她们出去——用头指了指门。伍迪以为父亲已经安静下来，其实他只不过是找到了另外一个更好的逃脱办法。他用消耗热量的办法达到了目的。他身上的热气已经渐渐消逝。你在手上抓着一只小动物的时候，也常会发生这种情形——伍迪没过多久就感到他已渐渐变得冰凉。就在伍迪尽力使他安静下来，并且以为已经渐渐做到这一点的时候，父亲已将自己分化成两半。他离开自己的躯体，悄然投入死神的怀抱。他那身材魁梧结实、已上了年纪的儿子依然紧紧地抱住他，按住他，可是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再需要他按了。你永远也按不住这个固执的人。如果他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永远照他的意思干，而且，他总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鬼办法。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聂振雄 译

# 堂表亲戚们

就在坦基·梅茨格即将判刑前，我在被人诱逼和扭住手臂的情况下给联邦法院艾勒法官写了一封信。主要是他家人对他的案子牵肠挂肚。我与坦基是表兄弟，他姐姐尤妮斯·卡尔格得知我熟悉艾勒，逼我出面求情。我与艾勒多年前就相识。当时他是法律专业的学生，我在七频道主持一个电视节目，辩论法律方面的疑难问题。后来，我主持了芝加哥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宴会，我与艾勒身穿宴会服，相互握手微笑的照片随后出现在几家报纸上。

当坦基的上诉被驳回（本该如此），尤妮斯给我打了电话。她开口就热情洋溢地大叫一声，惊得我浑身颤抖。她在平静之后说，我必须施加我的影响。“很多人说你跟法官是朋友。”

“法官不是那样……”我制止道，“有些法官可能是，可是艾勒不是。”

尤妮斯逼得更紧。“求求你，艾扎，别把我推开。坦基会判高达十五年的刑。我说不清整个的情况。至于说他的同伙，我是说……”我完全明白她想说什么。她在说他那群罪犯同伙。坦基如果不想让他们密令动手了结他，必须保持沉默。

我说，“我多少明白了。”

“你不同情他？”

“那怎么可能？”

“你与大伙儿生活得不同，艾扎，可是我常常说，你非常爱梅茨格家的人。”

“说得对。”

“而且过去的日子里，你很爱我们的爸爸和妈妈。”

“我永远忘不了他们。”

她又失去控制。她为何抽泣得如此厉害，任何专家，甚至明察秋毫的专家都难说出所以然。她不是因为脆弱，这个我敢肯定。尤妮斯不是易碎的碗碟。她像她已故的母亲，坚强，不屈，有毅力。她可敬的母亲直率，可头脑简单，很原始。

说“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是个错误，因为尤妮斯把自己看做她母亲的代表，她如此哭泣，部分是代沙娜哭。我宁静的办公室电话里从没有传出过这样的声音。儿子是重罪犯，对沙娜是奇耻大辱。老太太如何承受得了这样的伤害！这个仍不承认母亲已去世的尤妮斯，只知道自己痛哭，而这原本应由她母亲承受。

“别忘了我妈妈特别宠你，艾扎。她说你是天才。”

“她是这么说过。家里人的看法而已，世人没这么看。”

尤妮斯为拉斐尔（坦基的真名）求情，可坦基并不把他的姐姐放在眼里。

“你们——你们俩人——保持联系吗？”

“他不回信，也一直不回电话。艾扎！我要他明白，我很关心他！”

回首往事，我心情激动，神采飞扬，但闻听此言，顿感情绪低沉，无精打采。但愿尤妮斯不会这样说话，让人难以接受。如今的超级市场及借贷公司的墙上都有“我们很关心”这样的话。也许是因为她母亲不懂英语，也许也因为尤妮斯孩童时说话结巴，而现在流利了，能像最出色的美国人那样说话了，便很得意。

我不能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别给我胡扯”。相反，我不得不安慰她，她有心脏病——夹心蛋糕般脆弱的心脏病。我说：“你放心，他知道你的感情。”

虽然他是个恶棍。

不，我不能一口咬定表弟拉斐尔（坦基）真是恶棍。是她姐姐的喋喋不休逼得我（弄得我快疯了）夸大其辞。他与恶棍来往，但市政委员会委员、市政官员、新闻记者、大型建筑公司，以及为慈善机构募捐的人都与恶棍来往——恶棍出手慷慨，而这些恶棍并不是恶贯满盈的。我可以指出更大的恶棍。如果我是但丁，就会详尽地把一切都写出来。

我问尤妮斯为何找我（不用多聪明就能看出，是坦基让她找的）。她说：“你是名人。”

她指的是多年前的事。当时我独创了一个“著名审判”的电视节目，并担任节目主持人。我当时处于完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以全班优等生的成绩从法学院毕业。几家主要的律师事务所都邀我，并给我好的职位，可被我一一拒绝。我觉得自己精力旺盛，充满活力（精力过剩），不能保证在市中心这些声名卓著的事务所里行为不出格。于是，我突发奇想，编了一个电视节目，名叫“法律之庭”，由来自芝加哥、西北、德保尔或约翰马歇尔的优秀学生，重新审理法律编年史里重大的、臭名昭著的案子。我们挑选学生时侧重于他们的机智，不是学府的知名度。最残忍的辩论者是几位夜校学生。律师显然有机会施展各种能耐，如狡辩、招摇撞骗、厚颜无耻、出其不意、自我陶醉，等等。我的作用是挑选娱乐型的参加者（辩护方与原告及其律师）并把他们介绍给观众、掌握进程——定基调。选案例时，得到了我妻子的帮助（我当时的妻子也是个律师）。她对涉及民权的刑事诉讼案兴趣颇浓。我偏爱个性奇特、性格神秘、解释模棱两可的案件，这种案例可看性不强，可事实证明我拥有导演这些舞台剧的诀窍。

节目前，我一向在瓦巴希大街弗里策酒店为参加人员设一早晚宴。自己吃的是老一套——一条大排，半生不熟，倒上一小杯罗克福尔<sup>①</sup>色拉调味酱。甜点是圣代冰淇淋，一边喝圣代，一边吞巧克力，其中夹着不少烟灰。我不是炫耀自己。早年的这种热情和鲁莽后来得到克制，现在已荡然无存，否则我有可能变成“小丑”，用《剧艺报周刊》的话说，一个“滑稽角色”。我很快看到，那些由我引导辩论的聪明的年轻人（主要是那些将参加律师资格考试的活跃分子，他们早已在寻找顾客，迫切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对我的古怪行为特别欣赏。费里策尔酒店的晚宴使他们大为放松。在节目过程中，我引导、刺激、放任他们你争我斗，并驾驭他们。结束时，我妻子塞贝尔<sup>②</sup>（我妻子叫伊莎贝尔，因她肤色较深，我就叫她塞贝尔）大声宣读陪审团的裁决和法庭的判决。参加辩论的许多人后来成了大律师，成了显贵。塞贝尔与我离婚后，先后嫁了其中的两个人。她最终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获得了成功，成了名人。

艾勒法官当时是个年轻律师，曾不止一次应邀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此，三十年后，在我亲戚们的心目中，我还是“法律之庭”的主持人和明星，还是媒介的名人。有些东西魔力无穷，终不衰竭。我仿佛像德国的哪个傻瓜或笨蛋，赚了大笔的钱。我现在知道，在尤妮斯心里，我不仅是一个媒体名人，而是个神秘人物。“离开芝加哥的几年里，你不是在为中央情报局干吗，艾扎？”

“没有。我在加利福尼亚呆了五年，在兰德公司工作，一个搞特殊研究的智囊团。我在那里搞研究，写报告，进行分析。我

---

① 商标名。

② 英语中 Sable 的含义是黑貂或紫貂。

这里所供职的这家私人集团公司，为银行做着类似的研究工作……”

我想消除神秘——驱散艾扎·布罗德斯基的神话，但像“研究”及“分析”这样的字眼，在她听来犹如从事间谍工作。

几年前，尤妮斯做了一次大手术，出院时她对我说，偌大个世界她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说她丈夫厄尔“感情上不可依靠”（她想说的是他很小气）。她的两个女儿都已离家。一个在和平队<sup>①</sup>，另一个即将医学院毕业，忙得没工夫看她。我请尤妮斯外出吃饭之前，先在湖滨路我的公寓里喝点酒。她说，“这么多阴森森的老房间，黑乎乎的旧画，一条条叠起来的东方地毯，还有外文书……而只有一个人生活，”（意思是说，我不必为八元钱的一张煤气账单与配偶吵个天翻地覆）“你一定有女友——女性朋友？”

她在影射“男人问题”。我生活在这个阴沉、奢华的公寓里，难道它掩盖了我变得怪诞的事实？

不，那也没有。（对尤妮斯来说）只是一个人而已，没有新奇的地方，没什么新奇的。

但是，回到我们的电话谈话，我终于从尤妮斯的嘴里听出，是坦基的律师建议她给我打电话的。她说：“坦基今晚从亚特兰大城飞回来，”——赌博——“想明天吃晚饭见你。”

“行，说我在门罗街‘意大利村’饭店见他，下午七点，楼上私人小包房。让他问领班找我。”

坦基一九四六年退役后，我还没与他真正聊过，而那时交谈还是可能的。约十年前，我们有一次在奥黑尔邂逅。当时我要上飞机，他将乘下一班班机。他当时是联合会的实权人物（这与我

<sup>①</sup> 由志愿人员组成的美国政府代表机构，去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服务。

近来从报纸上得知的一致)。他在人群中看到我，将我介绍给他同伴。“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著名的表兄，艾扎·布罗德斯基。”他说。与此同时，我脑中出现一个奇怪景象：在悬浮于我们头顶的一个游魂面前，我们俩显得多么滑稽。坦基的身材像职业橄榄球员，使人联想到此人鸿运高照，人到中年，拥有自己的球俱乐部。宽宽的脸像玫瑰色迈森<sup>①</sup>瓷品，留着卷曲的金胡子。他的牙齿又大又方。该用什么词儿能恰到好处地描述这时的坦基？肥头大脑，滔滔不绝，维生素充足，有权有势，富贵而傲慢。以取乐的方式展览他的表兄——光头艾扎，眼睛像猩猩，扁平的圆脸，天真的神色更像动物园里的野兽——长手臂，橘红头发。我身上发出的所有信号，都不会引起别人的尊重，与任何有意义的世界性杰作丝毫不沾边。这时，我脑中掠过一件事。这个世纪初，曾有人问毕加索，法国的年轻人在忙些什么，他回答说：“年轻人，在忙我。”可是，我从未表现或代表过任何事物。坦基逗乐式地把我作为知识分子介绍给他的同事。我不介意被看做聪明人，可坦白说，我为被视为知识分子而感到羞耻。

反过来看坦基。他在那一行里干得很出色。他属于身材魁梧一族，做一件外套需半亩地面积大小的布，吃伊莱酒店的纽约窄牛排，集百万本钱飞到棕榈泉、拉斯维加斯、百慕大。坦基还在说：“在我们家族里，艾扎是天才。至少是其中之一，我们家有两三个天才。”

我不再是具有光明前程、聪明好学的法学院学生——事实如此。既然我曾经因被视为家族中“希望的玫瑰”而得意过，这么挖苦也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坦基的幕后合伙人是谁，也许是托尼·普罗文扎诺，

<sup>①</sup> 德国一城镇，自1710年以来以其瓷制品闻名于世。

或者是萨利（巴格斯）·布里古利奥，也许是美国国际工人兄弟会<sup>①</sup> 保险集团的多尔夫曼。不会是杰米·霍法，霍法当时在监狱里。否则，像成千上万的其他人那样，我会认出他。我们认识他这个人，因为战后，我与坦基同受雇于亲戚米尔蒂·里夫金。米尔蒂当时开了一家旅馆，据说霍法也有股份。霍法与他那伙人只要到芝加哥来总住那里。我当时给米尔蒂的儿子哈尔当老师。哈尔极其机敏狡诈，不肯用功读书。由于他迫切想做事，米尔蒂就让他负责旅馆酒吧，那年他才十四岁。有年夏天，他父母觉得让他当经理很有趣，当推销酒的人找到米尔蒂时，他说：“你得找我儿子哈尔。他负责进货。去找那个长得像埃迪·坎托<sup>②</sup> 的年轻人。”他们会发现，办公室里是个十四岁的男孩。我在那里督促哈尔，教他独立离格（他是拉丁语学校的学生）的用法规则，同时监督他工作。这是个令其父母骄傲无比的出色小孩。

自然，大部分时间我呆在酒吧，因此认识了霍法那帮人。他们几乎都是粗人，只有哈罗德·杰宾斯彬彬有礼，谈吐中，至少与我谈话时，流露出书生气。其他人非常粗野。堂兄米尔蒂想与他们较量，男人对男人，阳刚之气，但他错了。他根本无法在这场自找的挑战中取胜。他也很粗野，原则上接受虚无主义，可是他缺乏压倒一切的领导者意志。他不可能说出恺撒大帝说的话。当警卫接到命令不让恺撒通过时，恺撒说：“与你争辩还不如杀了你更容易。”霍法却正是这样的人。

坦基当时刚退役，米尔蒂雇佣他查出拖欠税款者的财产，这是米尔蒂的副业。驱逐出门是惯用的手段。表弟坦基（拉斐尔）正是通过米尔蒂·里夫金见到了雷德·多尔夫曼。曾经当过拳击手的雷德·多尔夫曼，是霍法与芝加哥犯罪团伙间的中间人。多尔

---

① 由美国卡车司机、汽车司机、仓库工人和佣工等组成的国际工人兄弟会。

② 埃迪·坎托（1892~1964）：美国能歌善舞的喜剧演员。

夫曼当时是个体操老师，从他父亲雷德那位老拳击手里继承了坦基。一大批团伙关系户也是遗产的一部分。

以上这些都是叱咤风云的人物，我曾想在他们统治的地方引导出所谓的“高尚活动”。渴望“出类拔萃”，这不是一个抽象目标。我并不是从学校小组讨论会上明白这一点的。这是健康、生理和性格的需要，它以无法获得的交感作用为基础。人类对脸面、事迹、身体的沉迷，将我引向形而上学。而形而上学之于我，犹如飞行生物的雷达。我成熟时，才发现自己头脑里的形而上学。而正如我刚说过，学校教育与此没多大关系。上大学时，我坐高架火车往返学校，在车里要坐数小时。火车轰隆隆地上下跳动着、尖叫着从城南贫民区呼啸而过，我则温习着佩里教授课上关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或者是圣托马斯的内容。

别去管这些思维了。坦基来到意大利村，他交了五十万保证金保释在外，等待宣判。他气色不好，根本就没血色。成年累月的野蛮行径使他那张大脸浮肿。凭我业余内科医生的医术，我断定他患有高血压——上压 250，下压 165。即使不进监狱，他也面临突发心脏病的危险。坦基将他爱德华式的胡子修剪得很整齐，为了精神面貌，且就在这天早上，理发师将他的头发染成金色，这个时候不能露出白发。尽管如此费神，他已不再生气勃勃。坦基不会在乎我的同情。他已打起精神，准备接受惩罚。若我表示点滴怜悯，他会生气。当我说他那边麻烦成堆时，惟有常遇遗憾的人理解我。这些麻烦发出了信号，可我缺少破解信号的密码。

意大利村在第一国家银行对面，我的办公室在第一国家银行第五十一层（那些内向弯向上弯绕，一直向上）。意大利村是城内为数不多设有私人包厢的酒店，它用于供人进行诱骗或欺诈活动。它可追溯到二十年代，用一串串灯泡及旋转灯装扮得像小意

大利<sup>①</sup>的圣人白日狂欢节。它也让人联想起靶场以及表现主义的舞台布景。禁令已消失，旧的大环商业中心为幢幢写字楼取代，于是，意大利村成了一个体面的地方，音乐界所有明星都熟悉这个地方。来访的著名女歌唱家及伟大的男中音歌唱家唱罢抒情曲，会来这里饱食意大利调味饭。墙上挂有艺术家亲笔签名的照片。不过，这地方仍保留肉食气息：红酱般的血、脚臭味的乳酪饼、以及从海泥里集拢起来的无脊椎动物做成的菜。

很少谈到个人私事。你在街对面工作？坦基说。是的。如果他问我日子过得怎样，我会说，六点起床打室内网球，促进血液循环，到办公室后，先读《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家》以及《巴伦周刊》，看看秘书准备好的一些打印材料以及信息资料，记录重要事件，之后，就把一切全置之度外，把上午余下的时间全用于自己的私事。

表弟坦基没有问我日子过得怎样。他提及了我们各自的年龄——我大他十岁——并说我年纪大了，嗓音变得深沉了。不错。我深沉的男中音只在献献小殷勤上增加点深沉。晚宴上给女士让座时，女士可沉浸在深沉的男中音中。或当我安慰尤妮斯时，天晓得她需不需要安慰，我那些语无伦次的低语好像具有稳定情绪作用。

坦基说：“出于某种原因，你与所有的堂表兄弟保持联系，艾扎。”

我回答的低沉声音模棱两可。我以为不该提及他在联合会的生涯或者提及他最近的审讯，即便是暗示也不应该。

“告诉我，米尔蒂·里夫金出了什么事，艾扎。我退役回来时，他与我断绝了来往。”

<sup>①</sup> 指在美国纽约等大城市中的意大利移民或意裔居民区。

“米尔蒂现在生活在阳光地带<sup>①</sup>。娶了旅馆的总机接线员。”

坦基也许会告诉我一些有关米尔蒂的惊人消息，因为我知道堂兄米尔蒂曾经非常想拉霍法进一步参与旅馆的经营。霍法有钱库，是养老基金会，成亿的钱。米尔蒂很壮实，近乎肥胖，长着一张俊俏的鹰脸，一脸骄傲。不加节制的身体穿着过分华丽，俗不可耐，目光里流露出目空一切和好斗的神情。他很会赚钱，但性情暴躁，发怒时拔拳就打，危险可怕。他经常打架，近乎疯狂。他前妻利比体重达二百五十磅，穿着尖跟鞋在旅馆里颠东颠西，大家常暗称她“不怕死的金发女郎”（她的金发是自己染的）。利比招待客人、记账、管理、威胁、痛骂厨师长、解雇管家、雇佣酒吧招待，无所不能，自己打扮得像个歌舞剧演员。为了能制约米尔蒂（他们与其说是夫妻莫如说是生意伙伴更合适），她减少自己的工作量。米尔蒂好几次向霍法抱怨他的一个伙伴个人账没结清。那个伙伴——一下子记不起他的名字来，为了停车而在他克莱斯勒的前挡风屏上贴了一张牧师标签——把米尔蒂打倒在大厅地上，又差点将他扼死。这事件引起了罗伯特·福·肯尼迪的注意，他当时出来找到霍法，发传票要堂兄米尔蒂到麦克莱伦委员会去作证。疯子才去作证，与霍法的人作对。听说传票将到时，利比大叫说：“瞧你做了什么？他们会把你剁成肉酱！”

米尔蒂出逃了。他开车到纽约，在伊丽莎白女王街往他的凯迪拉克装东西。他不是独自一人，有总机接线员陪着他。他们是爱尔兰美国大使的座上宾（是通过德克森参议员以及参议员的特别助手朱利叶斯·法尔卡什联络上的）。在美国大使馆逗留期间，米尔蒂买下后来建都柏林新机场的那块地，然而他买错了地。之后，他与他未来的妻子飞到欧洲大陆，乘一架运输机，载着他那辆凯迪拉克。飞行时，他们玩着纵横字谜游戏。在罗马着陆……

<sup>①</sup> 指西起加利福尼亚州，东至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一带。

我省去这些细节，没有告诉坦基，他可能知道其中不少事。再说，他见多识广，这些事不值一提。谈及霍法或逃避传票就如谈及什么忌讳的事。坦基当然被迫拒绝通常联邦提出的豁免权。接受它是致命的。联邦调查局在威廉斯—多尔夫曼一案中使用电话窃听以及其他的证据的事公开后，人们对此更能理解了。消息如：“告诉默尔，如果他不以我方条件将他公司的控制股份卖给我们，我们就毁了他。不只他一人，我们也会劈死他妻子，卡死他孩子。而且请你告诉他的律师，我们也会给他、他妻子及孩子同样待遇。”

坦基本人不是杀手。他是多尔夫曼的生意人，是他法律及财务方面的人员。但他曾受命去威胁那些不痛快合作和或付款的人。他曾在精美漆面的桌上掐熄雪茄，将人家妻子和孩子的镶框照片砸得粉碎（我想，在某种情况下这个主意不坏）。这涉及到几百万的美元。对无关紧要的事他不会发作。

很自然，谈及霍法会让坦基生气，因为他也许是少数几个知道霍法是如何失踪的人。我自己大量看书读报（出于对一个有牵连的表弟关心），迫不得已相信，霍法在去底特律进行“和谈”会议的路上，上了一辆车，当即被敲碎了头，很可能被人谋杀在汽车后座上。他的尸体在一台机器粉碎，在另一台机器里化为灰烬。

坦基的神情及脸上的浮肿——牵涉命案秘密的水肿——都说明他对这些情况知之甚多。这给他带来危险。他为此得进监狱。有关机构认为，他顽固不化，将对他严加提防。他需要我做的只是给法官写封私信。“尊敬的法官，呈于您的陈述是关于被告拉斐尔·梅茨格的。我家里要求我以法官的朋友身份求情，我充分信任陪审团的出色工作。但是，我努力说服你在审判中给予仁慈。梅茨格的父母是体面的善良人……”也许还会加上，“从他

一出生我就认识他，”或者“我参加了他的割礼<sup>①</sup>”。

下面这些方面法庭不会给予注意：他是个大孩子；坐高脚童椅的孩子里没见过有他这般大；他脸上依然带着出生时的神情，就是那种宁静、可爱的傲慢神情。其情形就如西班牙的谚语所说的：

神形终身永随，  
直至进入坟墓<sup>②</sup>。

神赐的，或像大多数人喜欢说的，遗传的特征，即便在腐朽和毁灭时都存在。我们具有相同的遗传特征，只是程度不同。我的骨架窄小，但类似的特征显而易见：脸颊上的皱纹、鼻子末端的转向，最明显的是下唇趋向饱满——嘴巴朝感觉世界做功时的方式。你还可以从老家的——正统教派，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同族人的照片上辨认出以上这些特征。可是，蓄胡男人的颧骨、大头盖骨下的宽额、隐蔽的双眼带着凝滞目光露出吃惊的神情，这些特征从他们后代脸上依然清晰可辨。

两个表兄弟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里相互审视着。坦基鄙视我，这不是秘密。怎么可能是秘密？表哥艾扎·布罗德斯基，讲话用词古怪，表达的意思从未真正清楚，动机令人琢磨不透，明显是个怪物。他学弹钢琴，被吹为奇才，在金博尔大厦（欧洲落难音乐大师的诺亚方舟）引起极大轰动。他在康普顿<sup>③</sup>百科全书编辑室工作，编一本杂志，研究语言——希腊语、拉丁语、俄语、西班牙语——而且还研究语言学。

① 犹太教、伊斯兰教出生时的宗教仪式。

② 原文为西班牙语。

③ 康普顿（1892~1962）：美国物理学家，获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

我曾错误地理解美国。对于讲究实际的人来说，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霍法的语言。坦基属于霍法之流——从大半的必要条件看，基本上与肯尼迪之流相似。如果不说真话，就是说假话。如果不心狠手辣，就是心慈手软。而且我们别忘了，头头入狱期间，坦基作为他们的干事，曾经管理过一个大公司，而该公司拥有的房地产比曼哈顿蔡斯银行拥有的还多。

再回过来看艾扎：他没有从事音乐，也没有从事语言学，他对大学的空谈家们失望后，却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出了名。他也没有当律师，那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明星向来不从事具体的事务。他爱上了一个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手。单相思，结果并不理想，她忠诚于她的丈夫。艾扎的妻子组织电视节目，精明得出奇，但她也无法使他务正业。事实很明显，艾扎天生不是个愿意合作的人，而且也没有在这方面长进的可能，于是，她踌躇满怀，离开了他。她像堂兄米尔蒂的妻子利比，将自己看做婚姻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一方，统治的一方。

坦基想将艾扎这样的人变为什么样的人呢？艾扎并不被动。艾扎确实有人生计划，但他的计划不为他同时代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似乎没有同代人。他只与活着的人有联系，但这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生存的主要特点表现为焦虑不安。没有人——绝没有人——说得准将来怎样。

让坦基感到奇怪而好笑的是，艾扎竟会如此受人尊敬，而且关系很多。这个嗓音低沉的艾扎是个绅士，是许多上层社会俱乐部和协会的成员。坦基的表兄是个绅士！报纸上常登着艾扎的照片，光着头，一脸宁静。他显然赚了不少钱（对于坦基来说，微不足道）。也许他不愿意向联邦法官透露，他是一个重罪犯的表哥。如果坦基这么想，那么他错了。

几年前，艾扎还是个疯狂角色。他的电视节目如“二市”<sup>①</sup>剧，像马克斯兄弟<sup>②</sup>的喜剧保留节目，办得都很红火。

现在艾扎的举止大不相同。今天他文文静静，是个绅士。当绅士需要些什么？过去需要有世袭的土地、高贵的血统与谈吐。在上世纪末，要懂希腊语和拉丁语，而我每种语言都懂一点，说到这些，我可以享有额外的优势，因为我不必成为反闪米特（反犹太主义）者或不必经放弃犹太籍来强化证明我是文明人，但别管这些。

“尊敬的法官，也许有必要听听已审案的真实情况。当法官很少有机会知道人类普遍的生存状况，作为梅茨格的表兄，我可以是广义上的‘法院之友’<sup>③</sup>。

“坦基在高脚童椅里时我就认识他。坦基这个名字是他在舒尔茨高级橄榄球队时叫出来的。他母亲叫他礼福儿，还叫他福儿亚，福儿卡。她是村妇，生他时还没有佩尔地区<sup>④</sup>。一个巨婴，用带子捆扎着，挣扎着想摆脱带子。声音洪亮，肤色清晰。与其他婴儿一样，他一定也吃宝宝乐或米粉，但姨妈沙娜还给他吃更稠的东西。她在厨房里烧像牛蹄冻这样的天然菜肴，我还记得给他吃过炖肺。肺吃起来像海绵，别有滋味，很耐嚼，有很多软骨。他家住在霍因街的一幢砖头平房里，有个白色和罗马甜瓜色相间的宽条遮篷。姨妈沙娜是个铁腕女人，将家治理得像有几百年的历史似的。她人宽大，像个鼓风机，说话惯用惊叹语气。先用意第绪语说：‘听着！听着！听着！’然后告诉你她的想法。也许像她这种类型的人在美国已没有了。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① 即兴演出艺术团团名，由迈克·尼克尔斯等人组成。

② 美国杂耍、电影喜剧演员家族。

③ 法律用语。指对案件中涉及公共利害事项陈述自己看法的法院临时法律顾问。

④ 佩尔地区，历史上指在俄国规定给犹太人居住的地区。

我们喜欢对方，我去梅茨格家是因为我在那里觉得自在，同时也为感受原始家庭生活。

“沙娜的姑姑是我的外婆。在仅有的十多个能通篇背诵巴比伦《塔木德经》<sup>①</sup>（或者是耶鲁撒冷《塔木德经》？我对这很无知）的人中，我祖父是其中之一。我一生都在问：‘为何要通篇背诵？’但人们就这么做。

“梅茨格的父亲在大环商业区的波士顿商店卖男子服饰用品。他过去在奥匈帝国学过裁缝，也学过男子服装设计。他有很多手艺，穿着一向讲究，身材矮胖，秃顶，只在额上有一缕头发，梳向右边。有人秃头不易让人注意，可他却很明显。紧张时，秃顶鼓起一个个疙瘩，直到他平静下来才恢复原貌。他少言寡语，遇事咧嘴笑笑，如果说有什么好脾气的天然分界线的话，这条分界线就在他脸上。他长着坦率简洁的牙齿，空隙很大。还有呢？他苛求尊重，不容任何人任意践踏他的温良恭敬。脾气上来时，他会气得说不出话来，头皮下冒出大块的疙瘩，但这种情况不多见。他有眼皮跳的毛病。同时，他也会说些无伤大雅的意第绪脏话，表示对孩子的喜爱——这是信任你的标志。如果年龄相当，你们会成朋友。

“尊敬的法官，若你看重被告家庭背景，还有一件事。他父亲，即我姨夫梅茨格，喜欢晚上外出溜达，他经常来与我父亲和后母玩牌。冬天他们一起喝茶，吃罐头草莓；夏天，他们派我到店去买三色冰砖——香草、巧克力以及草莓，买时称‘分层花色冰砖’。他们玩一种赌注小的扑克，经常玩到夜半三更。”

“我知道你是杰拉尔德·艾勒的朋友。”坦基说。

“熟人……”

---

<sup>①</sup> 《塔木德经》：本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在犹太教中仅次于《圣经》等重要经典。

“去过他家吗？”

“大约二十年前。但现在那幢房子没了，他妻子也没了。过去我常与他在聚会上见面，现在那些办聚会的人都已仙逝。圈内人近半数入了土。”

按惯例，我借一切机会表达我对生命的感受，提供太多的信息，其中有的对询问者是无用的。我父亲先前也有这个让人气恼的习惯。坦基不关心谁进了坟墓。

“你是在艾勒当法官前认识他的？”

“比这还早……”

“那么，你也许最合适给他写信谈我的事。”

奉献一个小时的伏案工作，我也许可免去坦基多年的监禁。为了往日，为了我喜爱的他的父母，何乐而不为呢？若我要继续保留以往的美好记忆，我必须这么做。如果让沙娜的儿子失望，我的纪念品会发臭。这样做是出于道义还是感情，我没有选择决定的余地。

我也许会给艾勒写信，炫耀我莫名其妙拥有的影响力。坦基如何解释我的动机令人好奇。在他看来，我似乎是个笨蛋，而这个笨蛋想让人有理由相信，他的信对艾勒这样经验丰富的联邦法官居然会有很大影响？或证明我的生活是正确的？他永远不会向我承认他的想法。但是，面临刑期长的判决，他没情绪研究生活中的奇怪现象。他病了，万分沮丧。

“街对面的第一国家银行相当不错。”

下面广场上有一幅价值连城的夏加尔<sup>①</sup>的巨幅镶嵌画，主题为美国人之魂。我常怀疑年迈的夏加尔是否有足够的体力读这幅巨画。他漂浮感太强，太奇思怪想了。

我解释说：“我所在的小组就外国贷款向银行家提供咨询服

<sup>①</sup> 夏加尔（1887~1985）：犹太画家，生于俄国。

务。我们的专业是国际法——政治经济学等。”

坦基说：“尤妮斯很为你骄傲。她寄给我各种有关你的剪辑材料：有你在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发言、与州长坐同一包厢观看歌剧、安瓦尔·萨达特<sup>①</sup>夫人获荣誉学位时你做陪、与政治家们打室内网球。”

表兄艾扎深奥的爱好使他能接触显贵人物——艺术赞助人、政治家、上流社会的名流淑女、独裁者们的寡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坦基痛恨政治家。他对政治家的了解远胜我，认识真正的头面人物；与核心人物做过交易，与他们保持现金周转关系。他能告诉谁从谁那儿收钱，哪一帮拥有什么，谁供养学校、公共住房、县监狱及其他机构，谁从公共住房里榨取好处，谁给予特许并私下签订交易。除非你是长期圈内人，否则你不可能发现歹徒及核心人物的秘密联系。这些人偶尔也会暴露。最近曾有两个职业杀手试图将一日本毒贩杀死在他车里。此人名叫江渡东京让卫。他头部中了三弹，然而，连弹道学专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一颗子弹也没有射穿他的头盖骨。既然到了这个分上，东京让卫没什么可怕的了，说出了两个杀手的名字，其中一个居然是领取县治安官津贴的代理人。难道其他市、县的领津贴者也在暗地里买吗啡？没人提出进行调查。表弟坦基大都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在被告席上嘲讽地看了我一眼。但即使这一眼也苍白无力，毫无力量。面临囚室的阴暗，他不舒服。家族里也曾有人犯过错，但没有严重到进监狱。他不想与我讨论这些。他想的是利用一下我可能有的影响力。值得一试。又一件棘手的事。至于我同意求情的动机，无需费神查考。多愁善感。蠢举怪事。虚荣。

“行，拉斐尔，我给法官写封信试试。”

我这么做是为姨夫梅茨格的眼皮跳，为了三色冰淇淋，为姨

<sup>①</sup> 安瓦尔·萨达特（1918~1981）：埃及前总统夫人。

妈沙娜疯长的红头发，为她太阳穴及额中央搏动的筋脉，为她拖地时以及在地上一页页地铺《先驱论坛报》时光着脚向前移动的力量，同时也是为表妹尤妮斯的结巴，为治结巴而上过的演讲课，为她给着迷的家人背诵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sup>①</sup>的诗以及她勇敢面对《霜降南瓜》<sup>②</sup>的难度，为发好“a-a-a-a”所显示出的决心。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参加过坦基的割礼，听到过他的哭声，是因为他笨重的身体现在锁在失败的迷雾中。胡子上的小卷不见了。他面露经过与死神进行小打小闹过的神色，眼下的脸颊严重损伤。但是，若他以为我多愁善感，而他是虚无主义者，那么他错了。我自己见过罪恶，见过旧生存枷锁的腐朽，见过人类躯体遭受的痛苦，凡此种种，我都冲动地要亲自经历体验一番。

我之所以写信，是因为堂表兄弟在我记忆中占着独特的位置。

“尊敬的法官，拉斐尔·梅茨的父母是勤劳、遵纪守法的人，他们连违犯交通规则的纪录都没有。五十多年前，布罗德斯基家初到芝加哥时，是梅茨格家收留他们住了几个星期。我们睡在地上，当时身无分文的移民都这样。梅茨格太太给我们孩子衣服、洗澡、食物。这一切发生在被告出生前。不可否认，拉斐尔·梅茨格性格残忍，但他没有犯枪杀暴力罪，而且，鉴于他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也许他还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预审时，医生已证明他患有肺气肿和高血压。若他必须在恶劣的监狱里服刑，他的健康可能会被无可挽回地毁掉。”

最后的话是胡扯。良好的联邦监狱犹如疗养院。我听到不止

---

① 詹姆斯·惠特科姆·赖利（1849～1916）：美国诗人，善用印第安纳方言写诗。

② 赖利的诗。

一个以往的囚犯说过：“监狱使我焕然一新。他们治好了我的疝气，给我的白内障动了手术，给我换假牙，给我安助听器。要是靠我自己，永远付不起这些钱。”

艾勒这样的法官收到求情信件不少，它们成千上万出自市民领袖、国会议员之手，更有目标明确的其他联邦法官。这些信都用低劣的语言大谈高尚的道德——为遇上麻烦而又关系密切的某个人、或政界伙伴、或老朋友写的满纸好话的贿赂信。让艾勒法官自己在字里行间去琢磨。

我还是有作用的。坦基判了很短的刑期。艾勒当然知道坦基的行为是受他上司指使的。即使有酬金也不会很多。也许钱少不烫手，但他绝不会像他的一些头头那样，拥有四幢房子。我也明白，法官知道当时正在进行秘密调查，知道大陪审团正在起草起诉书。政府要捕捉更大的猎物。艾勒不会跟我谈这些事。我们见面谈的是音乐和网球，有时谈谈外贸生意。我们聊聊大学的事。艾勒清楚，重判将危及坦基的生命。他会被怀疑为早日出狱而出卖情报。大家一致认为，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就在被控与内华达贿赂案有牵连后，于去年被杀。原因是一旦他被判终生监禁，他可能会愿意与当局达成某种交易。多尔夫曼去年冬天头部中两弹身亡，地点是停车场。杀手技术高超，未留痕迹。摄像机对着血迹斑斑的弹口拍了许多特写镜头。没人去将伤口的血洗去，我心想，耗子们半夜会出来舔食它。多尔夫曼想到了死，没有做任何防范。没雇佣保镖。保镖与杀手进行混战的结果可能要他的家人赔偿。因此，他等待不可避免的枪杀，默默承受濒临死亡的情感折磨。

有句话概括人们如何看待芝加哥的这种事情，这种全都赞同的生活，即贱买贵卖，这是交易的灵魂。按杰出哲学家的理论，政治和民主的稳定建立在欺诈和诡计的基础之上。目前，欺诈的圆滑性为自身安排豁免权。高层执法者、处于权力核心的律师、

致命法网的铺设者等，他们绝不会被碎尸、焚毁，他们绝不会有脑门血洒停车场的结局。因此，芝加哥人对冒生命危险明目张胆犯罪而拥有四幢别墅的歹徒，反而怀着一份敬意。我们用是否害怕死亡来判断中产阶级的本质。芝加哥公众审视它对此事的态度却没这么仔细，但你已知道：歹徒的大头目在灵魂深处都准备死亡。他必须如此。以这种基本方法作为提醒：正义一定形式上还是存在的。普通百姓应有所感激（我顿时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的愤怒；不说了）。

我必须陈述这样一件事。在审判前，有人给我送来一箱拉斐特—罗思柴尔德，让我很难堪。当时我还没寄出给法官的信。作为律师（不积极参与的），我对此不当行为感到不安。神不知鬼不觉。齐默门公司的车子给我送来十二瓶美酒，但这酒玷污良心，不能喝。我将酒送给了女房东，作为晚宴礼物。坦基至少懂得什么是好酒。

在意大利村我要了诺泽尔，一种高雅的意大利红酒，坦基几乎没有尝。他不让自己喝醉，这太糟了，否则我也许可以让他当一回我堂表兄弟中让人感到愉快的知己（在我俩的历史上没有过这样的事）。我本人也与大笔放贷有牵连。坦基做的是数百万的大生意。作为撰写简要文件的一员，我参与了向墨西哥、巴西、波兰以及其他一些困难国家贷款数十亿的事。就在那一天，一个西非国家的代表到我办公室，讨论他国家面临的硬通货困难，尤其是限制进口欧洲高档产品，特别是执法阶层使用的德国和意大利进口车（他们周末开着车，带着夫人孩子去观看当众处决——一周里最让人快活的事。那代表用一口迷人的巴黎大学校园英语告诉我）。

但坦基绝不会将他们的秘密告诉我。我绝不可能打开两个都做大钱生意的犹太表兄弟间各怀鬼胎的交谈话匣。

无论这个隐蔽的、参与秘密活动的人走到哪里，沉默都跟到

哪里。万丈深渊的沉默，使得像我这样的男中音再次开口说话时，会产生巨大的回音。

应该说，最吸引我的不是坐办公室，而是不同的爱好和激情。我正要谈这个。

由于表现出色，坦基减了刑期，他只需在阳光地带一家体面监狱里再服八个月的刑。他是受过培训的会计，可指望派干些轻活，最有可能是摆弄电脑。你会以为他会感到满足。没有，他既不安分，又很迫切。他显然觉得，艾勒可能听到他表兄艾扎的低声咕哝就会心慈手软。假如我对芝加哥人的思维方式略有所知，我想，坦基甚至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艾扎对法官“很有办法”。

不管怎样，表妹尤妮斯又打电话来，“我必须见你。”若是为她自己，她的话应这么说：“我想见你。”于是我知道又是坦基。现在又要什么？

我知道不能拒绝。我入了圈套。还在库利奇<sup>①</sup>当总统时，布罗德斯基一家就在姨妈沙娜家的地板上睡过觉。我们挨饿时，她喂我们。基督以及先知的教导永远留在有些人的血液里。

注意，我完全同意黑格尔的说法（一八〇六年在耶拿上课时），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世界的枷锁”——正在像梦中的幻觉一样自行消亡、崩溃。一种新的精神正在——或不得不——诞生。或如另一位思想家和幻想家所说，人类长久以来为一种听不到的音乐支撑，它使人类流动、延续，和谐一致，但这种和谐的音乐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粗野的音乐。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然力已开始展现出来，虽然其形式还没有明确。

还有一个很好的解释：传播音乐的宇宙乐队突然取消表演。那么，我们堂表兄弟们互相的关系又将是如何的呢？我把自己与

<sup>①</sup> 库利奇（1872~1933）：美国第三十任总统。

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我有自己的兄弟，一个是外交官，我从未谋面过，另一个在特古西加尔巴<sup>①</sup>经营一个出租车车队，早将芝加哥彻底遗忘。可以说，我被封闭在一个历史的小港湾，无法远航，甚至无法从犹太堂表兄弟的束缚中解脱自己。看来世界枷锁的消亡对犹太人的影响完全不同。一直延续至今的全部观念——这一世界枷锁……

坦基与这枷锁有何关系？成年在地狱生活，瞧不起自己的姐姐，视表哥艾扎为怪物。我们面前的生活是大家认同的生活，但表哥艾扎不认同。他为什么要固执己见？他以为自己是哪半球人？如果他按兵不动，不去满足周围的达官显贵，他从何满足自己的天性？

是的，我们在意大利村见面，喝诺泽尔。意大利村有三层，三个餐厅，我分别将它们起名为地狱、炼狱及天堂<sup>②</sup>，我们在天堂厅吃柠檬小牛肉。坦基因需要找到艾扎。犹太人的亲族观念——特殊现象，是犹太人自身一直都在抛弃的文物，但目前的时代却阻止了他们。显然，崩溃的世界压在了他们身上，抛弃无法继续。

好，我现在带着尤妮斯来到第一国家银行大厦的顶楼用午餐。现实奇特世界的一个纪念碑。（现实世界还有多奇特？）我给她指点景色，在我们下面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是那家意大利村酒店，窄窄的一条汉塞尔－格雷特尔<sup>③</sup>时代的旧建筑。它的一边是施乐集团新总部的绿色富丽堂皇的大厦，另一边是贝尔储蓄公司的大楼，它被挤在中间。

① 洪都拉斯首都。

② 地狱、炼狱、及天堂，这三个名字是意大利诗人但丁《神曲》里的三界名称。

③ 格林童话中同名童话里的两个主要人物。

我痛苦地意识到，尤妮斯做过癌症手术，知道她衬衣下有一痛苦的红色刀疤。上次见面时她告诉我腋下很疼，害怕再次复发。顺便说一下，她掌握医学术语的能力很惊人，而且你绝不会忘记她对行为科学颇有研究。为抵消那些旧情感和同情心，我自卫地思索着梅茨格家人不好的地方。首先是坦基的粗鲁。其次，老梅茨格在经营波士顿商店时，只要有一小时的空闲，他就会频频光顾粗俗低级的歌舞表演，我逃学时能在色情的低级场所见到他，但那不是大罪过。说是罪过，其实令人同情。那是他活力的体现方式，是人为的复苏。一个性敏感的男人在低矮的平房里履行了夫妻职责后，也许会感到自己生殖器疼痛。姨妈沙娜可亲可爱，但她决非是个淫猥多情的女人。但是，在庸俗的芝加哥，南州大街除庸俗的低级趣味外不再有别的特色。在高雅的东方，即便在圣城，展现在公众面前的是更为糜烂庸俗的东西。

接着，我竭力寻找姨妈沙娜可被指责的地方，如何否定她。在暮年时，她拥有了一幢大公寓楼，却又为省车费在谢里顿路上搭车。有位亲戚说，为留给尤妮斯更多的钱，她宁愿挨饿。人们还说，尤妮斯需要她的每一分钱，因为她当公园雇员的丈夫厄尔，每周刚发工资就存上，封在他个人的账户里不动，不承担任何经济责任。尤妮斯只好全部用自己的钱供孩子求学。她是教育委员会的心理学家，职业是心理测试（坦基或许会说成，她的扯蛋）。

在第一国家银行的顶部，我与尤妮斯在我们订的桌旁坐下，她说了坦基新的要求。迫切为弟弟服务的心情吞噬着她。她是一个类似于她自己母亲的母亲，富有牺牲精神，当姐姐也是一样。坦基过去是五年看望尤妮斯一次，现在频频与她联系。他将他的信息带给我。我像格林童话里的那条大鱼。渔夫将它从网里放走，它答应满足他三个愿望。我们现在面对第二个愿望。鱼在餐厅里聆听。坦基想要什么？再给法官写封信，要求经常进行医疗

检查，能常去看专家，饮食要特殊。“他吃的东西让他作呕。”

大鱼这时应该说一声，“留神！”

可是，他却说：“我可以试试。”

他以更低沉的声音开口说话，一种极美的低音，几个音符用双重低音奏出，又仿佛是出自稀少的中音提琴<sup>①</sup>，海顿酷爱中音提琴，专为它写了动人的三重奏。

尤妮斯说：“我的特殊使命就是要让他从那里活着出来。”

以便让他活着在非法赚钱的领地里陷得更深，在拉斯维加斯式的酒店进行操纵，看上去健康（其实有病）地混在头上擦着亮闪闪的发油的人堆里，发油的目的就是使人看上去充满活力。

尤妮斯百感交集，无以言表。她将她的语言能力转移到易发挥的主题上。使交谈陷于困境的原因在于，她对已掌握的专业词汇异常骄傲。对她获得的教育心理学学位沾沾自喜。“我是专业人员。”她这么说。她一有机会就说这样的话。她实现了她母亲的不甚明确却非常强烈的愿望，以及对她孩子的奢望。尤妮斯并不漂亮，但在沙娜眼里是心肝宝贝。她曾像其他女孩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裙子和内裤（看得见）是同样质地的印花料，当时是二十年代流行款。在同龄孩子中，她是巨人。除此以外，一紧张就结巴，她的脸就涨得通红。那时她学会了大胆使用祈使句，里面饱含她结巴时的巨大能量。经严厉的自律，她抑制住了骂人的冲动。

她说：“你一向愿给我忠告。我也一向找你帮忙。艾扎，我很高兴你那么富有同情心。大家都知道，我丈夫不可依赖。他对我提议的事都反对。所有钱都得分开。他对我说：‘我管我的钱，你靠你的钱过日子。’姑娘们高中毕业后，他就不愿让她们再受教育，他自己也是高中毕业。我不得已卖了母亲的楼房，我自己

① 一种古老的弦乐器，似是吉他，似是大提琴。

去抵押。糟糕的是，当时的房价太低。现在可高入云霄。我经济上遭受了很大损失。”

“拉斐尔没有给你什么忠告？”

“他说，我将所有遗产都用在两个姑娘身上，太傻了。年老时我怎么办？厄尔也是一样的意见。每个人都该自立。他说我们都得靠自己。”

“你对你的女儿格外全心全意……”

我只认识她小女儿卡洛塔。她有着说不清的冲劲，身材像北极爱斯基摩人。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极地及极地人令我神往。卡洛塔的手指甲长而尖，还涂着指甲油，她的神情像得了热病，说话易激动，语无伦次。我曾参加过一次家庭晚宴，她弹钢琴，但声震如雷，让人没法交谈。亲戚珀尔请她弹柔和些，她哭了起来，将自己反锁进厕所。尤妮斯告诉我，卡洛塔将退出和平队，加入西岸<sup>①</sup>的武装部队。

大女儿安娜洛志向较稳定。她的成绩不太好，进不了好的医学院。表妹尤妮斯现在向我详述她的职业教育，令我震惊。“我得付额外的钱，”她说，“我得给学校捐一大笔钱。”

“你说的是塔尔博特医学院？”

“就是。即使找院长谈话，还得付钱。你需要找一个可信赖的人。我不得不答应斯卡佛——”

“哪个斯卡佛？”

“我们的堂弟斯卡佛，那个基金募集人。得找个牵线搭桥的。斯卡佛说，要是我先给他公司送上一笔礼金，他会安排我与院长会面。”

“在医学院，私下进行？”我说。

“否则我进不了院长办公室。我送给斯卡佛一万二千五。他

---

<sup>①</sup> 指 1967 年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部分。

开的价。还有，我得保证给塔尔博特医学院五万美元。”

“不包括学费？”

“不包括学费。不难想像医学学位值多少，想像它确保的收入。像塔尔博特这样的小学院，没有捐款，就没有基金。除非在薪水上有竞争力，否则就聘不到好的老师，没有好的老师，就保证不了水平。”

“所以你非得捐款？”

“我分期付款，先付一半，答应毕业前再付另一半。不付就没有学位。一般人永远不知道有这些秘密交易。”

“所有这些你都能兑付？”

“即便安娜洛当了班长，学校仍传话来，希望交清余下的钱。当时我很绝望。心想，我有百分之五的抵押，而现在大约是十四。厄尔不愿跟我谈这事。我带着这个问题去找心理医生。他建议给医学院院长写封信。我们构思了一个申声，——承诺善待这两万五。我说我是‘无比正直’的人。我找律师看看措辞上有没有问题，他建议‘正直’足够，无需‘无比’。于是我写道：‘我以一个人正直的人向你保证。’基于这，安娜洛才被允许毕业。”

“于是……”我说。

我的问题使她迷惑。“二十五美分邮票省去我一大笔钱。”

“你不付钱了？”

“我写了信……”她说。

我们的分歧在于强调点不同。她坐得更直，不碰椅背，整个脊梁挺得笔直。矮小的尤妮斯已变得瘦骨嶙峋、一副老妇形象，只是气质仍显高贵，侧影高凸，满脸她母亲的气色，半血色，半非理性。如果可能，用高雅古老的目光，对她视为骄傲的这些当代“时髦”看上几眼，将它们综合起来考虑。

但是，如果我们中有过时的人，这个人就是我。表兄艾扎再次不妥协。什么动机？不知出于何因，我未向她的成果道贺。她

却渴望我称赞她，干了一件多么聪明的事，多么出色，可我似乎注定让她失望。我这种令人不解的执拗意味着什么？

“那几个词，‘无比正直’省了你二万五……？”

“我告诉过你，艾扎，是‘正直’，我删去了‘无比’。”

尤妮斯为什么不该使用好词？所有的词都是供人使用的。她对外交的把握比我强。我不想让“正直”一词被嘲弄。恐怕我最好的理由是维护诗一般的美好事物。这个理由太蠢，她要维护她单乳房的躯体。癌细胞的转移会毁了她。

话题换了。我们谈了谈她丈夫。他在临湖大公园忙着。由于犯罪率急剧上升，公园委员会已决定砍去可藏身的灌木，拆除老式、舒适的洗手间。强奸犯用灌木作掩护，女人在公厕里遇刺身亡，故现在出现了像岗亭一样的罐头公厕，一次只容一人。卡尔格负责这些新罐头房子的安装。尽管从坦基谈丈夫，谈他所做的一些事上，他并没给我什么好印象，但她述说时的语气中带着骄傲。他的嘴奇紧，使人无意交谈。谈话毫无价值。也许他是的。我明白他的意思。从正面看，他毫不在乎人们对他的看法。他是个敢说敢为的怪人。他的独立意识深深打动了。毕竟他没有趋附。

“我得付一半的房租，”尤妮斯说，“还有公用设施费。”

我没有轻易相信她的不幸故事。“你们为什么呆在一起？”

她解释说：“他的蓝十字—蓝盾<sup>①</sup>也保我……”大部分人会相信这个解释。我则是将信将疑，将所有事情放在一起看。

饭后她想看看我的办公室。“我的天才表兄。”她说，很满意房间的规模。我是重要人物，应该在大厦第五十一层占有这么大空间。“这些小玩艺儿、文件以及书有什么用途就不用打听了。比如这些巨型绿书。要你解释，你肯定会感到厌烦。”

<sup>①</sup> 美国一种非营利性的健康保险组织，会员或其家庭可享受医院治疗保险。

这些褪色的巨部头绿色书可追溯到本世纪初，与我拿薪水的工作无半点关系。读这些书时，我在逃学。那是两卷本杰瑟普远征系列报道，由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出版。西伯利亚人种志，很吸引人。这些专著减轻了我的痛苦（不小的痛苦）。乔基尔森和博戈拉斯在书中描述的两个部落——科里克<sup>①</sup>和楚克契<sup>②</sup>深深地吸引了我。脱衣舞像磁铁将老梅茨格从波士顿的店里吸走（着魔似地离开他的伙计岗位），同样，我也因这些书而疏忽了公务。政治激进分子瓦尔德马·乔基尔森和瓦尔德马·博戈拉斯（两个俄国犹太人起这样古怪的名字），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两位瓦尔德马在这个地区数年潜心研究当地部落。苏联人后来在这个地区建了马加丹和科雷马两个最差的劳改营。

我像读《圣经》一样为了超脱而读，北极荒原，为冷酷如火的冰霜所净化。冬季的黑夜，即使在西伯利亚驻地内，一旦你被风吹倒，就可能失踪。积雪的速度快得惊人，没等你站起来，已将你掩埋。如果你将狗拴紧，等早晨挖出，你有时会发现它们已奄奄一息。在这块黑暗的土地上，你得从烟囱里的梯子爬进屋。大地扬起大雪时，狗爬上去嗅嗅在煮什么。它们互相争夺烟囱顶部的位置，有时掉进大锅里。有狗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照片，常见的祭祀形式。你为各种力量——黑暗所包围。一个提供资料的楚克契人告诉博戈拉斯，人类四周存在无形的敌人，各种贪得无厌的幽灵始终张着大嘴。人们卑躬屈膝，花钱买安全，免受这些丧心病狂的魔鬼的侵扰。

大脑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的游历历程不可能相同，黄金领域游移别处，漂泊到了过去。在办公室读着这些部落、幽灵以

---

① 在西伯利亚东北部。

② 在西伯利亚、近白令海峡处。

及萨满教僧侣的故事，我的四周一片奇妙的寂静——它两倍、四倍地增加……十倍的寂静，周围是喧哗的大环商业区。我的窗口面向大公园，我不时地凝视湖滨，我的表妹夫卡格尔剪掉了那里开花的灌木，不让它们掩护色情狂，还修建了单人用窄小公厕。这座巨大的公园有供游艇游划的小湖，那些窄长的游艇则属于律师或公司的经理们拥有。周日停泊，是性暴力的场所。而周末，施暴的色情狂们却携妻儿宁静地泛舟湖上。我们在准备一种新精神的诞生，还是在准备最终崩溃的痛苦（而这是不是前几页所提及的悬虑不安），这取决于你的所思、所感，以及对灵魂或幽灵的驾驭，取决于你在诠释这些当代事物时所形成的神秘<sup>①</sup>技能。我的直觉是，科里克和楚克契人引我走上了正路。

于是，我在办公室里读着博戈拉斯和乔基尔森的书，神思恍惚。没多少人来打扰我。开会时，我醒过来。我变成预言家，同事们则听我分析。我对巴西分析正确，对伊朗分析正确。我预见到了毛拉<sup>②</sup>革命，而总统的顾问们却没有，但我的观点必定要遭到反对。借贷机构的利润巨大，又有政府担保的保护，我不可能指望我的建议被采纳。人们称赞我“深刻”和“聪明”，这是我得到的回报。在洛根广场的孩子过去常看到猩猩般眼睛的地方，我的同事看到的是天才的目光。无人从中看懂什么，但大家都读我的报告，主要内容是我独自进行我的精神探索。我盯着一张旧照片出神，照片上是一群尤卡各赫尔<sup>③</sup>妇女，在纳仑姆河岸上。远处的河岸很荒凉——积雪、岩石、瘦长的树。照片的前景上有一堆大白鲑。妇女们蹲着，在零下三十度的天气里用针线串大白

---

① 借用希伯来神秘哲学对《圣经》作秘密解释的理解。

② 毛拉：有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识的人的尊称。

③ 在东西伯利亚。

鲑。劳动使她们出汗，于是她们脱掉皮背心，半裸身子。她们甚至“将大块的雪饼塞进胸口”。原始妇女在零下三十度浑身冒汗，用雪块给乳房降温。我边读边问自己，在这幢大楼里，在这幢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里，有多达几千人，谁具有最奇特的想像，谁知道别人心中的秘密？谁知道这些银行家、律师、职业妇女的梦想、怪念和幻觉？他们被自己的疯狂吓倒，不会自己抖露出来。从定义上说，人类一半时间是疯狂的。

因此，要是我将这些书吞吃了，谁会在乎？其实我在重读这些书。最初读这些书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州议会大厦附近一间酒吧的钢琴手。我甚至还有几首保留的歌曲，其中有一首是《木瓜公主有许多木瓜》。那时，与堂哥伊齐基尔（泽克）住在一个房间，我与他并不同行。在家里，大家叫他塞克尔。泽克在州立大学教原始语言课，他的专业使他每周都要去北部森林。每周三他开着那辆沾满尘土的普利茅茨，去记录莫希干人的民间故事。他找到了一些幸存的莫希干人。而在北半岛上，他所做的，与乔基尔森当时在东西伯利亚所做的基本一样，由他妻子黛娜·布罗德斯基博士相助。塞克尔肯定地告诉我，这位布罗德斯基博士是位堂姐。在世纪之交，两位乔基尔森来到纽约市，与法朗兹·博厄斯<sup>①</sup>一同在美国自然博物馆工作。塞克尔还说，当时布罗德斯基博士查阅过家谱。

为什么犹太人都是如此如饥似渴的人类学家？人类学的奠基人有涂尔干<sup>②</sup>、利维—布吕尔<sup>③</sup>、博阿兹、马塞尔·莫斯、萨皮

---

① 法朗兹·博厄斯（1858~1942）：美国人类学创始人。

② 涂尔干（1858~1917）：法国早期社会学家，倡导集体表象论。

③ 利维—布吕尔（1857~1939）：法国人类学家、哲学家。

尔<sup>①</sup>、洛伊<sup>②</sup>。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是消除神秘的人，动机是进行科学研究，最终的目标是增进共识。我的看法不同。更真实的解释是犹太人区与《启示录》划的范围近似，心灵可轻易从腐烂的街道和恶臭的碗碟直接升华至超凡境界。这当然是亚洲犹太人的状况。西欧犹太人像有学问的德国人，神气活现，趾高气扬。但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患有结核病和眼病，失宠于文明的评判）是不是与野蛮行径扯不上边了呢？他们不必象征性地决定自己发狂；他们天生就疯狂。外来人种竭力对外来人种进行科学研究。于是，研究的成果或是希伯莱语与德语杂交，或是狄卡尔哲学与犹太教法典的杂交。

堂哥塞克尔没有建立理论的癖好，他有学习稀有语种的才能。为学一种印第安方言，他到路易斯安那州牛轭湖乡间，向最后一位传人学，而这位传人已近暮年。不过数月，他便能讲得十分流畅，结果使得这位印第安老人临终之时还有人交谈。他死后，只有塞克尔一人懂这门方言。那个部落只在他一人心中继续存在。我向他学会过一首印第安人的情歌：《*Hai y'hee y'ho*（吻我后你再走）》。他要我在鸡尾酒会的休息室里弹奏这首歌。他还教我克里奥耳人的什锦饭的制作方法（火腿、米饭、小龙虾、胡椒、鸡以及西红柿），我这个单身汉没机会制作这种饭。他是各种原始绷绷线的行家，还就印第安人的翻线戏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我现在还能玩某些绷绷线游戏，有时用来逗逗孩子。

塞克尔年轻时体胖背圆，脸色苍白，像个犹太教哈西德派<sup>③</sup>教徒。丰满的脸庞上刻着真诚的线条，额上的皱纹像弦乐器指板

---

① 萨皮尔（1884~1939）：美国语言学家、人类学家，文化语言学的奠基人和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派的主要建立者，以研究北美印第安诸语言著称。

② 洛伊（1883~1957）：美国人类学家。

③ 指公元前3至公元前2世纪的犹太教派别；亦指18世纪兴起于波兰的哈西德派。

上定音的档子。满头的黑发全是展示着雄风的卷发，沾着他每周去五百英里外的印第安乡间的尘土。塞克尔不常洗澡，也不常换内衣，但那个爱他的女人并不在乎。她是荷兰人，叫珍妮·鲍士马，身背装着书的帆布包。在我记忆里，她戴苏格兰式便帽，穿齐膝袜，半裸腿，在威斯康星的冬天看上去像火焰。与塞克尔同床时，她的喊叫声特响。我们的小房间没有门，只有隔帘。塞克尔急得团团转。他的腿肌和臀部非常结实，白白的，肌肉很发达。我弄不懂这个家族如何会产生如此一流的肌肉组织。

我们租的是机车工程师寡妇的底楼，整幢房子为古老的框架结构。

那年塞克尔惟一读的书是《最后的莫希干人》<sup>①</sup>。他只读第一章，用来给自己催眠。就理论而言，他自认是多元论者。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他否认历史学——他在这点上立场非常坚定。他将自己说成文化传播论者<sup>②</sup>。所有文化都是一次性产生，并以单一的文化源传播。他还真读过 G. 埃利奥特·史密斯的书，坚信凡事万物都起源于埃及这一理论。

他睡眠蒙眬，很能迷惑人。那迷茫的目光掩盖了他对语言学永不停息的耕耘。他的酒窝具有双重作用，因为有时它们起着批评的作用（我这里指的是现代危机，悬虑不安状况的根源）。1947年我在墨西哥城邂逅塞克尔，不久他就去世了。他当时在给一队不懂西班牙语的印第安人带队。由于墨西哥行政机构里无人会说他们的方言，塞克尔就成了他们的翻译。毫无疑问，他怂恿他们诉苦。这些沉默的印第安男人，戴着阔边帽，穿着宽松裤，嘴角上蓄着黑胡子，他们从阳光里走来，离开他们的生存环境，

---

① 美国小说家 J. F. 库柏（1789—1851）的作品。

② 文化传播论是人类学用语，是一种认为所有文化的相似点均由于传播而产生的理论。

走进他廊柱的政府大楼。

这些都历历在目。惟一想不起来的是我自己因何事去的墨西哥。

我通过黛娜·布罗德斯基博士从塞克尔那里了解到，瓦尔德马·乔基尔森（也许结婚后成了亲戚）写了关于库里克部落的书。在妇女备用品市场上，我买了一本颇具诱惑力的书，名为《地球的两极》<sup>①</sup>，发现其中有一章写了东西伯利亚的部落。于是，我想起了几年前我在威斯康星的迈迪逊初次见到的专著，便到雷根斯坦图书馆借了两卷本杰瑟普。我在书中读到，库里克传说里的女人，必要时能够卸下自己的生殖器，高高挂在树上。还有那个雷文，传说中该部落之父，一个非人间的小丑。当他从妻子身后进入妻子体内，探索她内部时，竟然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在思索这种创造或幻想时，应记住库里克人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他们在挣扎中求生存。在酷冷的冬季，渔夫得在坚硬的冰河上打出六英尺深的洞，然后将钓鱼线放下去。过了一夜，打出的洞又结冰封冻。库里克人住的小屋拥挤不堪，而女人却庞大无比，传说中的部落之母如宫殿一般雄伟。

我的助手罗丁逊小姐很同情我（我肯定，她并不只是爱管闲事），走进我办公室，问我为什么在窗口趴了一个小时。显然是在看下面的门罗街。其实这只是因为从雷根斯坦图书馆借来的灰绿色的专著太大，难以捧住，于是，读时我将它们放在窗台上。罗丁逊小姐迫切表达她的关心，也许希望进入我的思想，帮些忙。可是，她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呢？最好不要进入这个毫无诱惑可言的绿色书卷里，它只是了解野蛮时期的西伯利亚的途径，而那个西伯利亚早已不复存在。

两周后，我将被派往欧洲参加一个会议，重新安排债务支付

---

<sup>①</sup> 作者是约翰·皮金斯及美国自然博物馆。

计划，她希望确认旅行安排。我先在巴黎停留？我模模糊糊地说，是的。在蒙阿朗贝尔酒店住两夜。然后到日内瓦，再途经伦敦返回。这一切都是日常事务。她意识到，这些没有对我产生影响。于是她将从《先驱论坛报》剪下的材料递给我，因为我曾与她谈到过江渡东京让卫（自从坦基的资助人多尔夫曼被暗杀后，我对这样的消息兴趣陡然增加）。两个残杀江渡东京让卫的人，自己也遭到杀害。他们的尸体是在停在内皮住宅区的一辆别克车的行李箱内发现的。车里散发出难闻的恶臭味，苍蝇在箱盖上飞来飞去，密密麻麻，比红场上五一劳动节时的人还多。

尤妮斯又给我打来电话，但这次不是为了她兄弟，而是为舅舅莫迪凯。他是我父亲的“头”表兄弟。就家族而言，有家族就得有个头，而他就是这个家族的头。莫迪凯——大家都称他莫迪舅舅——在车祸中受了伤，由于他已年近九十，这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与尤妮斯通话时，我站在黑暗公寓一个黑暗角落里。我真说不清我怎么会让它这么黑的。我喜欢柔和静谧的光线，喜欢线条简洁的轮廓。可是，东方地毯买得太多，是从马希·菲尔德店赫林先生（他近日退休了，一心一意扑在他的马场上）那里买来的，还有那些装帧老式的书，这些书早就不读了。因此，我显然创造不出我喜欢的光线和轮廓，相反却弄得像圣墓<sup>①</sup>一般黑暗。连续几个月，除了经济学和国际银行方面的书，我只读杰瑟普的远征报道。我也读海德格尔<sup>②</sup>的书，但读海德格尔时不能掉以轻心，他的书很难读。有时，我也读读奥登<sup>③</sup>的诗歌，或读奥登传记。这有点风马牛不相及。我猜想，我创造这些令人厌恶的

---

① 基督教传说中耶稣葬于其中直至复活的地方。

② 海德格尔（1889~1976）：德国哲学家，德国存在主义先驱。

③ 奥登（1907~1973）：英国诗人。

黑暗，是为了强迫自己进行内省或重新整理思想，使自己集中于事物的本质（为了消除这种悬虑不安）。事物的本质都显现在眼前，所需做的只是恰到好处的整理。

在美洲超级大国的一个大都市，竟有人探索这样的问题，这同样也很有意思。尽管我从没与别人谈过，但我的同事却对我说（感觉到我在思考一些怪僻的问题），在一个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里，发生着许多事情，令人目不暇接；在外部世界，事情层出不穷；这座城市本身满是进行真正发展的各色各样的机会，它是财富、权力、戏剧性事件的中心，同时也滋生无尽的犯罪和罪恶、疾病以及固有的而不是偶发的暴行。因此，沉溺于自身是愚蠢的，是一种自怜自哀。普通的日常生活比人的内心深处更值得关注。是的，而且我想我的内心深处与大多数人相比，缺乏浪漫的幻想。可憎的内心幻想潜伏于无形，当你审视这些幻想时，自觉的思想以模糊的形式仁慈地显现出来。另外，我尽力避免任何形式的雄心勃勃和别出心裁。再说，我孤独，并不是因为我喜欢孤独，而是我似乎找不到我所需的同代人。

我马上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莫迪凯舅舅与这些关系密切。

尤妮斯正在电话上告诉我事情的原委。当时是莫迪的妻子莉瓦开车，莫迪的执照几年前给吊销了。太糟了，他开了五十年的车，刚发现后视镜的作用。尤妮斯说，莉瓦的执照也早该没收。她一直不喜欢莉瓦（沙娜与莉瓦长期不和，这种不和延续到尤妮斯身上）。莉瓦制伏了每一个人，死活不愿放弃她的克莱斯勒。她人变得很小，无法摆布那么个庞然大物，最终她还是将它给毁了。

“他们受伤了吗？”

“她一点也没伤着。他受了伤，鼻子和右手，伤得不轻。他在医院里又染上了肺炎。”

听到这，我心头一紧。可怜的莫迪，出事前，他的身体就不

好。

尤妮斯继续往下说。从科学前沿传来的消息说：“他们现在对肺炎有办法了。这种病过去常常会很快置人于死地，因此被医生称为‘老人的伴侣’。现在他们已将他送回了家……”

“哦。”我们又获得一次延缓。不会延缓很长，但每次延缓都让人感到轻松。莫迪凯是他这一辈人里最年长的幸存者，也快临终了，感情上必须作好准备。

尤妮斯还带来消息说：“他不愿离床。她这一辈子天天与他同去店里。她说莫迪这么钻被窝，太不可思议，是行为失常。于是，她强迫他到斯科基<sup>①</sup>的家庭顾问去看看。那个女人心肠很好。她说，他一辈子都是清晨五点起床到店里，不必奇怪他那么嗜睡，他是想补回失去了的睡眠。”

“我现在告诉你最新情况，”尤妮斯说，“他肺里有痰，所以非得让他坐起来，他们强迫他这么做。”

“他们怎么做得到？”

“将他绑在椅子上。”

“我看我这次还是不去看望他为好。”

“那不行。他过去一直最宠你。”

那不假，当时的行为仍历历在目：声称莫迪爱我，也给予他我的爱，敬重他，留意他每一个生日，用爱自己父母之心爱他。为了这些，我没有机会去了解过去数世纪的一些革命性的发展、启蒙思想的进步观点，以及塞缪·巴特勒<sup>②</sup>诱人而又尖刻地说明如何表示对父母的蔑视。他说人出生时最好只有一个人，尿布上别一张两万英镑的钞票。为了这种爱，我耽误了许多经典课，有

① 美国地名。

② 塞缪·巴特勒（1835~1902）：英国作家和讽刺家。

米拉波<sup>①</sup>与父亲、腓特烈大帝<sup>②</sup>、高老头<sup>③</sup>与他的女儿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骨肉相残的故事。那震聋发聩的内容就是海德格尔向我们展示的“恐惧”，用古希腊的话说就是 deimon 及 deinotaton，意思是说恐惧是通往崇高的门槛。大众正在逐渐背弃家庭。天真的莫迪舅舅没意识到这些变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及其他混合因素，我才不愿去看望莫迪舅舅。而尤妮斯说得也不错，她提醒我，这会使人怀疑我对他的爱。我进退维谷。这些关系一旦产生，就必须坚持到底。我不能背弃他。坦基是莫迪的外甥，却二十年没去看一眼这位老人。这完全合理，始终如一。我上次看望他时，老人说不出话来，或许不愿说。他怕见我，对我转过身去。

“他过去很爱你，艾扎。”

“我现在还爱他。”

尤妮斯说：“他一切都清楚。”

“我所担心的正是这点。”

撇开理性思维不论，扪心自问，我是爱那老人的。我承认，那是不完美的爱。但毕竟是爱，而且始终不渝。

尤妮斯早已发现我完全受亲情左右，便加码施加她对我的影响。于是我开车去接她，带她到了林肯街，莫迪和莉瓦住在那里的一幢平房里。

我们进门时，莉瓦伸出已弯曲的双臂，做出高喊“好啊”的姿势说：“莫迪不知会多高兴……”

说是这么说，可她机敏的蓝眼睛里的神色却表示了另外的含

---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

② 腓特烈大帝，即腓特烈二世（1712～1786）：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之子。

③ 巴尔扎克同名小说中的人物。

义。她不喜欢尤妮斯，而且五十年来对我也一直抱怀疑态度。这不是缺乏理解，而是等待我变得正常可信。在我看来，她倒是成了一个可爱的老太婆，只是仍非常固执。我记得，莉瓦曾身材很高，满头黑发，体形丰满，两腿笔直。现在浑身几何线条都发生了变化。双膝像汽车千斤顶一样下坠，变成钻石样外形。她仍然想快速行走，似乎在跟着过去的莉瓦学跳舞，但她毕竟不再是过去的莉瓦。圆脸蛋拉长了，出现了伏尔泰式的严肃神情。她那蓝眼睛的目光本身在对你说：向我解释一下，这些荒谬变化、白发以及粗哑的声音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变化，还有你的。你的头发哪去了？你为何佝偻身子？或许存在着某些普遍的先决条件。所有这些形体上的变化似乎是对大脑的解放。我觉得这里存在更多的含义：社会秩序杂乱不堪，存在了几百年的枷锁废弃了，历史接合缝打开了，墙壁四角裂开，束缚消失，于是，我们的自觉思维得以解放，只要我们能找到不失良机的勇气，就能从裂隙中逃脱，不再软弱地哀悼往日，而是超越废墟，登上顶峰。

儿孙满堂，莉瓦无疑是满足了，但她不是你奶奶。她是一个商人。她与莫迪从一个只有两辆送货车的小店起家，最终创办了一个大企业。六十年前，莫迪舅舅、他的兄弟希曼、我父亲——他们的第一代堂表兄弟以及一批波兰面包师，一起给几百家移民办的杂货店供应面包、凯撒卷和各式各样的糕饼——煎饼、夹心蛋糕、咖啡蛋糕、奶油松饼、俾斯麦饼、巧克力泡夫（巧克力包奶油的手指形小蛋糕）。这些全靠三只大烤箱烤出来，燃料是工厂的废木料——上面留着树皮，靠墙堆放——沿墙还堆放着一袋袋面粉和糖、一桶桶果子冻、一盆盆糕饼酥脆油、一箱箱禽蛋、面浆桶状的揉面桶，还有十四英尺长的长柄铲。这些长柄铲不时在烫手的烤箱里伸进伸出取面包。人人粘满面粉，只有莉瓦例外。她在楼梯下的办公室里，记账，开票，给大家发工资。我父亲在店里的头衔是经理，听起来似乎这些烤箱以及弥漫于整条街

的面包香与“管理”有什么联系。他从来不管理。给他“精神焦虑中心”的头衔更合适。他的眉心是焦虑的中心，犹如第三只眼，留神夜间他当班时可能会出现的差错。他们的生意做大了（没我父亲的份，他自行辞职，从未做成过大点的生意），而且不断扩大，直到受到时代的局限为止。超级市场兴起，冷冻食品长途运输，产品规格统一（一订就是百万打的恺撒卷），他们的面包房适应不了这样的形势。于是，公司清账停产。这不是谁的过错。

生活进入了新阶段，进入了美妙或假定美妙的退休阶段，佛罗里达这些气候温暖的地方适于做梦。人们如果还未变得烦躁和扭曲，会重新赞美先前的生存方法。我们都清楚，这不可能。莫迪竭力想做个称职的美国人。一个称职的美国人，不论生存状况如何，都得为这种不得不为的生存状况吹嘘呐喊。在芝加哥，莫迪每天到市中心的俱乐部去游泳。他在那儿是个“人物”，给俱乐部成员讲了十多年的笑话，逗他们乐。他的笑话讲得很出色。我听父亲复述过其中的大部分笑话。要听懂这些笑话，大都需要具备故国知识——希伯来语课文、寓言、谚语。其内容大都古老，若你不了解小村里的东正教犹太人在干活时口哼赞美诗，你就得要人解释。莫迪希望成为、而且也称得上是优秀的、性格开朗的老头，他一生颇有成就，也许是全城最出色的面包师。他富有，大方，是个公认的正直人。但是，当年长的俱乐部成员相继去世以后，就没人与他交流这些东西。莫迪快九十了，可他仍然缠住别人讲有趣的故事。那是他的礼物。他不断重复。在俱乐部里锻炼的商品经纪人、政客、人身伤亡案律师、贿赂中间人及疏通人、销售员及推销员，对他感到不耐烦了。在更衣室里，他裹着被单，让人生厌。没人清楚他在说些什么，一派胡言乱语，俱乐部要求家人将他留在家里。

“他当了四十年的俱乐部成员。”莉瓦说。

“不错，但他的同代人死了，而现代人又不欣赏他。”

我一向觉得，莫迪没完没了的笑话是祈求别人的认同，为自己申辩。他在更衣室里想逗人取乐是在糟蹋自己的人格。他年轻时少言寡语。我幼年时与成年人同在俄国人的浴室里洗澡。我蹲在蒸汽里，羡慕过莫迪高大、强壮的身体。他赤身裸体时像个印第安勇士。卷曲的头发从头中央往下长。他的威严来自于他的人格。现在他头顶中间已无头发。人萎缩了，脸变小了。在他快乐的年代，他参加游泳，满脸微笑，心中充满爱，见到我总是非常高兴。他说：“我已 shmonim，”——八十岁了——“可我每天在游泳池里游二十个来回。”接着问：“你有没有听到过这个词？”

“肯定没有。”

“听着。有个犹太人走进一家饭店，以为不错，可很脏。”

“嗯。”

“那里没有菜单。你在桌布上点菜，桌布上满是斑斑点点的油污。你指着上面的一个斑点说：‘那是什么？tzimmes<sup>①</sup>？给我来一些。’”

“嗯。”

“招待没有开账单，客人直接到收款员那里付账。收款员拿起他的餐巾说：‘你吃了 tzimmes。’这时客人打起嗝来，她又说：‘哦，你还吃了萝卜。’”

这不再是笑话，而是精神生活的源泉。当你听了无数遍后，它就成了神话，就如库里克传说里的雷文爬进他妻子的内部，发现自己到了一个巨大的房间里一样。但是，所有的笑话现在都停止了。

在上楼前，莉瓦说：“我明白，凡是联邦调查局设格雷洛德圈套调查你所有活动的地方，都遭到不少起诉。”

① 意第绪语，意为萝卜。

莉瓦并没想伤害谁，只是开开玩笑，没有恶意，仅仅在发挥她的聪明才智。她喜欢逗我，明知我不当律师，不弹钢琴，没有从事任何一项我曾出过名的事（指家里出名）。她接着说：“我们不能让莫迪躺下，必须强迫他坐起来，否则他肺里的痰液会越积越多。医生指示我将他绑起来。”她说话时的调子依然不紧不慢。

“他不能接受这一点。”

“可怜的莫迪，他讨厌被绑。他逃了几次。我感到很不好受。我们都……”

莫迪被绑进一只扶手椅内。皮带扣在他的身后。我第一个冲动就是不管医生的指示放了他。医生延长人的生命，但是我们不知道莫迪对他们的强行规定有什么感受。看到我们进来，他略微示意了一下，动作微妙得连点头都称不上。然后他掉过头去。让人看到这个样子是一种羞辱。我突然想到，在给艾勒法官写信时，我脑中闪过这样一幕：坦基坐在高脚童椅里，不声不响地挣扎，非要从紧扣的皮带里挣脱出来不可。

莫迪不讲话，他还不能说，因此，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站着探望了一下。我还要莫迪怎么样呢？而且我为何要从大环商业区来这里打扰他？他的脸比我上次见到时还小——神和形<sup>①</sup>的最后面貌，其组成部分即将消失。他现在全然是一副自然状态，他直接考虑的事是死亡。来观望这些，并没有多少善意。

在我最初的印象里，尤妮斯站着咬大拇指，个子矮小。现在，尤妮斯高了，而莉瓦矮了。莉瓦外表萎缩，无法看出她的心思。电视没有开。外凸的玻璃像是某个入侵者的额头，这个入侵者退回到他罪恶的神秘中，进入他光滑的屏幕中那易碎的灰细胞组织里。窗帘拉拢着，外面是北里士满街。与所有其他漂亮的住宅区的街道一样，它一片静谧，空空荡荡，人们对它们的兴趣都

<sup>①</sup> 原文为西班牙语。

被更为强大的力量以及国家行为带走。任何没有参与国家行为的行为会枯竭，会被死亡吞噬。莫迪在他的公司破产清帐后，成为年高德劭的家长 and 会说笑话的人物，而现在没有他继续生存下去的角色。

最后总该说些什么，于是尤妮斯鼓足勇气说了较为科学和可取的话，而且，她似乎是在喜剧直觉的鼓动下说出来的。她说：“你得给莫迪舅舅的手进行理疗，否则会没用的。真让我吃惊，这一点竟会疏忽了。”

莉瓦听了快气炸了。她早已为这起事故自责不已，大家曾劝她不要开车。还有绑带椅子也让她自责，但她不允许尤妮斯批评。“我以为，照顾我丈夫我是称职的。”她说着离开了这间房。尤妮斯尾随出去，我听到她坚持向这个“外行”作详尽的解释。五十年前，她治好了结巴的毛病，从此她始终不渝地相信专家治疗。“看最好的医生”成了她的口号。

我将莉瓦的书和杂志推向一边，坐到床上。我想起她曾喜欢埃德娜·费伯<sup>①</sup>、范妮·赫斯特<sup>②</sup>以及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sup>③</sup>。一次在伊利诺伊州苏黎士湖畔，她给我读《环形楼梯》<sup>④</sup>。想到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涌现出来，无须触及便生情。有一年夏天，全家驾了三辆车外出。在出城的路上，莫迪舅舅在密尔活基大街一家五金店停下，买了晾衣绳索，将野餐食物篮子固定在道奇车上。他一会儿站到保险杠上，一会儿站到踏板上，将那些篮子用绳索四面来回系紧。

苏黎士湖，如洗彩笔的水盆，呈黄绿色，软泥很深，芦苇茂

---

① 埃德娜·费伯（1887~1968）：美国女小说家。

② 范妮·赫斯特（1889~1968）：美国作家。

③ 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1876~1958）：美国女小说家、剧作家。

④ 女作家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的小说。

密，空气闷热，周围的树林散发出的不是大自然的气息，而是三明治及香蕉味道。由莉瓦的母亲主持的野餐桌上摆开了扑克牌。她拉下大帽子上的纱巾，罩在脸上，挡蚊子，也许也是掩护偷看别人的牌。坦基当时大约两岁，光着膀子，从他母亲身边逃开，她在后面追他，要他吃土豆泥。沙娜的兄弟，莫迪和希曼，在野餐地四周散步，谈论烤面包方面的事。希曼的背上隆着小山似的肉，是经常用力导致的，不是天生的驼背。衣袖里露出两只巨手。他身上穿着漂亮绉条纹薄外套，可他并不太在乎。他买来了，拥有了，但穿在身上便糟蹋了它。这成了某种反美玩笑。他强有力的脚步踏死了地上的植物。他绝对机敏，小孩子的秘密经他蓝眼睛否定的目光一瞪，便化为灰烬。希曼不喜欢我。这与真实生活不符。莫迪舅舅为我抱不平。我不能说他说得全在理。沙娜常这样评论我：“那孩子脑袋开窍得很。”她指的是我读书很轻松。就他们的争论而言，希曼的直觉更正确。在苏黎士湖岸边时，我应该与别的孩子一同到软泥里去呼叫闹腾，而不是捧着玛丽·罗伯茨·莱因哈特写的愚蠢书（书的封面装着凹凸的棕色单色面）。我当时不愿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真实的现象”，而那种现象现在联邦调查局已给予揭露（腐败现象的揭露不会太深入，恶贯满盈的坏蛋们没什么可担心的）。

沙娜所说的话是离题的。那是形而上学的哲理。事情并不在于脑袋开不开窍，而在于别的东西。我们在没有预知的情况下来到这个世界，先有存在，然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有一个本我存在，也许你喜欢说有一个本原灵魂的存在。也许正如歌德所暗示的，灵魂是本性表演的剧场，且是本性表演的惟一剧场。当你满怀激情观察——如观察你的堂兄弟们——并试图说明所见现象时，就会明白这一点。如果你的观察只限于通常意义上的观察，那有什么价值？但如果你的观察是“人如此，见如此；如此眼，力无比”，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我在奥黑尔邂逅坦基和他的狐朋

狗友时，我想，游离肉体的威廉·布莱克式的眼睛，在我们上方会见到什么。我当时乞求自己的内在存在保佑。这个内在存在能忍受平庸视觉的扭曲，但却一贯是将本原的我或本原灵魂的观察视为真正有价值的观察。

我相信，沉默中的莫迪正在向“本原个体”咨询。扭曲的人可以无憾而终，也许早已死亡。

裂缝已打开，枷锁已崩溃，原本脆弱的存在解放了你，使你返回本我。于是，你可自由地在现代观念的废墟下寻找真实的存在，而无论你仍神志恍惚，或清醒，这种清醒与已被认同的知识形态的清醒不能同日而语。

就在这时，莫迪舅舅用头向我示意。他有话要说。少得可怜，等于没说。我企盼听到的话，他只字不提，我想。他不会叫我给他松开皮带扣。我向他弯下身子，一只手扶在他的肩上，我觉得他希望我这样。我敢肯定是这样，而且也许用他母语与他讲话更好，就如塞克尔在牛轭湖与那个族里最后一个印第安语传人讲话一样。莫迪现在用的词不可能是“Shalom”<sup>①</sup>。他为何要用传统的问候语呢？见我神情茫然，他便极专注地看我——眼睛很大。他又试了一次。

我只好问莉瓦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她解释说：“哦，他说的是‘Scholem’<sup>②</sup>，他一遍遍地提醒我，我们一直在为你代收肖勒姆·斯塔维斯的邮件……”

“是堂哥 Scholem？……而不是 shalom。”

“他一定没有你的地址。”

“我的地址未编入册。再说，我们已有三十年未见面了。你们本可以告诉他我的地址。”

① 希伯来语，“祝你平安”。

② 人名“肖勒姆”。

“亲爱的，我一直很忙。但愿你将所有这些东西拿走，我食品间里有整整一抽屉，而且成了莫迪未了的心事。你拿走了，他就会感到舒坦了。”

当她说到“将所有这些东西拿走”时，目光重重地落到尤妮斯身上。其真正的意思是“将这个杂种从这里带走”。她叹了口气，带我到了厨房。

肖勒姆·斯塔维斯，娘家姓布罗德斯基，与希曼和塞克尔一样，也长着一双蓝眼睛。当坦基在奥黑尔机场那难忘的一刻提到家族的天才——“我家有两三个”，他指的就是肖勒姆，拿我与他取笑，而他的真正用意是：“你们这么出色，怎么会没有钱的？”与“教皇拥有多少个师？”<sup>①</sup>如出一辙。老式的移民家族曾迫不及待地挖掘天才，孩子当然竭力满足他们的愿望。坦基嘲笑这种愿望的落空，谁能责备他？

我与肖勒姆一同长大，住相邻街道，上同一所学校，经常交换书籍。由于肖勒姆没杂七杂八的爱好，总是康德和席勒，还有达尔文、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高中毕业班时读的是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sup>②</sup>的《西方的没落》，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肖勒姆在信（莉瓦给我一只金奶岛购物袋装信）中提到了我们以上这些共同的兴趣。让我钦佩的是，他的信文笔古派，有点像康斯坦斯·加尼特<sup>③</sup>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笔调。他称我“布罗德斯基”。我仍然喜欢加尼特的翻译，好像不说：“正是，波尔菲利·彼得罗夫斯基，”或者不用：“丹娘令我五体投地，”就读的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自己对事没有这么持之以恒。我嗜好现代速

---

① 这是斯大林的话。当有人问他，宗教的权力多大时，他以这个问句反诘。

②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

③ 康斯坦斯·加尼特（1862~1946）：英国女翻译家，向英、美读者介绍俄罗斯文学名著。

度，甚至达到褻渎的程度。可以用奥登关于里尔克<sup>①</sup> 的评价作为例子。他说里尔克是“萨福<sup>②</sup> 以来最伟大的同性恋诗人”，只是为了强调我们不能忘记枷锁的崩溃和消亡（1806 在耶拿说的话）。肖勒姆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贝多芬视为巨擘，我当然不会为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争论。肖勒姆曾经是而且还是个崇尚巨擘者。从莉瓦食品间里拿回家的材料使得我一直到了次日凌晨四点还没睡觉。那天我根本没有上床休息。

肖勒姆深信，如同牛顿从哥白尼的理论中汲取智慧，爱因斯坦从牛顿那里汲取养料，而他从达尔文那里获得灵感，在生物学上有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的发展和应用可能会在哲学领域带来突破，且是自《纯粹理性批判》以来第一个重大突破。也许我能从我对肖勒姆早年生活的回忆中预料到，他做事不会半途而废。他是耐用材料制成的。意志消沉了？在自然进程中，人人都会消沉，但生活永远不会将他压垮。过去，我们经常散步走遍雷文斯伍德的每一个角落。他一口气可说许多话，任何一个谈话者都不如他，事实上，他不让自己停顿片刻，换口气。他脸色白净，身材消瘦，步态里带着奇怪的弹性，大拇指勾住裤子的口袋。他总是走在我的前面，脸激动得发白。他的呼吸有一种如煮沸的牛奶味。上课时，他口角边上出现白色黏液。他处于如痴如醉状态时，根本听不到你所说的话，只是不停在你的脑际里回响着一个急促得气也透不过来的声音。后来当我读到兰波<sup>③</sup> 时，特别是他的《醉舟》时，禁不住会想到肖勒姆：同样的沉浸，同样的宇宙般的怒哮，只是肖勒用的是深奥解释，不是感性描述。在我们散步时，他会探索诸如像康德的死亡范畴这样的主题，我们边散步

① 里尔克（1875~1926）：奥地利诗人。

② 萨福（约 612~? B. C.）：古希腊女诗人，传说是个同性恋者。

③ 兰小波（1854~1891）：法国诗人。

边探讨，沿着福斯德大街一直往西走，然后向南到波希米亚人公墓，还一遍遍地绕着北公园学院走，在排水河的桥上不断往返。在劳伦斯大街上汽车展厅前，我们也没有停止讨论，也不可能注意到我们在厚玻璃窗里的形象是否被扭曲。

在他寄给我的许多资料里，夹着他一张彩色照片。从照片上看，他大变了样。眉毛又粗又浓，一脸严峻的神色，双眼眯起，嘴扁扁的，深陷在皱纹里。肖勒姆没有垮，但不难看出经受了許多磨难。这一切都刻在他的脸上，将他的头发压伏在头颅上。在我公寓的一个圣墓般黑暗角落里，我仔细地端详着照片。这是一个真正值得认真研究的人，一个可敬的表兄弟，一个坚固材料制成的战士。

与他相比，我似乎微不足道。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在娱乐业试身手，在七频道的半严肃半诙谐的节目——“二市”的卡巴莱歌舞内容——混饭吃，混在弗里策尔饭店的年轻无赖或半无赖中用餐，在库普西内特愚蠢的脱口秀节目中干傻事，直到自尊告诫我离开为止。我现在对自己的看法中肯多了，但论智力，我承认我最推崇的是堂兄肖勒姆·斯塔维斯。即合现在，他那张不妥协的严肃的脸、他鼻孔张大朝下喷着怒火时会告诉你他是何许人也。由于这张快照摄自他公寓附近，你可看到他奋斗的环境。他身后是芝加哥住宅区，一条盖着六层公寓的芝加哥街道，六十年前的好地方。二十世纪的建筑师充分考虑到中产阶级的体面。但对肖勒姆这样的人来说这却是可怕的地方。那里能写出哲学？就因为有这样的地方，我才痛恨进化论主义。进化论主义认为，人种最终会达到完美，而在未完美之前，我们必然会在各个漫漫无际的阶段厌倦地死去。

然而，肖勒姆正是在这些街道上写哲学。二十五岁前已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告诉我，自十八世纪以来，只有他才真正发展了哲学。然而，杰作未写，日本就偷袭了珍珠港。按他生物学、

哲学和世界历史学中带有革命性发现的逻辑，他必须加入武装部队，当然，是自愿参加。我一页页认真读他寄来的东西，设法弄懂所有这些生物学和世界历史学的依据。接合体与接合孢子的改良，单子叶和双子叶植物、有脊椎与无脊椎动物的分化——这些我较熟悉。当他进而讨论现代政治的生物基础时，我无法理解，但我衷心祝愿他能成功。拥有广袤土地的是顺服的、逆来顺受的民族，而小国却孕育侵略力量。他写道，读摘要帮不了忙，得读全文。但他想告诉我，左右派是并存的。主流最终会转化为广泛的、中立的、自由进化连续体制，而这种连续体制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初现端倪。依此看，不难理解肖勒姆为何去从军。他要捍卫的不仅是民主，还有自己的理论。

他是步兵，在法国和比利时作战。当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会师、将德军切割成两半时，肖勒姆是越河的巡逻队队员。俄军与美军的战士们欢呼雀跃，饮酒跳舞，流泪拥抱。那些来自芝加哥西北部、父母是俄罗斯移民的年轻人，发现自己在托尔葛（地名）作战，在康德和贝多芬的故土上作战，与发起和亲手屠杀犹太人的民族作战，不难想像他们的特殊情感。不久前我注意到一个名叫艾扎·布罗德斯基的人。此人已将自己迷乱的灵魂交给了楚克契和科里克，面对聚集在第一国民大厦内的众多智者，面对处于最敏锐的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的弄潮儿们，居然无法确定自己的思想是否最奇特。自然，在托尔葛欢呼的士兵，拥抱、哭泣、痛饮（我还不想漏掉俄军中的姑娘们和坐在河边任河水——此时水流湍急——阴凉脚的老妪们），不能保证其中不会有人同样沉浸在生物和历史学理论中。但在这土地上的肖勒姆……对，施本格勒——我们为什么要遗漏施本格勒？其古今平行论曾极大地影响我们。那时我们在列文斯伍德，还是孩子——肖勒姆不仅只是读世界历史，或只限于思考，或解开了从军前其中一些最令他迷惑和棘手的结和乱麻，而且他还以一个士兵的身份卓有成效地进

行亲身体验。双方军队的士兵——肖勒姆是其中的一员——发誓要永做朋友，永不忘对方，建立一个和平世界。

此后多年，我这位堂兄一直忙于组织工作，向各国政府呼吁，从事联大活动，参加各种国际会议。他随一个美国代表团去过俄罗斯，在克里姆林宫，将一张他的巡逻队向易北河挺进时使用的地图，交给赫鲁晓夫。这是美国人民给俄罗斯人民的一份礼物，表示真诚友好的愿望。

他认为他的著作是对二十世纪纯哲学无与伦比的贡献，但它的完成和出版不得不被推迟。

肖勒姆在芝加哥做了近二十年的出租车司机。现在已退休，从出租车公司领取养老金，住在城北。但他生活得并不安宁，他最近在退伍军人医院动了一次癌症手术。医生告诉他，他已活不了多久。这也是我收到他许多邮件的缘故。有文件，文件中夹着星条旗复制品；有两军在托尔葛会师的照片；有官方文件、最后的陈述的影印件，既有个人的，也有政治性的。我再三端详了肖勒姆最近的照片——半合的双眼目光内敛，一张脸充满情感力量。他曾立志要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我有时也想，我死后人类会是什么样，我不能预见我最终消失后会有何特殊影响。然而肖勒姆却动情地信仰成就，认为他的影响将为人类的荣耀和尊严而流芳百世。我读了他的遗嘱。他提出不少具体要求，有些涉及仪式方面。他希望将他葬在易北河畔的托尔葛，靠近打败纳粹军队的纪念碑。他要求葬礼开始时朗读加尼特翻译的《卡拉马佐夫兄弟》<sup>①</sup>的尾声，结束时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第二乐章，使用苏尔蒂公司录制、维也纳交响乐团演奏的录音。他为自己撰写了墓志铭，记述他留给人类的永垂不朽的知识财富，及他参与了有历史意义的宣誓。铭文最后写道，《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

<sup>①</sup>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sup>①</sup>

遗嘱后还附了一封陆军部军务局长办公室的来信，要求斯塔维斯先生了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在管理将遗体运入他们国内进行安葬有什么规定。他可向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盛顿特区大使馆询问。至于费用，美国政府的可靠性有限，它不会承担肖勒姆遗体的运费，支付他哀伤中家人的旅费也少得可怜。葬礼及墓穴的费用可由退伍军人协会补助。信写得语气温和，合情合理。当然，不知道签发此信的上校是否了解肖勒姆·斯塔维斯是一位多么杰出的人。

最后一封信的内容是来年（一九八四年九月）的巴黎聚会，纪念马恩战役七十周年。主要表彰出租车司机，他们以运送战士去前线的方式参加了城市保卫战。邀请世界各国的出租车司机参加聚会，甚至包括东南亚三轮车夫。壮观的游行队伍将从拿破仑墓附近出发，沿一九一四年的行军路线行进。肖勒姆的用意是向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展出的，也是硕果仅存、令人崇敬的出租车致敬。作为筹委会的成员，他将很快去巴黎，参加此次聚会的准备工作。回家途中，他将在纽约市停留，拜访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请他们记住托尔葛的那个伟大日子产生的精神，然后向每一位热烈道别。上午九点三十分，他将拜访联大法国代表团，十一点拜访苏联代表团，十二点三十拜访中国代表团。下午两点拜访大不列颠代表团，三点半拜访美国代表团，五点去见联合国秘书长。然后返回芝加哥，开始“新生活”——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中承诺的生活。

他以人类自身的名义，重申了本世纪人类的尊严，呼吁给予经济资助。

<sup>①</sup> 《圣经·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二十四节。

还有些次要的材料，关于销毁核武器和期望超级大国之间永久和解的声明，体现着托尔葛精神。凌晨三点，我的头已经毫无兴趣保持清醒，无法再看下去了。

根本睡不着，于是我没去睡觉，喝了点浓咖啡。睡也没用，脑子不会停止思考。

遇到深夜头脑清醒兴奋时，我不会使用失眠一词。白天，那些终身习惯大惊小怪的人使你无法有真正的发现。我学会享用夜间时光，它折磨神经，撕扯情绪——“无法入眠而出神入化地躺着”。要想达到这个境界，并承受住它，就需要坚强的意志。

我拿着咖啡躺在一个叙利亚风格的角落，（我没故意创造这种东方氛围，这个角落是怎么形成的？）躺在近乎平缓、有光线、空旷月明的过道上思考。也许能为堂兄肖勒姆做些什么。为什么要做？为什么不把他介绍给慈善部门？等他去过慈善部门五六次，我也就可认为我已为他尽了力。然而，在堂兄肖勒姆这件事上，一般的逃避方法不起作用。作为犹太移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在富尔顿市场上做鸡蛋买卖），堂兄肖勒姆决心在自然和历史中为自由寻找依据，并减轻、抑制和消除死亡的恐惧，它统治人类——震慑人类。再者，他是一个爱国的美国人（一种非常古老的情感），一个世界公民。总之，他想确保一切都美好，奉献一份别致的礼物，保佑人类。所有这一切，肖勒姆为全球犹太人树立了典范。与芝加哥董事会议室和幕后活动场所的背景，以及欺诈、纵火、暗杀、职业杀手、毒品贩子抗争，这种理想的正直源于看不见的力量——道德法则，而在芝加哥，它一向比蒜皮或手纸还薄弱，现在更像氩气一样稀少。不管怎样，想想他，也许是驾驶出租车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乘客们是使《哥林多后书》<sup>①</sup>

<sup>①</sup> 见《圣经·新约》。

相形见绌的彼勒<sup>①</sup>的后裔。而在这空前绝后的堕落中，肖勒姆的思想却更加纯洁。这种努力使他身患恶性肿瘤。我一直认为，每天在城市的车流中开十个小时的车，足以使人身患癌症。这是强迫性的静坐不动导致的，再加上越发加深的恶感，器官释放出愤怒的逆流，也许还有机械装置的缘故。

我能为肖勒姆做些什么呢？疏远三十年后，我不可能径直上他家去按门铃。我没法给予经济资助——我没钱帮他印刷成千上万页的东西。他至少需要十万，或许他希望艾扎从大环商业区凭空变出钱来。艾扎不是属于怪物式的精英财务分析家吗？但堂弟艾扎不是具体操作员，无法攫取大笔钱用于“知识”项目或开明的改革，也不是玩弄大钱的政治拨款人。

我不敢与他同坐在六层公寓他的客厅里，讨论他倾注毕生心血的著作。我缺乏所需的语言。大学的生物知识无济于事。我们曾在波西米亚公墓讨论过的那些了不起的问题：显贵的环境、众多的坟墓、腐败的花朵，但我的施本格勒比波西米亚公墓里的这些东西消失得更加无影无踪。

我与莫迪舅舅也没有共同语言，无法向他敞开思想。在肖勒姆看来，若我不用几年时间钻研，使我具备资格，他无法将我列入他哲学体系支持者的行列。毫无疑问，时间根本不够。既然如此，我惟一能做的就是募集资金，将他安葬在东德。渴求硬通货的共产党人不会拒绝合理的提议。早晨洗脸修面时，我记起了伊利诺伊州埃尔金市的一个堂兄弟——尽管不是近亲，但我一向与他关系友好，且挺有感情，也许他能帮忙。处在一个变态的时代，要尽量维护感情。储存起来，感情会保持原样，因为人们并不经常明白维持感情的目的。然而，这些精神水生物也令人奇怪地持久和顽强地存在。人们似乎能够相互长达数十年或无数年地

<sup>①</sup> 《圣经》中的魔鬼。

“保持不变”。如此的分离，具有永恒色彩。“无同时代人”的一种解释是，任何有价值的联系都受时间限制。而人不在，就会感觉到他们的价值犹存。这种关系犹如用使人昏睡的乐器演奏渐慢乐段，而整个交响乐队的其他乐器声则轻得微乎其微。

我说的那人仍活着，住在埃尔金。他叫梅迪·埃克斯丁，曾经做过自由撰稿人和广告人，现在一半时间赋闲。他与肖勒姆·斯塔维斯属完全不同类型。我的堂哥埃克斯丁喜欢打台球、拳击和爵士乐。梅迪有一个奇特爱好，即做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他出生于俄亥俄的马斯金根。父亲在那儿经营一家男厕装潢用品店。他在芝加哥读了中学，长成一个活泼的、满口俚语的小伙子，爱打棒球，玩杂耍，吹小号，是个布基伍基乐手，喜欢赌博，是骗人老手，十足一个市政府内的胡闹人。他特爱机灵的乡巴佬这种人——“乡巴佬出身的机灵的亚伦”<sup>①</sup>。梅迪满头浓发卷曲，梳理得竖直，颧骨凸出，长着难看的粉刺，脱落处留下一个个小疤。他的脑袋会漂亮地一抖，声称即将要打出好成绩。在威斯康星拉斯凯勒大学打台球时，要先将香烟置于台球桌沿，然后拿球杆，研究下一杆怎么打，然后就会出现这个习惯动作。就如曾向塞克尔那里学歌，我也从梅迪那儿学会一些歌曲。他喜爱乡村爵士乐的韵味，比如“我听上去像个怪人”，尤其是：

当他吹起了喝彩的小号，  
啊，奶牛没了奶，母鸡不下蛋。

总之，是个可敬慕的人，就如一件艺术作品，从形式上以及整体风格上看都是一个完全的美国人。他曾经仿效过的榜样不复存在。三十年代后期，他和我一起从军，一起去莉萨俱乐部演奏爵

<sup>①</sup> 《圣经》中人物。

士乐。

为了肖勒姆，只能找堂兄梅迪，因为一位死了多年的亲戚不知在哪儿设立了一项基金，他是他那一族门里的最后一位。我知道一些这个基金的条款，主要用于家族贷款，如果穷亲戚们有天赋，也用于支付他们的教育费用，甚至更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我了解得不详细，但我想梅迪了解。我很快打电话找到了他。他说第二天进城，并告诉我说，很高兴与我谈谈。“老兄，好久没见你了。”

基金来自一位老阿卡迪斯·埃克斯丁的遗产。人们称他阿迪。人们对他没有什么指望。他一生没系过鞋带，不是因为太胖（只是块头大），而是他向世人宣称爱随便。阿迪临终前意外获得一笔钱。俄国革命前，他将一本俄国小学生阅读的普希金传带入美国，一知半解地给我们背诵普希金。现代的经验从未触动过他。从头顶看，阿迪的脑袋圆圆的，长着棕色头发，与孩童无异，充满童真。他的脸颊和眼睑浮肿，眼睛呈猕猴桃绿。一九一七年他在威士忌酒厂失去一个手指，也许是想逃避服役自残的。有一幅阿迪和他守寡母亲的“袖珍肖像画”，作于七十年前。画中他的大拇指顶在西装翻领后。他的母亲丹娘身材矮小、肥胖，带有东方风格。尽管神色拘谨，其实面带笑容。为什么笑？如果说她的腿又粗又短，够不着地，其原因是物质世界本身就可笑地不完美，滑稽地无法适应丹娘。丹娘的第二任丈夫是个身价百万的船员，在他那个犹太教堂是个名人，一个思想正统的诚实人。丹娘是个电影迷，喜爱克拉克·盖博<sup>①</sup>，从不错过《乱世佳人》。“哦，克拉克·盖博，我多爱他！”

她老公先死，五年后，她八十五六岁时随老公而去。她死

---

<sup>①</sup> 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著名电影男演员。在电影《乱世佳人》中饰演巴特勒。

时，阿迪是个脱水苹果酱推销员，消息传来时，他正在一个偏僻的小百货店里展示他的产品。他和妻子，这对没有孩子的夫妇立即退休。他说他要重新研究哲学，他曾经在安妮阿伯<sup>①</sup>主修过哲学，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要管理家产和金钱，故无法接触书本。过去他常对我说：“艾扎，你对乔·杜威有什么看法——啊？”

等这些姓埃克斯丁的亲戚去世了，人们才了解到，他已设立了一个基金，根据遗嘱用于高等教育。按梅迪的说法，叫基金会。

“这笔钱用过吗？”

“几乎没有。”

“我们可不可以为肖勒姆·斯塔维斯的事用点基金的钱呢？”

他说：“那得看情况。”暗示他也许可以更改遗嘱。

我早已为他准备了一番陈述，他很快抓住了肖勒姆这件事的要点。“没有足够的钱来出版他一生的著作。再说，我们又怎么能证明他等同于达尔文，就像牛顿等同于哥白尼一样？”

“让我们来证明确实很难。”

“你会邀请谁？”梅迪说。

“我们得花钱请几个专家，我对大学里的人没有足够的信任。”

“你认为他们会剽窃一个无抵抗力的业余天才的成果？”

“接触灵感，常会干扰你稳定的工作……”

“假定肖勒姆是个有灵感的人。阿迪和他老婆去世了，没能享受他们的遗赠。我不想一时冲动大花他们的钱，”梅迪说，“如果肖勒姆的形象不这样高大，我对他就更有信心。”

时下的人，如果你不向他们暴露你最微妙的人性，就不会信

---

<sup>①</sup> 密歇根州地名。

任你——在户外厕所里，利奥波德·布卢姆<sup>①</sup>，他渐起的恶臭，他妻子的山羊乳房，等等。给普通人定的标准已向低层次的细节靠拢。

“再说，”梅迪说，“那是什么基督教精神？为什么他非要引用福音书中最反闪米特人<sup>②</sup>的话？在我们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不该再朝这个方向走。”

“据我所知，也许他是伊曼纽尔·康德的传人，不接受全犹太色彩的观点。同时，他声称在知识史上拥有占重要地位的天然权利，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人。”

“即使这样，”梅迪说，“为什么还要求葬到铁幕<sup>③</sup>后？他难道不知道俄国人那么仇恨犹太人——与德国一个鼻孔出气？他以为躺在那儿，就能像吸墨纸一样吸掉仇恨，治愈他们的恨？也许他以为他能——只有他，其他人不行。”

他竭力指责肖勒姆的狂妄自大。这些心理学术语俯拾皆是，咄咄逼人地诱惑我们去使用。它们都应该被铲进车里，倒进垃圾堆。

想想梅迪自己的发展很有意思。他很聪明，当然，如果你见过他如何装腔作势成胡佛时期或早期罗斯福时期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你也许不会这么认为。他追求愚蠢行为，甚至忍受新教徒<sup>④</sup>所受的痛苦，忍受丈夫和妻子隔阂不和的不幸，在性生活上自我惩罚。他会在大环商业区醉酒，像其他美国人一样，醉醺醺地乘坐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他买了一只英国哈叭狗，气得他妻子

---

① 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里西斯》里的主人公。

② 古指希伯莱人、阿拉伯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巴比伦人等。今指犹太人。

③ 西方报刊及政界用语，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及东欧国家为阻止同欧美各国进行思想、文化交流而设置的一道无形屏障。

④ 指不受天主教或东正教控制的其他任何基督教徒。

发昏。他和岳母用种种美国怪诞详尽发挥相互之间的反感。他在家时，她躲进地下室，等他上床睡觉了，她才上来去厨房冲杯可喝。他会对我说：“我送她去见营养师，我弄不懂她不吃甜卷饼和可可，却又看上去气色很好，面孔红润。”（我猜想，是矫揉造作使她身体状况出色）梅迪与小儿子是同盟；一起去钓鱼，一起去参观南北战争的战场遗址。他一生都是一个中西部人，靠写中西部户外材料生活。在戴着浅顶软呢帽的人眼里，总混杂着犹太味。六十多岁时，犹太人特征更为明显。我已经说过，他模仿的美国模式现在早已完全过时。《旧约》中的祖先们也要比他们这班自作聪明的乡巴佬更现代化。梅迪不想继承他父亲一辈的宗教，远离那种宗教，但在半赋闲生活中，在埃尔金他变得引人注目，像莫迪舅舅在他的更衣室内有过的情形一样，变得令人不可思议。因此，我对堂表兄弟的兴趣并没有使他吃惊。他自己也来了兴趣。他的脸现在变了形，长着疙瘩，但充满热情，如果我没有理会错那上面的表情的话，那么他是在祈求我对他的兴趣。他盼望亲近。

“你不会是因为与肖勒姆曾在一起散步度过美好的时光而多愁善感吧，艾扎？如果你读读他了不起的著作，你也许就能判断了。兰德公司不雇佣蠢才——过些时候我会来请你跟我谈谈那个超级思维库。”

“我看还是称之为同情好，不是多愁善感。”

在道德范畴内，这是疯狂，无知，彻头彻尾的无法无天。

梅迪说：“如果你试图对他说话，他会高人一等地给你上课，对不对？既然你对那些接合体和接合孢子不了解，你就不得不坐下听他说……”

梅迪想要说的是他和我——我们能互相理解，因为我们同辈。我们这些长大于美国街头的犹太人根本不是外国人，我们给美国生活注入了那么多热情、朝气和爱，以至于我们就是美国生

活本身。奇怪的是，正当我们在这令人羡慕的民主国内完善自我时，这种美国生活却在被遗忘。而我们的民主已经过时，带有新抽象概念的新的民主又残酷地使人沮丧。成为一个美国人其实一向是一种抽象目标。你作为一个移民来到这里，得到一个最合理的提议，你接受了，找到了目标。而在新的概念之下你又迷失了。他们要求你断然放弃个人的判断力。尤妮斯致医学院的信就是佐证。“正直”一词，可以欺骗良心。一旦接受了新的概念，你就再也无须担心是非善恶了。不用顾虑善恶的借口是你在教育上倾注了心血。你在有限的课程上拼命用功，掌握了它，你就永远清醒了。你会说：“负罪感必须消亡。人类有权享受没有负罪感的快乐。”上了这宝贵的一课，你现在能接受女儿混乱的性生活了，而在过去，这会使你休克。你上好了这一课，得到了补偿，你得感谢才是。于是，你又有新思索。很可能我们的幸存依赖于我们的思索——必须作出所有理性的抉择。听着，我根本没有离题。堂兄肖勒姆是生活在一片旧思索中的圣人，他就是真实，是个出类拔萃的人。堂兄梅迪说他不是。堂兄梅迪想提醒我，我与他是一种独特的犹太—美国人（为历史所淘汰）发展出的代表，并且要比任何已淘汰的天才们能理解的更具无限共同性。

“我想为肖勒姆做点事，梅迪。”

“我不敢保证我们是否能用亲戚阿迪的钱将他安葬在东德。”

“完全可以。假定你募集钱以便他的著作有人读……得找个生物学家来审查一下，还得有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

“也许吧。我会与遗嘱执行人着手处理此事。我回头跟你联系。”梅迪说。

我猜想他自己就是遗嘱执行人。

“我要到国外去，”我说，“也许会在巴黎见到肖勒姆。他在辞别信里提到要旅行，筹划马恩的出租车的事情。”

我把罗丁逊小姐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梅迪。

“乘协和飞机去，对吧？”梅迪说，脸上没有嫉妒。有他相伴我会很高兴。

我在华盛顿停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人商量重新由商业银行向巴西人提供贷款的事。我抽了几小时去了国会图书馆，寻找有关乔基尔森和博戈拉斯的资料。顺路去东德大使馆咨询了一下，然后给我在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前妻打了个电话。伊莎贝尔是人们最熟悉的播音员之一。三次婚姻之后，她又恢复用她的本姓。有时在欢跃的音乐之后，播出节目主持人姓名时，我会听到她的名字：“请听记者伊莎贝尔·格林斯潘从华盛顿发来的报导。”我邀请她与我一起吃饭。她说不行，可能是为我没有早点从芝加哥给她打电话而生气。她说她会来哈伊亚当酒店与我喝一杯。

相会时伊莎贝尔一再暗示的思想是，人这种动物的心理还未达到平衡。我的理解是，不仅有缺陷的、有病的、发育不完全的人很普遍（顺便说一声，伊莎贝尔既无缺陷，也无病），而且人类中的绝大多数永远也不会心理平衡。他们天生就是吹毛求疵的、烦躁不安的、动辄生气的、浑身不舒服的，他们寻求解脱这种痛苦，而又痛恨找不到解脱的办法。像伊莎贝尔这样的女人，下决心要给人留下完美平衡的印象，却反映出这种令人不快的不稳定。她认为我身上具有她已摆脱的缺点；她以我们越来越显著的分歧作为衡量她进步的标准。她很聪明，自然是门撒<sup>①</sup>（高智商）团体的一个成员。在广播中，她是快活迷人的，然而与我在一起时却一向郁郁寡欢，似乎她对自己的“洞察力”一直不满。作为一个全国知名的人物，在节目中向成百上千万听众传播开明思想。塞布尔是“全心全意的”、“投入的”，但作为一个有才智

<sup>①</sup> 成立于1946年的一个国际组织，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试中居前2%。

的女人，她心里暗自对这种开明感到痛苦。

她对我谈了芝加哥。在一定程度上，她将我等视为芝加哥。“市政委员会委员们是白色机器，一方面捆住黑人市长的手脚，一方面又一文不剩地花完这个城市的钱。而你，当然，你全明白，你一向都非常明白。你却宁可悠闲地过你的日子。”这天下午塞布尔有个显著的变化。下午四点多时，她穿得如黎明一样亮丽。她的深肤色是即逝的黑夜。黎明没有香水味。否则两者将非常相似。不用否认，她是一个风姿秀逸的女人，深茶色底色的真丝服装上配着传统的深红色图案。我们相会时，她并不总是打扮得如此风姿绰约。

假装我“全明白”是徒劳的，但她说到“悠闲过日子”时，用意相当明显。这里具有两个明白无误、相互联系的内容：（1）我特殊的爱好，及（2）我终生对弗吉·邓顿·尼·米勒特斯——一位只有八个手指的竖琴演奏家——梦恋般的关系。尽管弗吉先天有缺陷，她仍然掌握了竖琴的几乎全部演奏曲目，只放弃了几首不可能演奏的作品。她的演奏事业很成功。绝对没错，我确实从没有治愈我对弗吉的感情——那双黑眼，圆圆的脸洁白、坦率，女性味十足，充满人性或者说从中可以获得善良的保证。就连她短鼻子上微小的破损——一次车祸的结果，她拒绝移植塑料鼻子——也很有魅力。在我看来，说“女性”一词用于她身上最富有代表性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可能，我总去听她的音乐会；我在她家附近散步，希望能与她邂逅，还想像在百货商店见到她。偶尔几次的相遇——三十年中有五次——具体细节都记忆犹新。当她的丈夫，一个酒鬼，将她在印度写完的《加尔布雷斯传》<sup>①</sup>借给我时，我每个字都读了一遍。这惟有用感情膨胀或精神发泄来解释。弗吉·米勒特斯，这位缺了拇指的维纳斯，带着她充满激情

<sup>①</sup> 加尔布雷斯，美国经济学家。

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力量，当然成了塞布尔“你还是继续悠闲度日”的真正目标。我与米勒特斯—邓顿夫人也许会有幸福，犹如阿里斯托芬<sup>①</sup>爱情神话中两个分隔的人渴望团聚。我当时是个富有灵感的哲学系学生，长期乘坐喧闹的电动列车，从范布伦<sup>②</sup>街及许多当铺来到第六十三街及它的吸毒者们中间。在漫长的旅途中，我克制自己不去想苏格拉底形容的高高在上的厄洛斯<sup>③</sup>。我与米勒特斯—邓顿夫人之间的爱完全是不自然的爱之梦幻，应该遭到塞布尔的蔑视。

在哈伊亚当酒店，我们喝了杜松子酒，塞布尔发表了一番令人称奇的言论，这不像她平时的洞察力，确实不一样。她说：“我认为悠闲度日一词并不令人满意。更准确地说，你拥有一种热情，并且独自享用。你拥有一种独特疯狂的高能量。正因为这种高能量，你可以无视平庸的肮脏的事实，而其他不论喜欢与否都不得不忍受。你其实就是一个热情的宝窟，艾扎。你依赖你自己的热情宝窟生活。像其他人一样，精神不振会使你窒息。”

这是令人奇怪的一击。说得有些道理，我为此对她刮目相看。不过，我没有立刻作出反应，等空闲时再好好思考一下。我开始跟她说起肖勒姆，将他的事情描述给她听。假如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对他进行专题访谈，该受到应有的关注（战争英雄——哲学家——出租车司机）。他也许能成功激发起人们的热情，更重要的是，使公众慷慨解囊。塞布尔当即反对。她说，他会沮丧的。如果他宣称康德和达尔文的最终继承人是他，听众们会说，这家伙是谁！她承认人们对马恩的出租车会兴趣大增，但庆祝仪

---

① 阿里斯托芬（前 448？～前 385？）：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喜剧之父之称，相传写过四十四部喜剧。

② 范布伦（1782～1862）：美国第八任总统。

③ 希腊神话中的爱神。

式要等到 1984 年才举行，还有一年的时间。她还说她的节目不会一播就能起募集基金的作用。她说：“你肯定那人真快死了？你只是听他自己这么说罢了。”

“这话一点儿人性味都没有。”我说。

“也许吧。你一向对亲戚们善良。家属向你的热情泼冷水，你就投向亲戚。我过去曾想过，假如有人告诉你停尸房可能有一个堂表兄弟，你会打开停尸房的每个抽屉查看。你自己问问自己，有多少亲戚会来找你。”

这句话让我发笑。塞布尔一向很有幽默感。

她还说：“核心型家庭<sup>①</sup> 破裂时，投给那些旁系亲戚们的热情又有什么用？”

我能想出的惟一答复来自旁门左道。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为堂表亲戚间的忠诚所控制。”

“是么？结果很不错，对吧？”

“有人认为那是一个黄金时代——最后的古老的甜蜜生活<sup>②</sup>。”

但这不是我的真意。数千年的无政府状态于一九一四年达到顶峰，在凡尔登<sup>③</sup> 与坦尼堡发生的野蛮事件只不过是为一九三九年之后的更大的毁灭拉开了序幕。这又是普遍的悬虑不安——历史缝隙裂开了，枷锁在消亡（黑格尔语），数世纪的桎梏解除了。如果你意志不坚强，它会使你头晕目眩，假如你不会头晕目眩，你将会走向自由。如果无序没有使你毁灭，那它将给你创造一定的机会。当我夜晚坐在那套圣墓般黑暗的公寓里时（每次尤妮斯来看我，都对身边的环境大惑不解：“瞧这些东方的地毯、灯笼，

① 社会学用语，是指只有父母孩子两代同堂的家庭。与扩大型家庭相对而言，后者是指包括祖父母、已婚子女等共居的数代同堂的家庭。

② 原文为法语。

③ 法国东北部一城市，一次大战时法、德两军在此激战。

还有那么多书。”她说，你不会知道我正专注于思考，枷锁的消亡和桎梏的崩溃使得自由成为可能，我将如何充满热情地扑向自由。书有无数，但仅有半架管用。学识的增长不保证美德的增加。我常读的一位作家侧重于热情。他引你思考爱与恨。他否认恨是盲目的。相反，恨是条理分明的。一旦你让恨萌发，它会一路向内心吞食，吞噬你整个身躯，强化内省。它不是盲目的，它只会越来越明晰，打开人的思想，向外延伸，思索自身，最终把握自己。同样，爱也是明目的，不盲目。真正的爱不虚伪。与恨一样，爱是本源。但爱难求，恨易得。等待稀有的热情，无疑会危及你自身。若你毕竟欲求明晰，且因恨丰富，故你应设信心于恨，倾你全部灵魂拥抱它。

尽管塞布尔有能力讨论此话题，但我不想与她讨论。她仍在喋喋不休我对堂表亲戚的弱点。她说：“如果你也像对那些疯子、那些蠢笨的亲戚们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一样，对我多一些关心，我们绝不会离婚。”

“诸如此类”是暗指弗吉。

塞布尔在暗示我们再试一次？难道她是为此而亮丽梳妆、漂亮装扮自己的么？我觉得受宠若惊。

我上午去了杜勒斯，然后乘协和式飞机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等候巴西的国会议员们作出决定。我为自己的报告匆忙写下要点，然后无拘束地想其他事情。我思忖塞布尔是否要我向她提出复婚。我喜欢她所言贮藏的热情。依她所见，自亲戚们、自弗吉，我的格调已沉溺于简单的内心情感。我缺乏真正的现代严肃性。也许她以为我通过参观旧画廊、信步美术馆、洋溢于亲情、喜于粉饰的遗迹，来满足一位艺术家的需要，可是又没有坚强到能承受住极大的狂喜，也没有因虚无主义之火的洗礼而得以净化。

至于婚姻……独身生活是沉闷的，然而，要结婚也不可避免要作些不愉快的思考。我到华盛顿能做什么？若塞布尔移居芝加哥，她能做什么？不，她不会自愿移居。我们将飞来飞去，往返两地。若一件件详述，塞布尔已是个驾驭公众舆论的人物。舆论即是力量。她属于拥有巨大权威的群体。此种权威非我所关心。与保守的对手相比，她所属的群体不属于很愚蠢的蠢人，但毕竟是蠢人，且在她的行业中，蠢人比其他行业数量更大，更具影响力。

我现在到了巴黎，在蒙阿朗贝尔酒店前停车。我放弃了一家我喜欢的酒店，因我在行李内发现了蟑螂，这些黑色昆虫随我重新越过大西洋，准备征服芝加哥。

检查完蒙阿朗贝尔酒店的客房，我沿巴克林阴道走向塞纳河。这些不朽的首都依然对美国人有着极大的魅力，多么神奇。感觉告诉我，就连此地的太阳亦具不朽的形状，犹如墨西哥的日石，照亮了圣教堂、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第九大桥及其他中世纪的古迹。

晚餐后回到酒店，我收到罗丁逊小姐发自芝加哥的消息。“埃克斯丁基金愿向斯塔维斯先生赞助一万美元。”

梅迪太棒了！我现在可向肖勒姆交代了。他曾决定去巴黎，参加筹划行动，那么，如果他还活着，他明天就会出现在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而相别数十年重逢时，我给予他的将不仅仅只是同情。梅迪曾说此笔赞助应用于证明肖勒姆以科学为依据的纯哲学是否如他所称，是对《纯粹理性批判》的发展。我立即开动脑筋，思考说服梅迪的方法。我可自己挑选肖勒姆的读者，给他们一点钱——反正他们不应得厚禄，他们都是学院式的糊涂虫（瞧，对他们愤怒，是因为他们未力阻美国的腐败。实际上，我谴责他们，是他们加速了美国的堕落）。五位专家，每人两百美元，这些钱由我支付，那一万赞助费全部用在肖勒姆身上。在华

盛顿找找门路，也许可以从东德大使馆搞到安葬许可，这需花两三千美元，包括贿赂费。剩下的足够支付遗体运输和最后的安葬仪式。假如肖勒姆的洞察力确信，他在托尔葛的安葬可将全球业已膨胀的疯狂缩小成丹丸，那就值得一试。埋葬在芝加哥的瓦尔德海姆，伴随哈莱姆林阴道上隆隆的卡车声，是无法指望产生什么影响的。

为适应欧洲时间，我熬了夜，玩玩单人纸牌，纸牌奇大，无需戴眼镜。这么玩玩，睡觉时就不会仍情绪高涨。只要平静与平衡，我可以理解我的处境。边玩牌边沉思，我理解了塞布尔的指责。她说我缺乏热情的投入，毁了我们的婚姻。说起我对堂表亲戚的多情，她迂回曲折地暗示了犹太人的神秘性。塞布尔有一个漂亮的犹太人鼻子，也许犹太味太浓了点。她了解我的弱点，显眼地向我展示她的腿。她胸脯匀称，喉部光滑，臀部丰满，两腿仍能在卧室里踢蹬——我过去常称“你的跳绳的腿”。那么，塞布尔现在经过了三次婚姻，是否认为惟有我是她真正的丈夫？或是否她想最后一次与她的亚历山大对手（埃及人）竭尽全力较量一番？无过的弗吉是她一生所恨，仇恨使人条理分明，失去爱情。海德格尔亦会赞同此看法。可以说，他的思想传染了我。我打算去追求这两种使人条理分明的情感。爱不是太多，而恨则犹如氮或碳那样，无处不在。也许恨本身具有遗传性，因此它就是人身的组成部分；我们的血液也许为恨所膨胀。对于北极区内的道德冷漠，我在科里克和楚克契生活的西伯利亚环境——霜冻不亚于烈焰的严重的副极地荒漠，适合建立奴役营的地方——中发现了具体形象。综上所述，我对弗吉·米勒特斯田园诗般的感情也许可以理解为对普遍的冷漠的胆怯逃离。

我应该告诉塞布尔，面对许多年都未实现的爱，<sup>①</sup> 她是赢不

① 原文为法语。

了的。毕竟女性魅力无穷，你不拥有这样的女性魅力。

然而，我承认的真正挑战是捕捉和驯服邪恶。没有这种挑战，你将停止不前。面对新精神的诞生，却任疑虑摆布……

沉思到此，我睡着了。

上午，我的餐盘上放着一份罗丁逊小姐寄来的快件。此时我没情绪打开看。里面也许是关于事务性约会的通知，但我现在不需要它。我要去伤残退役军人协会见肖勒姆。但愿他在那儿。我在《世界报》上读到，由来自五十个国家的近二百个代表团参加的世界出租车司机协会成立大会，将于十一点举行。我将罗丁逊寄来的东西塞进衣袋，与钱包和护照放在一起。

我乘出租车急忙向圆顶大厦赶。这是一个宗教建筑艺术作品——是十七世纪的布卢盎<sup>①</sup>，十八世纪的芒萨尔<sup>②</sup>。它的壮观不时地引起我的注意。我极度兴奋，思维混乱，在我看来，这个已有裂缝的大厦圆顶与一个蛋杯差不多。我腋下的汗斑在扩大。喉头干得发燥。我去打听马恩的出租车的情况，有人指了指角落给我看。司机们还未到。我只好游荡近半个小时，爬到上层<sup>③</sup> 向下看圣日尔曼教堂的地下室。哇！多么壮观！多么美丽！如此精美的拱、立柱、雕像，还有行云漂浮、骏马奔腾的壁画，精致的拼花大理石地。我想亲吻它们。另外还有来自圣赫勒拿岛<sup>④</sup> 的拿破仑所说的沉痛的话。“我愿我的骨灰安葬在塞纳河边，安葬在我多么热爱的法兰西人民中间，安葬在这个国家的中央。”<sup>⑤</sup> 现在拿破仑安葬在重达三十五吨的磨光斑岩下，富有罗马式辉煌。

① 布卢盎，法国 17 世纪的宫廷建筑师。

② 芒萨尔，法国 18 世纪宫廷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

③ 原文为法语。

④ 位于南大西洋，属英国，1815~1907 年拿破仑一世被放逐至此并死于此。

⑤ 原文为英、法语混用。

拾阶而下时，我取出了罗丁逊小姐的信封。读着尤妮斯的信——信封里只有这封信，我清晰地觉得心里激动，或是狂喜。是坦基的第三个愿望：我再给艾勒法官写封信，要求将最后几个月的刑期判在拉斯维加斯的过渡教习所内服刑。尤妮斯解释说，过渡教习所只有基本的监督。上午签字出去，晚上回来再签到。白天时间归你，可以做些私活。尤妮斯写道：“我看监狱简直成了我弟弟获得无数经验的地方了。他毕竟很聪明，因此从监狱里学到了所有能学到的东西。你给法官谈谈这一点，用你自己的话说。”

用我自己的话说，大鱼在富丽堂皇的楼梯上摇晃了一下，内心一片昏暗，耳边响起了大海的咆哮。心中有个声音对他说：“终于来了！”他想张开一个血盆大口，用牙将信撕得粉碎。

我也想回信：“我不是笨蛋表兄，我是条能许愿、有无穷力量的大鱼。”

我一边让自己平静下来，一边将尤妮斯的来信撕成六片、八片、十片，然后在废纸篓里寻找克制。等回到集合地时，情绪已差不多复归正常，但还没彻底正常，还有些反复和不平。

大约有一百个代表团已聚集在出租车司机角落，也许用聚集一词来形容这群异常激动的人较合适。这些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戴着帽子，别着军功章，身穿制服，还有蜡染布裤子、秘鲁帽、马裤、印度皱纹马裤、非洲大红长袍、苏格兰褶叠短裙、希腊衬衣、锡克族穆斯林头巾。整个聚集的人群使我想起了由赫鲁晓夫和卡斯特罗参加的联合国大会。在那次联大上，我见到了身穿白色服装的尼赫鲁，他的翻领上别了一朵红玫瑰，头戴一顶面包师戴的那种帽子。就在那次联大上，赫鲁晓夫脱下他的鞋子，愤怒地敲着讲台。当时我正好在场。

这时我突然想起小时候在芝加哥上的地理课。我们发了一套小册子：“我们日本的小堂表亲戚，”“我们摩洛哥的小堂表亲

戚，”“我们俄罗斯的小堂表亲戚，”“我们西班牙的小堂表亲戚。”我读完了这套小册子，读到了小伊万和小孔奇塔，叙述缓慢。我向它们敞开我渴望的心。瞧，我们贴近了，我们毕竟是一家（正如坦基“毕竟”非常聪明一样）。我们不是英国佬，不是意大利佬，不是德国佬，我们是堂表亲戚。这个观念很辉煌，我们中凡是将激动的心敞开，面对世界亲戚大团聚的人是幸福的，我就是。我们将零花钱捐给基金会，用于重建二十世纪地震后的东京。珍珠港事件后，我们应当将它夷为平地。而日本儿童不可能有他们的美国小堂表亲戚这样的书。芝加哥教育委员会也从没想了解此事。

两位九十多岁的法国老人，一九一四年的幸存者。他们的出现，顿时成了人们更加关注的中心。多么令人愉快的聚会啊，我想，或如果我不是那么激动的话会这么认为。

我哪儿也没见到肖勒姆。我想我本应该让罗丁逊小姐打他芝加哥的电话，问一下情况，但他们肯定会问是谁打来的电话，什么目的。我不遗憾来到这个震撼人的大厅。事实上，我不会错过它的。我热切地盼望与肖勒姆相见。甚至准备好了对他说的话。我不能漏过他。我走出人群，在人群外寻找他。代表团的人已被领去开会的地点，我策略地站在一个门口。五颜六色的服装令人眼花缭乱。

总之，发现肖勒姆的不是我。我不可能找到他。他的变化太大了——消瘦。是他发现了我。一位由年轻妇女——居然是他的女儿——搀扶的老人瞥了一眼我的脸，然后站住脚，对我说，“我这人睡觉不多，不会做梦，不过，如果我没产生幻觉的话，这应该是我的堂弟艾扎。”

是的是的！是艾扎！肖勒姆就在我面前。他已不再是那张用傻瓜相机拍摄的彩色照片上那个老人的模样，那张照片上的他，浓眉下两眼内视。由于体重减轻了许多，他的脸消瘦了，绷紧的

皮肤再现了他的青春气息。比照片上口吐先知之火的人少一些狂热，更具生命力。他的眼睛大得出奇——如新生儿的眼睛，初次露出它们的形和神。我突然想到：我做了什么？你如何向这样一个人说为他准备了钱？难道我该说我给他带来了准备安葬他的钱么？

肖勒姆在说话，对他女儿说：“我的堂弟！”又对我说，“你住在国外，艾扎？收到了我的邮件？我明白了——你没回信是想给我个惊喜。我得发言，迎接代表们。你与我女儿坐一会儿。我们过后再聊。”

“当然……”

我需要这个姑娘的帮助；我得将埃克斯丁赞助金通知她。她将使她父亲对这个消息有个准备。

这时，我突然觉得我的力量一下子消失了。我们的生存负担不是太过分吗？我没有忘记，并观察和研究了我的堂表亲戚，而这些研究似乎确定了我自身的本质，使我始终如一。我没有将自己归入他们的行列，于是我突然得为这个疏忽付出代价。当代价有所表现时，我腿脚虚弱无力。于是，当姑娘注意到我似乎迈不动腿，向我伸出她的手时，我想说：“你想干什么？我不需要帮助。我每天仍打满一场网球。”相反，我伸手让她挽起，她带着我们两人顺着走廊走去。

石雅芳 译